

2020.09.27

為了前進的回顧。

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手冊

發意識，也要認識到他們的「民主、科學」
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以台灣人民的利益
力理解、認識台灣人民的感情、看法和向背。
些問題都曾經發生在大十年前的「光復」
呼刻刻向大十年前的光復歷史求取智慧，
能照明今天的道路。
歷史認識，是正確的。
兩個基石，是互為用的。
發意識，科學、
的意識。是站在台灣
者前提是，努力理解、認
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曾
因此要呼刻刻向大
學習歷史不能照明今天
有正確的历史認識，
因此這兩個基石



為了前進的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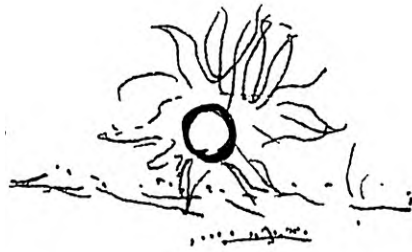
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手冊

主辦單位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人間出版社

為了前進的回顧



〈勞倫斯的沙漠〉 曾健民, 16歲

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
2020.9.27

(二) 要緊緊站在“再光復”的時代課題上。

時刻都要向~~著~~“再光復”的目標進行。除了要認識到
 台灣民衆的民族意識，也要認識到他們的「民主、科學、
 科學」的意識。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以台灣人民的利益
 為前提，努力理解、認識台灣人民的感情、看法和向背。
 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曾經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光復”，
 因此要時時刻刻向六十年前的光復歷史求取智慧，
 學習歷史才能~~照~~照明今天前進的道路。
 有正確的历史認識，不至於看不清楚而走跛躓的路。
 因此這兩個基礎是不可分割，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

曾健民

2005年10月14日

曾健民醫師：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安息歌

成幼姝 原詞
錢大衛 譜曲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指引我們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繼續向前走！

「為了前進的回顧」

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流程

九月二十七日十三時整

十三時三十分

十三時四十分到十四時十五分

十四時十五分到十五時十五分

十五時十五分到十五時三十分

十五時三十分到十五時五十分

十五時五十分到十六時四十五分

十六時四十五分

十七時整

【報到】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

【開場】獻唱安息歌、曾醫師生平簡述

【青年曾健民】來賓致詞

【曾健民醫師的文學與思想】來賓致詞

【中場休息】

【詩朗誦】海燕朗誦隊

【曾健民醫師的社會參與】來賓致詞

【家屬講話】

【追思紀念會結束】

目次

安息歌

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流程

【專題】曾健民醫師口述回憶錄

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訪談

曾健民 簡歷

六三 七

【悼辭一】同時代人的追念

致 曾健民先生

我的二哥曾健民

毒蘋果札記 二〇二〇、八、二〇 夢見會長

曾健民先生追思會的書面發言

深切懷念思想不死、精神永在的曾健民醫師

我會帶著光碟去見你——悼念曾醫師

蕭瑟秋風今又是

為社會改造的進步事業爭奪話語權的左翼戰士——曾健民醫師

曾健民醫師的台灣戰後史（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研究

徐勝 六八

曾安民 七〇

施善繼 七五

趙選秋 曾慶瑞 七六

朱雙一 八八

王墨林 九六

林一明 九八

陳美霞 一〇一

林載爵 一〇六

《方向》的戰鬥，戰鬥的《方向》——悼念曾健民醫師
追憶曾醫師

關曉榮

鍾喬

范振國

范綱璿

一〇九

人間不捨，兩岸同悲——寫在曾健民醫師遠行的日子裡

陸卓寧

趙剛

一一二

追思曾醫生——一位用左眼書寫台灣歷史的民間學者

樊洛平

一一五

【史料拔萃】曾健民醫師手稿選刊

再次面臨「光復台灣歷史」的時刻

一一一

讓這樣的歷史精神站起來

一三三

中國人民文學的脊梁

一四九

方向叢刊創刊號封面草稿與成稿

一五九

【悼辭二】我們的曾醫師

給曾醫師與夫人

胡清雅

一六三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追思曾醫師

黃雅慧

一六五

反對偽言的戰士·診療台灣的醫師

張立本

一六七

悼曾健民醫師

尹憶革

一六九

懷念曾健民醫師

李勇

一七二

致學長曾健民醫師

王睿

一七五

麥子不死

陳良哲

一七七

感念曾醫師指引我前進的方向

徐秀慧

一七九

無論如何，也要戰鬥下去……

吳舒潔

一八〇

為了黎明的國度

邱士杰

一八二

【於無聲處】曾健民醫師文選

- 點燃共同前進的火炬——對「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的初步考察 一九二
- 雙戰結構與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形成及其特質——以五十年代為中心 二〇五
- 「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關於陳芳明的戰後文學史觀的歷史批判 二二三
- 論「台灣意識型態」 二四〇

【詩抄】

- 田 間：我不曾背叛世界 二四五
- 高爾基：海燕之歌 二四九

封面照片攝影：中國時報／陳怡誠

封面設計：黃立慧

手冊編排：邱士杰

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訪談

時間：二〇一八年七月二五日、十一月二五日。

地點：台北中日牙醫診所。

主訪人：林麗雲、黃琪椿。

訪談參與人：林麗雲、黃琪椿、王慧如、呂怡婷、盧穎珊、陳冉涌。

影像記錄：盧穎珊。

整理：陳冉涌。

本文經《人間思想》授權收入紀念冊。

■花蓮的童年與苦悶的青年時代

林麗雲（以下簡稱「林」）≡稍微跟曾醫師解釋一下，我信裡邊大概有講到了，我們的研究案已經進到第六年了，是科技部的「戰後左翼口述史」計畫，是以陳映真作為線索。所以我們對今天跟曾醫師採訪的內容擬定了幾個部分。首先我們會請您談一下個人的成長，跟您以後的左翼啟蒙的關係，即使沒有關聯也請讓我們知道一下您的成長背景，包括求學、出身等等。再來就是左翼啟蒙這個階段，怎麼樣開始接觸這類思想的？然後今天有個很大的部分是要來談那個東亞冷戰會議，因為就我們所知，一九九七年在劍潭舉辦了一個東亞冷戰會議，之後就是在韓國、日本和沖繩舉辦。曾醫師大概都有參與到這個活動，等於是早在陳光興之前，陳映真已經做了東北亞左翼運動者的串聯。材料我們有看了，主要是希望曾醫師特別談談你自己在這個過程裡的經歷等等。然後就是你跟陳映真的關係，因為我們畢竟是扣在陳映真這條線索上邊；最後就是想請曾醫師談下您一路走來台灣左翼團體之間的分分合合，你在這個運動過程中自己的經

驗。總體這就是我們訪談的規畫，其他的我們再可以隨時補充。

曾健民（以下簡稱「曾」）≡大概是這個樣子吧，說起來會跟陳映真走在一起，當然與自己的出身和思想背景有關。這個就從我個人的出身成長、還有思想的變化形成開始說起吧。

我是一九五〇年出生的。一九五〇年，大家都知道嘛，陳映真的許多文章大概都要提到這個一九五〇年，它與一九四五年的台灣光復不同，而是在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中台灣進入了另一個新的所謂「戰後」起源的年代，一般就叫反共「戒嚴」時期嘛，台灣進入了完全的白色恐怖時期。我出生在這一年，就跟陳映真出生的歷史背景不一樣了，陳映真是一九三七年出生，經歷了日據末期和台灣光復，到我出生的一九五〇年他已經成長初識人事了。那時候世界冷戰和反共戒嚴風暴才剛剛起，紅色中國的歷史和思想以及紅色台灣的歷史和人的傳承還完全被根除，還殘存在牯嶺街舊書攤或是在陳映真父親的書房中，青春的陳映真還可以窺見那微弱的左翼歷史和思想的紅光。可到我出生成長，到上中學、大學的時候台灣已被徹底白色化了，年長後因自我發展的思想騷變曾到牯嶺街去尋找，也找不到什麼東西了。可以

說，我的出生和成長是在台灣已完全進入反共戒嚴的思想真空年代，這個世代和陳映真那世代的時代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思想啟蒙和蛻變的歷程也不同；我認為還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在對於五、六〇年代風靡一時的台灣亞流現代主義，陳映真一開始就「抱著批評的意見……創作生活具備了免疫力」，而小他十三歲的我卻一開始就如陳映真說的，「出了現代主義的疹」，^{（註一）}為此在脫離現實的虛無蒼白的糾葛中度過了青春期；只不過，在台灣「戰後」歷史的大脈絡中，各自在曲曲折折的挫折中，前後都走上了左的祖國派的道路，才會因緣際會地走在一起了，不管怎麼說，他還是像走在前面的大哥。

我出生在花蓮，而且是在花蓮比較偏遠的叫玉里的地方，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小鎮，六、七〇年代曾因木料業和大理石業而繁榮過，現在已經沒落了。一般人對玉里這地方比較有印象的可能是知道那邊有一家不小的玉里榮民醫院，裡面收容了很多榮民，很多是被認定精神有問題的榮民。我小的時候只知道它的存在但沒有特別認識，慢慢長大知道了國共內戰的歷史之後，才知道那裡實際上承負著中國內戰的悲劇。大約是八〇年代吧，一位曾經對我個人思想影響很大的王競雄老師，在受過綠島的長期政治牢獄後，竟然被認定有精神疾病而被送

到這地方來；他在綠島曾與陳映真同窗過，陳映真有一篇文章敘述了他對王競雄老師的印象，這件事，等後面我會再敘述。

初中、高中我就讀省立花蓮中學，十三歲就離開了玉里鎮到了花蓮市在外住學生宿舍。那時候花蓮市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大都市，我記得小時候到花蓮市還是要坐火車、那種真正燒煤炭的火車，從玉里到花蓮市不到一百公里要半天的時間，早上一大早天空還有星星的時候就坐車，到了花蓮市已經中午十二點了。所以小時候對我來說，花蓮市是個很遠的現代都市。我的初、高中六年是在那邊度過的，隨著青春期成長的潮騷還有思想變化的戰慄，點點滴滴令我難忘，那是讓我很懷念的地方，到現在我還是很懷念。那邊的一草一木，那邊廣渺蔚藍的大海，那邊的海岸浪花……從不懂事到好像懂事……我的現代生活知識大都是從花蓮市的生活開始的，比如說第一次看到道路有分隔島這樣的東西，我們玉里街道是沒有的，分隔島中間還有修長摩登的路燈，類似這樣現代的東西……比如第一次知道原來糖還有方糖這東西，以前只知道糖有散裝的砂糖或黑糖，在外寄宿生活才知道還有方糖，才知道早上起來還可以泡牛奶喝，與小時候的鄉間生活大不同，是一個新鮮的世界。

我父親是玉里附近一個小學校的校長，但是家裡有一片果園，從小我就跟著父母親一起在果園勞動，種過很多水果，種過鳳梨，種過橘子，種過花生，種過各種各樣作物至少十幾種。我父親白天上班，是一位穿著西裝威嚴的一校之長，一下班回來就換了工作服到園地去勞動，是一位辛勤的農夫，星期天也如此。用文明話說是一「耕讀世家」，但胼手胝足的農作生活是辛苦的，並不像文人說的那麼優雅；小時候對我們來說，週末、星期天不是休息的，是要到田地工作的，因此養成了勞動的習慣。在讀初中、高中的時候，寒暑假回到老家，星期六、星期天還是要去園地拿鋤頭鏟刀勞動作工，然而，隨著青春期的成長，且在外讀書過了比較「文明逸樂」的生活，在對文明的嚮往和現實的勞動之間就產生一種莫名的矛盾，這成了青春期的苦悶的來源。人家說「粒粒皆辛苦」，這確實是我個人小時候很自然的生活體認，還常常聽人說「勞動創造世界」，再怎麼浮華繁複的世界根本上還是由人的勞動創造的，這本來是一個簡單的道理，但在反共思想戒嚴和亞流現代主義的蒙蔽下不容易被認知，當然我也是到了二十歲才認真體會到這個道理，為什麼會那麼敏感地感受到這是個大道理呢？並不是因為讀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典，那個時候還在戒嚴時期根本

不可能讀到，而是因為小的時候、青春期的勞動生活經驗，使自己很快就體會到勞動的真義，流汗勞動的社會尊貴意義。這可能是我高中的時候沉迷於現代主義，後來可以很快地從現代主義走出來的原因——說很快也要好幾年啦——跟我個人從小到大的家庭勞動經驗有很大的關係。

講到我個人思想起變化，還是在初中到高中這一段時間，大約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跟大家一樣迷著讀瓊瑤——那時候瓊瑤的確是很流行的——但是上了高中就改變了，怎麼改變？改變到沉迷於當時（一九六五年）陳映真就己不斷批判的台灣的亞流現代主義去，當時摻著自由思想的現代主義思潮已經以破除舊思想的進步姿態來到我們生活周邊，最具體的，比如說《文星》，現在大家比較不知道的袖珍本《文星叢刊》，後來又有《文星》雜誌嘛，李敖也主編過，比較是屬於自由派。那個時候剛好上高中，有一位住同一宿舍、高我一年級的同學，他會去郵購《文星叢刊》讀，那時候會去郵購台北的書讀就不得了了啊，我也學著去郵購《文星叢刊》，影響我最深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王尚義的《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註）。那一本小書，那本書表達了王尚義對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的感受和詮釋。書裡充滿著失落啊，荒謬啊，虛無

啊……像這樣的感情思維、想法，的確吸引了思想剛要轉型的、青春期的青少年。為什麼呢？因為現實和理想的

矛盾太大了，在那個時候沒辦法認知是來自青春期的憂鬱呢，還是來自環境造成的苦悶呢，王尚義的文字和感情吸引了我。這個矛盾和衝突一直存在，後來等我了解到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戰後社會史以後才知道，其實一九六〇年代正是台灣整個社會大轉型，社會變動激烈矛盾最大的時期。首先是經濟上從進口替代轉變到出口導向，出口導向有一個很大的前提就是要創造大量的工廠勞動力，都要來自農村，那時候農村幾乎是破產的，因為農村的破產，所以很多農村的青少年一批批送到了工廠，我的周遭，譬如說，小學一個班級五十幾人，上初中甚至高中的不到五位，大部分都只有小學畢業就到工廠。後來我十九歲高中畢業考上屏東農專的三專，那時候是叫大專「聯招」，三專是和大學一起聯招，分甲、乙、丙、丁組，我選考了丙組，考上屏東農專算是吊車尾，到了農專就認識了詩人吳晟。一直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了，他還是我最好的老朋友。雖然後來各自的政治立場有不同，但還是無礙於朋友關係。就我在認識他的前後，吳晟開始寫作了《吾鄉印象》^(註三)詩系列，他的《吾鄉印象》實際上是一九七七年前後鄉土文學創作裡最好的、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反映了當時台灣農村破產的實際情況。

在這同時，隨著經濟上出口導向的變化，美國式大眾文化和價值也紛紛進入台灣，以時髦之姿來到了後山花蓮，特別影響了當時堪稱花蓮最高學府的花蓮中學；從初中一個夜晚跟著大家群聚在校園爭看花蓮架設的第一台模糊不清的電視機開始，小型電晶體收音機成了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收聽中廣陶曉清主持的美國熱門音樂每週排行成了與美國最流行文化的接頭，手提唱片機響出了最流行的 Pop，從委託行流出的牛仔褲和有顏色的 T-shirt 更在時髦的同學中流行，男女同學的家庭舞會也悄悄進行……不知不覺中，現代主義和美式大眾文化生活和時尚一起悄悄地改變著青年的想法，在空泛的夢想中看不到現實的劇變和痛苦，只帶來了新的茫然的矛盾和挫折。就是陳映真早在〈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文中就敏銳指出的那種台灣現代主義：「變成了一種和實際生活、現實問題完全脫了線的把戲……不是徒然玩弄著欺妄的形式，便是沉溺在一種幼稚的，以自我那麼一小塊方寸為中心裡的傷感。」

再說到讀王尚義那本書的時候，哇，反覆讀啊，他反映出來的一些思想吸引了我，我接著又去買更多的書

讀，就是這樣進入了當時台灣相當普遍的也是相當強大的現代主義思潮裡邊。那個時候花蓮市的書局也放有很多書和雜誌，譬如說《現代文學》啦，《台灣文藝》啦，還有《劇場》，還有《歐洲雜誌》、《創世紀詩刊》……有好幾種算是小眾的文學雜誌，即使蒙上了灰塵，它還是擺在那邊賣，跟現在比起來就完全不一樣了，現在的書局完全是利潤導向，一個月賣不出去就馬上下架，現在很多小眾的東西根本不可能在書店裡生存，甚至連架上都擺不上。我那個時代，台灣的資本邏輯才剛剛開始，還沒有那麼普遍深入，因此，在花蓮後山那樣的環境中，還可以讀到的這些文藝雜誌影響了我，比如在十五、六歲時初讀到《劇場》雜誌時，被它的前衛性和譯介的西方前衛戲劇的內容所吸引，記得當時有一期譯介了亞蘭·雷內（Alain Resnais）導演的《廣島之戀》全劇對白，我還把它反覆抄記。

那時候花蓮中學也新建了圖書室，環境好、可望海，圖書室裡訂購了各種各樣的雜誌，譬如說當時也訂了《文星》雜誌啊，我還記得《文星》雜誌被禁刊那一期，有同學讀到不錯的文章，就偷偷帶著小刀去把那篇剪下來；像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剛剛在台灣復刊的時候，我們的圖書館居然也訂購了，我看到這個雜誌後，

雖然知道它裡邊沒有文藝欄，但還是試著把我寫的第一篇小說（一種離棄）——大概只有三、四千字吧——寄給它，那是高中一年級的時候一面上課，一面寫的東西。寄去之後，主編竟然很快給我回信，稱我「曾先生」——那時才十六歲被尊稱為先生，讓我的確十分受寵若驚——他問「可不可以自我介紹啊？」他說「你這篇文章很好、太好了，太吸引我了，我破例使用。」我回信說，我還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哪，後來他就不再給我回信了。但是文章是有刊登啦，因為已經先登出了，稿費很高啊，當時有三百塊，學生的宿舍費包括吃的和零用費一個月也不過三百塊，所以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筆蠻大的收入，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嘛，接著就又再寫，比如說在書店看到《台灣文藝》也試著投去，也給我登了，記得有兩篇短篇小說，但是沒有稿費，只用贈閱雜誌代替。這樣子就跟吳濁流有了一點關係，因為吳濁流那時候才剛剛創辦《台灣文藝》，說真的也賣不好啦。後來吳濁流出版了自選集，一個漢詩集，一個小說集，兩大本好厚，他簽名寄給我，那時候我還在現代主義的思想裡邊，對吳濁流的作品沒有興趣，就把它放到一邊去了。後來因為生活的變動這些早期的作品幾乎散失無存，最近我再到圖書館去查，還是找到了。

後來不斷地有了一些創作，也不多，但算是不自知地闖入了文學的世界，也進入了糾葛的思想世界……比如高三的時候認識了王拓，當時他用本名，叫王紘久，師大國文系剛畢業，分發實習的時候來到花蓮中學，他沒有直接教到我，但一些年輕的老師來學校教書還是引起注意的。記得第一次遠遠見到他時他穿著長袍馬褂，叼個煙斗，一個五四青年的、自由主義的樣子，我印象很深刻。當時他也訂閱了《東方》雜誌，剛好有一位他教的學生跟他說《東方》雜誌中有一期登了我們高三同學的作品，他好奇直接來找我，就這樣認識了。我們就一起創辦了校刊《海燕》，校刊的內容引起了學校特別是其他國文老師的不滿，當時的國文老師大多是年歲較長的外省籍老師，都固執於維護古文傳統、反對五四運動。這些老師看到王拓搞這樣有自由氣息的校刊，而且我一個高三學生還跟他一起搞，引起了這些國文老師的憤怒，引發了一場不小的校園風波，連學生之間也分為兩派，我也受到波及。當時台灣的文化形勢，還處於傳統中國古文派和西化五四派之間的論爭中，算是大陸的五四論爭在台灣遺緒，代表的就是李敖和徐復觀之間的一中「西文化論爭」。

後來我高中畢業，王拓也一年實習期滿後離開了花

蓮，之後斷斷續續有聯繫，一直到他當了立委後才漸疏遠，但還保持聯繫，有一次他出來選基隆立委我還捐了不小的一筆錢。高中畢業後考大專聯考，成績不好考上了屏東農專，認識了詩人吳晟。吳晟同是三專學生，比我高幾屆，但他讀了比較久，我進農專時他還在學校，當時他主編一本校刊叫作《南風》，我一到農專就投稿校刊，因此認識了吳晟結為好友，記得當時林載爵他們在東海也有一個校刊《東風》，真相映成趣。在《南風》還認識了詹澈，第一次碰到詹澈的時候他是五專三年級，等於是高中三年生吧，年紀比較小，他那時候就已流露了濃厚的鄉土氣息，很有活力，會打各種土拳啊，台灣民間社會的各種拳他都會打，那是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前後，台灣鄉土浪潮來臨的前夕。在校刊我也寫了一些作品，有小說也有散文，有一篇短篇小說題為〈壓下的山影〉我印象深刻；因此一直跟文學結緣，但是又進不了所謂的文學界，只是在文學邊緣。現在看來，我是從文學的泥沼進入思想的糾葛世界，借陳映真常說的一句話，大意是說：有了文學，思想才顯得豐潤而不乾澀。我經常以此自勉。

吳晟和詹澈兩人有「瑜亮情結」，從一開始兩個人就經常互相批評詩風，但是兩個人都很傑出，詹澈一直沒

有改變他的風格和他的思想，且自覺地追求突破和創新；對吳晟，我一直帶著老友的寬容或者是帶著真誠的社會感情認識他的變化，他的變化也是台灣一九八〇年代社會矛盾遞嬗的表現，我認為有它的道理，有其合理性。

說到自己思想變化的經過，很漫長又充滿荊棘，簡單地說就是要怎樣從亞流現代主義走出來，又要走到哪條路去？那是當時很普遍的困惑，或者說是那個時代的命題。那時候也沒有認識陳映真哪，而且陳映真還是很遙遠的一個存在，實在說，高中時我還比較喜歡七等生的作品呢。陳映真在一九六八年被關了以後，才成了一個反抗體制的謎樣的人物，在屏東農專時就經常同吳晟談到陳映真，我記得很清楚，在吳晟住處綠園不知道怎麼樣經常談陳映真談到深夜。

白色恐怖雖然還沒有來到身邊，但社會的學業的壓力已重重壓在身上。當時考大學很困難，特別是我選的丙組錄取率還不到兩成，也就是十個人裡邊只有兩個人可以進大學，剩下八個人在大學外邊，得再重考。我為什麼會去選丙組不去選文組呢，當時就認為文科我自己讀就好啦，為什麼要去讀大學呢，而且那時候有一種風氣，認為讀理工才可以學到東西，而且我從高中起就對生物學的世界特別有興趣，特別對遺傳學部分，而我們

考的丙組，就是叫作農醫組，農醫組一定要考生物，甲組就是理工嘛，理工就不要考生物。考上屏東農專畜牧科讀了一年後沒有興趣，準備重考，但重考失敗，那是一九七〇年。失敗那一年挫折感特大，就一個人跑到中部橫貫公路太魯閣、再進去幾公里有一個比較少人去但當時很有名景點，叫長春祠，從長春祠旁邊再走上去有一個廟，叫禪光寺，那時候廟剛剛建好，有很多廂房可住，就跑到那邊去住下來了。可是躲到那邊去的那個暑假，是一個充滿挫折和思想大轉變的暑假，在那邊我認識了一些重要的人，更重要的是認識了影響我後來思想變化的王競雄老師。

王競雄老師應該是國共內戰的時候，以一個「娃娃兵」被帶到台灣來，到台灣後很早就去考大學進了台大哲學系，刻苦讀到台大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陳鼓應跟他大概是前後期。台大碩士畢業後就到文化大學去當講師，那個時候有一個叫洪惟仁的學生追隨王競雄讀書（後來他專搞台語研究，現在在台中的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書），那個暑假洪惟仁也跟著王競雄到了花蓮的禪光寺，我們就在那邊碰面了。那時候王競雄只帶了一套衣服，然後兩擔書，他每天戴著一個大斗笠，拿個拐杖，在長春祠陡峭的山路上來回散步。他說要創造一套哲學

理論，叫作什麼我一下忘掉了，對了，好像叫漩渦理論，而且他說毛澤東是偉大的人，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好像聽到了一個不該聽到的秘密，一時難以接受，卻也衝擊了我渾沌自憐的亞流的現代主義世界。當時有兩位花蓮中學的高中生暑假住到那邊，也認識了王競雄，叫他老師，其中一位後來也讀了台大哲學系，另一位世新畢業以後……啊這個我後面再說吧……禪光寺的那個暑假也碰到後來成為散文家的陳列，記得當時聽陳列說他到那邊是為了躲避女朋友，他剛從淡江畢業……

林：那時候陳列還沒有入獄嗎？

曾：還沒有。那時候陳列剛好淡江外文系畢業，他本名叫作陳瑞麟，嘉義人，他比較後來到禪光寺，那個時候陳列就像一般外文系畢業的學生一樣，還沒有改變，記得還一齊去溯野溪立下霧溪戲水玩耍，在人跡罕至的大自然中脫除世俗煩塵、回歸璞真。後來，我因年紀已到二十歲，收到兵役徵召單必須去當兵，才離開了禪光寺，我是先去當大頭兵，然後再去讀醫學院的。陳列是後來才離開禪光寺……之後很久沒聯絡，只聽說後來因為他喜歡花蓮就跑到花蓮的一個叫花崗國中的地方去當老師，到了那邊因為上課講話內容……大家都知道，在戒嚴時期即使在國中也是有很多抓耙仔，他就被檢舉了，竟然被

關了十年，受了無妄之災。

黃琪椿（以下簡稱「黃」）：在哪裡當兵？

曾：哦，說來話長。先到馬祖，而且還不是在馬祖本島，而是到了北竿啊。南竿是主島嘛，到了南竿還得坐小艇去北竿，搖來搖去就想吐了，因為小艇船體是平的，所以風浪大的時候搖得很厲害。北竿的前面就是亮島，沒居民，那個地方等於是馬祖與大陸的交界地了，在北竿的一年沒水沒電，只有在巨石下自然滲流出來的小水池邊盥洗，晚上在碉堡中點蠟燭看書。我就在那邊一年，後來調到金門又待了一年，算是金馬牌。那時候相當辛苦，一方面呢，自己的思想不斷地異變發展，但是當兵的現實壓迫又很大，無可訴說只有深埋內心自我發展，這個衝突是相當大的，就像陳映真在一些文章裡談到的，比如說他看到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啦，或者是在舊書攤裡邊讀到一些左的書，知道自己的思想的豹變以後又不敢告訴任何人，深藏在內奧裡無可訴說的苦悶，就只有轉化為小說來抒發。

我當然沒有陳映真的天分，可以把苦悶轉化為小說情節，只有往更極端去變化，那個極端是怎麼樣的呢，大家都知道，那時大陸文革正沸沸揚揚還影響到世界潮流，日本反安保鬥爭、美國的反越戰平權運動、美國熱

門音樂、還有台灣剛開始的現代詩論戰在在都有它的印記符號，我自然往大陸的革命理論和思想或文化大革命去尋找思想出路；但那個時候不是可以讀到那些簡體書或者是像陳映真那樣可以躲在棉被裡聽微波廣播——沒有那個條件，只有通過自己感受到的時潮的簡單符號印記和顛倒讀軍中反共教育讀本，來想像大陸的革命理論。

反共讀本就是批判「毛匪澤東」的理論那一類的，說什麼階級鬥爭不是階級鬥爭啊是階級共存啊怎麼樣的，但是裡邊會引用一些馬列毛的文字，我是從那邊顛倒讀到隻字片語，是在這樣顛倒的、想像的世界裡簡單地認識到當時沸沸揚揚的文化大革命。至少知道了文化大革命是為人民、為勞動的簡單道理，這又剛好符合了我當時在汗水塵土中打滾去掉了蒼英外衣的當兵生活。

林：莒光日的反共教育那是通過上課還是看影片？

曾：主要是上課，很少看影片。我記得有一個莒光室，當然擺有電視機，比如說一個連隊有一台電視機，但電視機還是供休閒娛樂用的，主要的還是通過政戰書本，莒光室裡邊就會放一些薄薄的政戰教材，每週都有一個莒光日上政戰課，很少放影片。放假日自己也會到外邊去買書，比如說當時有個黎明書局，出版了很多批判共產主義的反共教本，我也去買了顛倒讀，是在這樣的情

況下，自己還偷偷地寫了一些小筆記。

林：所以那時候你是自己讀書，也沒有朋友？

曾：沒有，在軍中沒這條件，了不起放假去找吳晟或其他朋友，但不會觸及自己思想的豹變。我真正地有所謂的同道朋友或有同志，是從日本回來以後的事了。所以我的改變是自己的孤獨的改變，相當的艱難。當時台北這個地方是一個大都市，實際上我很少來這個地方，當兵的時候偶爾經過而已，所以台北的文化圈或台北的這些文化人我都不認識。但是，在我當兵的時候，突然，洪惟仁跟王競雄他們私下組了一個團體，叫「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

林：哪一年的事情？

曾：應該是在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我記得剛好是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不久。後來才知道，那個團體有名稱卻沒什麼活動，大概只見了幾次面就被檢舉了。洪惟仁跟王競雄就在那個案子裡被判刑的。但是我因為當時還在當兵，他們聚會我也沒有機會參加，可是因為是朋友的關係，也被牽連了。

黃：被牽連是指也被約談？

曾：對，也被約談了。但是約談是軍方，不是警總，因為當時我在當兵嘛，大概偵訊了一、兩天吧，徹夜沒法

睡覺，後來就把我放回去了。可是那個衝擊是很大的，突然來了，把你帶走，瞬間失去了自由、孤立無助，因為那時候也沒有朋友，有朋友也沒法子，只有一個人去面对不知結果的深淵，父母親當然也不可能知道。是一九七二年的時候，我正在桃園當兵，在桃園軍用機場那邊。

林：所以你是先到北竿，再到桃園……

曾：對，到桃園，再到金門，在金門退伍的。記得是一個有薄霧的早上，突然連長叫我去連長室，那個老連長叫柯瑞國，是四川人，娶了一個台灣太太，住在屏東。當時他對我講話的內容我還記得很清楚，他說「你還年輕，像剛剛長出來的新芽，不要被捏斷。」他沒有告訴我什麼事，接著就有一台吉普車來，把我帶走，我還記得很清楚，從桃園一路經過龜山、泰山，路邊都是工廠，那時候應該還沒有高速公路，還是省道。那種感覺，就像陳映真在文章中記述的他被抓的時候的情景，是很像。因為你不知道那邊是什麼，完全不知道，但心中揣測著或是一道可怕的未知的深淵。在白色時期，因為你思想的突出，很容易從文學碰到很嚴峻的現實、很嚴峻的高牆，就不得不進入思想的領域去。後來洪惟仁被判了十年，王競雄因為他在綠島堅持自己的良心和信仰，不

屈服、不服從，就被關到獨居房，獨居房是對政治犯最嚴峻的處分，一個人被關在一個斗室裡面會發瘋的，不瘋也會變瘋，後來他被認定為精神有疾病被送到玉里榮民醫院去了。陳映真曾經告訴我幾次，如果他有能力一定會再去調查王競雄的生平經過，但可惜一直未實現。

（註四）

最近一、兩年我偶然從一個朋友那裡拿到了王競雄當時被抓時候的自白書複印本，讀了之後心情相當的沉重，真如撕開了不願再見到的傷痕……洪惟仁呢，他在綠島的時候恰好跟陳映真在一起。陳映真比他早出來，聽說洪惟仁跟陳映真說「出去後去找曾健民」，陳映真在一九七五年出來之後還不敢馬上去找人，怕給人帶來麻煩，後來到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前後他才通過吳晟告訴我，說他想要找我，我就到陳映真家去拜訪，在景平路那個地方，去了好幾次，是這樣的因緣我們認識了。退伍以後我考進入高雄醫學院，現在叫高雄醫學大學，讀牙醫系。那以後就完全走自己專業的路了，但是我的思想、知識還不斷地發展，但無心創作也不可能有的發表的地方。高醫畢業後考取醫師執照，不久就去日本九州齒科大學讀研究所，因為孩子已經出生要養家活口沒條件讀博士班，就在那邊考日本的牙醫師執照，考上

了牙醫師執照就到日本北海道執業。說起來，我真正可以自由閱讀馬恩毛原典是到了日本以後，特別是在我開始執業後有那個條件才開始的，那時已三十二歲了。

■在日期間的自我成長

林：您是哪一年到日本？

曾：一九八〇年。因為我是一九七九年牙醫系畢業，牙醫要讀六年，畢業了要考國家考試，國家考試過了，在台灣上班上了一段時間，不到一年，申請到日本的九州齒科大學入學許可才到日本。

林：您診所叫中日是有這個意思嗎？

曾：是。後來因為我女兒已經出生了嘛，我自己也沒什麼錢，得趕快工作，剛好找到北海道南方函館市附近的一個漁村，就在那個地方開診所。我在九州齒科大學讀了一年多。在讀研究所的時候順便也就考上了日本的牙醫執照，有了執照才能工作。到了北海道函館，開業了也就安定了，我就到東京內山書店去買書。

現在手邊用的一九六四年大陸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是當年在內山書店買的，買了以後寄到北海

道家中，初次跟年輕時在恐怖的禁忌中自己想像的、夢想的思想世界見面，如獲至寶，終於可以在光天化日下閱讀人類解放的經典，如飢似渴；每天看完診之後在寧靜的北海道夜晚自己閱讀，特別在暗無人聲的雪夜中展讀、思考原典的幸福感，一直令我難忘，因為過去長期間自己在暗中跌跌撞撞對左翼思想摸索，很快就領會了其中的道理。

林：大陸的一九六四年版？

曾：對，好像是大陸最早的全集版本，三十七卷，我現在還在用啊。後來我一九九二年從日本搬回來，是用貨櫃搬回來的，東西太多了。這套書在海關還被特別檢查，託人去關切才放行，書還被用刀子劃過，可見得那時候反共戒嚴的遺緒還在。

黃：那個年代會去日本留學的不多，曾醫師是怎麼想到去日本的？

曾：是的，那時候大部分的人都去美國留學啊。因為到美國讀牙醫學費比較貴，美國的牙醫執照不好考，又有各種各樣的限制，我沒條件去，而且我在大學的時候就跟日本一些牙科的教授有一定的認識，因為有私人的熟識所以他直接發研究生的入學通知給我，就順理成章到日本去了。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真的是很夭壽，對

醫事人員的出國有很嚴苛的限制，如果你的身分證上登記的是「醫事人員」，就不能用「醫事人員」身分直接出國，必須在台灣醫院服務滿十年才能夠出國，所以除了用學生身分出去留學之外，一般用「醫事人員」身分是沒辦法出境的。我到日本去讀書考到執照準備去日本工作的時候就被卡到了，我要出去工作，結果規定你要在台灣醫院工作十年才可以出境，因為我的身分證職業欄登記了醫生，後來有人教我一個變通的辦法，去改身分證職業欄，改成某某公司的業務經理，然後這個公司再發個證明給你，以業務經理的身分才可以出境，我被折磨了一段時間。

林：所以你是到日本後，才開始研讀馬列等左翼的理論？

曾：對。一九八〇年初台灣還在戒嚴中。

黃：您怎麼會找到內山書店去？

曾：那時候我知道有內山書店，但不知道那裡有賣大陸版的馬恩全集……在東京神田，我去逛，就碰到在賣中國書，反正就是突然碰到的，除了買馬恩全集還買了一些政治經濟學讀本、毛選，那本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註五）}就是那時候買的，後來在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上也用到了，記得當時也在那裡買到了葉芸芸他們辦的《台灣與世界》雜誌。

林：所以相較於有些人的「左翼之途」，你比較偏向自學，就是一個人摸索？

曾：對，自己讀，也是比較孤獨。我去工作大概一九八二年吧，所以我在北海道開業是十年。那十年算是最好的時光，我可以好好地在那邊讀很多書，自己讀。當然這期間陳映真偶爾也會寫信給我，那時候我已知獨獨派的勢力已經起來了，而且集中批判陳映真。陳映真寄一些資料給我叫我寫一些評論，但我一直沒寫，反而對剛崛起的日本右翼竄改歷史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寫了一系列批判，陳映真把部分刊登在《人間》雜誌和《中華雜誌》上。

整個十年在日本讀書，自己讀，沒有參加社會活動，也是生活最安定的十年吧。當時從台灣去日本開業的醫生同行還是不不少的，滿十年了都要面臨選擇繼續留在日本或是回國的問題，要留在日本就只有兩條路，一個是申請歸化，一個叫永住，永久居留。一般醫生身分申請歸化日本很快，只要提出申請一定會過，申請永住的條件就相當的嚴格。申請歸化呢，對我來說有個大難題，就是要改成日本姓名，雖然有人已經給我好了，說你就叫曾根也可以啊，還留個曾呢，後來還是因為我個人的民族感情沒有選擇改名歸化，還有我一直想要實踐我

個人年輕時無法實踐的理想，再有我想到我女兒，因為她那時候已經小學中年級了，再繼續留下去就要變成日本人，所以我就毅然結束在日本的診所經營搬回台灣，雖然當時絕大部分在日本的台灣籍醫生朋友都改了姓名歸化當日本人了。一九九二年底回台灣，那是台灣最亂的時候，那時候台灣從一九八六年起發生的泡沫經濟剛破，留下高房價、高地價、高股價和高物價，金錢炒作漫天，社會風氣浮躁，政治上也是李登輝剛要起來，國民黨內部新舊勢力鬥爭很激烈的時候。我還記得，剛回來時我還支持民進黨起來，但並不認同他們的台獨綱領……而且那時候還認為李登輝是站在正義的那一邊。

黃≡一九九二年的時候還是認同民進黨，然後你覺得李登輝還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曾≡對，應該說是支持民進黨起來。那時候對於李登輝在國民黨內跟老法統的鬥爭，我是肯定的。李登輝的改變，我記得很清楚，是在一九九三年他正式掌權後，利用千島湖事件炒作，鋪天蓋地的惡意反中宣傳開始的。我回來以後，先去潮州街九一號五樓找陳映真，他不在，但事先託他弟弟陳映朝送我一套《台灣政治經濟叢刊》。我記得很清楚。我記得一九九三年年初吧，後來陳映真到診所找我，我們談了很久，後來就一起成立了台灣社

會科學研究會。我從日本回來前就買了這個房子，買了就裝潢準備開業。一回來就住在這邊，我診所的另外一邊是住家。

在診所從事牙醫工作時，我很專注，自我要求很高，且我憑牙醫專業良心看診，跟一般賺錢的牙醫不一樣；為了實現牙醫工作之外的社會實踐，占用了我大部分的時間，不得不大幅縮減看診的時間，我和我內人經常自我嘲諷，說牙醫只是我的副業，我們只是窮牙醫。還有，我可以順利從日本搬回來，也是要有老婆的配合。不管日本社會怎麼樣，對老婆來說在生活上還是比較方便的，而且牙醫的社會地位也好，所以沒有老婆對我的心志特別體恤的話，很難回來的。我做這些事沒有老婆的容忍、配合不可能做到……畢竟不賺錢去做這些事……一般不太可能。所以我的序言裡邊都要感謝老婆。

■參與創辦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林≡你說你們就成立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這個有多人參加？

曾≡那時候的創始會員，有我、陳映真、汪立峽、舒詩

偉、陳國坤、金鴻文，還有一位當時在成功大學讀碩士的韓國留學生叫申正浩，以及一位搞工運的顏春賢。二〇〇九年那個交大辦的陳映真研討會上，我發表的那篇論文（九〇年代的陳映真）中基本上交代得很清楚了。

黃：是誰說要成立這個研究會？

曾：是陳映真。

黃：他怎麼跟你們說？他為什麼想要成立這個？

曾：我們成立這個研究會時，有一個經過大家共同討論通過的宗旨，^{（註六）}其實那之前陳映真請我先起草一份，但大家討論沒通過，後來陳映真才親自動筆，他一直有這樣謙讓的美德。這個宗旨實際上跟陳映真為什麼要辦《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的原因有關係的，他在《叢刊》的〈出版贅言〉裡邊也特別說，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論，也不能只停留在感情論，而要歷史地、科學地、實證地認識台灣社會，這個認識和實踐是很重要的。

陳映真從一九八〇年代初被點燃的中國結、台灣結爭論開始，就飽受獨派的集中攻擊，因為那時候國民黨還高高在上一黨獨裁統治著台灣，而民進黨還沒有成立，陳映真和獨派還同是受國民黨的壓迫，陳映真也不好重手回應批判，一直抱著隱忍、不好正面對決的態度。這樣一個時代背景裡他創辦了《人間》雜誌，《人間》雜誌

當然不是思想理論型的刊物，它是以感情和藝術形象為訴求的東西，不是直接用社會科學的語言，而是用現實社會生活鮮活的影像來呈現、來批判社會現實。《人間》雜誌停刊後，接著創刊《台灣政治經濟叢刊》以及創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和《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這些應該跟他對整個一九八〇年代的反省和再出發有關；另外，

他從一九八七年寫了〈趙南棟〉後一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再寫〈歸鄉〉，小說創作停了十年，為什麼會停了十年之久？這在他的一些文章中也表明過：自己思想沒有出路的時候就沒辦法創作；現在來看，八〇年代末他小說停筆應該是面臨了思想困境，要克服，要超越泛泛的感情論，要超越高滔的道德論，要以社會科學來認識台灣的社會歷史，來認識台灣社會的根本性質問題，通過這樣的認識才會有追求台灣社會的變革動力，亦即，從社會科學找思想的出路。由此我們也可認識到，陳映真所謂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和「台灣社會變革論」，是一體兩面的，沒有性質論也不可能沒有變革論，只有變革論沒有社會性質論也不可能是一個好的左派論述。這也是我們一會兒要講的台灣左翼運動道路的問題。

林：當時為什麼會找這些人參與？

曾：這些人主要是陳映真找的。哦，還有一位叫官鴻志，

但是官鴻志很快就離開了，還有一個當時《人間》的助理鍾俊陞，後來林一明、施善繼和他夫人曾淑霞也加入了，再後來的林孝信這些人算是創始會員。

我們這個研究會呢，人員進進出出很多，我估計前後大概有兩百位吧。有些人只來了幾次，有很多年輕學生。我們剛剛成立的時候，每週都聚會，陳映真每週都出席嘛，可能是因為慕名陳映真而來的關係吧，有一陣子突然有很多年輕學生來參加，我感覺到其中會不會混有情治單位的人，因為那時候真正的白色恐怖還沒有完全過去，情治單位還到處在監聽，搞左的理論還算敏感的時期，為了因應，我要求學生留下親筆寫的姓名跟住址電話，或許當時我們都有一種「一朝被蛇咬」的過敏心理在作祟吧。

林：你的意思是說裡邊可能有些來自不同的背景或立場？曾：對，就會警覺到會不會有情治單位混進來的人。在我們這些團體，我們指的是泛左統派這些團體，當時都不斷有這樣的疑慮和傳言，因為這些團體本來就一直是被台灣統治者忌視，處境很困難，難免有政治的「過敏」症，會憂慮「這邊是不是有竊聽器啊，那邊是不是有監聽啊」，然後「你不是國民黨那邊派來的啊」等等。說這些，只是想表示研究會在九〇年代初創時的特殊處境。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所做的工作還有研究，我們一開始的讀本是陳映真指定的，先讀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那是一本經典，而且很容易讀懂。還有讀矢內原忠雄那一本《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註七)，接著就《台灣政治經濟叢刊》一本一本本地讀。是這樣開始的。

林：所以這個階段學習的成分居多？

曾：嗯，學習是不斷地在學習，可是那個時候就會不斷地碰到很多撲面而來的對台灣「歷史文化思想」認識問題的挑戰，這不是在街頭的政治抗爭，必須很快地基於社會科學認識進行回應和批判。陳映真也不時強調我們不是一個黨的组织，我們只是一個研究團體，而且是一個有著左的思想批判和實踐的團體，這可能與陳映真一直感嘆台灣一直沒辦法建立出一支有批判性的左翼理論隊伍有關係。他不斷地講啊，「我就是很討厭理論嘛」，理論不是他的專長，但他為什麼要捲起袖子自己搞呢，實際上就是因為周圍沒有一個左的批判性的理論隊伍。陳映真不斷地在問，如何結合左的理論和中國大陸、台灣的左翼歷史傳統來批判現實，闡明台灣社會的根本性質和台灣社會變革的道路。只要好好地《陳映真全集》翻一翻，其中許多篇章都要講到這個東西嘛，他的社會

性質論不但要從一九五〇年代講起，也要從台灣光復或日據時代開始講起，可是很可惜，就是到了現在，這種批判視野還沒有生根哪！

林：我問一個問題，就是剛才你提到台灣左翼思想的整理和建設是很重要的。你提到了兩個單位，一個是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一個是出版。您提到這些人員我有兩個比較不熟，就是金鴻文跟申正浩。當時你們跟陳映真共同在想這些事情，那當時你們為什麼想要找這些人？包括陳國坤、舒詩偉等等，其實就班底來講都不是原來的，汪立映可能比較早，《夏潮》就開始認識了，但舒詩偉是美國回來的嘛，陳國坤是在《中國時報》而且跟黨外關係也蠻密切的，官鴻志是《人間》的老班底，好像從《夏潮論壇》就開始了。那申正浩和金鴻文呢？你可以不可以講一下你們找這些人的考慮是什麼？

曾：人員的聚合主要是陳映真的關係，因為當時我都不認識這些人。我想陳映真應該曾跟其他的朋友提過要成立研究會這件事，可是當時會走進來的，就這些人……我說陳映真的孤獨就在這裡。後來我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不斷地有活動，很多朋友才陸續繼續進來，比如說林孝信、黃德北、陳秀惠、杜繼平、范振國、林深靖，後來的林一明、臧汝興啊，這些現在你們大概都知道的人，

都曾經來過一段不短的時間。

林孝信剛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他就先到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這邊來的。他還擔任過講座的講師，比如說後來我們有了知識的積累，還曾經對外辦過一系列「認識中國」的講座，二十幾講，那時候講師就是林孝信、杜繼平、黃德北，分別講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個講座還要收費的，參加費兩千塊，二十次都出席沒有缺席的人退還費用。

黃：二十講，每週一次？

曾：每週一次。

黃：基本上要進行很長時間啊。

曾：很長時間啊。而且累計了不少資料，那二十幾講我們是正式地對外招生，有不少人，整個人間五樓滿滿的，幾乎快坐不下了。就是我說的，進進出出，不下兩百人。我們也請人來會做專題報告，比如說我們為了解解當時的後現代問題，也邀了陳光興到研究會來報告過，報告了兩次吧，那時候還留下一張照片呢，陳光興、陳映真跟我三人，大家當時還很年輕，不像現在，都老了。為了要讀台灣文學，請呂正惠來講龍瑛宗（當時的錄音帶我還留存著），也請藍博洲邀林至潔——她是呂赫若小說譯者，郭琇琮夫人，也是政治受難者——來講呂赫若。這些

資料我都還存著，那只是我們研究會的一個部分。比如說，有半年的時間我們集中搞了「帝國主義論」，包括收集、研讀日據期台灣左翼的思想論述資料，譬如一九二六年陳逢源和許乃昌在《民報》進行的「我的中國改造論」論爭，李友邦的〈日本在台灣之殖民政策〉（一九四〇年）等等，還準備要出書，叫「帝國主義與台灣」，陳映真還手寫了大綱，那正是陳映真跟陳芳明論戰的那一段時間。我們要辦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的研討會之前，也曾經先搞了冷戰的研究，自己找書，開始讀什麼叫作冷戰。這些問題，都深深影響了台灣的社會歷史和左右著台灣政經結構以及一般人的感情思想和生活，但不知為什麼台灣在這方面的知識仍然相當的貧弱。

再後來，作為重要的思想里程碑就是出版了《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一九九八年出版了第一期。《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編輯和總編輯，陳映真自己都不掛名，都是掛別人的名或是掛我的名字，實際上主要的編輯工作還是陳映真在抓。可以說，從一九九三年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我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努力學習和實踐達到了一定的思想積累，陳映真也認為自己有了一定的認識和成果了，才出版了第一期。實際上在一九九七年就已經開始籌備了，在研究會上對於出版新雜誌大家也討論

了不少。一九九七年可說是一個最活躍、忙碌也是大豐收的一年，年初二月主辦了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七月初辦了四天的香港回歸展和活動，接著十月又舉辦了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研討會」，每個活動都是一次有開創性的有基進批判性的活動，累積了滿溢的思想成果，開始有話要說了。同年，我和陳映真一起去參加了一場「日本社會文學會」在台大舉行的研討會，在會上引發了一場皇民文學爭議風波，場上陳映真和黃春明、戴國輝都起來說了話；還有，那時張良澤在《聯合副刊》上連日刊出了醒目的所謂「皇民文學特輯」，這兩場的皇民文學爭議和風波也促成了第一期《清理與批判》的誕生。那一期先刊出了一部分「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的論文，另外一部分就是對皇民文學的批判，其中最長的那篇〈皇民文學總清理〉是我寫的，實際上那篇文章我修改了好幾次也用了好多個題目，最後是陳映真把它改成那個題目。

當然研究會還進行了其他各種有開創性批判性的議題，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我們稱作「台灣第二波左翼（文學）運動歷史」的史料出土和論述，實際上就是對台灣光復歷史史料的出土和研究。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九九九年我和陳映真一起出版了一本《一九四七

——一九四九台灣文學問題議論集》——一般稱作《新生報·橋副刊》論戰（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堪稱台灣文學史三大論戰之一——陳映真為此寫了一篇精彩的序文（一場被遮斷的文學論爭）；書出版後還與中國作家協會一起在蘇州大學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還找出了當年參與論戰現在還在大陸的老作家參加，如朱實、蕭荻、田野、呂宋、吳阿文等人。光復期歷史一直是我的研究重點，它是台灣現代史最重要的轉折點，一直被疏忽或被扭曲，跳過了或簡化了這段歷史，台灣現代史就容易被編造、被篡改——比如那些在許多「台灣意識」文論中出現的論述。從二〇〇五年以來我寫的、編的出版的近十本著作，大都是有關這方面的歷史議題，算是歷史問題批判。這也是《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裡面的一些重要的主題，我們出土了很多作家，比如范泉、歐坦生、駱駝英、黃榮燦、光復期的楊逵活動等等。那怎麼會碰到范泉？會出現這麼多人物的議題呢？主要是因為認識了橫地剛的關係，跟橫地剛的認識也是在一九九七年。

黃：陳映真跟橫地剛認識是在一九九七年？

曾：我們一齊認識他是在一九九七年。他也來過我們的研究會，就是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還留下了一些照片。橫地剛怎麼會找到我們的呢？是因為藍博洲的關係，他

先認識藍博洲，再經藍的介紹跟我們認識。

林：所以陳映真《人間》雜誌之後，就是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再來就是《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也就是說他從感情面的《人間》雜誌開始進入到清理台灣的社會性質的這個部分。再來就是出版嘛。我想知道說，陳映真在這個過程中討論的主要伙伴、決定事情的比較固定的有哪幾個人？

曾：還有一個人，施善繼，還有他太太曾淑霞女士，也是比較長期的伙伴。研究會第一年是金鴻文當會長，第二年以後就由我當會長。金鴻文現在主要在夏潮基金會活動，當時他在一個台北的私立專科學校教書。可以說我們這些創始會員，大概一年以後，就產生了變動，像舒詩偉跑到北埔去了，然後官鴻志不見了，陳國坤後來就回到美國，然後汪立峽也偶爾出現，申正浩在台南讀書。實際上變成我和陳映真兩個人在支撐。因為我的個性是要做就要做好、做到最後，我是會長所以研究會主要議題和活動是我在規畫，然後跟陳映真討論，比如說這一次要做什么題目，我們要討論什麼，那當然也要配合陳映真，他要帶頭舉辦各種對外活動。各種大型的公開的活動，必須要各方面的力量配合，就不是研究會單獨可承擔的，那就由陳映真主導了。

黃丕現在談陳映真的都缺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這一塊。可是這很重要。

曾丕開會時我都有寫筆記的習慣，譬如說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東亞冷戰會議、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啊等等無數次的活動，會前會中我都會寫一些筆記，這些還是要回去書房重溫筆記才會更清楚。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是我從日本回來後的第二年，一九九三年和陳映真一同成立的，一直持續到陳映真病倒以後；這期間舉行或參與了無數次的社會運動，它跟陳映真這段時間（或說他的晚年）的思考、實踐活動有緊密的關係。我認為陳映真寄望在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目標基本上達到了，只不過，經過這番的批判實踐以及達到這樣的對台灣社會的科學的認識高度未來要怎樣落實，怎樣產生社會影響，這是再過來的一個重要課題，陳映真在二〇〇六年要到大陸之前也曾找我深切地談到這問題，表達他的憂慮。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成立時已經解嚴幾年了，但是有一段時間大家還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曾經有一次，各路的左翼朋友曾到苗栗的明德水庫集會，包括林孝信啊，大家一起在那住一晚上，可以好好談。就是《左翼》雜誌成立之前。（註八）

林丕林孝信之外參加這個集會的大概還有誰？

曾丕算是左翼的一次集結，有談到要辦一個雜誌。那時候談啊談啊，講了很多，有人說那乾脆就用《左翼》好了，我記得林孝信說，現在還很敏感，不要直接用。當然有陳映真夫婦，是我開車載他們去的，還記得為勞工問題跟陳素香爭論過。還有一些左統派朋友，具體還有哪些人，我記不起來了。只記得那是《左翼》雜誌創辦的起源吧。後來不管敏感不敏感，林一明就自力更生，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直接用《左翼》之名辦起來了。可是《左翼》雜誌第一篇又是林孝信寫的，他用黎建江的筆名寫了〈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那一份雜誌很重要，真的是相當重要。那時候林一明在人間出版社，跟臧汝興一起打字，然後拿去複印店複印自己裝訂發送。還有黃德北也積極參加，還記得他帶著兩個小女兒，到統聯幫忙裝訂分裝，當時統聯有一台快速複印機，晚上借用複印之後還要裝訂啊，裝訂之後還要裝封套寄出去。所以主要的工作人員就林一明、臧汝興這兩個，在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利用空檔時候打字，他們功勞是蠻大的，他自稱左翼要「自力更生」。《左翼》內容還是蠻豐富的，而且很有現實性。

■東北亞連帶與「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

國際研討會

林：真是謝謝您，釐清了這一塊，我們在做陳映真研究過程當中其實都知道有這個東西，但它的細節就不是很了解，包括東北亞的連結。我們有去大阪拜訪雜草社，採訪服部良一、林伯耀，還有一位可能你認識，徐桂國，大家叫他墨面。他們都有參加你們的活動。

曾：對，他們不但是積極分子，更是日本事務局的中心，裡邊還有一個老田，更厲害。你有碰到老田嗎？他是日本人。在文革時期他到中國大陸去留學過，所以中文相當的流利，每次東亞冷戰研討會的主要中日翻譯都靠他，他可以一面跟你講話一面打字翻譯，真是高手。我開始也以為老田是中國的名字，後來才知道是日本姓。他是一個真正的日本草根左翼，一方面要維持一般人的生活，一邊又要進行左翼的工作。他謙虛、隨和、默默地工作，絕對不出頭，是一個真的有覺悟的左翼。

黃：是不是每次都有一些論文？就是東亞冷戰的會議？曾：對！每次會議都有二、三十篇論文，六次也共有一

百多篇了。

黃：曾醫師都還有留嗎？

曾：都有留。我可以把當時的會議宗旨給你們留一份。

那都是陳映真寫的，本來他要我寫，陳映真看了我寫的不滿意他又自己寫。前兩屆韓國事務局的團長是姜萬吉，日本是井上清，然後沖繩是金城睦，台灣就是林書揚。

林：我倒是比較好奇，裡邊有一個人是從美國回來的，王春生。

曾：第一屆時陳映真積極邀請了王春生，論文題目是〈興起的亞洲和擴大美日安保條約〉，但是人沒有回來。

她是老保釣，當年保釣運動第一團到北京的團員。這次釣魚台教育協會在蘇澳開會，聽說她會來參加。她有發表論文，但沒有與會。比如說第一屆我們也邀了李清潭教授，結果論文來了人沒有來。

劍潭那個國際研討會是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底舉行，記得在一九九六年就舉行了幾次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的各事務局會議。其實更早一點，一九九四年六月二五日，我們在耕莘文教院就舉辦過韓戰真相紀念演講會，陳映真和我都有上台發言。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就辦了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大型歷史照片展，一共展出了兩個月，在衡陽街的力霸大樓七樓新生

畫廊。

黃彥戴國輝的日記裡有寫，他去參觀，在力霸大樓七樓。曾≡我二〇〇九年在交大報告的時候曾經秀了當時活動的手冊，類似邀請函那種，有一張照片，是蔣渭水要入獄之前的一張照片，後來你看到嘛，說那張照片你沒看過，叫我給你。

陳冉涌（以下簡稱「陳」）≡好像《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有登。

曾≡對，那個影像展叫「五十年的枷鎖」，因為那個時候在衡陽街的力霸大樓雖然比較舊但便宜，我們幾個太太都動員了——陳麗娜、我太太、施善繼的太太淑霞——都去輪流幫忙。那個展覽進行了一、兩個月，需要有人每天在場服務照顧。

那次日據歷史的照片展覽，陳映真花了很大的苦心和經費。他對歷史影像相當敏銳，他曾說過這些本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要作為彰顯殖民功績留下的照片，歷史正義的結果成了它罪惡的明證。就我所知，很多老照片是他自己掏腰包到日本的一些大新聞社去買的，當時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方便，他買了以後還請專業的店把模糊的照片弄清楚，又弄了展覽現場的說明機，就是參覽者可以戴著說明機一邊看影像一邊聽歷史說明，是陳映真

親自錄下的說明。你看他花了這麼大的工夫，還自己掏腰包，為的是向大家呈現真實的日據歷史。陳映真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對台灣社會歷史的認識，真實的認識，有批判性的認識。

他為什麼要投入這麼大的心力去辦這樣一個歷史影像展呢？就我所知，當時台獨論的歷史照片已排山倒海地出版，陳映真憂慮日據歷史會再度被扭曲，而成了頌揚帝國殖民的現代化論。他要不斷地訴說、批判他所認識的台灣殖民歷史。

那個時候我們研究會每週的冷戰功課也已經在進行了，還有就是跟徐勝和其他地區事務局的聯絡。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這六次的會議是怎麼開始的呢？當然最主要的是徐勝，他扮演了聯絡和團結各地區的重要角色。最近我查閱了一些自己保存的資料，才確知一九九五年林書揚先生曾受邀到首爾參加韓國的「國家保安法國際研討會」，與韓國繫獄四十四年的老政治受難者金善明先生碰面。當時政治氣氛還十分嚴峻，大約還有七百五十位政治良心犯在獄中且「非轉向」的出獄政治犯也不能出國。同年徐勝和大阪大學教授杉原達再度來台，他們和林書揚、陳明忠、吳樹培的「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有一起討論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的初

步構想。徐勝跟林書揚那時候曾在綠島進行一次長時間的對談，那個對談的錄音檔還在我這邊，是徐勝給我的，他們是用日文對談的，現在還沒有人把它翻譯出來。不久後有一天，陳映真忽然叫我一直跟林桑跟陳桑——林書揚和陳明忠——在一個地方見面，討論決定由陳映真負責，我協助陳映真籌備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這個研討會，後由陳映真在人間成立台灣事務局（我們稱秘書處），我跟他一起工作，那時候加入工作的還有林一明跟臧汝興，林一明跟臧汝興負責聯絡和事務性的工作，譬如說打字啊，臧汝興專長於中、韓文互譯啊，韓國事務局有人來時他負責接待口譯啊，是這樣開始的。第一次會議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劍潭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由我們負責各種籌備工作，那是我們第一次主辦大型國際會議的嘗試。從租借場地、住宿、交通，包括接洽同步翻譯的機器和人員，當時是與輔大日文系合作，一直到會議接待人員的分工，都是我在負責。因為四個地方（台灣、沖繩、韓國、日本）、三種語言（中文、日文、韓文）的人員接待和大會論文翻譯，工作量巨大且複雜。

林：那次會議的主要籌備人是你跟陳映真，林一明和臧汝興等人也協力辦會？

曾：對，但當然還有其他單位和人員來協助。統聯啊，

勞動黨、互助會、夏潮這些朋友都來幫忙。比如論文的翻譯裝訂和分發，住宿的安排啊，機場的接機啊，會場的控制等等都要有人負責。我們的六次會議有兩個很大的活動特色，一個是一定會有到歷史現場的田野參訪，比如說劍潭會議時我們安排到白色恐怖的歷史現場參訪，到馬場町去啊，去六張犁啊，還到了鹿窟基三四地；比如說濟州島會議的時候，就去了當年的屠殺現場，還去濟州島唯一的山——漢拏山——爬洞窟體驗逃亡的危難；另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就是一定有文化活動，劍潭這一場的文化活動就是由陳映真主持的。

林：台灣第一次文化活動的內容是什麼？

曾：由陳映真主持文化座談會，與談者有台灣的文化界代表侯孝賢，韓國的作家玄基榮，日本的哲學家運動家花崎皋平，沖繩詩人高良勉。其他地區也會邀些運動合唱團詩朗誦表演或帶唱，到最後一定要合唱三種語言的〈國際歌〉。韓國跟沖繩的運動團體的合唱團很強。在濟州島那一場，因為一九九八年剛好亞洲金融風暴，我還記得那時候一下飛機韓國朋友就說哎呀我們國家整個垮了。那次的文化活動他們就請了從事運動的唱歌團體，我還記得他們唱的一首歌叫〈一個沒有 IMF 的世界！〉，因為那時候他們就因為 IMF 的關係整個金融經濟垮掉了，

所以他們那時候運動的目標就是反IMF。在這一點，韓國的運動強大就是在這邊，它跟現實的社會議題結合，又跟世界的議題結合。台灣就很缺乏社會的、世界的議題。在沖繩的那場文化活動就是請了沖繩的一些知名音樂團體，因為當時全日本流行沖繩民謠腔調的流行歌，比如說〈花〉，就請了一些沖繩的合唱團來唱。這些文化活動帶動了情感交流，使原來彼此陌生的團員跨越國界產生了共鳴和一體感。

台灣這邊除了統聯、夏潮，還有勞動黨，這些朋友每次都有來共同工作、幫忙。第一次劍潭會議沖繩來了二十幾個人，日本大概來了一百多人，韓國也來了一百多人，不少人，而且他們也是第一次的經驗，大家很陌生，都需要人協助。台北的第一次會議總算順利完成，就成了後來歷屆會議的固定模式。至於這個研討會的主要精神可以去讀陳映真執筆的第一屆會議旨趣書，在《陳映真全集》第十五卷裡有刊出。那一篇要好好地讀，那一篇真的太重要了，太精要了。

對東北亞四個地區的同時代史的認識，也是認識四地區在一九五〇年代的紅色肅清年代實際上面臨的同樣的命運；當然二戰前這地區同樣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圈裡，在日本戰敗之後各自有了不同的命運：台灣復歸中

國、沖繩在美軍軍政統治下、朝鮮南北分斷，這幾個地區在美國的新統制下被冷戰各個分斷了，特別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以後更是嚴重地分裂了，彼此都不認識彼此有共同的命運。直到徐勝因為在韓國獄中就知道了台灣也有政治犯，他九〇年代出來之後有機會遇見林書揚，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經過徐勝的努力把大家串聯了起來，串聯起來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復原當時大家共同的受難歷史，追求東亞的和平。

第二屆一九九八年在濟州島舉行。濟州島在一九四八年發生了大屠殺的濟州四三事件。現在大家才慢慢知道了濟州島在台灣二二八事件的隔年也發生了一次大屠殺事件。那次會議由當地的濟州四三事件研究所主持。開會前幾個事務局一定要先碰個面開協調會，不像今天有網路視訊會議，當時最快的聯絡方式就只有傳真，因此協調會必須搭機往返。濟州島正式會議之前，我代表台灣秘書處飛到濟州島去開四個事務局協調會議，等開完會有了共同的結論回來後我們召開台灣秘書處會議，再落實各種各樣的籌備安排，當然，在這之前各事務局之間早有通過傳真互相聯絡。到了真正開會的時候，每晚四個事務局都還要徹夜開協調會，比如第二天會要怎麼開、怎麼安排、有哪些注意事項，都要徹夜商量到天

亮，大都是我在負責協調，因為我懂中文，又懂日文，比較好溝通，然而經常會碰到意見不同吵起來，因為各事務局面臨各自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還有是因為大家分開太久了，互相不熟識對方的歷史社會或生活習慣。譬如第一次我們到濟州島去的時候，有韓國的朋友們問我們說你們台灣有用筷子吃飯嗎，還有你們有用淋浴嗎……類似這種很不可思議的問題。我在台灣秘書處會議跟陳映真討論了好幾次這樣的問題，我們就生出一個想法，就是要先讓其他地區的朋友了解我們的社會歷史。這就是為什麼陳映真在一九九九年第三屆在沖繩的會議上，親自發表了一篇論文，就是收入《全集》十八卷的〈台灣當代歷史新詮〉那一篇，他為什麼又要從日據時期開始談台灣的歷史？就是深深地感受到沖繩、日本跟韓國的朋友不了解台灣的歷史和現實。

林：與會者來自四個地方：沖繩、日本、韓國、台灣。這四個地區針對這個會議也都成立了事務局。會議前的討論，台灣地區是由你代表跟其他的事務局溝通？各地事務局的情況如何？例如你剛才提到濟州島那邊是由濟州事件研究所主抓，那其他地區呢？

曾：是這樣的，韓國事務局每屆都由不同的團體和主導，日本和沖繩比較固定，但也有變化，台灣是一直沒

變。譬如在濟州島的會議，本來我們想，因為我們是運動團體嘛，住的一定是簡陋的地方，吃的也普通，反正大家都有這個準備。那一次包括鄭村棋夫妻有六十幾個人人都去了。沒想到一去竟住在濟州島最大的觀光飯店裡面，開會也在裡面，住得吃得都很豪華。後來才知道，因為濟州事件當時作為韓國很重要的一個政治平反運動，得到濟州島當地財團的支持。濟州四三事件研究所所長，他主持會議，後來當了國會議員，據說現在還是國會議員，搞了濟州事件平反運動，當上了議員。

林：所以聽起來好像是這一次的活動成為他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資源。

曾：從後來的結果來看是這樣子。就我所知，從第一屆開始韓國那邊的主導團體就自我定位他們的運動性質是市民運動。

黃：這個議員叫什麼名字？

曾：好像是叫姜昌一。第三次就在沖繩。沖繩事務局的朋友一直都是反美軍基地運動的朋友。沖繩的大會執行委員長，是一個有名的律師，叫金城睦，是一位熱情又誠懇的人。金城睦律師在大會開會的「歡迎致辭」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沖繩矛盾的核心，讓我印象深刻，他說：「沖繩，不單處於日美安保體制的關鍵地位，更是美

國在東亞戰略的核心，因此，東亞背景和冷戰構造所造成的諸問題，大大小小都在沖繩可以看到，相反，沖繩發生的諸問題有美國的東亞戰略的影響。」沖繩事務局局長、沖繩大學憲法學教授高良鐵美在「致辭」上也說：「在沖繩的美軍基地存在的意義，主要在針對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的兩地情勢，特別大多基地駐紮了具有快速打擊的海軍陸戰隊，其目的更明顯。」

沖繩會議的歷史現場田野工作坊，大家去了紀念二戰末期悲慘的沖繩戰的和平紀念館，有一位會議工作人員特別帶我們到一個當時沖繩居民躲美軍的珊瑚洞窟，講述了當時居民因為受到日軍恐嚇宣傳的影響，懼怕美軍來了會強暴妻女而在躲藏的洞窟中發生了一些父親先殺妻女、子殺父的悲慘事件；還到了美軍普天間基地，更到了邊野谷海邊，去聲援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當時這個邊野谷反新建美軍基地運動才開始並不廣為人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吧，美日政府為了緩和沖繩強大的反美軍基地運動，以停用普天間基地為條件想要交換到邊野古搞一個更大的更完備的新美軍基地，沖繩人民本來就一直強烈要求美軍基地完全撤出沖繩，當然反對再新建。那時候反對運動已經開始了，我們四個地區大概三、四百人吧，都到邊野古海邊去支持他們的運動。我還記

得當時韓國的代表團還來了一個舞蹈家，在邊野古海邊跳舞，算是舞祭吧，還有韓國有一些尼姑宗教團體參加，是反慰安婦運動的，在現場發放了小紅花讓大家一起拋向大海，表示抗議，日本也有一些和尚神職人員參加。

林：您提到沖繩大部分是反美軍基地的團體，那韓國呢？曾：韓國主要是由各地的政治事件平反運動團體主導，濟州島、光州、麗水三次會議都不同，當然他們之間會有交接，譬如組織在濟州島的會議時光州的主辦團體會有人來參加，剛才講到濟州島會議時也提到一部分。

到了第四屆就是光州會議，二〇〇〇年，紀念光州事件二十週年，大會正式名稱是「紀念五·一八二十週年、朝鮮戰爭五十週年國際大會」，以「復活光州、朝鮮半島統一和東亞和平」為主題。當然這次由光州事件平反運動團體主導，那次的中心人物還是徐勝，由他串聯。我記得是大會的前一晚，在光州市舉行火把遊行。講到火把，小的時候在反共抗俄時期，我們會被動員到街上拿火把遊行，後來就很少有了，結果那一次在光州又經歷了一次晚上拿火把在大街遊行的經驗，熊熊的火炬隊伍的確很令人亢奮。但是，那一次韓國紀念光州事件二十週年的運動分裂了，分裂得很清楚，在同一條大街上，一個團體舞台在那邊辦，我們參加的團體在這邊辦，互

打對台，互相叫陣，我記得很清楚。

黃：為什麼分裂？

曾：怎麼分裂我到現在也不清楚，是他們光州事件平反運動內部的分裂。還有記得很清楚，那時候金大中剛當上總統，還在光州晚宴款待了我們；我想大家應還記得，現在的韓國總統文在寅，就職後馬上到光州去嘛，說光州是韓國民主運動的起源地，他發誓要繼承金大中的精神。第五屆是二〇〇二年了，隔了一年才再辦。本來是說要休息了，已經辦了四屆大家也累了，而且那個時候陳映真好像另有要事或身體不好，沒參加，所以陳映真實際只參加了四次，第五次跟第六次都沒有參會，會議事務就只有由我來做了，當時連會議的邀請函和署名都由我寫，但第五次在京都的會議的台灣團團長還是由陳映真掛名。（註九）

二〇〇二年大會在京都的立命館大學舉行，就是在徐勝任教的大學，當時徐勝在那邊擔任韓國研究所所長；立命館大學在戰前就成立了，是一所有進步傳統的大學，在會議前立命館大學校長也特別出面宴請了與會成員，我記得

很清楚。大會的名稱是「朝鮮戰爭、《日美安保條約》和《舊金山和約》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二〇〇二年正

是《舊金山和約》五十年，大會批判和揭露了《舊金山和約》的反動本質，因為當時同時又簽定了《日美安保條約》、《日華（台）和約》並發動了朝鮮戰爭，因此雖然名為「和約」實際上是確立美國在東亞冷戰體制的「戰爭條約」。二〇〇二年二月京都會議辦完了以後，本想要休息一段時間，再檢討展望以不同形式來維持東亞的人民和平團結。但徐勝說韓國還有一個團體想接著辦啊，就勉為其難在二〇〇二年底再辦一次，是第六屆在韓國的麗水會議。因為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前，在麗水跟順天這兩個城市發生了一次白色恐怖大屠殺事件叫「麗順事件」，一直還沒有得到平反。所以這樣一來，同一年就辦了兩屆啊。年初在京都辦了第五屆，十月在韓國麗水辦了第六屆。第六屆結束後，四個事務局在最後的討論中曾提到，下一次是不是到大陸去辦啊？曾經有過這樣的討論，我當時還說哎呀呀我們考慮看看，後來也沒成。會議就這樣子結束了。

林：第六屆在麗水舉辦的那一屆是由誰主抓？

曾：主要還是在地的麗水事件平反團體，所以大會的歷史現場工作坊中主辦團體都很熟練地安排我們去參訪當時的事件現場。

林：請您談談韓國麗水屠殺事件的過程？

曾ㄟ麗順事件還是跟濟州事件有關聯，兩地距離很近，麗水地處半島末端，與濟州島僅隔個小海峽，那時候在南北分裂的過程裡，為反對南方李承晚先成立大韓民國，民眾群起抗爭，美韓派兵鎮壓，爆發了麗順事件和濟州事件，事件從一九四八年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前後。李承晚在日據時期逃亡美國，是親美派，日本敗戰朝鮮將要獨立的時候他回到朝鮮，在美國支持下先成立大韓民國。我記得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國共內戰敗逃台灣的時候想搞一個亞洲反共聯盟，還曾飛到韓國跟李承晚見面商討共組反共聯盟，那時候菲律賓賓也是聯盟之一。本來在《開羅宣言》或《波茨坦宣言》中都明記了戰後朝鮮應獨立，因此戰後朝鮮不管南北各地紛紛成立了人民委員會準備建國，人民委員會成員大多是日帝殖民時期從事左翼民族獨立運動的人和傳統。後來因為南方在美國支持下先成立大韓民國，有些人民委員會成員就向北邊跑，有些就往南跑，很多人民委員會成員在這南北分裂的歷史過程中被屠殺，這就是麗順事件、濟州事件的大歷史背景。

■陳映真的東北亞串聯

黃ㄟ曾醫師我想問一下，我查到的資料是說一九九六年的十月陳映真就是為了要辦這個白色恐怖國際會議去見了戴國輝，跟他討論這個事情。你對這個有印象嗎？

曾ㄟ沒有印象。

黃ㄟ所以你不知道他跟戴國輝碰面了。

曾ㄟ那時候戴國輝已經回來了。

黃ㄟ對，已經回來了。

曾ㄟ而且他當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黃ㄟ所以你對陳映真跟戴國輝去談這件事，大概沒有印象。第二個我是想請問陳映真對濟州事件的了解是不是比跟徐勝的關係還要早一點？因為他一九八九年幫光復書局編一個全集的時候，他選的是金石範，然後金石範的創作都是以濟州事件為主的。那我想說他這麼早跟韓國那邊有一些歷史的了解，中間的因緣是什麼你了解嗎？

曾ㄟ我並不了解，陳映真與韓國的作家的聯繫是相當早的，應該是《人間》雜誌期間就跟韓國有連結，他不但關心韓國的文學也關心社會運動，更關心韓國的社會性質論爭的情況，在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成立不久，他就

請申正浩在會上報告了韓國的社會性質論爭的歷史演變。陳映真還寫了韓國詩人金明植的詩評論，蠻長的。（註七）

但就我所知金石範應該是在日朝鮮人，出生於濟州島的，生活在日本，也在日本成名。我記得他寫了好幾本小說，有一本是烏鴉還是什麼……

黃≡《火山島》是長篇，《烏鴉之死》是個小的集子。陳映真選的是《烏鴉之死》。而且很關鍵的是，他後來為了這個寫了很短的一篇日文文章，他說他看了金石範的《烏鴉之死》之後他要重新開始創作。金石範給了他很大的啟示。

陳≡〈最近的活動〉那篇吧。（註八）

曾≡那篇是我提供的。因為那個《日本文學》雜誌就是我們大會的日本事務局裡邊的部落解放同盟的人主編的，叫高地耀子，她曾送過我許多期他們編的《日本文學》，陳映真的那篇就刊登在其中一期，是陳映真在會議期間寫的，在編《陳映真全集》之前我曾出示給一位年輕朋友，可能是這樣流傳出去的吧。

黃≡應該是收在陳映真編的一套「世界小說家」集裡，金石範有單獨的一本，裡邊都是中短篇小說，他還有一部分比較長的叫《火山島》，是好幾卷的長篇小說。

曾≡對！七卷。當時金石範剛好寫完七卷的《火山島》，

濟州島會議的韓國主辦單位就邀請了他來會演講，但是韓國政府禁止金石範入境，當時我們大會就發了一個「緊急聲明」，要韓國政府趕快讓金石範入境，結果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在與會者都從「濟州四三歷史現場巡禮」活動回來時，金石範總算得以臨時入境的方式到達了會場，在大家的熱烈鼓掌中上台完成了「紀念演講」。根據金石範在會後發表的〈這麼困難的韓國行〉文中的記載，他認為自己一直受到韓政府安全企畫部的人敵視憎恨，他們這些由朴正熙時代的中央情報部轉換到安全企畫部的人，雖然時代已大變動（當時金大中總統已上台），但仍然脫離不了過去情治政治的獨裁作風。

另外，在第二屆濟州島會議之前韓國有一個作家金東滿拍了一部濟州四三事件的紀錄片《不眠的吶喊》，還有一部《獵紅》，這個紀錄片就被韓政府以違反《國家保安法》的「通敵罪」起訴。還有徐勝的弟弟叫徐俊植，也因為公開放映了紀錄片同樣被《國家保安法》起訴，當時大會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要求當局釋放兩人並終止起訴。

由此可見，濟州四三事件的歷史真相究明（包括所有東亞冷戰歷史的清理也一樣），不單是歷史的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與現實政治有相當複雜的關係。

■歧異與合作

曾「當時韓國在政治上還是蠻緊張的，韓國事務局那邊的人就曾告訴我們，實際上他們還不敢公開用「國家恐怖主義」這樣的一個名稱，因此他們的會議正式名稱只有用中性含糊的「東亞和平與人權」。後來第三屆在沖繩，第四屆在光州，第五屆在京都，也都用這樣的名稱。可台灣一直用「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秘書處」，日本則一直沿用「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事務局」，沖繩跟韓國一樣也用「東亞和平與人權」。後來我漸漸認識到這種大會使用名稱的不同的微妙之處，除了有各別政治現實的考量之外，還有來自各別觀念上的落差。

實際上，在第二次大會的籌備期間我們秘書處就與韓國事務局之間就「人權」問題在意見上有了不同的看法。當時韓國主辦團體邀請了當時東帝汶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奧爾塔（José Manuel Ramos-Horta）來大會擔任主題演講（後來他當了東帝汶第一任的外交部長、第二任的總統），因為那時奧爾塔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們都知道，這個獎完全是附和西方的中心的理念——韓國事務局那邊

為了「壯聲勢」，特別邀請他來。我們早就知道奧爾塔一向對中國不友善、特別對中國的人權公開批評得很兇，還有他跟台灣的獨派相當友好，因此我們台灣秘書處就向韓方提出嚴正的抗議，希望韓方不要邀請奧爾塔。經過無數次的意見折衝，韓國事務局還是執意邀請他，那我們就表示，如果一定要邀請他演講，希望他在演講的時候不要提及中國，如果他提及，我們台灣團會集體退場。實際上當天大會開幕進行主題演講時，在聽到奧爾塔的演講中提到中國人權的時候，我們就集體站起來退場，等到他講完了，我們才進去。

這個時候就產生了關於「什麼叫作和平」、「什麼叫作人權」觀點的歧異，在第四屆光州會議的時候我們台灣秘書處發了一份特別聲明，是有關我們對人權問題的看法，這個聲明是經過大家討論後由陳映真執筆的，一共寫了十四條。我的資料裡邊還保有當時陳映真的手寫稿，給大家看一看……這個是影印的。

這裡邊就浮現了跟韓國事務局之間觀念的差別。就我所知，陳映真跟徐勝在有關人權觀念上也有不同之處。聽說兩個人曾經為了人權觀吵過，但是這只是聽說，我並不在場。我與陳映真的觀點一樣，簡單說人權不止只有政治人權，還有最主要的經濟人權、社會人權和發展

權。這樣的人權觀，實際上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那邊已經寫得很清楚，反映了第三世界的看法，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徐勝的人權觀比較屬政治人權的領域，但有一個他很大的特色，他的人權觀與東亞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歷史脈絡緊密結合，來自於批判東亞的帝國主義歷史，與西方的人權觀大不同，很有現實的批判性。徐勝，我認識的他，實際上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受壓迫的民族主義者，當然他同情左翼也同左翼在一起。在東亞具體的帝國主義壓迫的歷史中，民族主義者大部分都跟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解放運動一起，因為帝國主義的本性本就具有民族和階級的雙重壓迫，不可能有一個真空的、沒有社會解放運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嘛，所以徐勝對東亞的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思想是認同的，但他不完全主張這些東西。這一點是比較大的區別。這又可關聯到韓國事務局比較傾向「市民運動」的性質，當時韓國的代表團團長叫姜萬吉，是韓國一個有代表性的歷史學家，他說「我們現在主要的運動中心還是在市民運動」，但台灣這邊就不一樣，實際上不是市民運動，而是比較屬於左的統一運動。這在研討會中自然會產生一些觀點的不同，大概在第二屆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但是這種事情不會影響整體的合作。

林：當時其他與會的日本、沖繩代表針對這個爭議有什麼樣的表示嗎？

曾：沒有。那時候，我們就為奧爾塔的事溝通很多，那時候還沒有現在的手機，都是用傳真機聯絡，當時陳映真給姜萬吉的傳真我還留著一些，而徐勝就以日本事務局那邊的立場回應了，要大家彼此容忍。基本上還是要看事務局的組成啦，日本那邊的事務局有幾個重要人物，大家都知道嘛，一個是豬八戒，就是林柏耀那對兄弟，他們的雜草社，裡邊有墨面（徐桂國）……

林：還有杉原達？

曾：沒有。杉原達實際上是最早促成這個會的人，但是後來得了精神疾病，就沒法再參加會議了。杉原達是一個很純粹的人，他對於這個會議寄予很大的希望，因為工作太忙陷於精神疾病沒法繼續工作。記得在會議之前，他寫過一封信給林書揚，林書揚特別翻譯了那封信，

（註二）

那封信很短，但是很厚重地表達了他對這個研討會的一些想法。他寄望研討會能夠通過重新整理、清理再批判歷史作為新的時代出口。這也是我們台灣這邊的想法，認為研討會不止是一個會議，它也是一個不斷面對歷史的，通過清理百年來的帝國主義歷史的——當然還有帝國主義的附庸政權——對新的統治體歷史的徹底的批判運動，

以找出時代的出路。杉原達那封很短的信，就透露出這樣一個想法。那一封信我本來沒有注意到，前一段時間邱士杰把它重新發在微信上，我看到了，再仔細重讀。你講到杉原達，他真的指出了會議的重要的精神，只可惜他無法實際參加會議。

實際上，六屆的會議對照亮和深化東亞歷史認識的重大成果之一，在於它揭示了戰後的美國新帝國主義與戰前的日本的帝國主義之間，有一定的斷裂也有利用和繼承的關係；亦即，戰後美國新帝國主義一方面打破、裂解了日本帝國主義，更重要的，它濫存並利用了它進行對東亞的新統制，反共主義是它們共同的語言，戰後它通過對戰前反日帝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運動的人和思想進行了徹底的肅清，確立了東亞的冷戰體制。

在第二屆會議中，嚴秀峰女士——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先生的夫人——報告了抗戰時期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跟朝鮮義勇隊還有日本反戰同盟的鹿地亘共同在中國抗戰前線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鹿地亘是日本一個很重要的左翼作家，因為戰爭時期在日本受到壓迫跑到中國，在中國組織了「日本反戰同盟」結合了很多當時反戰反帝的日本人、日本兵。嚴秀峰的報告讓大家知道了組織台灣人反帝抗日的李友邦在戰後返回台灣卻

在東亞冷戰和中國內戰的狂瀾中被槍斃了；還有朝鮮義勇隊的金九，在半島光復後也同樣犧牲了；至於鹿地亘在戰後回到日本的遭遇，根據一位年輕時曾參與營救鹿地亘運動的町田老先生在會上的證言報告，這樣一個戰前反戰反帝的左翼作家，戰後回到日本卻在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時被當時占領日本的美軍軍政特務單位綁架被拘禁了一年多，經過一些進步人士的救援終得釋放。鹿地亘後來長年糾纏在法律的訴訟中，鬱鬱以終。在戰前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不論台、日、韓在戰後美新帝國主義統治下都遭到更悲慘的命運，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戰前跟戰後帝國主義殘暴性的延續性。

另外，在第六屆會議中有一份森正孝的報告，也從另外一個歷史現場指出了同樣的事實：他在報告裡說他做過實地調查，在韓戰裡，美軍曾經發動了細菌戰，並且還利用了前日軍滿州七三一部隊的細菌戰成果攻擊了中國的東北。那個報告很震撼人，還有很多相同例子的。我只是想說，通過這樣一個研討會照亮了新帝國主義的暗部，有了這樣的歷史觀，不但要做歷史的批判更要聯繫到現實的批判，沒有這樣一個歷史地圖，是走不出來的。我特別要強調，這個會議不是一般的所謂的會議，實際上是一個批判實踐，是一個運動。

林≡曾醫師有提到，關於徐勝所說的東亞這個概念，並不是一個區域性的概念，想請曾醫師針對這部分做進一步的說明。

曾≡我曾經翻譯過徐勝的退休演講〈東亞人權的探索〉，發表在錢永祥編的《思想》雜誌上（第二期，二〇一二年五月），文中徐勝對東亞的概念講得比較清楚，也很特殊很有啟發性，他認為所謂的「亞洲」或「亞細亞」，本來是近代以降占據世界秩序中心的西歐所建構出來的歷史與政治的地區秩序概念，而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模倣歐洲的「文明開化」，隱晦地在「亞洲」、「東亞」、「大東亞」的名義下推進對亞洲的侵略和支配，把誕生於歐洲的亞洲概念偷胎換骨轉換成日本中心的地域概念，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完全暴露了日本亞洲主義的帝國主義本質。大家可以去參考我翻譯的那篇文章。還有，這一次徐勝在上海的華東師大舉辦的「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討會」上，也做了一次特別演講，演講的題目就是〈什麼是東亞〉。

林≡曾醫師這邊的材料也很豐富，對我們也很重要。陳映真跟東北亞左翼運動團體之間的關係，關於這部分我們再需要釐清。

呂怡婷（下文簡稱「呂」）≡您剛才提到四個事務局，他

們除了每年舉辦這個會議之外，這四個事務局之間還一起舉辦過什麼正式活動？

曾≡會議完了以後嗎？

呂≡對，就是說，當各個地方有什麼運動，事務局之間會互相支援嗎？還是說他們四個事務局會再另外有什麼活動？

曾≡沒有。事務局基本上是為了這個會議成立的。特別是台灣、沖繩跟日本事務局的人員是比較固定的。韓國的事務局是為了平反而臨時組成的，成員可能有連續性，但主要的動力是變動的。我們最繁重的工作，是論文集的翻譯。在台灣就要先把韓國、日本的論文翻成中文，會前就要完成。更重要的是會議的同步翻譯，當然同步翻譯不是很完美啦，不像一般的有錢的那種國際會議那樣有專門的人去做，我們都是完全業餘的人，志願去做的。

呂≡語言的部分是你們有意識地選擇把它翻成中日韓三種語言，避開了英語，還是說為了當時的方便？

曾≡不是，其實我們都是運動團體或者政治受難者，英文並不熟練。陳映真曾經感嘆，他說左統派最大的缺點就是英文不好！大家都是搞運動的，都是民間的，並非搞理論的學者專家，都自己掏錢，要搭飛機，要住宿……

哇，這個要花不少錢。

林：經費這麼龐大，大會是以什麼方式來運作？若以台灣為例？

曾：對啊。譬如說以日本來講，它們就會先募集，就是如果你要參加這個會，一定要交多少錢，以會費來維持支出。

黃：但是台灣舉辦第一屆的時候也來了不少人嘛，大概有一、兩百人吧，那這整個的經費是從哪裡來的呢？

曾：但我不負責財務，並不清楚，但就我所知，真正的經費可能來自互助會的老同學，都是老同學捐出來的。

這些老同學出來以後在社會上也不被見容，只能做一些小生意啊，大概有一些人有些積蓄。韓國那邊主要就是靠平反運動，比如說我們去濟州島的時候，開始那邊說他們沒錢，結果沒想到，到了濟州島，居然是住當地最大的觀光旅館，Grant Hotel，很豪華，我們都嚇一跳。

為什麼？就是當地人要平反四三事件的社會動力很強，大會得到了當地資本家的支持。那一次我們印象相當深刻。看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也得到台灣一些中小企業的支持，但是白色恐怖就沒有了，因為它是紅的。

黃：講到這個平反運動，一九九七年，就是在台灣辦這個會議的時候，那時候秘書處有提一個緊急呼籲，要求

政府對冤錯假案進行謝罪賠償，然後我想知道當時為何會提出這樣一個呼籲，還有就是為什麼那時候認定是「冤錯假案」，因為這個在第二年，就是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同樣有對於所謂的白色恐怖補償條例提出一個批判，可是那個批判裡面已經看不到「冤錯假案」這幾個字了。所以，當時一九九七年的時候為什麼提的是「冤錯假案」，到後來一九九八年的時候要求的是全面性的賠償而不是「冤錯假案」的部分？會問這個是因為現在在講「轉型正義」的時候，他們其實也會說「冤錯假案」，但有些人就會說我那個不是冤錯假案啊，我為我的理想犧牲，我為什麼要被評說是「冤錯假案」？這裡邊我看到這個差異，所以不曉得曾醫師是不是可以談談這個部分？

曾：琪椿問的這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我沒有特別注意到。可是我只是看到一篇報導，就是一九九八年立法院通過以後，《聯合報》去訪問陳映真，陳映真那時候說得很清楚：「台灣政治受難者平反問題，一定要放在整個「戰後世界史的範疇」來討論、處理，否則永遠會有爭執。不是繞在「你是不是共產黨」的問題，而是政府為昔日不必要的大規模蹂躪人權措施承認錯誤，否則，所有國家暴力都會有「不得」、「不得不」的說辭。」^(註三)而「補償條例」雖然有上述的缺失且充滿政

治妥協的痕跡而受到政治受難人和家屬的詬病，但仍然跨出了清理國家暴力歷史的第一步。

只是，我要講的是，這個研討會基本的動力還是為了歷史的平反，特別是對「戰後世界史中冷戰構造下美國虐從國家的大規模人權蹂躪事件」的歷史批判和平反。雖然沖繩不一樣，京都也比較不一樣，但是都聯繫到對東亞冷戰、新冷戰結構的現實批判。因為有沖繩會議，這個會議格局被拉得更高，為什麼？因為你親眼看到一個現實的新帝國主義霸權的存在，很現實的。我們那時候就到了沖繩的邊野古去了，直到現在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裡重要內容就是反邊野古美軍基地的建設。那時候沖繩人已經在抗爭了，我們去加入聲援抗爭把這個會議的格局真正地拉到現場——美國東亞冷戰並沒有結束，還活生生地存在著。而且在沖繩的美軍基地的存在並不在保衛沖繩人，而是針對兩岸，針對朝鮮半島的南北分斷體制，針對亞洲人民的，是一個美國在亞洲的刺刀。

到了京都會議又回到五〇年代，特別是《舊金山和約》，還有《日美安保條約》，還有朝鮮戰爭，都是連在一起的，是亞洲冷戰結構的開端。「日美安保」是什麼意思？就是美國接收了舊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支配性角色，繼續維持著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一個戰略工具角

色；一九五二年的《舊金山和約》很諷刺地與和平無關，反而是美國在亞洲的一個新的戰爭條約，再看看浴血的朝鮮戰爭，美國與日本的角色就突出了。一直到今天，我們到沖繩還是深深地感覺到美國東亞冷戰現實的威脅，這個所謂的美國的亞洲秩序活生生地存在著，不只是歷史。

林：所以聽起來像這樣四個事務局都是在各自的歷史現實裡去進行重新的清理。明顯地，像曾醫師提到的韓國那部分，就會跟台灣、跟沖繩有差異……

曾：有一定的差異是當然的，更重要的是有共同的命運。這個會議最後促成了什麼？促成了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跟韓國的反美軍基地運動連在一起，他們在繼續活動！我這邊還有個資料，就是沖繩那邊學習韓國運動的材料。實際上反美軍基地運動是這兩個地方共同的命運，在日本的駐日美軍約有五萬人，裡邊有一半在沖繩，韓國也有兩萬多人。

林：那曾醫師，照您剛才說的這個會議促成了一直到後來的韓國和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的交流和學習，換句話說，韓國那邊的事務局屬於這個反美軍基地的成員是一開始就加入了？

曾：對。而且這個會議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到了第二

屆把女性議題變成一個 section，很重要的一個 section。我們第一屆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後來因為參加者中從事運動的女性很多，所以當時就檢討以後從第二屆開始加入女性的議題，比如說第二屆就出現了日本的一個女性學者，寫帝國主義與性暴力問題，也開始有了關於慰安婦問題的報告。

黃：大阪外國語大學的助教授，藤目ゆき。

曾：對。還有關於在韓國、沖繩美軍基地性暴力的一些調查報告，另外有一些關於冷戰與勞工的報告，關於過去侵華戰爭罪行的報告也有，所以說會議有很多副議題，範圍很廣，這裡邊很多議題都要聯繫到冷戰與美軍基地的根本問題，所以全會議積累的一百多篇論文可以當作是東亞人民歷史各方面的報告或分析批判。剛才提到的藤目ゆき後來另外寫了一篇論文發表在《世界》雜誌，題目是「照亮了東亞現代史的黑暗部」，比較完整感性地描述和論釋了我們這個研討會的性質。我個人現在總的感覺是這樣，這個研討會所集結出來的觀點、論述和呈現的世界，在我們現在的論述世界裡幾乎沒有出現過，是很珍貴的，所以如果能夠把這些變成一個新的思想的力量，打破現實的支配意識，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為日本那邊也沒有繼續整理，韓國那邊也沒有，如果台灣這

邊——雖然遲到了——能夠完成的話，不光對這四個地方、對中國大陸及整個華語世界都是好的。那個思想資源如果能夠再挖掘再深化、更細緻地再發展下去，我認為是很有意義的。

■曾經的政治犯和老朋友吳晟

黃：曾醫師，我們是否可以順著追溯一些更前邊的細節。王競雄他是外省籍的嗎？幾歲來到台灣的？

曾：我說他是「娃娃兵」啊，一九五〇年前後當時有很多年紀小的「娃娃兵」，跟國民黨撤退過來的。陳映真在多年紀小的「娃娃兵」，跟國民黨撤退過來的。陳映真在一篇文章^{註一四}中寫過他。政治思想犯後來的變化很大，很令人不忍！你看王競雄是這樣的遭遇，然後洪惟仁走上獨派。洪惟仁剛出來的時候還是跟陳映真啊這些人在一起的，結果後來怎麼變成獨派的，我也搞不清楚，這二十幾年來身旁的朋友「轉向」的太多了。記得一九九二年剛回來的時候，好不容易聯絡上洪，那時候他住在汐止，我去找他，久不見面，一見面他就滿腔怨言，他說「我受騙啦！都是他們騙我！」他指的是王競雄還有我們這些左派騙了他，他對過去信從的事完全否定了。

我很失望，之後就沒見面了。

另外，我想說當時另外兩個同案的高中生。一個後來世新畢業，找不到工作就自己做家庭加工型誕燈，一九九一年剛好台灣整個泡沫經濟破了，土地、人工成本都高漲很難生存，夫妻倆就把簡單加工的機器搬到廣東東莞專門做燈飾，剛好六四之後不久，到那邊去四年就發家了，我一九九三年跟他聯絡上去香港找他，他用私人遊艇招待我，很氣派，聽他說他在大陸的東莞廠，有六千個工人。本來見面很高興啊，後來他也抱怨說「什麼左派，我都不相信！」實際上他已是資本家，世界觀自然也不同了。

黃：那規模很大啊。六千個工人談。

曾：後來是很大的一個燈飾公司，現在是台灣的上市公司。

王慧如（下文簡稱為「王」）：「真明麗」嗎？

曾：對，你知道？

王：我知道做燈飾的就只有它，然後還在東莞。

陳：所以陳映真認識他嗎？

曾：認識。

陳：我在想，是不是陳映真去過他工廠或者知道他工廠的事情，大概在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陳映真寫過一

篇，在《南方週末》發的，整篇文章就在譴責台商。

曾：對，叫〈被視為牛馬的日子〉。（註一五）

陳：對對對。

曾：這篇文章關係到一段很曲折複雜令人傷心的故事，現在不好說。只是，我很驚訝為什麼這篇會刊出來，是誰提供的？因為他寫〈被視為牛馬的日子〉那一篇，後面還有一個很長的附記。因為當事人都還在，不好說。講到樊邦弘，他被抓的時候是花蓮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被抓去偵訊了三個月，因為未成年就把他放出來了。另外一位姓金的，當時是高中三年級，叫金行天。林：高三那個有被判刑嗎？

曾：沒有。我與金行天有幾十年沒見面，後來有一次居然在路上偶遇，開始有聯絡，他現在比較偏藍。幾年前，樊邦弘住在陽明山的別墅裡邊，那時候說大家要不要為王競雄做一些調查研究寫一本書啊，我就跟他們用 Email 聯絡，結果大家對王競雄的認同評價完全不同，就不了了之了。因為大家後來的變化，變成這個樣子。樊邦弘還是跟洪惟仁有來往，資本家和獨派都不喜歡紅色嘛，有時候孤獨感是來自這邊。

黃：那時候陳映真為什麼會幫吳晟寫那個序？那時候寫序是吳晟找到陳映真呢，還是透過你的關係？

曾不是透過我的關係，吳晟跟陳映真的關係一直不錯，他很敬愛陳映真。陳映真給他寫的序很長。

林：很長。而且也幫吳音寧的書寫序。

曾：吳音寧那一本書啊，開始找人出版時，也曾找過我，因為我有一個小出版社，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現在關掉了。後來她找到陳映真，陳映真就是那樣溫情愛護後進的人，他替她寫了序。對於吳晟我懷著理解的態度……帶著寬容的理解。我並不把他歸類成真正的獨派。他二

〇〇九年寫的那首懷念陳映真的詩，〈景平路〉，以陳映真住家的那一條路「景平路」為象徵，前半段還是怎麼懷念啊，後半段卻是質疑為什麼「掛紅旗」。我的印象是這個樣子，有兩面的矛盾感情。那首詩寫得不錯，但是我讀起來就卡卡的，覺得為什麼非要這麼寫不可呢？

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嘛。吳晟對陳映真的情感確實是很深。

黃：如果情感那麼深，那首詩不應該那麼寫。

曾：對，沒錯，陳映真對吳晟也很敬重，寄望也深。

作為五十年深交的老友，他的轉變我是親眼看到感受到的，點滴在心。他的轉變應該在去愛荷華及回來前後……他是在陳映真去愛荷華以後去的，愛荷華是他轉變的一個轉折點，就我的感受他的轉變過程很長，時間拖

了很長很長，幾乎一直到八〇年代末。我跟陳映真曾經到他家去幾次，我開車載陳映真去過兩、三次啊，住在他家，一起聊天到深夜，他的孩子那時候都還小，他的母親過世時，我還跟陳映真特別去他家上香，他母親生前對我們朋友很親切。他的轉變也有受他太太莊芳華的影響吧，就我所知莊芳華在八〇年代就比較直接支持台獨了。

吳晟的散文集從第一本就請我給他寫序，前後共寫了四、五本，近年這幾本就找別人寫了。我很感謝他對我的信賴。那時候莊芳華曾評說：「曾醫師，整本書就只有你的序最好，吳晟的散文不行。」所以，我看他的轉變過程很痛苦，他的中國認同破碎了以後，要重新再尋找出口，很不容易，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我對所謂台派的「台灣意識」總是先抱著同情的理解從社會歷史的轉變轍痕去看。

黃：所以這個沒有人講過。曾醫師講的這個變化，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他怎麼樣地慢慢變化，對於我們理解台灣的變化有很大的幫助。

曾：我跟吳晟五十年的友情，對他有一定的理解。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是因為整個台灣思想文化界的貧瘠，沒有出路、沒有進步動力、沒有那個文化潛力，侷限了他

的思想飛躍。吳晟算是一個相當溫厚的人，比較不是思想型的人，而且是思想改變很慢的一個人。吳晟年輕的時候，也是跟像《藍星》詩刊裡那些年輕的現代詩人要好。他很早就喜歡寫詩。他本是一個在過去的時代很普遍的、有中國意識的人，從愛荷華回來之後，慢慢地破碎了，破碎後都要重建意識，這時，整個台灣思想文化環境產生了劇變，所謂「本土意識」崛起成為主流、主導文化，他周圍的一些中南部的朋友也都變了，再加上那時經濟的困頓，深深影響了吳晟的思想方向，使他原本深厚的「鄉土」情懷思維逐漸移行到「本土意識」。

他很尊敬陳映真，這一點是沒有錯。雖然有一個他敬仰的陳映真，思想也抵不過我常說的那時代性的「統治性的意識形態」。

■ 一九九七：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

林≡我們採訪王拓的時候，他有提到自己對中國和台灣的情感。他那時候已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訪談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十二）——以陳映真為線索經預估到第二次的政黨輪替了。我們跟他採訪了六個小時，沒想

到他那麼快就過世了。他舉了一個最生動的例子是，站在萬里長城跟站在八斗子情感上的差異。

曾≡他這句話已經講了幾次。一九九七年，我們辦鄉土文化論戰二十週年時，他忽然來到會場，也講了這句話。林≡他好像因為陳映真那場沒有邀請他心裡不舒服。

曾≡經過是這樣的，王拓他們很早就提了企畫案，申請到了文建會的錢，然後春風基金會又跟《中國時報》合辦，所以他們的資金、人力方面是蠻充足的。我們先拿到王拓他們向文建會申請的企畫案，看他們企畫的宗旨內容，就感覺到不對，他們想要把鄉土文學變成台灣意識文學。當時，王拓也邀請了陳映真，陳映真當時也猶疑啊，因為都是老朋友。那時尉天驄叫陳映真不要去，這樣子陳映真就下定決心不去了；陳映真決定不去以後，我們就把王拓研討會邀請了那些人研究了一下，就更加意識到他們要把鄉土文學論戰變成台灣意識論戰，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那才決定「乾脆我們來辦！」所以應該說，一九九七年研討會，是王拓場先籌辦。（註一六）

陳≡可是陳映真後來寫的那篇文章是針對王拓的，但看起來會是開在王拓主辦的會議之前……這中間是否哪裡有誤？

曾≡事實是這樣的：在十月十九日辦的「回顧與再思」

會上，陳映真發表了主題報告〈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在台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註七）}，文中他對於親身參與的二十年前的文學論爭作了有思想高度的社會科學的概括。他認為論戰是一次對支配台灣二十年的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挑戰和大突破。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陳映真在讀了王拓在「青春時代的台灣」研討會（十月二四日）上發表的論文〈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本土化運動〉一文後，寫下了另一篇長文〈一時代思想的倒退與反動——從王拓「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批判展開〉。^{（註八）}我也去參加了王拓那場會，只是旁聽。在誠品的地下室，很貴的地方。

一九九八年底，我們出版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第一期《清理與批判》，有兩大主題，其一就是刊登了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的論文，其中有我批判陳芳明的論文和陳映真批評王拓的論文。我們這邊的會議是早上論文發表，下午文化座談，王拓是下午來的，他自己跑來的。陳鼓應說，那就讓他講講話吧。後來他就坐在下邊講，他講完之後轉頭就走了嘛，那時候他還講：「我三更半夜醒來的時候想到這些老朋友啊，特別是曉波啊，陳映真哪……」還真令人動容，後來黃春明趕忙抓去麥克風澆了冷水。

我認為整個研討會對鄉土文學的判斷不是衝著王拓個人，而是對他們整個場的論述性質，他們想要把鄉土文學論戰變成台灣意識文學論戰，想在文學領域進一步推動政治正確的台灣意識論。那時候我們對於這個東西相當敏感，我們認為鄉土文學論戰絕對不能被誤導論述。回想起來，它可以說是九〇年代後跟陳映真一起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那就是有關台灣歷史論述、文學論述的批判論爭。

林〰所以那次鄉土文學二十年是在研究會的框架下辦的、出版了《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

曾〰是研究會辦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主要是因為有了這個研討會的論文積累以及有關皇民文學的批判才在一九九八年底創刊。我在《陳映真全集》出版紀念會上曾發表一篇論文〈挑戰與倒退〉，就是在處理那一段問題。我特別引用了當時陳映真當時應《中國時報》採訪的資料——當時文化新聞界已經知道會有兩場會議——陳映真當時對鄉土文學論戰以及二十年後的新文化政治情況說的很清楚，那材料我都還留著。這些東西有必要正視且公開討論，要認識陳映真文學思想這塊很重要。後來我們也跟陳映真到大陸，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國作家協會辦了幾次台灣文學研討會。

黃：這幾次會議都有紀錄嗎？

曾：你一起參加了第一次。

黃：哦，呂赫若的那一次。所以呂赫若那一次也是在這情況下辦的。

曾：對。陳映真一直堅持要讓中國大陸的學界認識台灣的文學和作家，所以他會辦呂赫若的會，又特別辦了楊達的。

黃：還有黃春明。

曾：對，還又辦了一次黃春明研討會。另外，在蘇州大學也辦過一次有關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橋》副刊論戰的研討會。推動活動的重要人物是人民大學的趙六〇。趙秋教授，如果要進一步認識陳映真在大陸活動的情況，一定要去採訪趙趙秋，她是在大陸幫陳映真最重要的一個人，後來趙趙秋還與呂正惠一起主編，我們分章分節寫了一部《台灣文學思潮史綱》出版，那是兩岸的文學界第一次合作寫的一本台灣文學思潮的書，那本書先出的簡體字，後來在人間出了繁體字版。再後來，還出版了一本《文學台獨總批判》。我是說，從九〇年代以後，台獨的歷史論述、文學論述已經慢慢地越來越強勢，陳映真不得不去應對這些。記得那時，陳映真好幾次邀我加入統聯，我都推託了，甚至於在一九九七年底要去北

京參加呂赫若研討會時，他邀我一起去，我說我還沒有心理準備要去大陸，陳映真一直催促下才成行的。

黃：所以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您還沒有想到要去大陸？

曾：對，還沒有。因為我那時候自認為自己對大陸還沒有一定的認識，所以並沒有很想去。說起來，對陳映真我很尊敬他叫他陳大哥，一直抱著一個想法，就是想全力幫助他，只是這樣而已；所以說你們要採訪我，我並沒有想要誇耀什麼，只是雜談把我所知的事跟你們談一談而已。

陳：曾老師可不可以說一九九七年你們弄的香港的那一系列活動？我記得您跟陳映真有一個很長的對談，在誠品。

曾：對，在誠品地下一樓嘛，連辦了三天的活動，叫香港「滄桑一百五十年」，那時候租金也蠻貴的呢，陳映真也花了不少錢吧！那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初香港回歸日，所以一九九七年是很忙的一年。一九九七年四月他又去中國社科院接受贈與「榮譽研究員」，席上他那一篇講話真的是寫得太好了。^(註一九)他那個演講裡有很長的一段內容，我能看出受到我借他的一本日文書裡面的部分影響。那本日文書名叫《東亞工業化與世界資本主義——第四世代工業化論》，^(註二〇)是一本在日本的朝鮮人學者寫的書。

陳映真還特別提起，韓裔的學者都能寫出這種論述啦，我們還沒辦法寫出來真感覺到羞愧，就像他不時批評台灣、的學界思想界一樣也間接批評、期待了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界。

陳≡那一九九八年年底的在台大有個關於近代日本與台灣的研討會曾老師有印象嗎，大概「皇民文學批判」前後，陳映真有一篇針對這個會議現場的手稿，(註二)當時我們找線索找了很久。

曾≡應該跟許介鱗老師有關，他那時候他還在台大，是由許老師主持開場的。

黃≡估計是戴國輝的關係。

曾≡沒錯，戴國輝也參加了，他在台下旁聽發言，陳映真和黃春明都沒有被正式邀請，只是去旁聽發言。會中對「皇民文學」問題發生了爭論，那一次尾崎秀樹也有來。

黃≡那次我有去。還有李明峻，翻譯政治經濟學的那個。那場還有很多台獨派去。中島利郎去了，葉石濤也到了。

陳≡陳映真手稿就是批評這些發言。

曾≡對，那個好像是什麼日本社會文學會吧？這個會有出版會訊簡報。

陳≡對，簡報是河原功寫的。

曾≡對。那個簡報把陳映真的發言翻譯成了日文，不知道是誰翻譯的，我手上還有那個簡報。那一場的前後後的資料我都有收集，而且當時寫了一篇報告，很長的經過報告，是對那一次的會議經過的一個說明，本來是想在研究會上向大家報告的。還記得當時《中國時報》的文藝版也報導了這個事。

黃≡我也有跟李明峻稍微講了下話。我倒是那時候不知道戴國輝有去。

曾≡他有去，我的紀錄裡有戴國輝的講話。

黃≡那太有意思了。因為我是覺得，陳映真受戴國輝影響是在更早之前，因為他在戴國輝的追悼文裡就有說，他出獄之後就讀到戴國輝的一篇文章，他受那個影響很大，後來我查得到的紀錄就是他們在一九八三年他去美國愛荷華的時候在葉芸芸的介紹之下見面了。之後，就會很明顯的，在戴國輝的一些紀錄，不算是日記，像行事曆那樣，可以看到兩人之間很密切的往來。那個往來如果跟陳映真同時間對台灣文學還有日據時期文學的關注，這兩個是可以放在一起來看的。所以戴國輝對陳映真的影響，其實是大的。但是從來沒有人談。所以我想要寫這個部分。

曾≡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後來李登輝的「南進論」出來

時，不是說成什麼《出埃及記》的摩西，說李登輝是摩西，要帶台灣「出埃及」啊。那個時候戴國輝在《中國時報》寫了一篇……當時大家都批評「摩西論」嘛，大家對他很不諒解，但是陳映真就不一樣。

黃：因為我看到陳映真他寫的那個悼念文裡面，他就說他知道大家都對戴國輝不諒解，可是陳映真自己說他沒有辦法說出一些傷害戴國輝的話。我覺得那一段是很重要的。

曾：沒錯，沒錯。你說的陳映真跟戴國輝的關係，這就讓我想起一九九七年二月我們在劍潭辦東亞冷戰會議的時候，日本的團長就是井上清，他是京都大學的名譽教授，用唯物史觀寫了一套日本史。那時候李登輝知道我們開這個會，知道井上清有來，就透過人說要見井上清，井上清回說這種總統我不見。我猜想，李登輝是不是通過戴國輝來居間聯絡的？

黃：應該是，因為第一屆之前陳映真還有徐勝都有為這個跟戴國輝見面，但詳細內容不知道了，戴國輝自己的紀錄裡是有提到這個，就是分別跟徐勝還有陳映真見過面。

曾：我們有邀請戴國輝，但他一直沒有參加。但是有一次他想參加了，我們開始給他準備機票什麼的，結果突

然消息傳來，他入院了，不久就過世。我記得是在光州會議的樣子，第四屆。戴國輝是幾幾年過世的？

黃：二〇〇一年一月。

曾：就是前一年那一屆的光州會議。井上清參加了三屆，在沖繩會議的時候還作為日本代表團的團長致辭，寫得很好，之後就過世了。井上清是真正的日本的歷史學家，他那本《日本歷史》是代表作，我經常要參考。

陳：老師您看的是中文版還是日文版？

曾：日文版。我是先看了日文版，岩波出版的，袖珍本上中下，蠻容易看懂。他實際上是完全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看歷史的，看日本的歷史的。他的分析你一看就知道。中文版最近有出版吧？可以當成一個教科書。他的立場是很清楚的，而且他很激進。

陳：那所以等於日本那邊來開會，都是他（井上清）來組織的嗎？

曾：不是。你說是不是井上清組織的？不是。井上清是他們邀請的。真正的組織者應該是日本的事務局，主要是在日本的華僑。

林：就是徐桂國他們，豬八戒等。

曾：對對。他們實際上是我所知道的，還有另外一些花岡事件（日本強擄奴工）平反運動的人。一個是雜草社

嘛，另外一個就是花岡事件平反運動的人。花岡事件的人他們很積極，一直都有出版會訊報道。還有一些，比如我說過的老田，很重要的一個人，真的很重要的人。這樣一些日本朋友，真的是令人尊重的。

■回顧與再思

陳≡所以聽起來最早是《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出版，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成立後為了準備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這個會進行很多閱讀和學習，兩者基本上是同步的或者是前後時間關係，然後再關聯到《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出版。這個過程您不可以再詳細講講。

曾≡我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成立於一九九三年，我這裡有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成立章程還有前言，它寫的是二號，實際上是四月一〇號成立的。開始當然是為東亞冷戰的會議共同學習。在一九九六年知道要舉辦這個東亞冷戰會議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閱讀研究什麼叫冷戰，譬如先共同研讀了一本邁克爾·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註11）} 第一屆會

後也組織了四次論文學習會，學習徐勝、林書揚、井上清、姜萬吉的論文。

我們還對照日文版讀矢內原《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帕米爾版是周憲文翻譯的，他是很重要的一個人，但一直沒有人研究他。周憲文在台灣銀行翻譯出版的那一整套台灣史叢書很重要。後來就還讀了陳映真組織出版的《台灣政治經濟叢刊》，一本一本地讀，還配合讀一些依賴理論、世界體系論。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

後來，就因為碰到的現實問題，每年都有一些重點。譬如說一九九八年初開始，我們曾經以「帝國主義與台灣」這議題，從三月二六日到六月十一日、分十二講進行了一系列的講座，陳映真還寫了一些東西講這個議題，據我手上的資料名單有三十幾人參加。

我記得很清楚，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前後，研究會成立不久第一個碰到的大問題就是對李登輝的南向政策的批判，當時楊照等文人也在大報發表文章支持李登輝啊，關於李登輝南向政策的批判我收集了很多資料啊，那些資料我都還在，所以最近蔡英文的新南向又出來了，我又把這些舊資料拿出來看啊，深覺得從日據末到今天，不到八十年的時光，台灣的不同統治者就發動了三次的南向政策，使人不禁感嘆台灣還未脫殖民之域……

當然配合讀書，我們也一直邀請各方進步專家運動者來報告和授課。^(註二二)特別是一九九九年我們舉辦了

「中國現當代史講座」，辦這個講座的理由在學員募集的說明寫得很清楚：「台灣朝野在面臨兩岸關係逐漸進入關鍵時期，往往倉惶失策、喪失主動，如何走出偏向觀念，客觀地認識和評價中國大陸現當代歷史，將是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講座的第一階段由林孝信和黃德北主講一八四〇—一九四九時期，從三月四日到六月三日分十二堂講授；第二階段由林孝信、黃德北、杜繼平三人主講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時期，從九月二一日到十二月二八日分十三堂講授，當時是有三十名學員參加。

後來在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年間，我們對日本小林善紀的政治漫畫《台灣論》展開過有計畫的批判，相關一些文章陸續有發表在《海峽評論》上。

林〇那老師我再追問一些細節，比如說你們那時候的運作……參加研究會學習的成員有提到幾個。那固定的大概有多少位，多久一次？

曾〇這個就是我當時影印下來的每一次的紀錄，比較固定積極成員除了陳映真和我之外如林孝信、黃德北、林一明、宋文揚、施善繼、曾淑霞、陳威佑、楊國君、金

鴻文等，其他在各不一樣時期來參加的人就很多了……馬雅貞你們知道吧？現在好像在清華吧？他也曾在一段時期很積極參加。他們都是自己來的，陳光興是我們邀請的。還有戴瑜慧哦，現在好像是在交大……那麼一批年輕學生，當時政大的新聞所、勞工所的一些碩士生如倪世傑、鄭怡雯，由黃德北帶來的……還有舒詩偉，那時候他在中原兼課，杜繼平、范振國、關曉榮、藍博洲、林深靖等有一段時間來過。另外，從事原住民運動的陳秀惠，後來當過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台北市原住民局局長，當時她還帶著小小女兒來參加很認真學習。

呂〇老師我想問一下，你說到研究會的組織實際上是有個宗旨的，那個宗旨實際上與《台灣政治經濟叢刊》是有點關係的，因為那時候陳映真他有一個動力，就是他超越情感、道德上的判斷，去進入一個比較社會性的理性的觀察。你說陳映真他講到台灣社會的性質論和台灣社會的變革論這個是一體兩面的，你也提到說這個跟台灣的左翼道路有很大的關係，不知道能不能再請你多談談這方面？

曾〇就我的認識，陳映真為什麼要花那麼大的精力去出版《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呢？這個應該與九〇年代前後《人間》雜誌停刊，以及台灣、中國、世界的新變化，

台獨論的崛起等新處境有關；過去周圍充斥的道德論、感情論沒辦法解決問題，他知道要超越克服這些論述就只有用科學的台灣觀點、歷史觀來找出路，在在要求他從社會科學，或真確地說還是從左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理解台灣社會。但是，那時候台灣幾乎不存在所謂左的觀點來分析台灣社會的著作，他只有捲起袖子自己來。他也不是要成為學者，是為了解決困境，為了要實踐，這就包括我們說過的無數次的會議和運動，也都是在尋求出路的努力。這樣的社會觀和歷史觀，這樣的一個理想世界觀，在台灣一直沒有建立起來，陳映真從九〇年代以後就開始努力了……這個也反映在陳映真九〇年代末重新再創作小說，你可以看〈忠孝公園〉，沒有到達一定的社會觀、歷史觀的高度，寫不出那樣的小說。你看到的〈忠孝公園〉，是一個繁複的小說人物世界，但是後面就是一個龐大的歷史敘述。譬如說有關於帝國主義與台灣的這個主題——他曾經想要寫這樣一本書，最後沒有完成——這也反映了陳映真的努力。當然我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主要在陳映真的領導下展開，第一屆會長是金鴻文，第二屆開始就一直我在擔任。我大概都有留一些筆記，現在來不及把它找出來，找出來之後這筆賬還是要清理的。

黃：那這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因為我們知道開始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一〇號，那到什麼時候是完全停止了？

曾：一直到陳映真在二〇〇三年生病了，後來又有一段時間他經常出去，到馬來西亞、到香港啊，後來研究會次數就沒那麼多了。真正比較集中活動還是在九〇年代到二一世紀初，以後就比較少了，到了二〇〇六年陳映真病倒北京以後，還是我個人在撐啊，後來我自己成立了一個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希望能夠再繼續，出版了幾本書，但是孤掌難鳴啊，都是自己在掏錢，也沒辦法展開，真如陳映真說過的：只要把旗子撐住就好，但那真是一面孤獨的旗子啊！我曾經要把這一棒交接給邱士杰，而且還找了幾個朋友一起拍了一張照，但是他沒有很積極，這個會就等於是停頓了。

研究會另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協助出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裡面的內容有許多來自我們研究和運動實踐的成果，譬如創刊號就是。特別關於台灣光復史方面的研究、出土……我自己把很多時間精力投入到光復史研究上。在光復史料的研究和出土上橫地剛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陳映真也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在這方面，比如之前說過的關於范泉的出土，還有歐坦生（丁樹南），

駱駝英……這個跟橫地剛、跟廈門大學朱雙一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有關。那為什麼會集中在台灣光復期的歷史呢？

主要還是因為面對漫天而來的台獨歷史論述的謊言，我們只有科學地客觀地揭示關鍵的歷史，才是最有力說服力的批判。所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很大的部分就是在刊登這些東西，這個在陳映真九〇年代以後的工作和論述裡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我自己寫了出版了幾本有關台灣光復史的書，一本是一九四五年，一本是一九四六年，另有一本是有關一九四九年，還有幾本文論集和資料集。

陳映真也為楊逵辦過二次研討會，一次就是跟中國作協到廣西南寧辦了一次，另外一次就在一九九九年為紀念四六事件以及楊逵發表《和平宣言》五十週年，在耕莘辦了一次很有特色的文化會；當時我跟陳映真上台共同朗讀了一次陳映真寫的有關光復期內戰跟冷戰的歷史敘述，我們兩個上台，陳映真讀一段，我讀一段，等於是報告劇一樣。我們不把四六事件或和平宣言單純地孤立地看成只是一個台灣的事件，而是當時國共內戰中解放軍已快過江將要燒到南京、上海、台灣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內部「國共和談」之聲甚囂，此時楊逵發表了《和平宣言》，台大和師院又發生了學生運動，陳誠為了

隔絕內戰戰火對台灣的影響，開始整肅學運和文化新聞界。陳映真通過我們出土的楊逵在光復初期的作品和活動，更深入了解、尊敬楊逵的思想和實踐，這些都反映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上。後來陳映真病倒了，先是梁電敏當人間的社長，《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由更多且更廣泛的朋友組成的編委會，范振國當主編，一段時間後就停刊了。

林：梁電敏接的時間是不是很短？

曾：也有一、兩年的時間，《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也出了幾期，那時候人間還在長沙街，每期組稿都會開編委會，我記得有一次開編委會，陳光興來了，趙剛還帶著孩子來，在那邊一起吃火鍋啊。最後一期編委會通過由我來編，結果編好了，整個文章都組好了，呂正惠突然說要停刊，一些我拉的稿子沒辦法出愧對朋友，那也沒辦法……電子檔都還在我手上呢。後來就是呂正惠當社長，為什麼？有一次梁電敏在編委會上說他有困難，他公司被查賬，然後說他沒辦法再繼續做了。真的說起來，對左統派的打壓，不管哪一黨當政都一樣，到現在還是一樣嘛。

黃：您剛才說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本來要交給邱士杰嘛，還拍了照片，那大概是在哪一年？

曾ㄟ陳映真倒下去後，我在編《方向》叢刊的時候，應該是二〇一〇年以後了，我還記得二〇〇九年我要寫一九四九年那本書的時候，邱士杰還在讀博士，我還請他替我收集材料呢。應該是二〇一二年夏天以後的事。

黃ㄟ所以是二〇一二年年底左右想要把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交給邱士杰。

曾ㄟ之前，或更早一點，出版《方向》之前。

總的來說，我認為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跟《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是息息相關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創刊前一年，我們研究會就不斷地討論，要創刊什麼樣的新刊物，我的筆記都有很清楚紀錄；《人間》雜誌的一些老同事也很寄望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陳映真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實際上出版後市場反映冷淡，或者說思想市場上都很冷淡，所以，後來呂正惠當社長時就把堆積在倉庫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全部清出來，把一些擺在勞動黨、夏潮任人取用，有時候我去夏潮開會我太太到勞動黨開會也都帶一些回來，內心真捨不得啊！因為每一期都灌注了心血啊，每一期都負載了很厚重的思想，陳映真對時代的發言。我不是跟你們說過嗎，我在日本的時候，就與陳映真時有書信往來，我很敬重他才會一回來就跟他一起工作，實際上我一開始就

只想在旁幫助他協助他，一直避免出頭。我認為他作為代表性的時代批判者雖然有名氣，但是孤獨的，不管在思想上或實踐上。雖然現在全集也出了，但真正能夠摸到他的全思想的，還沒有吧！

麗雲想要來採訪時，我想我年紀也差不多了，剛好有這個機會把一些走過的路以及內心話講出來。希望陳映真和我們過去努力的成果，還有陳映真的思想實踐能有進一步的發揚，我認為台灣的出路就只有在這裡邊，只能在這裡找出路。

林ㄟ從陳映真找你回來，你們成立研究會，再來籌備六次會議，再到《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再到《方向》……曾醫師剛才提的意思是，主要是您在承擔這個工作，雖然很多人在協力。我想問的是這個線索下來，第一個是這中間有沒有做過調整，還是這個思路是跟實踐是一致的；第二個是說，這個跟陳映真實踐路徑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可不可以談一下？這兩個問題一個是個人的，一個是跟陳映真有關係的。

曾ㄟ我個人是一直沒有改變的，實際上我後來的工作是年輕時思想的進一步的特化和實踐。本來是一個執業牙科醫師，在日本十幾年自己閱讀，也沒有參加任何活動，一回來，碰到陳映真，實際上陳映真的問題就變成我的

問題了，也是我自己的基本信仰——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個我是一貫的。一九九二年回來，一九九三年開始跟陳映真一起工作，實際上也是在實踐這條路，不管我們是在認識台灣社會歷史的性質上、光復史上也好，對台獨的批判也好，實際上都在貫徹這樣的一個思路。

陳映真雖然沒有不斷地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實際上他是的。雖然有人可能對陳映真的馬克思主義會有意見，但是基本上他是的，不管是在歷史批判還是社會批判或別的怎麼樣，實際上都是在台灣的具體社會的實踐，這不是一個講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他所有的文章都是為了實踐，沒有空論的，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的現實問題尋找出路而發的。

黃：你也有提到你當兵的時候都會去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的動態，然後我比較好奇的是，到後來文革的真實狀況慢慢地曝露出來之後，你如何面對這些曝露出來的狀況？

因為我們也看到保釣後期其實因為文革事情的曝光出現過很大思想上的變動，所以想聽下曾醫師您當時在文革的狀況被曝露出來以後，怎麼看文革？

曾：雖然革命必定帶有血汗，基本上還是認為文革有它正面的意義；譬如說當時的五七幹校或者是下放政策，我認為統治階級必須要經過一定的勞動改造，才不會脫

離人民的世界。記得我當兵的時候就從負面的反共材料裡邊看到這些，那時候我就認為世界是應該這樣子的——一個平等的世界。當然它會有各種各樣的弊病，這個弊病我都了解，我想陳映真也更深刻了解。琪椿講到這個的確是一個重點，那現在社會主義像一場神話一樣崩潰了，「蘇東波」都崩潰了，我是不是還相信？我當然還相信，因為這個牽涉到人類的未來，人類建設平等社會的方向。

林：跟著這個文革的話題，我還是問一下老師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因為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文革、六四都是大的事件，對於社會主義信仰者來說——我是說台灣這邊。事件造成左翼內部社會主義信仰者的分歧和分化，後來有些人就因此改變了嘛，所以我也想聽聽你這一邊怎麼去理解這一個事件，以及對你的信仰有沒有挑戰或是衝擊。

曾：我記得六四的時候我還在日本工作。剛發生的時候我剛好要回台灣，在日本成田機場的廁所就看到很多牆壁上的塗鴉謾罵的話，當時就知道那是去日本留學或工作的一些大陸人在廁所的謾罵，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謾罵，我印象很深。當時我剛好認識一位從北京來日本的中醫師，他是北京大學醫學院的中西醫結合的教授到日本來

短期工作，我當時腰痛找上他替我治療，那時候就談到了大陸的情況，我說天安門事件爆發了你要不要回去啊，他說我還是要回去啊！我說你要怎麼樣回去啊？他說就只有先到香港看看怎麼回北京。他當時還跟我提到大陸當時正面臨的難關，就是物價的改革這一關，他說那是一次大難關，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個醫生當時跟我談的內容。對六四事件，日本 NHK 每天、每時每刻都在報導，知道很嚴重，但我並沒有感到一種失望或什麼的，也可能因為我這個人比較鈍，不會因為六四天安門的事件而改變我的想法，或者因為那個事件太複雜了，一直到現在都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和說法，我還沒有有一定的見解，只知道世界上有更多的野蠻。

黃：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再問一個問題。曾醫師您說在日本工作有十年了嘛，可是你最後成為一個反日的知識分子——其實我知道很多到日本工作的人最後都接受了日本的那一套嘛，您是怎麼樣在日本有這麼深厚的居住和工作經驗，可是你卻成為了反對日本帝國的人？

曾：實際上，個人的生活工作和對民族歷史的感情認同經常是兩個層面，特別在日本生活後，深刻體會了日本的問題，更能了解真相。一九八六年，日本剛上台的總理中曾根急速右轉，叫囂什麼「戰後總結算」，我寫了一

系列報導評論。因為日本戰後初期曾有一段「一億人總懺悔」的時期，我就用了「從一億人總懺悔到戰後總結算」的題目以歷史性的批判，中曾根的「戰後總結算」就是對日本戰後價值的反轉或否認，它一直擴大到現在的安倍政權，根源還是在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那兩年世界的背景是什麼？是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一年。那一年在美國紐約的 Plaza Hotel 舉行了一次七國高峰會，那一次的會議決定了日本往後的命運，之後日本就急速右轉，日幣急速升值產生了瘋狂的泡沫經濟。在那以後我就逐次寫了一系列文章，著重批判日本的右傾化，寄給陳映真，陳映真把它改了一個題目，登在《人間》雜誌。從那以後我就不斷地寫了包括日本的有關東亞的議題，最近我就把三十年來的批判，大概六十幾篇編成一個文集叫《東亞的憂患》，註四 準備送給大家。

林：您怎麼看像黃德北後來他們這樣左翼聯盟的集結？在你自己的理解看來，他們跟傳統左翼的連結又是什麼？曾：當然我也曾受邀參加，但我沒有加入。既然掛了「左翼」，而且要成立一個政黨，我一直期望它有一個綱領，這很重要。因為自命為左翼就應該在思想、理論和政治理想上比任何政黨或運動都清楚、進步，所以至少要有一個綱領。曾經有一個視頻記錄了陳映真在勞動黨

開會的時候的講話，他說如果你沒有台灣社會性質論，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到底往哪裡走都不清楚，那是不可行的，勞動黨一定要解決這些問題。我也是覺得一個左翼團體至少先要有一個「台灣社會性質論」，台灣是怎樣性質的社會，或者是有簡單的階級分析，然後大家再不斷地反覆討論凝聚共識，寫出一個政治綱領。如果這個東西都沒有的話，後來就會沒有方向，作為一個左翼政黨，它的動力還是在這邊，如果沒有這個的話，我認為它不會有很大的發展……太匆促了，還是要先沉下來。雖然我也理解左翼聯盟是一個各路人馬的聯合，但我還是認為至少要有一個寬鬆的、最低的綱領，否則人家要怎麼認識你。上次聚會麗雲也在場嘛，我很不合時宜地介紹大家讀《陳映真全集》第二十三卷裡的那篇佚文〈台灣反帝·人民民主主義變革運動初論〉，那篇文章是九〇年代夏潮出來選舉失敗後陳映真講的重話，他先指出失敗是由於沒有台灣社會分析，然後他自己做了很長的社會分析，那一篇很重要，要反覆地讀，我認為它是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最完整的一篇。

- (註一) 陳映真(一九六五)〈現代主義底再開發〉，《劇場》第四期。收入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一卷，台北：人間。
- (註二) 王尚義(一九六四)《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台北：文星。
- (註三) 吳晟(一九七六)《吾鄉印象》，台北：楓城。
- (註四) 曾健民先生補充說明：陳映真的一篇文章〈重回綠島〉就敘述了這細節和對王競雄抵抗精神的敬意，他說：「一九七五年我回到家以後的十幾年，經常都會想到他。對他的絕對性的不妥協主義，我並不贊同……然而我卻對他的溫藹卻又堅強的抵抗，充滿了至今不減的敬意。」該文收入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七卷，台北：人間。
- (註五) 艾思奇編(一九八四)《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
- (註六) 曾健民先生補充說明：這個宗旨我在一些文章裡都曾經提到過，它寫得很清楚：「我們有鑑

於此，深感一方面要批判地繼承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遺產，為了克服當時台灣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援引了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對於台灣社會與歷史之科學的、自我認識工作；一方面又要進一步汲取二戰以後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以及其他各種進步的關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理論新的反省與發展，同台灣社會具體現實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誠為當務之急。欲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協議成立了這個研究會。」

(註七)

矢內原忠雄(一九八七)《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周憲文譯)，台北：帕米爾書店。

(註八)

曾健民先生補充說明：根據我手邊留存舒詩偉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發給大家的傳真稿，明德水庫教師會館的集會時間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一六—一七兩日，集會的目的是：(一)在運動形勢方向上做思想的討論與澄清，開創論壇；(二)為進步運動加強基礎；(三)大家見見面通通氣聯誼一番。報告的議題總題設為形勢與運動，內容預計有：(一)陳映真：全球化、

兩國論、國際——台灣社運的瓶頸與出路；(二) 陳信行(暫定)：地震的新局；(三) 林孝信：新聯盟新運動的可能。

(註九)

曾健民先生補充說明：陳映真還特別為大會寫了一篇動人的團長致詞，他指出：「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美國的武裝不但迫使韓民族南北分斷，也造成海峽兩岸的民族分離和對峙，韓國和台灣都成了美國在遠東戰略的前線，並且在冷戰體制下，深受民族對峙、獨裁政治和人權蹂躪之苦。在戰後的冷戰體制下，日本逃避了對自己在東亞所犯戰爭罪行的責任，成為美國霸權主義東亞戰略的工具，支持和強化東亞各反共軍事獨裁政權，二度損害了東亞人民……在人民層次上，二十世紀三、四〇年代，日本、朝鮮、中國大陸和台灣人民曾經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有過團結互助的偉大傳統，讓我們在這偉大傳統的光照下，為了徹底粉碎冷戰體制，爭取分裂民族的再統一和世界真的和平和進步，團結一致，戰鬥到底！」

(註十)

陳映真(一九九五)〈金明植：歌唱希望、自

由和解放的詩人〉，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五卷，台北：人間。

(註一一)

陳映真(一九九八)〈最近的活動〉，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七卷，台北：人間。

(註一二)

林書揚、杉原達、徐勝(一九九五)〈杉原達、徐勝二氏回日後來函〉，林書揚(二〇一〇)《林書揚文集》第一冊，台北：人間。

(註一三)

曾健民先生補充說明：在一九九七年第一屆台北大會上，台灣秘書處發布了「緊急呼籲」特別提出了：「要求政府對白色恐怖犧牲者進行認真嚴謹的調查研究，負起法律責任，特別對冤假錯案進行謝罪和賠償」。翌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八日)，台灣立法院終於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及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對於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給予可以申請補償及恢復名譽的平反。同是政治受難者的陳映真很快對這條帶著濃厚的台灣現實政治妥協痕跡、殘留著反共威權色彩的補償條例表達了批評的意見。據六月一日《聯合報》記者江中明的專題報導，陳映真指出了：「該

條例仍列了如「叛亂匪諜有實據者」等不得申請賠償的「排除條款」，先訂了「我是警察」和「你是強盜」的地位，卻沒有考量到即使是警察，也不能侵迫人權。該條例要受難者自己提出申請，經政府審核，若認為資格不符，可以駁回，這已是將政府放在「絕對」的立場。台灣政治受難者平反問題，一定要放在整個「戰後世界史的範疇」來討論、處理，否則永遠會有爭執。不是繞在「你是不是共產黨」的問題，而是政府為昔日不必要的大規模蹂躪人權措施承認錯誤，否則，所有國家暴力都會有「不得」、「不得不」的說辭。」相同的觀點也列入了一九九八年濟州島舉辦會議時（八月二一日到八月二四日）台灣秘書處發表的大會呼籲文中，有二點如下：『第一、我們反對《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及匪諜案件補償法》中，要求白色恐怖受難人否認自己的政治信仰換取高額補償的規定。我們認為這是變相強迫政治「轉向」，是對受難人及家屬的二次傷害。第二、我們認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是戰後世界中冷戰構造下美國虐從國家的大規模人權蹂躪事件，

政府應無條件、通案辦理道歉和包括物質、精神雙方面的補償。』

（註一四）陳映真（一九九八）〈重回綠島〉，陳映真

（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七卷，台北：人間。

（註一五）陳映真（一九九八）〈被視為牛馬的日子〉，

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七卷，台北：人間。

（註一六）曾健民先生補充說明：我在〈挑戰和倒退〉的

論文中據實說明過經過：「一場是由陳映真主導，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人間出版社和夏潮聯合會自費主辦的「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討論會」（一九九七年十月一九日），另一場是由政府文建會出資、立委王拓的春風基金會主辦的「青春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回顧研討會」（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四—二六日）。前一場，因經費有限只舉辦了一天，但與會者大多是當年參與論戰的鄉土派主角，陳映真、尉天聰、黃春明、王曉波、胡秋原等人；後一場，在台北敦南書店連續舉辦了三天，與會者除了王拓之外都不是論戰的當事者，如陳芳明、龍應台、楊照、

焦桐、平路等人。從經費來源和與會者的不同就突顯了兩場研討會極為不同的性質，再從當時《聯合報》報導的聳動標題來看——「二十年後烽火再起」、「搶辦研討會、爭取詮釋權」，也反映了當時「鄉土派」與後來的「本土派」之間分立的氣氛。」

(註一七) 陳映真(一九九七)〈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在台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七卷，台北：人間。

(註一八) 陳映真(一九九七)〈一時代思想的倒退與反動——從王拓「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批判展開〉，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七卷，台北：人間。

(註一九) 陳映真(一九九七)〈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演講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六卷，台北：人間。

(註二〇) 金泳鎬(一九八八)『東アジア工業化と世界資本主義——第四世代工業化論』，東洋經濟新報社。作者在書中把世界資本主義歷史發展

過程分成四個不同性質的工業化論和現代化論，書中有一個表格表示得很清楚：第一世代工業化是英國，第二世代法國、俄羅斯，然後第三世代是日本，第四代就是所謂的東亞 NIES，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對當時流行的四小龍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學的進步的理論。它區分了第一、二世代是由資產階級推動與市民運動結合在一起發展的，但是到了第三代的日本和第四代的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四國地區，工業化現代化就不是由新興資產階級和市民運動發動建立起來的，而是先有了一個波那巴式的權威的民族國家或政府由上而下發動的。

(註二一) 陳映真(一九九七)〈近代日本與台灣學術研討會「有感」〉，陳映真(二〇一七)《陳映真全集》第十七卷，台北：人間。

(註二二) Michael Schaller. 1985.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邁克爾·沙勒(Michael Schaller)(一九九二)《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郭俊鈺譯)，台北：金禾出版社。

(註二二) 曾健民先生補充說明：比如一九九三年一月邀請文馨瑩來講「台灣一九五〇—一九六五年的美援」，一九九四年七月邀詹澈來講「台灣的農會和農村」，一九九四年一月邀施威全來報告「台灣的地方派系」，一九九五年六月請金寶瑜來報告「國際壟斷資本」，一九九五年一月邀請陳昭瑛報告「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和舉行座談會，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月請呂正惠來講「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系列，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月請陳光興來講「後現代主義」，一九九六年五月請林孝信報告「文革的起源」，一九九六年五月請許甘霖來講「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一九九六年六月邀請曾參與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副刊《橋》文學論戰的孫達人老先生來講「副刊《橋》的歷史證言」，一九九六年八月與日本 AWC 丹羽雅雄所率團舉行共同座談會，一九九七年八月參與編寫《糾謬「認識台灣教科書」》，一九九八年十月請高偉凱來報告「台灣工人狀況——以新竹縣為基礎」等等。

(註二四) 曾健民(二〇一八)《東亞的憂患：日本的歷史翻案和右傾化批判集》，台北：秀威。

曾健民 簡歷

一九五〇
生於花蓮縣玉里鎮。

一九五七
進入玉里國民小學就讀。

一九六三
國小畢業，考入省立花蓮中學初級中學。

一九六五
初中畢業，保送花蓮中學高中部。初中三年級時開始閱讀課外文學、思想書籍，高中一年開始自己寫短篇小說，第一篇獲刊在商務印書館在台復刊《東方雜誌》（第一卷第三期）。高中

三年認識來校任教的王拓（當時原名王紘久），一起辦校刊《海燕》發表一些散文。

一九六八
高中畢業大專聯招選考農醫組，考入屏東農業專科學校三專部畜牧科。

一九六九
投稿校刊初識當時擔任校刊《南風》社長、詩人吳晟（吳勝雄），接著認識詩人詹澈（詹朝立）。在《南風》校刊發表一些散文、小說，其中有一篇短篇小說〈壓下的山影〉。下學期休學重考聯考落榜。

一九七〇
重回農專就讀，再度休學重考大學，又落榜。

七月至九月避居太魯閣中橫公路長春祠上「禪光寺」，認識同住的王競雄老師和隨他來的洪惟仁，又淡江大學剛畢業的陳列（陳瑞麟）也來寺居住。九月收到兵役徵招單隨即入伍當大頭兵，不幸抽到三年役期。

一九七一
分發到空軍防砲，隨即派往馬祖北竿島最前線，年底換防回桃園大園機場。因「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案的牽連，遭軍方情治單位約談，兩天後釋回。

一九七三

部隊換防金門，年底從軍中退伍。

一九七四

考上高雄醫學院牙醫學系。

一九七九

到台北鐵路醫院牙科實習，初識陳映真。

一九八〇

從高雄醫學院畢業，考上牙醫師執照，到私人牙醫診所工作。

一九八一

到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矯正學部留學，考取日本牙醫師執照。

一九八二

應聘到日本北海道大成町診所執業，妻女一同全家移居該町。十年在該地

自己讀《馬恩全集》及大陸出版馬克思主義書籍。其間替吳晟的三本散文集寫序言。

一九八六

今年開始寫日本批判文章，如有關日本的「東京大審翻案」問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等，有一篇原題〈從一億人總懺悔到戰後總結算〉的文章拿給陳映真，他改題為〈軍事日本和經濟日本〉刊登到《人間》雜誌（一九八八年八月號）。

一九九二

結束日本診所工作，全家移居台灣，在台北市敦化南路開業。

一九九三

四月十日與陳映真和其他朋友共同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一九九四

六月廿五日由研究會、人間出版社、夏潮共同為紀念韓戰週年，在耕莘文教院舉辦「韓戰真相」演講會，播放紀錄片《歷史的見證》，曾健民、陳映真演講。七月，曾健民與陳映真對談「日本的戰爭責任和台灣的日本情懷」，刊登在七月七—八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一九九六

十一月廿三日至十二月十九日，人間出版社和研究會聯合舉辦「五十年枷鎖：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照片展」（展出地點：力霸大樓七樓新生畫廊）。十一月三〇日至十二月一日，參加聯合文學、文建會主辦「呂赫若文學研討會」擔任評論人，陳映真發表論文。

一九九七

二月廿一—廿四日在台北市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舉辦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

六月廿八日至八月六日為慶祝香港回歸在敦南誠品B2舉辦「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照片展系列講座，與陳映真對談「從台灣看香港歷史」。

八月，參與編寫《「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資料》（九月廿五日台灣史研究會出版），糾謬李登輝欽定初版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十月十九日，在台師大舉辦「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討論會」。

一九九八

一月十五—十八日，參加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辦「呂赫若作品學術研討會」。

三—六月，研究會進行「帝國主義與台灣」系列講座，共十二講。

三月廿一—廿二日，參加夏潮基金會主辦「認識台灣歷史（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學術討論會」，發表論文。

八月廿一—廿四日，韓國濟州島舉行「濟州四·三第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月廿九—卅一日，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舉辦「黃春明作品研討會」，發表論文。

十二月，創刊《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第一期《清理與批判》。

一九九九

三月四日到十二月廿八日，研究會舉行「中國現當代史」公開講座，分二十五講進行。

四月五—六日，在耕莘文教院舉辦「紀念楊遠和平宣言及四六事件六十年」。和陳映真兩人以幻燈片報告了〈四六事件的大歷史背景〉。

七月十三—十四日，參加夏潮基金會在澳門舉辦的「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研討會」，發表論文。

七月廿七日，參加「跨世紀亞洲人民

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展望的國際研討會」，陳映真發表〈帝國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危機〉，擔任評論人。

十月一日，赴北京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大會」。

十月十六—十七日，參加苗栗明德水庫教師會館左翼同仁聚會。

十一月廿六—廿九日，參加沖繩「東亞人權與和平國際研討會」。秋天，出版曾健民、陳映真合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台灣文學問題議論集》。

二〇〇〇

五月八—十日，到廈門市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

五月十七—二十一日，到韓國光州市參加「紀念五一八二十週年，朝鮮戰爭五十週年國際大會」。

八月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在蘇州大學舉行的「台灣新文學思潮一九四七—一九四九研討會」，會後爬黃山。

二〇〇一

參與兩岸台灣文學研究者共同執筆寫作《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二〇〇二年兩岸分別出版簡繁體字版)。

二〇〇二

一月廿九日，參加「陳純真老師追思會」。
二月廿二—廿五日，參加日本京都市立命館大學舉辦「朝鮮戰爭、日美《安保條約》、舊金山和約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十月十七—廿日，參加韓國麗水市「紀念麗順事件五十四週年·第六屆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

十月廿四日，參加中國統一聯盟舉辦的「台灣光復五十七週年紀念演講會」。

二〇〇三

二月五—十七日，參加「第二屆夏潮楊遠文學營」，擔任講師。

三月創辦「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新二二八史像》。五月十五日，應

劉紀蕙邀請到交大社文所課程演講。

二〇〇四

十一月十三日，參加「台灣學運論壇」(紫藤廬)，擔任發言人。

二〇〇五

十月十五—十八日，參加廈門大學舉辦的「海峽兩岸台灣文學史學術研討會」。
十月廿二日，應邀赴深圳參加「紀念台灣光復六十週年及《宋斐如文集》出版發行座談會」。

十月廿四日，應邀參加香港中聯辦台灣事務部主辦「紀念台灣光復六十週年座談會」發表講話。

八月廿一—廿五日，參加廈門大學舉辦「海峽兩岸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

十月廿八—廿九日，參加夏潮聯合會

二〇〇六

八月廿一—廿五日，參加廈門大學舉辦「海峽兩岸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

十月廿八—廿九日，參加夏潮聯合會

主辦「日據時期台灣文化與社會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評論人。

十一月十四日，與黃春明、詹澈、施善繼共同以特邀貴賓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活動，同時四人想探望在北京病倒的陳映真，不成。

十月十七—廿七日，應邀參加河南固始舉辦的「固始與閩台淵源研討會」，回程在北京與陳映真見面。

二〇〇八

九月廿六—廿七日，參加《文訊》主辦的「陳映真創作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〇〇九

十月卅日，台北清華大學月涵堂「魯迅左翼傳統」會上，講〈魯迅在台灣

的傳播和影響〉。

十一月廿一—廿二日，參加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主辦「陳映真：思想與

文學學術會議」。

二〇二二

七月廿七日至八月五日，參加台灣同學會兩岸交流學術研討會及陝西考察活動。秋天，創刊《方向》叢刊，出版《東亞後殖民與批判》。

十一月十七日，參加「林書揚先生追思會」。

二〇二三

七月廿五日至八月二日，參加台灣同學會兩岸交流學術研討會及寧夏考察活動。十一月一—四日，參加廈門大學主辦「台灣文學文化雙甲子研討會」。

二〇二五

七月廿六日，參加台灣同學會兩岸交流學術研討會及大連考察活動。

八月廿一—廿八日，參加台灣同學會兩岸交流學術研討會及青島考察活動。

十二月一日，參加北京八寶山「陳映真告別式」。

十二月十日，參加「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十二月卅一日，參加「陳映真紀念會」。

二〇一七

一月七日，參加在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舉辦的「左翼對陳映真的追思會」。

三月三日，參加「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

三月十七—廿日，參加廈門大學主辦「鞭子與提燈：陳映真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

八月廿六日，參加「鄭成功收復台灣三百五十五年論壇」，發表論文。

十一月四—五日，參加《「陳映真全集」發表會及陳映真思想研討會」。

十一月廿四—廿五日，參加「陳美霞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擔任公衛專家

Howard Waitzkin 專題演講的回應人。

二〇一八

十一月十七—十八日，參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主辦「第一屆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十四—十七日，到日本福岡參加福岡亞洲美術館主辦「刻在黑暗中的光：亞洲木版畫運動展一九三〇—二〇一〇」。

二〇一九

結束中日牙醫診所執業，退休，並返回花蓮定居。

二〇二〇

八月十三日凌晨，因病於花蓮逝世。享壽七十一歲。

二〇一六

致曾健民先生

一周前我接到了曾健民先生的訃告。我已過了七五歲，我比您大五歲，但您離開人間，這是否太早了？

由於曾先生的去世，我的「台灣地圖」也發生了很大的空缺。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在我出獄後的第五年，我們第一次見面。我記得是在曾先生的陽明山別墅，陳映真先生也在場。陳先生不僅具備作為偉大文學家的光環，還具備透徹的思想性。他是個子高高的美男子，聲音宏亮，很會畫畫，思路明晰，精通英語和日語等多種語言，完全是文藝復興式的偉人。他主持《人間》雜誌時，曾對韓國的民主化運動表示很大的關心。

曾先生是在九州牙科大學畢業的，在北海道做過十年的牙醫，所以很擅長日語。多虧他的幫助，我學到了台灣和大陸的很多事情。我很敬佩曾先生對陳先生的尊敬和

傾倒。他一生對陳先生如影隨形，不吝支援，如今那模樣還彷彿在眼前。

曾健民先生創立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致力於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台灣、大陸和世界的現狀。他作為旺盛的讀書迷，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抽出時間來，勤奮地學習並筆耕不輟。他寫了很多有關台灣現代史的著作，並致力於培養後輩。

通過曾先生的介紹，我也獲得了在《海峽評論》等幾家雜誌發表拙文的機會，這是我無比的光榮。

雖然我和他之間存在韓半島和台灣之間地理上的差異，但在世界觀和對東亞政治的認識上，我認為我和我的立場是一致的。

從那時以後，韓國在反獨裁民主化鬥爭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並成立了現在的文在寅政府。雖然因為美國的阻撓遇到

徐勝 (서승)

了很多難關，但是在韓朝和解和統一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展。

在台灣，在壓倒性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主義怒濤中，反對統一、附和美日霸權的勢力占多數，因此，這不僅阻礙兩岸統一，也阻礙了東亞和平。

我最近和韓國的歷史學家們一起寫了《為誰的歷史？

——新右派歷史學的『反日種族主義論』批判》。就東亞和平而言，我認為最大的障礙是明治以來一直推進東亞侵略政策的日本和在它背後支援的美國。加上，在韓國有戴著韓國人面具，與日本帝國主義合為一體的「親日派」；在台灣還有無條件地崇拜日本的「崇日派」或「哈日族」。

這種現象的蔓延是如今日本仍在向東亞伸出支配魔爪的重大證據。

在東亞地區，鴉片戰爭以來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江華島條約以後的反對日本侵略韓半島、滿洲、中國本土的「反日鬥爭」成為了東亞民眾最大的共同課題。我想把我的餘生獻給東亞和平、自主統一鬥爭，以此施壓日本清算歷史，阻止日本重蹈戰犯國家覆轍。

我對台灣同志的連帶感和友愛，是基於這種問題意識的。台灣同志們對我的細心關懷和支援更增加了我對台灣的關心。雖然地點有所不同，但在親美、親日獨裁政權下遭受牢獄之災的同志意識引起了我對台灣的強烈關注。

我很懷念已故的林書揚先生、陳明忠先生、陳映真先生對我的指導與愛護。尤其曾健民先生待我像對待家人一樣。每次我訪問台灣的時候曾先生和他夫人尤麗英女士都邀請我，甚至還讓我在家住一宿。有一次他們在新店的山東餃子店請我吃中國菜，我至今還能記得那道菜的味道。

一九九七年在台北舉辦的『第一屆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國際研討會』之後，我們一起參加了在濟州、光州、麗水、立命館大學的研討會。

在林書揚先生去世前一年的二〇一一年，我曾陪同曾健民先生和橫地先生一起去北京醫院探望過林先生，對此我記憶猶新。當時林先生表明了他一貫的唯物主義人生觀，說：「人死了以後只不過是歸於一把無機物」。我被他坦然面對死亡的態度折服了。

一起巡迴台灣和東亞各地，談論歷史和政治的時候，曾健民先生作為同志的溫暖和關懷包容了我。可惜您要邀請我到花蓮新居的約定無法實現。

作為同時代最優秀的教師、同志和朋友，我無法抑制對曾先生的惋惜之情。

但我不能不告別。曾先生走好！
懷著最大的尊敬和感謝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在首爾，徐勝

我的二哥曾健民

曾安民

八月十三日，二妹淑芳告知：二哥健民已在凌晨走了。雖然兩週前才剛從台灣返美；理性上已預知這一天的到來，內心雖然已有所準備，但是仍然無法接受這從此將永別的事實，無比黯然。無法自己地陷入反覆的思緒中……，回想這幾年來，我們竟然錯過那麼多可能一起坐下來有機會。這是永久的遺憾！

最後一次和二哥隔海長談，是在他得病時。他說：他已經盡全力的把台灣近代社會變遷的歷史的真相，很忠實的紀錄下來了。往後，他希望他能把他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筆寫下來。但，很遺憾的，他這個希望只能由我們一起來替他完成了！希望這篇追思文能幫忙填補一些不為人知的空白。

在談話中我們也一起回想我們小時共同的童年：

其一張烙印在我們記憶深處；永遠無法抹滅的影象……

這一年，他十五我十三歲。我們的學校是在一百公里外的花蓮市。當時，暑假過了，又是註冊的時候，父母好不容易才籌足了我們的學費。可是，颱風剛過溪水暴漲；整個村莊被溪水與外界隔絕，不註冊不行！父親只好冒著危險扛著我們的行李，再一個一個，一步一步的，小心的涉過深及腰部的湍急洪水……

每次想到此，我們心中永遠有許多酸澀異常，刻骨銘心的感觸！

花蓮卓溪的茅草屋：

我們六個兄弟姐妹共同的童年

我們的父母是典型的台灣客家人。誠實、忠厚、吃苦耐劳、擇善固執，重視倫理道德、以誠信待人。所以

從小我們便建立這價值觀及嚴謹的生活方式。父親是卓溪國小校長，卓溪是個布農族集中的聚落，也是當時布農族部落惟一生活文化聚集的中心。父親不止專心於教育工作，他也用了他四十年的生命，主導整個部落人文及生活的協調。他的努力，讓整個布農族部落十分融合。我們也經常分享他們獵來的野味：山羌、山豬……。我們六個兄弟姐妹生命的前二十年，也就是在這氛圍下成長……。

卓溪是座落在花東縱谷中部、中央山脈脚下的小村庄，有一條乾溪三面環繞整個部落，平常乾旱的溪床是唯一到玉里鎮的通道。父母在國小附近建了一間十來坪的茅草屋；在門口遠望，就可以鳥瞰玉里鎮及東部海岸山脈。

台灣東部是每年颱風登陸以及地震最頻繁的地方。

每到颱風季節，颱風帶來的暴雨，造成中央山脈山洪暴發，總會把整個村莊與外界隔絕。童年回憶，在颱風侵襲時，烏雲密佈，颱風暴雨呼嘯而過，全家緊緊互相依靠在煤油燈下恐懼但親密的感覺，仍歷歷在目。狂風暴雨過後，樹木傾倒，室內漏雨處處鍋具滴滴答答作響，以及修補被吹翻茅草屋頂的情景，仍十分難忘。

當時，父親薪水無法完全支持家用，聰明的母親想出可以貼補家用同時也可以幫助原住民銷售家產的辦法：她每天到部落去收集零星的農產，整理以後，每天清晨用腳踏車送到平地的玉里市場去賣，四十年如一日。我們的學費及生活費就是如此一點一滴攢取的。

同時，在家附近，父母也經營一片果園：它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果園中，茅草屋裏，我們全都擠在一間四坪左右大的房間一起長大。穿的是由母親用學校營養午餐使用過的麵粉袋裁縫改裝的衣褲，我們每天的工作是：一起上學、放學、做功課，然後依據分配去分別拔草、澆水、施肥，或跟著母親去部落賣水果，收集山產，辛苦但充實……

記憶最深的是每天清晨一起撿蝸牛的情景：當時蝸牛是市場十分受喜愛的山味，也是我們家收入的來源之實……

一，每天清晨我們全家都會一起上山撿蝸牛，我通常都會很快的爬上山頂，健民則喜歡留在山溝裏找尋蝸牛。

山溝裏陰暗、他膽小，常大聲呼叫我壯膽，我也大聲的回應。撿完蝸牛後，全家一起清理，由我或二哥陪母親送到玉里市場去賣。每年，期望的是過年穿新衣及吃豐盛的年夜飯，或則父親偶而到花蓮市出差時，期待他帶一些珍貴的蘋果、西瓜、或麵包回來。

這就是我們十餘年一起過的童年的生活。

這種日子一直到大哥到西部讀高中，必須搬到西部；健民考到花蓮中學初中部，必須到一百公里外的花蓮市住校後，從此我們分開的日子多，越離越遠，只在寒暑假回家時才有機會見面。

花蓮中學海燕社：

熱愛台灣鄉土文學及台灣社會科學

花蓮中學是東部尤其是花蓮孕育年輕優秀學子的所在，只有最優秀的小學畢業生才可能考取花蓮中學，尤其在偏遠的花蓮南區，更只有極少數學生能考取。健民

考上花蓮初中，我們全家都引以為傲。三年間，他成績一直非常優異，父母常以他為榮，也是我們的榜樣。

初中畢業後，他直升高中。我也考到縣立花蓮初中；和他一起租房三年。這三年，他思維快速地成長，同時也創作了許多文章。

當時，王紘久，就是後來的立法委員王拓，在花蓮中學任教。年輕喜愛文學的健民，非常積極地參加王拓帶領的海燕寫作社。他受到王拓深深地影響及引導。從此，他對鄉土文學及台灣社會科學產生喜愛。住在一起的三年中，現代文學和文學季刊等文學雜誌堆放在書桌上；黃春明、王禎和的鄉土文學、白先勇的小說……是他最喜愛的讀物。同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是他也是我喜愛的讀物。當時我由衷的感覺，他有一股鲜活而強盛的力量，蓄勢待發，暗地裏慶幸我們有這麼一位讓我引以為傲的哥哥。

大學以後：

分開了，相處的時間變短了

高中畢業後，他考進屏東農專。只在寒暑假回家時，才有機會才團聚一起，知道他持續對文學的熱愛，同時也認識了許多農專喜愛文學的好友如：吳晟、詹朝立……，他也參加農專校刊《南風》。很為他高興……後來，他在農專休學，回家的時間變更少更短了。尤其在馬祖北竿服役三年，有時返家他會提到北竿的生活。那是缺水而且很寂寞的日子，每晚站崗時面對夜黑風高的大海，非常害怕對岸「水鬼」隨時可能的摸哨，我可以想像這三年他是多麼的孤獨。

大學以後，他到九州大學進修齒科，然後在日本行醫十餘年。一九九二年結束日本的醫業，返回台北開設牙醫診所。我則在美國矽谷定居。時空的隔離，只能偶而透過昂貴且通訊不良的電話，知道他的情況，也知道他對台灣近代史的被扭曲，感到非常痛心。他希望能以客觀的視角及科學的態度，去探討、求證及論述台灣民國四十到五十年社會及文化的變遷。這是一件極具挑戰而且吃力不討好的長期計劃，必須要耐心的收集史料，細心的做客觀的論述，這是相當不容易的。而且，以那

時社會的氛圍加上他不妥協的堅持；他也很明確的認知：這將是萬分孤獨的路途。

但，我相信以他對台灣的熱愛、追求完美不達目標絕不中止的個性，一定會驅使他一步一步的完成！

二〇〇六相處一年：

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及尊敬他

二〇〇六，我有機會回台在新店和他一起相處一年，這是我們成人後首次也是唯一的以比較成熟的態度相較長期的共同生活。住在他的書房一年中，對他專業知識掌握的深度和廣度，精確分析論述的能力，十分佩服，特別對他細心、耐性、擇善固執、要求完美、實是求是、求真、求實的態度尤其不可多得。當時，他剛出版一九四五，正在寫一九四六，同時準備一九四九的材料，整間書房推滿了史料。他常說明每一件史料的出處及取得的過程，每一件都是經過他細心的挑選的紀錄。

他生活步調非常的規律嚴謹，每天早上一定早起，走半個小時到北新國小操場快走一〇圈，然後走上原野

公園，做早操，走下惠國市場買好吃的燒餅、油條、豆漿、及水果青菜。燒餅油條豆漿是我的早餐，他則只吃青菜水果。

經常我會起早陪他邊走邊聊，我原來是學經濟的，對經濟理論及台灣近代經濟發展的過程有一定的看法，我們常常深入的談論台灣戰後經濟發展史、經濟奇蹟的成因、及對未來走向的願景，沒想到他對總體、個體、財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分析及運用比我瞭解得更深、更廣、更明確。我在矽谷科技業沈潛了近二十年，令我驚訝的是：他對科技的知識也有十分深入的了解，尤其科技對人類社會及生活方式可能的沖擊，他懷有一定的隱憂。

他對做學問的用心與努力，讓我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及更加尊敬他！

二〇二〇年：

二哥再見！一路好走……

以後的十餘年在忙碌中，匆匆流去。其間他陸續出

版一系列有關台灣近代史的文章及論述。做為一個在台灣生長的知識人，他已經完成了他想做的事，也對台灣投入了一生的心力及貢獻。尤其重要的是：他為台灣近代史留下了真實的、客觀的、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及不可抹滅的紀錄。

去年得知他退休返回花蓮定居，十分高興。心中計劃未來幾年也準備返花，與兄妹一起走過人生的最後的一段路。沒想到，他的生命竟然會如此突然的戛然而止……！

我相信人的生命是永續的：像健民如此菩提心者，一定不入涅槃；如此高尚的靈魂，一定獲得永生。二哥再見，一路好走！— see you later —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於加州矽谷)

毒蘋果札記

二〇二〇、八、二〇 夢見會長

施善繼

昨晚，在夜睡深寐的情狀裡，沒有安排的條理。往時去忠孝東路看診，都得事前預先掛號。驚喜乍現，瞬即而逝，會長一貫他簡約肅穆、淡笑淺意。你不是才……來不及回話，他融入一景陌生的人際，消逝。你不是才……是啊，這樣一句問疑，完整留置在我醒轉起身的清晨裡。

你不是才……是啊，你不是才……就在七天後，這個霍閃而至的幻夢實境，死生相視。

七天前確然定向西去，四天前火化於無形，五月底你不是才被推進加護病房。

中日牙醫診所熄燈打烊，你站在診間門口默立些許，輕藍色醫師服中等身材嵌在門框中。接著，終於找到下一任牙醫，而且也診了一段日子。這期間大約一年半，所有你的消息，間接聽聞。花蓮遠嗎？要去須得行程安

排。不打擾最佳上策，避免影響你埋頭研究學問。

夢無法預約，你愛來就來，想來便來。夢裡偶遇，沒有人世的種種繁瑣。穿衣、穿鞋不用對鏡，隨心適意，夢裡你看不到我，不用在乎我，我雖然看得到你，但我須要在乎什麼。

熟睡中，一句話也擠不出來，雙腿無力使勁。若果真能追上，回頭你說你不是曾醫師，我沒有認錯啊，我向來呼你會長，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會長。沉痛的悼念，由衷的敬重！

「曾健民先生追思會」的書面發言

趙遐秋

曾慶瑞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北京——台北

我們倆，趙遐秋和曾慶瑞，健民和麗英二十多年來兄弟姐妹般的摯友，反對「文學台獨」鬥爭中的親密戰友，不僅在八月十三日健民走後去不了花蓮為他送行，也到不了今天，九月二十七日，在台北舉行的健民的追思會了。只能向追思會呈送上一個簡短的視頻，和這份書面發言，告慰於健民的在天之靈了。

祈願健民兄弟一路走好！

祈願麗英妹妹節哀！

此時此刻，我們想起了，我們這個時代反對「文化台獨」的旗手和主將陳映真三年多前在北京過世之後，健民曾經感

歎說：「長期以來，在有關陳映真的討論經常會出現一種不當的傾向。有人喜歡陳映真的文學，卻不喜歡他的思想和政治。有人肯定他七〇年代以前的作品，卻否定七〇年代以後的作品；有人喜歡年輕現代味的陳映真，卻詛咒左派的陳映真；有人尊敬他為台灣社會正義發聲，卻批評他的左派立場。……出現了只高舉陳映真的文學而刻意回避或矮化陳映真的思想和政治的發言。」健民非常敏銳地看到了這種複雜的情況，毫不猶疑地公開指出這種情況，這跟他是映真最真誠最忠實的敬仰者和追隨者，最堅定的也最傑出的戰友分不開。

作為映真文學戰線的戰友，健民在反對「文學台獨」上

絕對是一員大將。他對映真的呼應，主要表現就是追隨映真批判「文學台獨」。

回看歷史，人們可以看到，在台灣，一九七七年發生的所謂「鄉土文學」的論戰之後，正如映真指出了的，「歷史給予台灣形形色色的民族分離主義將近二十年的發展時間。但看來七〇年代論爭所欲解決的問題，卻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迎來了全面反動、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這近二十年的時間裡，陳映真一直堅持開展針對葉石濤等人的分離主義傾向文學的鬥爭。期間，一個重要的舉措，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還沒有「解嚴」的困難條件下，映真在台北創辦了《人間》雜誌，以「在台灣的中國人」的意識為中心，從事思想啟蒙運動。和一直堅持鬥爭的陳映真相呼應，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由曾健民擔任會長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在台北舉辦學術討論會，紀念「鄉土文學論爭」二十周年。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人間出版社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冬季號」，就「鄉土文學論爭」二十周年，組織刊發了一個專題《鄉土文學論爭二十周年》，健民就在裡面發表了《民眾的與民族的》一文。這一期的「叢刊」上，健民還發表了《反鄉土派的嫡傳——七批陳芳明的〈歷史的歧見與回歸的歧路〉》和《台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兩篇文章。一九九九年九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秋季號」《噤

啞的論爭》對「文學台獨」勢力作新一輪的宣戰的時候，健民進一步以自己的《一個日本「自虐史觀批判」者的皇民文學論》和《評介「狗屎現實主義」爭論——關於日據末期的文學論爭》兩篇重量級文章，旗幟鮮明地出場亮相。當時，這兩輯《叢刊》是陳映真和他的戰友對「文學台獨」勢力的代表人物葉石濤、張良澤，還有日本為「皇民文學」招魂的文人垂水千惠、中島利郎、藤井省三等人的新一輪征戰的檄文。健民的加入，火力更猛了。

緊接著，健民協助映真搜集和整理了，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關於台灣文學爭論的文章，並完完全全手抄一份，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交由再次訪台的慶瑞帶回北京，促成了中國作協跟映真、健民他們合作，聯合江蘇省社科院、蘇州大學中文系，於二〇〇〇年八月，陳水扁上台不久，在蘇州舉辦清理那次文學論爭歷史的大型研討會。健民發言提交的二萬字論文《在風雨飄搖中綻開的文學花苞——「台灣新文學論議」的思想和時代》，後來連同那些論爭資料及其他文稿，一起在大陸《新文學史料》二〇〇一年第一期全文發表。論文除「前言」和「結論」之外，就三個問題對《新生報·橋》副刊上關於台灣文學爭論做出了自己的闡釋。這三個問題是：一、「台灣新文學論議」的思想來源及其時代過程；二、「台灣新文學論議」的六大議題和

觀點；三、「台灣新文學論議」的歷劫。毫不誇張地說，健民的闡釋，具有文學史、論的格局和氣勢。

蘇州研討會拉開了海峽兩岸愛國文學家會師開展反對「文化台獨」「文學台獨」鬥爭的大幕。會後，在黃山，我們一起商量決定了，兩岸同仁聯合編纂一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健民分工撰寫這部共有九章的著作中的第四章《建設人民的現實主義的台灣新文學》。該書兩位主編之一的呂正惠在全書《結束語》裡說，一九四五年之後，絕大部分台灣作家和許許多多的大陸來台進步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努力建設站在全中國立場的人民的現實主義的台灣新文學。他們的努力因美國的介入中國內戰（協防台灣），最終歸於失敗，但歷史的痕跡斑斑可考。本書第四章從無數的、不為人知的原始資料中，已大致恢復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真實面貌。」這部書的書稿在台北討論的時候，我們兩岸寫作團隊的全體成員，包括顧問陳映真和金堅範，就在映真他們借來的一個倉庫裡開了三天的會。麗英和幾位台灣朋友的夫人，還有黃春明的一位女學生，做了研討會的全程服務工作。會後，幾位台灣朋友，都是夫婦一起出場，租了一輛大巴，陪同我們大陸去的朋友，從台北南下，過宜蘭，一直到台灣最南點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鵝鑾鼻公園觀光。途中，夜宿香格里拉度假村。晚飯後，我們跟映真、健民喝茶閒聊，說到了此前的三

月間我們大家一起在杭州議定的另一本書《文學「台獨」批判》，退秋和慶瑞報告了自己初稿寫作情況。映真、健民他們都表示了支持和鼓勵。

這之前的一九九九年，健民就寫了《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繼承和豐富——讀呂赫若的早期作品》。論述了呂赫若的早期小說較為成熟的技巧，深刻反映了殖民經濟和封建經濟的制度性雙重宰製下的台灣社會現實，揭示了人的命運的社會經濟本質，小說中的真實與社會的客觀現實達到高度的一致性，是對以賴和、楊逵為代表的台灣新文學中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繼承和豐富。往後，二〇〇九年十月三日，在台北清華大學月涵堂的「台社論壇」的「與魯迅重新見面」一場上，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作了《魯迅左翼傳統》的報告後，健民還在會上對錢教授報告做了回應發言，話題是《談「魯迅在台灣」——以一九四六年兩岸共同的魯迅熱潮為中心》。

一個時期裡，健民以極大的熱情，跟映真和其他「統派」朋友一起，在北京、長春、南寧等地參加了陳映真、黃春明、藍博洲、詹徹、楊逵的文學作品研討會，會上都做了有分量的發言。比如，在黃春明作品研討會上，健民在題為《從台灣社會的現實中一路走來——論黃春明小說的時代開創性、啟蒙性和藝術性》的發言裡，就熱情地肯定了黃春明「作品

確實有獨到的成就」，「一是他的作品對台灣光復以來的文學潮流的變化曾經起了開創性的和啟蒙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他的作品在文學的藝術上的出色成就」。

此外，二〇〇一年二月七日，日本右翼作家小林善紀在「台灣出版名爲《台灣論——新傲骨精神》」的漫畫書，收錄並吹捧了以李登輝等人親日媚日、鼓吹分裂的思想言論，遭到島內各界人士強烈批評，也引起祖國大陸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此前，這個人還出版過一本《戰爭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進行了全盤否定，並誣陷亞洲國家「捏造」了南京大屠殺和從軍慰安婦等日本戰爭罪行。《戰爭論》出版後，小林隨即成爲日本右翼理論界的新寵和台灣「台獨」勢力極力拉攏的對象，數次應邀訪台，和李登輝成了莫逆之交，也陳水扁的座上賓。《台灣論》在台公開發行後，激起了台灣有識之士的同聲撻伐。二月十一日，台灣作家、學者在台北舉行座談會，強烈譴責漫畫《台灣論》歌頌美化日本殖民統治。映真、王曉波、黃俊傑和健民，在座談會上紛紛以「沉重」、「羞恥」、「憤怒」等字眼形容自己的感受。他們認爲，《台灣論》的本質是美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對曾經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而言，不啻是一種侮辱。他們表示，這部爲軍國主義招魂、理應遭到中國人唾棄的惡劣漫畫作品竟然可以不加掩飾地公然流傳！這是不能容忍的！與此同時，

健民的批判鋒芒，二〇一四年還指向了一部名爲《KANO》的電影。健民寫了《台灣電影裡的自我「再殖民」》一文，批判《KANO》以台灣「嘉農」棒球隊歷史爲素材，「透過日本人的視角所呈現的「日治」榮光，不但燎起了民眾把日本殖民當作台灣「現代化」原鄉的集體想像，投合了時髦的媚日哈日風潮，更符合台獨意識的政治正確，大大挑動了文化歷史認同的集體亢奮。《KANO》熱潮凸顯了台灣的精神自我「再殖民化危機。」這樣頻繁出擊，用俗話說，在這方面，健民真是一個眼睛裡揉不進沙子的人。我們甚至看到了，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健民寫完一篇長篇文章，題爲《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反共文學現代出版與高等華人的現代文明價值》，發表在當年十月的《台灣立報》「新國際」版上。文章是對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大江大海》展開批判的。健民認爲，「台灣內戰冷戰體制的歷史起源，在一九九九年。對一九四九年歷史的反省和批判，也是從知識上思想上或者感情認同上超越克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起點。然而，至今連一本最起碼的有關一九四九的基本歷史知識性著作都未出現，可見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仍然在台灣的精神思想領域佔有統治性地位。果然，在這一九四九歷史批判的不毛之地，長出了以「內戰冷戰現代化論」爲基本價值觀點，對一九四九年進行敘事的異化之果——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大江大海》。」讓健民困惑不解的

是，「此書一出大為熱銷，連中國大陸也出現一些粉絲。」健民鞭辟入裡地批判說：「這種現象印證了，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不但是台灣現實生活的結構，普遍地無所不在；而且在政治經濟的再生產結構中，作為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思想不斷地再生產。雖然它是脫離真實社會歷史的虛假意識，顛倒意識，但作為維持現實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客觀的存在。龍書表現出來的，虛假的一九四九，正是這種現象的最好的例證。」文章裡，健民的批判從十個方面展開即：一、現代話語的「反共劇」；二、沒歷史沒社會的「文明價值」；三、建構「解放軍殘暴」的印象敘事策略；四、長春圍城真相；五、爭取政治解決，避免戰爭；六、「偉大領袖」在台灣開的槍；七、是國府「反動特質」的崩潰；八、國府的「戰爭和失敗」；九、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十、自囚於內戰的咒語中。健民的結論是：「不去正視失敗原因，不對歷史反省，而只圖以誇大戰爭的受害來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身分，再以虛誇的口氣說以「失敗者」為榮，這只會把自己囚禁在內戰的咒語中，無以救贖。」

健民的批判文章這樣寫，已經顯示出他與眾不同的個性特徵。他說話，寫這一類文章，和其他反對「文化台獨」、「文學台獨」的戰友站在一起，有一個明顯的特徵是，他總是把「文化」、「文學」同社會、同歷史的考量緊密地結合在

一起。

就此而言，可以說，健民深受映真的影響，追隨映真絕不動搖，與映真攜手並肩戰鬥不敢有絲毫鬆懈，跟映真一起建功立業最受人們敬重。

這要說到映真對日本學者尾崎秀樹的推崇。

早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日本學者尾崎秀樹就懷著對日本戰爭責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責之念」，寫下了力作《舊殖民文學的研究》。尾崎秀樹在書中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對這精神上的荒廢，戰後的台灣民眾是否曾懷著憤怒回顧過？而日本人又是否帶著自責去想過呢？」尾崎秀樹深刻地指出：

「倘若沒有這種嚴峻的清理，戰時的那種精神的荒廢，還會持續到現在。」陳映真深感尾崎秀樹提出的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精神的荒廢》一文裡，他深情地寫道：「每當在生活中眼見觸目皆是、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殘留的『心靈的殖民化』，尾崎的這一段話就帶著尖銳的回聲，在心中響起。」於是，他發自肺腑又振聾發聵地寫下的呼籲和警策是：「久經擱置、急迫地等候解決的、全面性的『戰後的清理』問題，

已經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們的眼前。」映真不僅呼籲世人去做，他自己也努力去做。他做，一是繼續寫政論、雜文，一是重新拿起小說的筆，用藝術形象去演繹這種精神上的荒廢的嚴峻的清理。這就是《歸鄉》、《夜霧》和《忠孝公園》的

問世。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映真在人間出版社出版的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陸平舟等人的中譯本時，還寫了一篇《出版的話》，指出，四十多年前，尾崎秀樹「就構建了關於嚴厲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偽「滿洲」和朝鮮文學中留下的心靈和精神的傷痕的系統性論說」。就此而言，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實在是一部「劃時代的，無與倫比的巨著」。就這部書的內容，映真特別關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尾崎秀樹認為，日本的「現代化」，是明治維新以來，以犧牲亞洲為代價所達成，亦即以日本殖民地為犧牲的結果」。而台灣，又是「日本『現代化』過程中最初的犧牲者」。尾崎秀樹就是在這樣一種「充滿深刻反省的歷史意識下，凝視台灣文學史，特別是其『戰時下』台灣文學」的。這和映真當年讀到台灣籍留日學者劉進慶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一書的影響完全相契合。映真說，那部書對他的影響是在於，為他「開啟了從社會的、物質的推移，去科學地認識台灣」的思路，也從而有助於使他「從台灣社會經濟的推移，去科學地認識台灣」的思路，也從而有助於使他「從台灣社會經濟的推移為參照系，比較科學性地認識台灣文學及其思潮的演變。」二是，尾崎秀樹研究的視野，是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台灣五十年時期的台灣現代文學史，從而，「對殖民地」法西斯統治所造成的台灣文學和作家在心靈與精神上留

下的傷痕，加以嚴肅、認真和誠摯的批判與反省」。三是，尾崎秀樹痛烈地感到，這種嚴肅、認真和誠摯的批判與反省，就是要集中在對日本殖民主義、對「皇民化」的毒害的清理上。尾崎秀樹認為，「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所帶來的傷痕實在是太深了」。

就在映真急於嚴峻地清理這種精神上的荒廢的時候，像是來自上蒼的安排，健民從日本回來了。此前，籍貫花蓮的健民在高雄醫學大學畢業後到日本九州島齒科大學研究，並且留在北海道行醫十年，回到台灣後在台北執業。健民後來追思悼念映真的文字回憶說：「一九九二年底我全家從日本搬回台灣，記得是一九九三年初，他到我家談了很久。當年四月，便由他發起共同成立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他擔任初代會長。他們在研究會創立宗旨中指出：『我們有鑑於此，深感一方面要批判地繼承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遺產，為了克服當時台灣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援引了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對於台灣社會與歷史之科學的、自我認識工作；一方面又要進一步汲取二戰以後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以及其他各種進步的關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理論新的反省與發展，同台灣社會具體現實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誠為當務之急。欲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協議成

立了這個研究會。」²後來，健民接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專門研究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其著力於光復後五年即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的台灣史。

映真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在北京病逝後一個多月，健民寫了他對映真的追思文章《初論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和社會變革論》，闡釋映真「台灣社會性質論」思想形成至成熟的過程。映真思想的精髓是，「將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台灣定義為『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與經濟上均對美日存在依附性，民族分裂的根源存在於美國新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支配力量。」文章說，「映真將台灣放置在第三世界的視野下，認為東亞各國『冷戰—戒嚴』的傷痛有其歷史共性，亞洲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對抗西方新殖民的宰製；並在『社會性質論』的基礎上提出『社會變革論』，強調在統一過程中將台灣人民置於主體位置。」健民回憶了過去的十多年中，映真帶領他們「在展開清理和批判台灣社會歷史、台灣文學史、台灣史觀、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新帝國主義批判、台灣社會性質論、統一運動等等，在各種文化、政治戰線上，作為批判和對抗台灣非理的支配體制追求社會變革的學習和實踐中」，自己是「全力向前衝刺的」。

我們今天讀健民追思映真的這篇文章，在重新回顧映真作為新一代台灣名族英雄般的光輝歷史的時候，也可以看到

作為映真最親密戰友的健民一路走來的閃耀著思想光芒的足跡。

健民回顧說，「為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映真與研究會在十年間進行了不懈的努力。」³當時陳映真帶領大家研讀的第一本書，是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真正的從「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開始的。「健民的判斷和結論是，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在一九九〇年代初就已形成一定的架構。一九九二年七月寫就的《祖國：追求·喪失與發現——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各階段的民族主義》，以及其後的《台灣現當代文學思潮之演變》，兩篇長文都對從日據到戰後的社會性質為分期進行了各歷史階段的論述，即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九四五—一九五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九五〇—一九六三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九六三以後的「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接著，映真在一篇可能寫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沒有公開發表的共有一一頁的手稿《關於李登輝體制的分析筆記》裡，通過對李登輝政權的政經分析，比較完整地闡述了他「有關台灣社會性質論的思考，不但做了階級分析，還針對台灣社會性質論提出了進一步的社會變革論。比前述兩篇有更大的進展。」⁴《筆記》「最後說明了『當前社會的特質」

是：蔣國家高度「相對自主性」的終結，李國家成為台灣資產階級共同處理、鎮壓被支配階級，促成台灣資本主義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辦公室」。「筆記」更是分析了當前台灣社會諸階級的關係，把當時的社會分為六個階級——大集團資本家階級、官商資產階級、中小企業資本、中產階層、農民、工資工人、城市貧民。「映真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是，當時的台灣社會性質是「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基礎上，健民說，映真對於台灣的變革運動的思考就是，「在克服新殖民地性上，主要內容是：反對美日新帝國主義，反對為外來勢力服務的民族分裂主義（李體制分裂體制的固定化、兩國論、依附美日對抗中國論以及台灣獨立運動），發展批判的、科學的民族統一論。」「在半邊陲性資本主義的克服上，不是全面揚棄，而是加以發展，使兩岸統一構造的完成、大集團資本和官商資本中的買辦性和官僚性的批判與否定，促進民族資本的健康發展。因而，克服半邊陲資本主義性，還不是社會主義的變革，基本上是人民民主主義的變革。而這一切，又是為達到新時代社會主義的實現，準備條件。」「關於批判的、科學的統一論，主要在變革過程中建立台灣人民在這統一過程中高度的主體力量，以這力量保證一定時期中台灣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並在這歷史的自治期中，發展先進的理論與實踐，對中國的健康、自主、高度

精神正當性之發展，做出貢獻。」認識清楚了台灣社會的性質，思考了台灣社會變革的問題，健民說，映真面對的問題就是「我們要走怎樣的道路」了。健民回憶說：「映真主張以社會性質論指導黨的路線爭論。」健民說：「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召開的勞動黨第三黨代表大會上，英姿風發的陳映真清楚地說明了對當前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析是黨路線爭論的『首先重要的問題』。」映真說：「到底我們目前這個階段，我們黨應該走先鋒隊的道路呢？還是走相對而言比較大眾黨的道路？那麼這個問題也不是大家在這裡你死我活爭論就可解決的。我們的黨須要有一個對我們台灣社會、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做出比較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從而研究我們當前社會是什麼性質，在這個社會裡面階級的關係是怎麼樣，……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首先重要的事情，沒有把敵人跟朋友搞清楚，各階級的力量量的對比搞清楚，我們就沒有辦法馬上在這個會上用爭吵來解決我們該走大眾性的黨呢？還是前衛性的黨，或者說，講得更赤裸裸地說吧，是幹革命的黨。」健民的追思，又說到了，從二〇〇〇年六月到十一月，研究會進行了一系列（大約有十幾次）有關台灣社會性質的討論。從日據期有關台灣社會性質的資料（台灣共兩個綱領、陳逢源和許乃昌的「我的中國改造論」、李友邦和矢內原忠雄的書籍等），一直到戰後各時期的討論，說到了

映真在「聯合文學」上發表了兩篇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的長文，說到了映真。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陳水扁勝選後發表的《讓歷史整備我們的隊伍》，等等。健民的追思，還說到了，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其中包括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六日到六月十一日，研究會組織的一系列的一二次「帝國主義與台灣」的討論會，其中，映真在四月十六日作了《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期》的報告，健民他們在報告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健民還回憶說，映真早在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就對戰後民族分裂的根本問題，積極進行了對美國新帝國主義支配的批判，作為島內民主化運動以及國家統一運動的重要基礎。其中，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八日AWC在台北舉行的一次「跨世紀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國際研討會」上，映真還發表了《帝國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危機》，說明了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本體是跨國資本的邏輯和組織對於人類生活、思想、感情的全面支配，其蘊含的矛盾造成了金融危機。

令人十分感動的是，健民在追思映真，特別提到了他們算是「永別」的一次記憶——

「記得在二〇〇六年五月底，也就是陳映真要到北京的前夕，他和大嫂兩次來我新店家，在有關搬家或車子如何等細瑣事的談話內容中，至今還清晰記得，他提出了趁此次機

會一起把「台灣社會性質論」作一次總結，在那次算最後一次的見面中，雖然沒有達到總結，但對於台灣社會性質的新殖民地性和資本主義性似乎有共同看法。直到今天，我深深感覺到在他在去北京之前內心最牽掛的事還是有關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建設。這也是他從一九九〇年代初起，或者說，更早在《人間雜誌》停刊後，他一直關心的焦點，不管在談話中、創作評論中或是社會活動中經常突出的核心思想。這也是他出版「人間台灣社會經濟叢刊」，創辦「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創刊「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以及從事許多社會進步活動中的思想中心。」

「另外，還依稀記得，當時他還特別問起我們的運動中還有哪些可以跟上來的年輕人，還一一列出了名字，可見得在臨走前他還憂心著運動後續的發展。」

健民還對映真說：「在你病倒醫院的十年間，世界和中國、又有新的巨大變化，時代似乎朝著我們努力的方向倒退，我想你在病床上也時刻關心著這些變化，痛惜的是，我們已聽不到你的聲音讀不到你的思考了，我只有在台灣仍然獨自沿著你開拓的道路繼續向前走。」

歷史已經書寫下來，健民真的是在台灣仍然獨自沿著映真開拓的道路繼續向前走的。

事實上，不僅是二〇〇六年映真離開台灣到北京之後健

民在向前走，從健民追思映真走過的道路，我們不僅看到了映真在開拓道路，也看到了健民跟映真一起開拓，一起往前走的身影。

回顧一下這種「一起開拓，一起往前走」的情景，人們可以堅信不疑的是，歷史對健民建樹的卓越功績，也會一一鐫刻在中華民族統一偉業的豐碑之上的。我們透視一下健民的幾部著作就會認同這樣的評價了。

比如，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八月出版的他的《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八·二五」後激動的一〇〇天》一書，就是以史料重建台灣光復初期的激奮和波折。「中國台灣網」對健民這部著作的介紹和評價是——他認為，在這一百多天當中，台灣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等，全面進行了「去殖民化」和「祖國化」，這個並未完成的時代任務，原動力來自台灣民眾高昂的民族感情。他說，歷史是延續的，但在現今的研究中，經常以「戰前」和「戰後」做為分水嶺，導致過渡期間被忽視。「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後短短一百天，是台灣現代史上最複雜、激動、內容豐富的一段。」不過，這段時期的台灣社會狀況，在目前的歷史研究中卻近乎空白。曾健民說，雖然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但我們仍活在八一五之後，以美國霸權為首的世界秩序中」。曾經出版《新二二八史像》、《文學二二》等書的曾健

民，大量收集台灣光復前後台灣和日本的報章雜誌，拼湊出當時的台灣社會圖像。一九四五年十月二五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及慶祝台灣光復紀念大會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曾健民認為，這是台灣人民的民族情感最高潮，但隨後的物價飛漲、省籍摩擦等問題陸續浮現，輿論對接管工作的不順展開批評，民間也對光復出現失望情緒。台灣歷史學者王曉波指出，歷史是一連串的因果，曾健民整理、發表的這段歷史，「其實是二二八的前因」，可以提供對二二八的背景理解。該書出版公司發行人、歷史學者林載爵說，回溯六〇年前八月十五日之後一百天，台灣那段「無政府」的光復初期是如此重要，卻又如此「面目模糊」。作家藍博洲有感而髮指出，曾健民的努力讓人意識到，台灣光復初期歷史還必須有更多研究者投入，更全面的重新建立。大陸的網絡評價說的是：「本書所處理的，是一段台灣史上一直處於空白的時期，至今幾乎未有人全面涉入過；即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翌（一九四六）年一月，一〇〇多天的歷史。這段歷史是台灣的戰前與戰後的交接時期，也是所謂台灣戰後的起點。短短的一〇〇多天，卻是最複雜、最激動，且充滿豐富內容、富有多元啟發性的一段時期。然而，除了十月二十五日的光復節之外（現在連光復節也被取消了），我們一無所知；不但一無所知，甚至還被扭曲了，因為「八·一五」已

被「終戰」所取代。」

再比如，二〇〇七年三月，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健民的《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台灣》。書中，健民闡釋了，一九四六年的台灣社會如何從殖民地轉換為民族社會？如何從一個日本的殖民地復歸為中國的一個省？在這樣大的歷史格局中，有「去殖民」的課題，如政權的接管和重建、日資日產的接收、日俘日僑的遣返等；對於殖民統治遺留的「債務」，有殖民歷史的清理，如省外台胞返台問題、漢奸、戰犯等問題；也有教育、語言、歷史的「民族化」問題。然而，「去殖民」的反面，就是「中國化」（或「祖國化」、「民族化」）；當時，剛從半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的中國仍帶有濃厚的半封建殘餘，官僚主義、貪污舞弊橫行。所以，台灣的「中國化」內含著「惡性的中國化」與「良性的中國化」，進步中卻又帶著矛盾。健民在書裡特別以「去殖民」與「中國化」為主軸為當時的台灣社會做詳盡的分析。健民的憂國憂民之心，是要從世界不同的「戰後史」觀點中，以更廣闊的「歷史眼光」來看今日所處的「戰後史」的困境，設法找到一道出口。

又比如，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健民又有《一九四九 國共內戰與台灣》一書問世。書中，健民主要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綜述了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的歷史過程。

從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定》，並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及至國共內戰再起，政經陷入總危機開始，一九四九年經歷了「三大」戰役、蔣介石「引退」，以及第三次「國共和談」破局；接著，解放軍過江京滬易幟，蔣介石以及國民黨政府雖然保有半壁江山，仍然欲振乏力，東南、華南、西南防線接連著潰敗，終致撤退台灣。以台灣為「反共復興基地」，並以舟山群島、金門、海南島等沿海島嶼為「反共跳板」，繼續打內戰。本書的另一篇篇幅則著重在厘清：一九四九年中，作為國共內戰重要部分的台灣省，如何從達官貴人以及撤退物資的「救生艇」，逐步成為國府的「反共復興基地」的；在島內則開始徵兵，建立全民皆兵制度，強化戒嚴，徹底進行反共宣傳，嚴查「禁書」，並進行「白色恐怖」統治。這些都成了日後台灣內戰體制的起源。

還比如，二〇一二年由健民擔任總編輯的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編刊的新作《台灣意識形態批判》。這部文集的內容是：「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近三〇年間，是『本土主義』（俗稱台灣意識）從萌芽茁壯到成為統治性意識型態的年代。本書收錄的這些篇章，大多是二十年間前後後對『本土主義』論的批判。這些篇章不但在揭露其虛假顛倒的面貌，也在揭露其政經權力的本質；希望從根本上克服更廣義的內戰冷戰意識型態。其實，本土主義只不過是台灣內戰冷戰歷

史框架中產生的意識型態的一種。本書的最後四篇，跨出了對本土主義的批判，而對內戰冷戰意識型態的另外三種觀念型態——反共主義、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進行了比較具體的批判；特別集中在針對龍應台的一九四九論的批判，指摘其「內戰冷戰現代化論」的詭辯。龍應台的這種論述，實與本土主義的「日本殖民現代化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同年十月，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又出版了健民編的《東亞後殖民與批判》一書。書中有「特集：香港回歸十五年」、「專集：亞洲後殖民批判」，「選輯：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論文選」、「台灣社會批判」、「兩岸爭鳴」、「複現黎明」的歷史」、「文學與藝術創作」等欄目。

到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健民又在台北聯經出版了《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這不只是關於陳逸松先生的個人生命史，更是一本關於台灣戰後歷程的時代史。突破了兩岸分隔的歷史界限，打開了新的歷史空間和想像。

再到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健民還出版了《東亞的憂患：日本的歷史翻案和右傾化批判集》。此外，健民還有《台灣光復史春秋》、《一九四五·光復新聲：台灣光復詩文集》、《新二二八史像》、《文學二二八》等書出版，這裡不說了。

健民在追思映真的時候，說了：「你與病魔搏鬥十年的肉體已走了，但你留下的龐大思想體系仍在這紛亂的世界活著，

深深影響每個人心靈。十年來，有時，在一些活動聚會中恍神中好像你還在場，在大家的迷惑中你會以特有的低沉有條理的聲調撥雲見霧地為大家直指問題核心。雖然你走了，但你的思想仍然活著。」

現在，映真的摯友與同道健民先生也病逝於台灣花蓮。當著人們看到，他以醫生為正式職業，卻憑藉嚴謹的治學與精誠的理想填補了台灣近現代社會史研究的空白，在文化戰線上為祖國統一的事業奉獻終生，我們也可以說，你與病魔搏鬥的肉體走了，但你留下的完整的思想體系仍在這紛亂的世界活著，深深影響我們活著的人的心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健民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五位台灣特邀代表之一，接受《文藝報》採訪時說，兩岸文學的交流，雖然受到「文學台獨」的極大阻礙，但從長遠來看，這只是一時的逆流。通過發掘歷史，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個事實，加上近年來兩岸關係互動和兩岸文學交往，「文學台獨」的氣焰會受到抵制。尤其是「台獨」官員的貪腐，使「文學台獨」更不得民心。希望兩岸作家能夠進一步攜起手來，讓台灣文學更能夠呈現它同屬中國文學的本來面貌。

安息吧，我們的健民好兄弟！你的美好願望一定會實現的！

深切懷念思想不死、

精神永在的曾健民醫師

朱雙一

曾醫師離我們而去，令我萬分痛惜！二十多年來每一次到台北，曾醫師總是在那裏，見見面交換資訊和看法，好像天經地義；這幾年知道他退休後要回家鄉花蓮，心裏想的也是今後就要到花蓮去找他了。沒想到他突然地先走了，驚痛之餘，真有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體悟。

知道先生原本在日本當醫生，想必生活安定優裕，這是多少人求之而不可得的幸運境遇，先生卻視富貴如浮雲，毅然舉家返台，可以想見先生必有不可割捨的戀

鄉或曰「愛台灣」的情懷，也許還為了不讓下一代成長為「日本人」。返台後即投入陳映真領銜的反對「文化台獨」的鬥爭中，可見「愛台灣」和「愛祖國」在曾醫師這裏是如此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合而為一，這是因為他深知消泯分歧和對立，融入祖國大家庭，才是台灣民眾的根本福祉之所在。記得有一次曾醫師邀我和學生一同餐敘，他的女兒正好從歐洲返鄉，得以相識，我頗為她作為台灣人而獲得在歐洲高校中研究台灣問題的教職而高興。席間巧遇曾醫師一位老朋友的女兒，老朋友標

榜「愛台灣」，政治理念上似乎早已分道揚鑣，朋友女兒也正因擔任某要職而陷入媒體風暴中，但曾醫師仍是露出驚喜的表情，保持著長輩對於晚輩的一份關愛和親切。這是何等寬廣誠摯的胸襟！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正是這種真誠包容的待人之道和人格之美，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到台灣，每一次都忍不住地要找他一會。

醫師職業在台灣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台灣的醫師也經常業餘參與社會運動或從事寫作，成為一種傳統。歷史上既有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等令人崇敬的醫師，當然也有周金波這樣的氣節有汗、惹人非議者。曾醫師顯然承續了以賴和等為代表的台灣醫師愛國光榮傳統，卻與當今不少醫師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這需要道德的勇氣，也需要何等堅強的信念！曾醫師為台灣終將與祖國統一的信念而奮鬥終生，錚錚鐵骨，令人敬佩！

返台後曾醫師迅即成為陳映真最親密的戰友之一，這當然並非只是個人情誼所致，更是共同的信念使然。他與陳映真先生一起策劃、組織了大量的反對「文化台獨」的活動，特別是他發揮嫻熟日語、瞭解日本社會以及與日、韓左翼進步人士聯繫廣泛的人脈優勢，展開對於日本右翼否認其戰爭罪責的歷史翻案風的批判，連續數年召開東亞左翼連線的研討會，出版《台灣意識形態

批判》《東亞後殖民與批判》《東亞的憂患》等論文集。

至於他發掘日據末期台灣作家楊逵、呂赫若等與「日本在台文藝總管」西川滿展開的「狗屎現實主義」論爭等資料，其重要價值為學界所公認和稱道。這些必將永載史冊的成果，都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和學術的遺產。

思緒回到與曾醫師相識相交的最初時刻。我的大學和研究生時代，正是大陸學術界也閉上了「左眼」的時期，談「左」即使沒有「色變」，至少也讓人「色報」。

我畢業後以台灣文學研究為職業——後來才漸漸轉為「志業」——按部就班地研究起被視為台灣文學「主流」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稍後偏重於新世代文學、文學思潮、閩台文學關係等，就算是「獨闢蹊徑」了，到台灣一般也是高校或民間學會、基金會的邀請，對於台灣左翼統派的文學和活動，可說是茫然無知。最早結緣是一九九六年起由全國台聯或中國作協接續召開的台灣文學、呂赫若、黃春明、「橋」副刊等研討會，開始認識台灣統左派作家、學者，但實際上瞭解還是很膚淺表面。記得當時總是利用北京開會之機，前往國家圖書館查找姚一葦、王夢鷗等早年在廈大文學蹤跡的資料，在其縮微膠捲室翻找館藏卡片時，發現有《和平日報》且括注「台灣」二字，調閱一看，副刊上竟然有紀念魯迅逝世十周

年的專輯等，於是委託「還原」（即影印），但當時也只是出於好奇心而已，對其重要價值毫無概念。不久有機會到台灣，無意中向曾醫師談起此事，他忽然瞪大眼睛問我：是不是有位「樓憲」？我回答：有啊。

這一「樓憲」之問，對於曾醫師而言，打開了通往光復初期台灣報刊資料寶庫的大門；對於我而言，開啟了通往台灣「統左派」的門徑；對於兩人而言，則是搭建了建立深厚友誼的金不換的橋樑。回到廈門後，我將一些台中《和平日報》副刊資料寄給他，他也不斷贈給我復刻或影印的光復初期的台灣報刊在當地已經難以找到，卻在大陸的圖書館保藏著，並製成了縮微膠捲。於是曾醫師從台北打電話到廈門，問我能不能幫忙洽購相關縮微膠捲。我打電話到福建省圖書館聯繫，價格一卷兩三百元人民幣；稍後覺得福建的膠捲畢竟還是從北京翻拍而來的，不如直接到北京去買，會更清晰。後來談起此事，他有時候說是黎湘萍帶他到圖書館，有時候說是李娜幫他購買膠捲，可見他不止一次為此事前往國家圖書館。這些第一手資料後來成為他進行光復初期台灣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依憑，在方法上可說獨闢蹊徑，也確確實實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獨創性成果。

自此之後，曾醫師不斷為我提供珍貴的研究資料或相關資訊。如他和橫地剛先生不斷提起「夢周」，讓我下決心前往晉江鄉下找到了楊夢周先生，由此揭開了一位光復初期台灣報刊上多產的年輕作者之謎，同時加深了對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社會文化生態和大陸文化人前往台灣情況的瞭解。他也曾邀約我為「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撰稿，使我得以在叢刊上刊發論文，深感榮幸。每次到台灣，曾醫師都會提供各種演講會、研討會或統左派活動的資訊，以便我前往觀摩。記得還參加了曾醫師主持、趙剛老師也參加了的研讀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讀書會。印象最深的則是二〇〇七年我到彰化師大客座，規定年前就得報到，於是有了在台灣過春節的機會。曾醫師邀我參加人間出版社的「尾牙」活動，在那裏不僅有舊識，還有新知，這樣一個充滿中國傳統習俗色彩的活動中，感受到統左派朋友們的一種渾然正氣和人格魅力，這是至今難忘的一次特殊的經歷。在這過程中，我自己似乎經歷著思想上某種脫胎換骨的轉變。

不過，如果說近二十年來我的台灣文學研究的「統左轉向」和自身對台灣文學研究的定位從「職業」向「志業」的轉化，完全肇因於與曾醫師之間的友情；或者說我是受到了陳映真、曾健民等眾多統左派朋友人格

的吸引；甚至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的閉合後，大陸的學術界又漸漸睜開了「左眼」，諸如此類，也許還無法切中根本——這些固然都是事實，但應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方法論上的啟迪。一般的史學研究往往主要依仗檔案資料而忽略了報刊資料，而曾醫師則同時注重報刊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究，這樣就避免了只聽官方的一面之詞，而更能瞭解現實社會的實況和廣大民眾的心聲。受此啟發，我的研究也經常倚重於各種報刊雜誌的資料並屢有斬獲。

其次，也是最關鍵的，是我從陳映真、曾健民等的著作文章中，看到了理想、信念，看到了真理，看到了歷史的真相。也許受曾醫師影響，我也開始較大量閱讀陳映真，而且與別人有所不同地將重心放在陳映真中後期的評論、雜文上，旨在從中吸取思想的滋養。從風格上看，陳映真縱橫捭闔，思維敏銳，具有強大的批判力道；而曾健民則注意發掘和搜集第一手資料，力求還被扭曲的歷史以真相。他們構成了互補關係，是名副其實的並肩戰鬥的親密戰友。我也就有幸從這一「共同體」中吸收到更全面完整的養分，既有思想觀念上的提升，也有學術方法上的啟迪和借鑒。我對於他們的信服，並非他們對於大陸而言屬於「政治正確」，而是因為經過我

自己的獨立的研究，得出的結論與他們是如此的接近乃至完全的契合，讓我深覺他們是真正的真理的擁有者。這種認知一經確立，就很難改變，因為這是一種深層次的真正的心靈契合。它甚至影響了我對於國內國外諸多事情的看法。相信對於陳映真、曾健民等台灣統左派的基本理念的認同，將伴隨著我今後的日子，而不會有絲毫的動搖和消泯。

案頭還擺著曾醫師的一摞書，幾乎每一本都有他惠贈的親筆題簽，也就覺得他還在我的身邊。也許因為寫這篇文章的緣故，不常做夢的我，卻在午休時刻迎他進入了我的夢鄉。睡醒後他的影像就忽然不見了，但他留下的思想和精神的遺產，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將伴隨著我，我的同事或同好，我的朋友們，以及後輩的年輕學子，直至永遠，永遠！

曾健民光復初期台灣之研究的特點、價值和

意義——深切悼念曾醫師

一九九〇年代，先生與陳映真等率先警覺到「文化台獨」的動向。在全國台聯、中國作協等的支持下，兩岸學者、作家連續召開研討會，極大地推進了兩岸聯手反對「文化台獨」的共同鬥爭。此情此景，至今都令我十分的懷念。

我也因此得以結識包括先生在內的台灣「統左派」朋友，並從中受到諸多教益。先生是影響我最大者之一。將此加以總結，也是對先生的由衷的紀念。

一、曾醫師光復初期台灣之研究的動機和目的

曾醫師致力於光復初期台灣歷史和文學的研究。此前的相關研究，多集中於「二二八」事件，曾醫師則擴展到整個光復初期的全方位的研究，為我們留下了寶貴思想和學術的遺產。

首先是進行這一研究的動機和目的。先生曾親口對我說過：這是整個二〇世紀中國真正統一的短暫五年，卻不幸發

生了二二八事件；然而，兩岸終究要統一，當統一再次到來時，兩岸人民都要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避免不幸事件的重演。此其一。

其二，光復初期是當代台灣許多問題的起點。如二二八事件與乙未割台一起，乃所謂「台灣悲情」的兩大來源。此外，像省籍（族群）矛盾、戒嚴體制、「白色恐怖」、「冷戰、內戰」交疊架構等，都起源於此。因此，充分瞭解這一「原點」的真相，是解決當代台灣諸多問題的「鑰匙」。

二、曾醫師研究路徑和方法的創新和價值

其一，以往的史學研究往往只依仗檔案資料，而曾醫師則同時注重報刊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究，這樣就避免了只聽官方的一面之詞，而更能瞭解現實社會的實況和廣大民眾的心聲。與此同時，曾醫師與橫地剛等，注意發掘長期被忽略、湮沒的人和事，如對於范泉的發掘。

其二，曾醫師並不停留於表面的現象，而是試圖透過現象，直達問題的本質。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曾醫師的研究具有現實問題意識。他針對的總問題即「文化台獨」，而每本著作又各有側重點和具體的針對對象。

接下來就這第三點略作展開。

三、針對現實問題的歷史研究

(一) 台灣人「奴化」了嗎？——「光復」與「終戰」之辨

首先，台灣廣大民眾對於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抱持著什麼態度？或者說，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奴化」了嗎？

曾醫師將其有關光復初期台灣的系列專著的第一本定名為《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詩文資料集定名為《光復新聲》，並用「昂揚的光復意識」，「新生台灣的胎動」，「亢奮的十月」，「最激動的一日」等，來形容日本投降後一〇〇天裏的台灣景象。

陳儀當局為了逃避責任，曾宣稱「殖民遺毒」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主因之一。然而事件的親歷者王思翔在其《台灣二月革命記》中用大量篇幅力辯其非；楊逵則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斷然否定了台灣人民「奴化」說。曾醫師則更周全和深刻地指出：少部分台灣人固然被「皇民化」了，但台灣人內部的自我批判、自我「去殖民」，在光復之初曾經是社會的主要潮流。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獨」派用日本右翼用詞「終戰」來代替「光復」，宣揚日本統治帶給台灣「現代化」的「美好」生活，以獲得其鼓吹「親日反中」思潮的「正當性」。曾醫師

則用大量資料證明，這並非事實的真相，而是一種蓄意扭曲的建構而已。

從曾醫師書中可以看到，光復之時，絕大部分台灣人為擺脫日本殖民統治，洗刷五〇年的恥辱，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而有重見天日之感。曾幾何時，部分台灣人卻以當「皇民」為榮，這未免坐實了當年陳儀當局所謂「殖民遺毒」之說，既是對先賢前輩的不敬，也自我損傷了台灣人的尊嚴。

(二) 「民主」問題：台灣諸問題的根源和本質

二二八事件長期以來在台灣是一大禁忌，但一九八〇年代起，卻成為熱門話題。作為某些政黨的「取款機」，每到選舉時就拋出來，成為製造省籍對立、撕裂族群、撈取選票的工具。

另一種說法則宣稱事件乃「民逼官反」。這樣廣大台灣民眾就成了理當被鎮壓的「暴民」。

這兩種說法雖然出自不同的黨派，但同樣加劇了省籍矛盾、族群對立。

克服之道，只有像曾醫師這樣，搜集、整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並加以分析，最終還歷史以真相。

《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用整整四章的篇幅，論述了「百花齊放的報刊雜誌」、從殖民地教育到國民教育的

「教育的大變革」、提倡從方言學國語、以「中國化」為核心的「文化重建」等內容。如此全方位地觀照社會文化問題，在同類著作中並不多見，可說是曾醫師與眾不同的開拓、創新之處。

曾醫師力求透過現象看本質，認為當時問題的根源、本質和關鍵在於「民主」。書中不少章節的標題就體現了這一核心觀點。如「台灣的「民主」問題——諸問題的根源」，「省籍問題的現象和本質——民主化問題」等等。這裏所謂「民主」，其對立面正是當時專制性的官僚統治。

光復初期的台灣集中了多種社會矛盾，包括中、日民族矛盾，省籍矛盾，兩岸現代化程度的差異，廣大民眾和官僚統治集團的階級矛盾，等等。而廣大民眾和官僚統治集團的階級矛盾乃其中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這主要矛盾，其他問題才能迎刃而解。能夠解決這一矛盾的「民主」——其本意即民眾當家做主——其重要性就凸顯出來。

當時包括楊逵、歌雷等在內的省內省外的文化人，異口同聲要求消泯省籍矛盾和對立，給予台灣民眾以民主的權利。楊逵的《和平宣言》即因此而產生。

由此可見曾醫師觀點的正確性和深刻性。

(三) 台灣戰後反共體制的起源

曾醫師系列著作的第三本為《一九四九·國共內戰與台

灣》。全書最後以「馬場町的槍聲響起」作為結束，說明「白色恐怖」拉開了「冷戰內戰」交疊構造下長達數十年的反共戒嚴體制的序幕。這樣，「台灣當代歷史的根源在本書中獲得了充分的解釋」，曾醫師如是說。

「反共」體制及其意識形態其實是當前台灣包括「台獨」在內的所有問題的總根源。像這樣以非「反共」的觀點如實再現這段歷史的著述，在台灣並不多見。只要將其與差不多同時出現的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比較，曾醫師這本書的特殊價值和意義，即可顯現。

四、曾健民思想遺產對我們的幾點啟示

其一，歷史研究也需要有現實問題意識。緊密跟蹤和針對現實問題的歷史研究，將更有價值和意義。

曾醫師有關光復初期台灣的歷史研究，針對著當前的「親日反中」的思潮、撕裂族群的政治操弄，以及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識形態」，均屬於當前台灣面臨的首要問題之列，因此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二，無論有著多少現實政治的需要，歷史研究仍要以「求真」作為其不二法門，各種片面、偏頗的觀點，都有可能淪為政治的工具，也難以服眾。

在反對「台獨」的鬥爭中，陳映真縱橫捭闔，思維敏銳，具有強大的批判力道；而曾健民注意發掘和搜集第一手資料，

力求還歷史以真相。他們構成了互補關係，是並肩戰鬥的親密戰友。

其三，應提倡和加強兩岸的攜手合作。台灣問題本就內在於中國問題，應提倡「中國問題中的台灣問題」的視野。

除了具有這一「視野」外，曾醫師還實際踐行了兩岸的攜手合作。如在與包括筆者在內的大陸學者的合作下，曾醫師發現光復初期台灣的一些報刊資料，在本地已湮沒無存，卻在大陸圖書館保存著，因此自費購買其縮微膠捲，最終成為其著書立說的重要資料。

曾健民醫師和陳映真先生、王曉波先生、毛鑄倫先生，雖然都已仙逝，但他們為我們留下了豐富而又寶貴的思想遺產。他們將永遠、永遠地和我們在一起！

痛惜之餘，繼承曾醫師的遺志，完成他的未竟事業，應是我們對他的最好的紀念。

曾醫師思想不死，精神永存！

以祖國統一為畢生信念的曾醫師一路走好！

我會帶著光碟去見你——悼念曾醫師

王墨林

這陣子都在想一些人死的事，這個問題本來是跟十三年

前自己得癌有關係，因為是癌末，難免就從拚命想一直到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就只好跟「亂世佳人」的郝思嘉一樣，總是把「還是明天再想吧！」當成口頭禪。沒想到這十三年間，遭遇到一連串從母親、父親到好友接踵去世的事，我似乎對死亡更是想不出個什麼名堂了，它真是一個無法說清楚的謎！

後來遇到牙齒有些問題，都跑去找曾醫師治療，有時跟他聊到甫去世未久的大陳，見他哀傷甚大，尤其遺憾與大陳生前共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之未竟志業，一直想要早日退休，回歸花蓮故鄉，好好利用餘生著述兩人都念茲在茲的台灣歷史研究。因期間有跟過曾醫師的「新自由主義簡史」讀書會，也有談到我來組一個台灣光復史的讀書會，他也很期待。

因為去年我要作一齣背景是一九四五光復到一九四七年

二二八的戲，因此讀了曾醫有關這方面歷史研究寫的幾本書，跟他本人談起來，他如數家珍講得欲罷不能，因門診來者人多，有時讓我等他門診下班，跟他去附近百貨公司地下日本料理店邊吃邊繼續聊，真的受益非淺。不僅如此，等下次去門診，他又準備了已列印好的一些資料給我，都是光復初期的舊報紙剪報，或中、日文的相關文章，這些資料在之後漸漸擴大我對台灣左翼劇場脈絡的視野，要說曾醫是我的私淑老師也是可以的。

後來他除了來看我的排戲，又專程來看正式演出，戲結束後還請一起來看戲大家都熟的朋友吃宵夜。我知道曾醫年少時是文藝青年，寫詩也寫散文，年長後又寫社會評論，這個脈絡跟我一樣，然後我們都成為了中年左派也是一樣。本

來左跟文藝就有一個相通的精神世界，從左到成為左派的階段，可以確定這個精神世界就是我們追求的烏托邦。又在這個階段我們先後都見到了大陳，也可以確定我們都在烏托邦找到亦師亦友的一株大樹。

就這樣文藝在我們左派的手裡，也成了跟反動體制在做鬥爭的武器，難怪曾醫見到面都會關心地問問我有沒有做什麼新戲，大概是激勵我隨時都要就著戰鬥位子。我知道橫地剛是他的日本好友，也讀過橫地先生《南天之虹》這本記錄黃榮燦在台事跡的著作，我一直想有機會要將書裡黃榮燦的故事搬上舞台，追念這位用木刻畫為二二八留下現場永恆記憶的左派藝術家，曾醫為此特別約了專門研究黃榮燦畫作的梅丁衍老師，在梅老師的看診日跟我見面聊聊，他又請我們去吃了一頓豪華的日本料理，在跟梅老師相談之下，後來我決定有機會一定要讓黃榮燦出現在台灣的劇場裡。是的，我們隨時都就戰鬥位子！

陸續知道曾醫退休回到花蓮老家的消息，他曾經跟我提過關掉診所要回花蓮，好好寫出台灣光復史研究的書，我知道這是他要完成「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末竟之業，也是大陳有過對他的期許，真蠻期待他能完成。記得有一天讀到朋友來訊說曾醫住院了，而且是癌症末期，我當場傻住久久不動。我不是一個無神論的左派，為他跪下來禱告。隔幾天

之後，又有一天突然接到他親自打來給我的電話，他竟然用著一種興奮急促的口氣，花了二十分鐘一直鼓勵我要去做《南天之虹》這齣戲，我也在全身陷入一種激動的情緒中回應著他。電話掛下，正在沈思之中，曾醫又打了電話來，我甚為惶恐，此次他語氣轉為幾近悲傷，勉勵互相要為我們的目標堅持下去，我忍住要噴出的眼淚，叫他好好休養再說。

有一天，友人良哲代傳趙剛老師約我與嘉玲一起跟曾妻麗英吃個飯，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曾醫的近況，才知道他跟死神艱苦地對抗了一個月之後，情況似乎好轉。我們都有慶幸之感，後來也聽說他回花蓮休養去了，正是美國大聲叫囂新冷戰要把中國再度隔離於世界之外……

友人來電說曾醫走了，我一下子啞然但也很快轉為平靜，似乎已經習慣這種接踵而來的死亡情事，只能說：它真是一個無法說清楚的謎。人步入初老眼下看到生老病死，一個連一個，一件接一件，從自己的親人到平生的摯交，沒有太大悲傷，也沒有太多想法。那日趕到花蓮去見曾醫火化前最後一面，站立棺前怔怔看著他閉下眼睛的臉，我在心裡跟他說：我會把《南天之虹》做好了戲的光碟，帶著去見你，這是我給你的允諾。回程在蘇花公路遠望太平洋波濤洶湧，正是中美軍艦在台灣海峽你來我往之時……

蕭瑟秋風今又是

林一明

我與曾醫師相識在「人間」。

一九九六年我到人間出版社上班，每個禮拜三早上曾醫師會到辦公室來，隔著會議桌拿出包包內一累累資料與大陳面對面開始一整個上午的討論。曾醫師是個嚴謹的人，講話也慢條斯理，總是兢兢業業的向大陳討教、勤勤懇懇的做筆記。相較於我這種疏懶而散漫的人，我總有種學生時代嫉妒好學生的酸味——「啊人家不就是大陳的好學生嘛」。其實在朋友間，與我同樣吃味的人還真不少，但終究是不明究理的多，幾年相處下來，我才真正理解曾醫師的樸實與真誠，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種要努力讓自己保持單純的傻勁，隨著年歲增長，這幾年我才發覺，人能一生保持單純真是不簡單。他對大陳的信任（或是信仰）就是如此，有一次與他聊起了手塚治虫，

由於我在時報出版時編輯過手塚全集，看過不少手塚生前的資料，於是就開始口沫橫飛、議論大發盛讚這位一生奉獻創作的「漫畫之神」，不想曾醫師脫口對我說：「有我們陳大哥偉大嗎？」……我聞言絕倒，但瞧他一臉嚴謹而認真，反倒是我尷尬靦腆、啞然無言——這人真是愛敬大陳如此！

除了禮拜三會見到曾醫師，星期六下午曾醫師在出版社還有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聚會。這個研究會據稱是在九三年就成立了，但在我九六年到人間時，已經因為大家各自的事忙，系統研究除曾醫師自己外已經推不動了，慢慢成了每週一次的學習會。當時在老林（林孝信）鼓動下，我在週四晚上開辦個讀書會，而後，週六的學習會與週四的讀書會就結合起來一併在週四晚。

那幾年，面向社會的工作變多了，在大陳的領導下，我們一起辦了好些事：「日據時期照片展」、「香港回歸照片展」、「鄉土文學二十週年」、「四六事件五十年」以及「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會議」。後來辦《左翼》雜誌那段日子大半的會議都是在我家裡，記得有兩次的會議，曾醫師和曾太太還特地準備了大家的餐點，遠從敦化南路的診所送到永和來。

其實，在泛左派的圈子中，曾醫師是個較為奇特的存在，他不是老同學，但他的待人處事卻是很老同學那一套，與眾多工具性使用人、空言強調「工作」、「組織」的「資源派」很是不同。以至於有一些人喜歡佔他便宜，背後卻到處譏嘲他。這種狀況如我這般驚鈍之人也都感覺到了，曾經敏感的寫詩少年，嫻熟執業于異國日本的牙醫師，豈會不瞭然於心？但曾醫師終究還是以他的寬厚去對待了。

我好幾次上他的診所看牙。小小的候診室中有一幅日本幼兒園小朋友畫的感謝曾醫師的童畫，我常看著這幅畫，想起曾太太提過當年在函館開業、帶著剛出生的女兒過著一家三口寧靜溫馨的小日子，腦海中就不自覺的浮出了電影中靜謐而冷冽的北國雪地裡點點昏黃的畫面，這不就是有一大部分台灣人夢寐以求的日本情調嗎？

然而在與曾醫師相識的二十多年裡，我從未聽過他提起曾經的日本生活，也不曾見他以好惡的情緒談論日本。從他常掛在嘴邊的「從社會的表象，去究明背後的政治經濟構造……」，總感覺他有種透視了日本社會內核的憂鬱，我在想這應該與他後來對於「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的議題一直念茲在茲有某些內在的關聯。

二〇〇二年我離開人間回家照顧小孩，與曾醫師的聯繫漸漸不如此以往頻繁了。〇六年大陳在北京病倒後，曾醫師有次約集了我們一家與施善繼夫婦到他新店的新家聚餐，特意拍些大夥的合照傳與大陳看，告慰養病中的大陳。當時他把新店的透天房子賣了，表示夫妻倆年紀大了爬不得樓梯，原本的房子大也照顧不來。那天曾醫師還帶我參觀他特意裝修的書房，見到了移動式的書櫃與那一大片的資料。當時以為他就要退休，全力做他自己的研究了。沒想到他還是放不下他的病人，往後又還是繼續執業。牙醫工作是耗費眼力的活，而他又又有糖尿病的宿疾，加之下班之後，孜孜不倦的讀書研究，沒有強烈的使命感，絕非一般人所能堅持的。

我是因為最近追思會的籌備與曾醫師訪問稿的出刊才比較清楚這些年曾醫師的狀況。現在回頭看曾醫師這十多年的修行，我打心底以為當初大陳離台，或許對曾

醫師來說是一件好事。其實跟在大陳周邊的人，必須時時有所謹慎與警惕，大陳畢竟是在社會上有名望、在文化上有一定份量的人，「人間」以大陳名義面向社會的活動，畢竟是與老同學左翼反抗運動有所不同，不加小心區別的話，是很容易落入如「資源派」那種汲汲於扮演當權者裝扮門面所賞賜的反派角色，與終日為是否成為社會定義的「左翼」而惶惶不安的境地。曾醫師這十幾年來，孤獨而堅定走自己的修行之路，卻成績斐然；相關於光復後的台灣研究令人眼睛一亮，我深深感到，經歷了這麼多年，曾醫師終究在自己清楚認識的台灣左翼所應走的方向上，明確地找到了自己所能為之效力的位置，並辛勤而寂寞的奮力不懈；除此之外，在這次追思會的籌備期間，我也見到了一批深受曾醫師勤奮堅持的精神感召而參與到左翼陣營中的優秀年輕人。

去年最後一次與曾醫師聚餐時，我才首次意識到曾醫師的初老，其實是他發散出來與先前不同的氣息，他沒有了已往的緊張感，而透著一種淡然的神態，一種在我看來並不像大陳而是頗類似於「藹噤」（林書揚）的氣質，一種清楚釐清自身與社會距離的閒適。——他們是可以獨自舞蹈的，自娛自樂、為所想的，因為對他們而言，存在的本身已經是對社會的反叛與抗擊。

我自〇二年江湖息影後，直到前些年才慢慢恢復了與老朋友的往來，沒想到卻是迎來了時代的終章。這些年「藹噤」、大陳相繼離世；去年「進噤」也走了；而今，兄長般的曾醫師也在初老之時，正待全力著書立言之際，不幸棄世。我沒有什麼多深刻的思想、多堅定的信仰，對於年輕時夸夸改造社會、創造時代的熱情也早已冷卻，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青春年歲是追隨他們走來的。也許時代已不再召喚革命、歷史也放棄追求典範，然而在親身感受過這些人的人格精神後，卻令我永遠活得不安穩。或許有人可以夸夸稱是信奉主義或思想堅定，而如我這般不識時務之人支撐我的就是這些人曾經在我生命中刻劃過的痕跡吧！

曾醫師一走，就像把那整個時代最後的背景布幕也提捲卸除了……

瑟瑟秋風，四顧茫茫，我自不知淚向何方？

「資源派」在我這篇紀念文中出現多次，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是什麼，畢竟是我亂創的詞。但我知道曾醫師一定曉得我指的是什麼，至於其他人，你曉得也好，你不明白也罷，反正我也懶得多說了。

為社會改造的進步事業

爭奪話語權的左翼戰士——曾健民醫師

陳美霞

一九九六—一九七年，我與我的老公林孝信（老林）先後帶著兩個還在小學讀書的女兒，從老林滯留三〇年、我也住了一〇多年的芝加哥回來台灣，全家安頓下來之後，就開始全身投入社會改造的工作。沒多久，我就聽聞：台灣左翼圈子有位理論界的武林高手，曾健民醫師。當時，曾醫生與著名作家陳映真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成立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除了編寫出各式各樣的重要刊物及書籍，也在台北推出「台灣社會性質論」、「帝國主義與台灣」等等多次高理論水平的讀書會。

因為我在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擔任教職，我們家就落戶在台南。老林因為投入社區大學、科學普及、通識教育、勞工及其他全台性的社會運動，常常南來北往，也不時參加這些讀書會，回家也會告訴我一些讀書會的狀況。但是我因為致力在新台幣公衛界建立一個比較批判性的學術團隊，進而也在二〇〇三年開始全身投入「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的運動，異常忙碌，而且大部分時間在台南，即使去台北出差也來去匆匆，因此就完全錯過了這些「重量級」的讀書會。我與曾醫

師也就沒有更多機會互動或交談，只是暗自希望：曾醫生的專業既然是醫學，是公共衛生的一部分，而我們理念又十分接近，將來一定有機會攜手為台灣社會改造的進步事業共同努力的。

我與曾醫師有更多實質的互動，始自二〇一六年年底。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們一群朋友——包括曾醫師——到北京參加陳映真的告別式；告別式結束，從台灣來的朋友們搭乘大巴到北京首都機場，準備搭機返台，我就與曾醫師比鄰而坐，一路上我們談起台灣社會改造的進步事業、他的分析以及他對我的鼓勵及期待。當時，老林回歸大自然才一年，我身心俱疲，而又必須從投入多年的、熟悉的、屬於我的專業的公共衛生改造工作中，抽出一大部分心力到老林二〇一二年起始的釣魚台教育工作的持續與推展；老林在世的時候，我與老林長年的分工是他搞保釣，我全力搞公衛，我們互相支援；當時我對自己必須投入這個對我而言是相對不熟悉的領域，而且擔任理事長，其實有些惶惶不安。然而，曾醫師在大巴上的一席話，卻安定了我的心：他對釣魚台教育這個工作之於台灣進步事業的意涵有深刻的、理論高度的理解，他對台灣進步事業殷切的期待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對老林與我數十年投入海內外草根組織工作的努力與

堅持有著真誠而深刻的珍惜，他對我從公衛及釣魚台教育兩個切入點投入台灣進步事業可以起的作用表達滿滿的信心、信任、期待、鼓勵與支持。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五日，一群支持保釣、願意承擔釣魚台教育工作的朋友們集結起來，成立了《釣魚台教育協會》（簡稱《釣教協》），希望可以更系統的在台灣推動釣魚台教育的工作。曾醫師，如他在往北京首都機場的大巴上所承諾的、以行動支持《釣教協》，擔任監事，而且參與多次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或其他工作會議，提供重要的意見，也戮力投入推動工作。今年及明年是保釣五十週年，《釣教協》為了系統而全面推動紀念活動組織了《保釣五十推動團隊》，我邀請曾醫師投入這個推動的工作，他也滿口答應，而且積極參與推動團隊的規劃會議。

曾醫師投入《釣教協》工作的過程中，他的分析及意見都是深植於他深厚的理論基礎的。而我特別被曾醫師這位理論界武林高手的功力所折服，是與一個《釣教協》的中文翻譯成日文的工作有關：二〇一八年年中，日本政府又要修改教科書，將釣魚台列為「日本固有領土」，我在當年七月二六日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發表了一篇評論——《日本需要的釣魚台教育》。主要批判日本政府

一而再、再而三地擅自竄改教科書，從上而下地以日本少數人的意識形態及利益為依歸，扭曲歷史，推動違背日本人民利益的教育，從而可能重蹈覆轍，為日本再招有如二戰的大禍，這對日本人民是大不利的。因此，我在這篇評論最後呼籲：日本人民需要的是一個人民觀點的釣魚台教育。評論發表出來後，《釣教協》幾位行動者思考：其實日本人民更需要閱讀這篇評論。所以我們就請朋友把這篇評論翻譯成日文，希望轉發給日本人看。從中文翻譯成日文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中日文的精準對應，需要對日文、中文、日本侵華史、日本侵占琉球史、日本侵占釣魚台史、釣魚台歸屬史、美日帝國主義侵略史等等層面的研究與知識有深厚功力的人，方能精準完成，而當時曾醫師正是這樣一位武林高手！經由他的協助，這個重要的日文翻譯工作得以圓滿完成。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四—二五日，《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與成大公衛所共同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舉辦我的「榮退學術研討會」，主題是：「憂患與前瞻——資本主義下台灣公衛與醫療體系的根本問題及其改造」。主題演講除了我的退休演講，「啟蒙與實踐：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一段公衛長征」，我們也邀請了中國大陸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的李玲老師談中國大陸醫療改革的問題，以及美國

著名左翼醫療社會學家霍華·維茨金談「全球資本主義下的醫療與公共衛生及建構另類體系的集體努力」。當時是「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的曾健民醫師擔任霍華·維茨金主題演講的其中一位回應人。霍華·維茨金與曾醫師的研究專長都是政治經濟學，而他們兩位都還在醫療體系行醫；曾醫師十分認真的事先閱讀了霍華·維茨金的主要著作，所以他的回應與霍華·維茨金的演講形成一個十分美妙而深刻的、台美左翼知識分子惺惺相惜的對話。

下面我特別引用曾醫師回應中最後總括他對霍華·維茨金的演講的一段評論，這段評論同時也展現曾醫師政治經濟學的深厚功力，以及他對霍華·維茨金這位美國傑出的左翼醫療社會學者的高度欣賞與珍惜：

「霍華·維茨金以『帝國主義』為中心概念，歷史地介紹了帝國主義如何透過慈善機構、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國際貿易和條約機構（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國際醫療機構，建構世界的平等關係，進行剝削，影響著人類健康、醫療及整體社會的發展。帝國主義不是抽象的，它是具體的，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從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到金融資本）

的最高發展階段，以帝國主義形式表現出來的國際擴張和剝削。一九八〇年代後，新帝國主義以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政策和意識形態對世界進行新一輪的更貪婪的剝削。它為了擴大跨國大資本的利益，以國際霸權，透過金融貿易的手段，向全世界各國推行社會經濟的極端私有化、公權力的去管制化、金融化；而且新自由主義也是一個意識形態，它以「普世價值」的面目統治著我們的認知、政策與學術，深入影響到我們的公衛、醫療、健康政策和制度。在台灣，特別在醫界，一般很少有關社會醫學、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討論，這次霍華·維茨金的演講對我們提出了最根本且最重要的課題。」

在成大公衛所教學數年之後，我觀察到，同學們對公共衛生問題及政策的了解及分析，深深受到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沒有破解他們不自覺的意識形態，他們不太可能有主體的、從根本了解及分析台灣的公共衛生問題及政策。所以，我在二〇一四學年開始開設「意識形態與公共衛生」這門三個學分的課程。之後我才知道，曾醫師早在二〇一一年就經由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台灣意識形態批判》，趕緊買

來拜讀。這本巨著從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深深影響台灣政治經濟發展及命運的「台灣意識形態」，做了鞭辟入裡的分析，見解深刻、透徹而切入要害。這本書對我在上述課程的教學有很大的啟發與幫助。它是台灣社會改造的進步事業中，堅定站在弱勢群體、被壓迫群體、底層人民的立場，與他們一起爭奪話語權的典範。

我在此再引用曾醫師這本書序文中很經典的一段，與讀者分享，但是真正要學習曾醫師長年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智慧結晶，還得自行買書來仔細閱讀：

「從鄉土主義轉化而來的本土主義，作為台灣戰後本土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一開始，在政治上以反獨裁、追求民主的形象，站在道德的歷史正義的高點，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相對於在政治上一定程度的變革性，它在文化上卻表現了相當的保守性。它一方面繼承了蔣國府的「反共親美日」的意識形態，另外又建構了『省籍矛盾』（一種族群矛盾）和『去中國化』（主要在台灣史論上）的新文化政治論述。本土新興資產階級……以本土主義掩蔽了其權力和階級利益的真相，維護了其階級統治。」

這本書也對其他重要的意識形態議題做了深刻分析，如對台灣的「日本情結」、對「戰後再殖民論」的批判分

析、對東方主義者龍應台「一九四九大江大海」一書反映的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批判分析等等。曾醫師其他的著作裡頭，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及資本主義都以他深厚的政治經濟學功力做了深刻、重要而深具啟發性的分析。

與曾醫師多年攜手在保釣、在公共衛生、在社會改造的進步事業的共同實踐，再加上從他的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中的學習與啟發，我深刻體會到：曾健民醫師是一位理論與實踐辯證結合、一生兢兢業業、腳踏實實的、無私的為台灣社會改造的進步事業爭奪話語權的左翼戰士。我深以擁有這麼一位傑出的同志、戰友與朋友為榮！因此，我對曾醫師不敵病魔、遠離我們而去的現實，特別難以接受、心裡特別傷痛！但是，我也嘗試著以老莊哲學的精神，接受大自然的規律。我理解，也這麼相信：曾醫師的生命將以另外一種形式，在台灣社會改造的進步事業往前推展中，不斷的延續著。

（作者為《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

二二八前的台灣

作者：曾健民

出版社：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二〇〇七年三月

一九四六年的台灣社會如何從殖民地轉換為民族社會？如何從一個日本的殖民地復歸為中國的一省？在這樣大的歷史格局中，有「去殖民」的課題，對於殖民統治遺留的「債務」，有殖民歷史的清埋，也有教育、語言、歷史的「民族化」問題。然而，「去殖民」的反面，就是「中國化」。台灣的「中國化」內含著「惡性的中國化」與「良性的中國化」，進步中卻又帶著矛盾。本書特以「去殖民」與「中國化」為主軸為當時的台灣社會做詳盡的分析。

曾健民醫師的台灣戰後史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研究

林載爵

如大家所知，曾醫師自一九九二年從北海道遷回台

北定居後，除了日常的牙醫師工作外，在思想與歷史的探索與研究上，一方面與陳映真先生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共同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出版了不少刊物討論台灣社會的性質。一方面又同時進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戰後台灣史的研究。先後出版了四本著作：

《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

(聯經：二〇〇五)

《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台灣》

(人間：二〇〇七)

《一九四九·國共內戰與台灣》

(聯經：二〇〇九)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

(聯經：二〇一五)

也主編了兩本相關文集：

《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

(問津堂：二〇〇三)

《一九四五 光復新聲：臺灣光復詩文集》

(印刻：二〇〇五)

在繁忙的執醫日程以及苦思台灣的社會性質、發行刊物宣揚理念之外，曾醫師還願意播出時間收集文獻，研究這戰後五年的歷史，我想，他一定認為這五年天翻地覆的大轉變，是瞭解台灣社會性質的一大關鍵。然而這五年歷史的研究卻又相對極端貧乏，這也讓曾醫師覺得有必要以己身之力投入其中。在《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書中他就說：「本書所處理的，是一段台灣史上

一直處於空白的時期，至今幾乎未有人全面涉入過。它就是從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到翌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一百多天的歷史。短短一百多天，卻是最複雜、最激動，且充滿豐富內容，富有多元啟發性的一段時期，然而我們一無所知，不但一無所知，甚至還被扭曲了。」他收集了大量的史料，重建了這段歷史，他要說明的是，台灣的八·一五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八·一五有很大的不同，是十分複雜且充滿矛盾的時刻。台灣島上，日人、日軍和台灣人之間，台灣人內部的皇民化階層與大多數台灣人之間，各有不同的八·一五，可說是陷入兩極的精神世界。在他的全面觀照下，光復意識、國軍、國語、美軍、日僑、日俘、漢奸、御用仕紳、省籍隔閡都有了充分的說明。他要指出的是，這段期間，從政治、經濟到歷史、文化，全面的進行了「去殖民化」和「祖國化」。然而，遺憾的是，這兩項工作都沒有達成時代任務，以致留下了更多的難題，產生了更多的悲劇。

這些難題與悲劇就在一九四九年顯現出來。曾醫師已經發行九刷的暢銷書：《一九四九·國共內戰與台灣》就是要論述這個觀點。他認為幾十年來有關一九四九年史實的討論，特別是超越國共對峙意識的論述，不是禁忌、空白，就是片面。他的基本觀點是：這一年，失去

中國大陸土地、人民以及資產的國民黨政府，連同國庫黃金、故宮國寶一起，有百萬以上的軍、政、經、文人員撤守台灣，在台灣社會之上架構了一個反共內戰的政府和體制。於是，台灣的光復期結束，開始進入內戰與冷戰的雙戰期，警總、出入境管理、戒嚴、禁書、徵兵、白色恐怖、反共教育等等，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他強調，一九四九年包括了國共內戰以及國共內戰在台灣的兩大部分，只有把這兩者聯繫起來看，才能看到台灣的一九四九年及其後的社會和歷史的真相，才能理解到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的歷史如何深刻影響了往後台灣的命運，透視到今天糾葛不清的兩岸問題的根源。

曾醫師已經把台灣光復前後十年史的史料收集和寫作當作一種天職，於是他會義不容辭的投入某些他認為該做的事，《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這本書的出版就是最好的例子。他非常敬重陳逸松先生，讀過《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前衛：一九九四）。他認為陳逸松屬於台灣第二代知識分子，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接受了比較完整的現代教育，同時殖民統治造就了他們強烈漢民族意識和祖國意識，又逢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因此漢民族意識，祖國情懷和左翼思想成了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特徵，陳逸松就是這種特

徵的代表。然而對於陳逸松這麼重要的人物的後半生卻無人接續撰寫，他深感不平。二〇一三年他終於下定決心，投入這項他認為非完成不可的工作。他說：「我以個人的力量，不計酬勞答應接下這項重大的付託，不只為了整理陳逸松個人的生命史，還為了彰顯其個人所代表的重大的時代史意義，後者，觸動了我不計名利不計毀譽投入這項工作。為此，我花費了兩年時間，自掏腰包整理和蒐集資料，特別在最近半年（二〇一五）我推辭一切雜務和活動，終日與陳逸松先生對話，閉關寫作下才完成了這本書稿。」如果不是天職的召喚，曾醫師怎麼可能任勞任怨的進行這麼艱苦的寫作工作。

怎麼解釋這種天職？曾醫師自己說得最清楚：「台灣戰後史，深受中國，東亞和世界歷史的影響，也受到島內多重政治經濟力量左右，道路十分崎嶇而複雜。這使得一般人的生活中，或者一般知識分子的觀念中，充滿了片面和迷思的歷史形象。我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和評論，主要致力於撥開這些歷史迷思，揭露歷史的真實面貌。」

曾醫師有關台灣戰後史的著作都是嘔心瀝血之作，撰寫《一九四九·國共內戰與台灣》期間，「正逢父親病危，去逝，每日親情，寫作交相煎，每一行每一頁幾乎

都像與父親的生命賽跑。」這正是最好的例子。作為曾醫師的出版人，我必需說，他是最準時交稿的作者，每一本書他都會按照事先約定的時程完成。他在寫作上的專心，自律和堅定的毅力，需要有人給於扶持，所以他的每一本書都會在序言中對夫人尤麗英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們相信曾醫師留下來的戰後台灣史著作將是了解這段歷史的永遠的必讀之書。

《方向》的戰鬥，戰鬥的《方向》

——悼念曾健民醫師

關曉榮 鍾喬 范振國 范綱壇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曾健民醫師在花蓮家宅出離遠逝，世壽七〇。

曾醫師不但是專業，熱誠，技術嫻熟，左派朋友共同喜愛的好學醫師，也是執業之餘，全神貫注於左翼世界建設的好學深思，篤行實踐之士。青年時其曾因為思想激進異端，服役軍中時受到白色恐怖的波及，一九八〇年高雄醫學院畢業後，東渡日本進修牙醫專業。在日本修業期間開始自學苦讀馬克思主義及進步左翼的社會科學理論，在寓居的北海道家中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時的心情，曾醫師這樣說：初次跟年輕時在恐怖禁忌中

自己想像的，夢想的思想世界見面，如獲至寶，終於可以在光天化日下閱讀人類解放的經典，如饑似渴；每天看完診之後在寧靜的北海道夜晚自己閱讀，特別暗無人聲的雪夜中展讀，思考原典的幸福感，一直令我難忘……

陳映真是經由同為獄囚的，曾醫師青年時的朋友洪惟仁的推介而與曾醫師結識的。他們兩人從此過從甚密，結為最親密的戰友，一起搞讀書會，辦座談，圖文展，組織，舉辦，聯袂出席各種兩岸，國際的會議，偶爾側身街頭，為良知正義的追求呼喊幾聲。他是陳映真過世之後唯一持續彈精竭慮，深入探索台灣社會性質論的思

想者，行動者。

曾醫師說，社會性質論決不是為了學術研究，而是為了變革社會，改造世界的實踐。陳映真再三提出台灣社會性質論主要是希望台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有一個思想的準備與指導。這與變革運動的性質，對像，動力等一系列問題有關，譬如要團結誰，反對誰的問題……

二〇〇五年映真先生囑我負責《人間思想創作叢刊》的編務，映真先生去北京，無法看顧刊物的期間，曾醫師是對我幫助，鼓勵，教導最多的兄長。《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停刊之後，為紹繼陳映真未竟之志，曾醫師以一人之力，編輯發行了《方向》叢刊，在曾醫師靈逝不遠的此刻，特請我兒綱埜繕打曾醫師執筆的《方向》叢刊發刊寄語，以明曾醫師心志，以致最深切的悼念。

曾醫師，安息！

願您和大陳的精神伴我們前行，讓我們在前進中追思大陳和您：

曾醫師，安息！

關曉榮、鍾喬、范振國、范綱埜同悼

〈發刊寄語：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

二〇〇八年哀鴻遍野的金融風暴，告示了新自由主義時代落幕的序場。接著倫敦街頭暴亂、佔領華爾街運動和阿拉伯之春的野火搖撼著舊秩序。歐債美債日債逼迫下走上街頭的希臘、意大利、法國的人民怒火，催生了左翼力量的崛起。野蠻的金融資本主義寡頭仍然通過局部戰爭和新自由主義的欺瞞，作者垂死的掙扎。世界在黑暗中摸索光明，世界在重重錘擊鍊鎖的聲中，尋求人解放的道路。人將從「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虛假個人自由中解放出來，尋求人和人共同的自由。

許多人開始重新拾起馬克思和資本論，許多國家著手重建公有經濟。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也走到了十字路口，向左向右已是提到眼前的嚴肅命題。因為中國的問題就是世界的問題，世界的問題也是中國的問題，還相信人終極解放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也只有縱身這個世界和中國的改造浪潮，共同探索前進的方向。世界已形成了百分之一統治百分之九十九的世紀。走出百分之一的虛幻世界，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現實世界；走出百分之一的唯心唯文化主義支配的時代，走入汗水的真實世

界，聯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共同前進。

為了在這混沌的時代摸索共同前進的方向，本刊試圖提供一個亞洲（包括中、台、港、日、韓、琉）的文化思想空間，希望在批判共同的舊世界中發現共同的新世界。

（摘自〈德法年鑑〉馬克思致盧格的書信〉中，記著這樣的一段話：

「所以，什麼也阻礙不了我們把我們的批判和政治批判結合起來，和這些人明確的政治立場結合起來，因而也就是把我們的批判和實際鬥爭結合起來，並把批判和實際鬥爭看做同一件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是以空論家的姿勢……我們是從世界本身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新原理……。」

「這樣，我們就能用一句話來表明我們雜誌的方針：對當代的鬥爭和願望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這是為了既有的世界，也為了我們的工作。這種工作只能是聯合起來的事業。」

謹以馬克思的話作為「方向」叢刊的方向。

方向叢刊 東亞後殖民與批判

作者：曾健民

出版社：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二〇一二年十月

本刊還是選擇了從「東亞後殖民批判」開始出發。

「東亞的後殖民批判」與西方傳入的後殖民主義論說不同，它不是唯心主義的，也與後現代主義式的唯文化批判不同；它總是歸結到政治經濟的批判，且與殖民主義後面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對決的批判。通過這樣的後殖民批判，才能確立自己的話語權。

在東亞，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批判，不是已經結束，而是一切批判的前提。

追憶曾醫師

曾醫師走了。是的，統左派的朋友們，年輕的或老的，都管他叫曾醫師。但這位行醫之餘自學而成，受到我們敬重的社會理論家與歷史學者曾健民醫師，卻實實在在的是我的牙醫。我找他看牙，大約始自二〇一二年，誰介紹的我也忘了，反正就是這個小小的朋友堆的某一個人。曾醫師在台北市忠孝東路頂好商圈的一個鬧中取靜的舊式公寓二樓看診，診所名：「中日牙醫」。他在日本北海道開業多年，在歸化與否的臨界點上，決定撤，因為再不撤，一家三口就都得變成日本人。對今日島嶼上的很多人來說，這恐怕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呢！據說，在日台僑中，此舉雖非絕無，但也近乎僅有。

二〇一八年左右吧，曾醫師退休了，我也億懶，自君之退矣，不復理殘牙。現在您走了，我這幾天多次無端想

趙剛

起那個老公寓的乾淨亮堂的樓梯間，很小很緊湊很齊備的診療室與會客室——只有這一點讓我想起您與日本。從會客室的一角，師母偶而會從通往居家的小矮門彎著腰走出來，熱情招呼我。在那兒，我坐著聊天，躺著看牙，但經常，躺著也繼續聊，話題從時事到兩岸到中國到文學，就在同一張診椅上，躺過陳映真，還躺過一口爛牙的王墨林——有一回他老兄排在我前頭。曾醫師和我總是在我起身漱口的时候，抓緊空子，少則聊個三五句，多則聊個十分鐘，最後，兩個人的對話常常在「唉！」聲中結束，然後醫師把大照燈拉下，用布罩上我的臉，繼續高頻洗牙。曾師母偶而兼任出納，但師母不在時，醫師也會戴上他的老花鏡，隔著櫃台收健保卡，上線辦理掛號。曾醫師曾說：「我退休後，回花蓮老家，保留一台看牙設備，給老朋友

們來長住並看牙」。不管是不是戲談，永遠不可能了。

曾醫師曾跟我說，當年是一個愛讀詩作詩的文青。其實有點狐疑，因為我眼中的曾醫師完全是個政治經濟學範兒。他心裡最喜歡的有關我的事，如果有的話，我猜，是知道我曾開了一門「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課，而不是我對陳映真文學的詮釋。他從沒這樣說過，但我就知道。

曾醫師這個人極其認真、嚴肅。禮貌性的軟交談一結束，發言馬上進入論文體模式，高度分析性、邏輯性。但也就是這幾天，我讀了邱士杰掛在網上的一首曾醫師一九六六年手寫在月份牌上的小詩，我覺得好極了，真誠、熱情，全無那時的「石室之死」式的調門，而且那個筆跡也是屬於純真年代的……，這我才真切相信曾醫師的文藝青年過往。是什麼力量什麼遭遇，讓一個詩青年走向了政治經濟學？肯定不是陳映真，因為曾醫師在回台灣之前的一九八〇年代，就在多少個北海道的雪夜裡，孤燈死磕《資本論》。請你腦補一下那個畫面吧！曾醫師怎麼走上統派的路？我也不知道，但我確信他的路不比陳映真的路容易，因為他似乎得更依賴政治經濟學所能給予他的理性力量與希望。他不渝地走上這條路的原因，還有，就是他對陳映真的友誼與忠誠，而我覺得這才是最要緊的。一九九〇年代，陳映真的很多大小研究與實踐計劃，包括辦讀書會、成立社

會科學研究會、研究香港殖民與回歸問題、研究「台灣社會性質」，還有籌辦好幾屆的東亞國家恐怖主義大型會議……這其中，沒有曾醫師的戮力以赴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而曾醫師卻總是永恆低調。如今，誰還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同志？誰又願意當這樣的朋友、這樣的同志？這才幾年，曾醫師跟著陳先生走了，也同時走了一代人的範兒。我竟然荒誕地想起聊齋的《葉生》。苦笑。

曾醫師與師母待人接物總是那麼和善、寬厚，而且有的禮。我有時偶而也想，當然是不帶惡意地，從他們的風貌言談中捕捉一些日本元素，但總是網個空。他們所體現的，我相信，是最質樸的台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所一向保有的善意與溫厚，不自誇示，不為己甚。我從來不曾聽曾醫師惡言過，即便是面對最不堪的行止言說。對曾經至交的某本土詩雄，他也以最包容理解的心情面對他的一切。只有在想到這一面時，我才明白，原來一個文學的、理解的、不審判的曾醫師一直在那兒。然而，您對您文學本性的壓抑，是否又壓抑了太多的憂鬱、憤懣與委屈呢？您的病與死。

有點遺憾。我吃了曾醫師很多餐，二〇一三—一四年我跟過他的一個劉進慶的戰後台灣史讀書會而且學到很多，我被他贈過書與刊物，我還收過他一袋他老家玉里的好

米……。對這些，我都沒有機會回報了，因為總是想——「不急嘛！」。於是我想起幾天前逝世的統聯的前主席毛鑄倫老師。我曾經在一九七〇年代末讀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時，在百無聊賴的青春歲月裡，修過他的課，什麼課我倒是忘了，但清楚記得少有人喜歡那時還算小伙子的毛老師的風采。雖然他一定不記得我，但我從不曾對他表明過曾為學生的事實，現在想想，都是很失禮的事，而且，無法挽回了。落葉蕭蕭，惡鳥囂囂。我唯有希望在這個亂世中，好好寫些我自以為一定得寫的東西，好好做人，別留下太多的遺憾。

作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一六日；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九日略改於高雄

方向叢刊 歌唱黎明

作者：曾健民

出版社：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二〇一四年二月

就像本期封面韓國美術家洪成潭所刻下的「火炬隊伍」一樣，大家一齊在黑暗中呼喚和歌唱黎明吧！本期以 AWC 第十六屆幹事會的報告集作為「特集」。全名為「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辛制運動聯盟」的 AWC，成員包括有韓、日、台、菲、美各地的反帝運動團體，它們「都是以反帝反戰的綱領為指導，進行社會分析和實踐的運動團體」。對過去東亞冷戰歷史的清理一直是本刊的主要工作之一。本期選刊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的三篇重要論文。

人間不捨，兩岸同悲

——寫在曾健民醫師遠行的日子裡

陸卓寧

樊洛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一個令人心碎的黑色日子，永遠帶走了我們可親可敬的曾健民醫師，我們再也見不到那個讓人想起來就滋生信念、力量和溫暖的曾大哥了！

曾健民先生在台灣和兩岸，仿佛植根於寶島卓然挺立的大樹，他以沖天的主幹高揚起偉岸的理想和信念，而紛繁的枝葉則寫就他橫溢的才華和生命的傳奇。

於台灣眾生，作為醫術高明的牙科專家，他是為黎民百姓解除病痛的『曾醫師』。於台灣思想文化界，作為陳映真先生最親密的戰友之一，他一以貫之地追隨他所尊敬

的陳大哥並肩前行，堅定地走在追求真理、探尋社會思想出口的道路上，積極參與《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策劃與主編，以真相還原來面對台灣社會歷史的正本清源，以現代史的著述深入東亞冷戰時代的研究語境，相繼出版了《文學二二八》、《新二二八史像》、《台灣光復史春秋》、《一九四五光復新聲：台灣光復詩文集》、《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一九四九國共內戰與台灣：台灣戰後體制的起源》、《台灣意識形態批判》、《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等，這無疑是憑藉高遠的

理想和精誠的治學填補了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空白，並廣續了賴和等新文學作家開創的台灣左翼文學傳統。如同關曉榮、鍾喬、范振國、範綱堉等對曾醫師的懷念和評價：「他是陳映真過世之後唯一持續殫精竭慮，深心探索台灣社會性質論的思想者，行動者。」於家國大義，他在台灣政治生態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始終心懷祖國、渴盼兩岸統一，不畏世事艱險，義無反顧地參與策劃組織了諸多反對文化台獨的活動。他為推動中華民族統一大業所做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並被歷史所證明。

事實上，從白天懸壺濟世的曾醫師，到夜晚伏案寫作的筆耕者；從戰鬥在《人間》前沿的勇士，到出席兩岸學術會議發表真知灼見的學者；從與陳映真先生共同創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左翼活動家，到以一人之力編輯發行《方向》叢刊的力行者；從精通日文的翻譯家，到為人正直、真誠、高尚的謙謙君子……他在眾多角色融合中所堅守的信仰、原則和奉獻，他為追尋社會真理和正義所踏出的生命路徑，包括他年輕時代鮮為人知的彈吉他、辦刊物、寫詩、唱歌、曾被警總傳喚約談、考醫學院、留學日本、執業東瀛、夜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人生事蹟，共同成就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志向高遠、才華橫溢的曾醫師。

曾健民先生在我們心中，亦師亦友亦兄。忘不了啊，每一次在寶島台灣與您相聚，我們都能強烈地感受到您帶給我們的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親切感；忘不了啊，我們與您最後一次相見，那是在台北市忠孝東路一幢舊式公寓二樓您那精緻而溫馨的牙科診所，您忙完了最後一個患者便不顧疲勞地跟我們交談，給我們講述，話語中是那麼憂患而又堅定地關懷著台灣的現實和兩岸的未來……；忘不了啊，您還對我們說，您要儘快地把台北的診所關閉，遠離世事喧囂的台北，到花蓮老家尋一個安靜的環境，去寫您想寫的文章，去繼續陳映真大哥未竟的心願。您期待著把陳映真的思想世界全部學習完了，再以一部書來紀念他；也為了陳映真一生追求直至離別時還牽掛在心的台灣左統運動，盡自己餘生的力量；忘不了啊，您還跟我們做了一個約定，我們再到台灣，便在那美麗的花蓮相見……

敬愛的曾大哥，您怎麼不信守約定呢？——正是：心願未竟，人間不舍！今天，在您遠行的日子裡，我們以無比沉痛的悼念，獻上一瓣心香，願天堂鳥引領，您一路走好！您未竟的事業必將有無數的後來者！

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 陸卓寧

鄭州大學文學院 樊洛平 敬悼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三日

追思曾醫生

——一位用左眼書寫台灣歷史的民間學者

韓嘉玲

今年由於母親的身體狀況及疫情的關係，我三〇年來第一次在台北滯留長達七個多月，也萬萬想不到在這段期間送走了三位亦師亦友的前輩。他們的離去讓我深深的傷痛，然

而最令我遺憾的還是曾醫生的離世，讓我有壯志未酬的感覺。這幾年來我常常向我描繪退休後的宏偉規劃，甚至在他病倒前的四天，我們最後見面的時候，他還滔滔不絕提及回歸家園，隱居山林，專心研究不同於台派史觀的台灣史寫作計畫。因此他積極的籌畫在母校花蓮中學附近買地、蓋房子，每當他說起這個夢想時，我很為他高興，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兒子、父親及丈夫，他總算可以卸下養家糊口的工作，隨心所欲的實現心中的夢想及寫作計畫。我也答應他等房子落成後

去花蓮新居小住，並期盼著他的新作及分享他的研究成果。然而就這麼素樸的願望，卻成為不能實現的夢想。

嚴格的說，我和曾醫生不曾一起並肩作戰過，但我們都相互認為是戰友。曾醫生一九八一年離開台灣，一九九二年才從日本返回台灣。他去日本的這段期間正是我在台灣參與左翼運動的時間，我在一九九一年的春天離開台灣前往北京，所以錯過了在台灣認識他的機會。然而一九九八年初的一個深冬，我因為要會晤一位到北京的英國學者，我們約在西單民航大廈見面。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只能嚴防死守在民航大廈外等候每半小時從機場到達的大巴。因為天氣太冷，又一直等候不到，找我個暖和的地方就躲進了旁邊長安街上

的民族飯店。不料這無意的闖入卻有了意外的收穫，剛踏進酒店大堂，赫然看到告示牌上貼著舉辦《呂赫若作品學術研討會》的通知。我心中暗喜，知道參與會議的人肯定和陳映真或夏潮的台灣朋友有關，就逕自往二樓的會議室走去，在會議室門口碰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曾太太尤麗英。我們雖初見，然而一見如故，後來跟曾健民見面也是相談甚歡，雖然看起來這樣的相遇是巧合，但是作為台灣的少數派們，這樣相見而充滿喜悅又是必然的。後來才知道這也是曾醫生第一次造訪北京。在北京另外一次的相聚則是二〇〇六年的秋天，大陳生病後，曾健民、黃春明、施善繼及詹澈以特邀貴賓的身份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協》的會員大會。由於黃春明先生殷盼能探望大陳，我也陪同曾醫生、黃春明先生等人在北京飯店等候消息。雖然等到半夜還是沒有結果，但我們卻在飯店暢談了一晚，我才深刻感受到曾醫生對大陳的深厚友誼，及他默默堅持努力著大陳未能完成的事業。

二〇〇八年兩岸直航後往返兩地不需要再中轉香港，也方便了我來回兩地的家，隨著父母親逐漸年邁，自己也認識到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陪伴他們，我也逐漸減少自己下鄉田野調研的時間，開始在兩岸間往返。因此也和曾醫生夫婦有了更頻繁的接觸，每次回台灣我總是要到曾醫生的診所報到，其實看牙只是一個藉口，因為到這裡來，我總能感受到同志

間的溫暖情誼。正如趙剛所說的一樣，從進門開始就先坐著聊，到看牙時躺著聊，時間永遠是不夠的。因此曾太太總是給我約當天最後一個號，這樣看完牙後，我們就可以好好暢談，每次都是曾醫生及麗英請我去吃飯，聊天的內容真是天南海北。從我在北京的生活、大陸的政經趨勢到台灣的政治變化、台灣的社會性質、台灣史研究、兩岸關係、國際形勢以及個人的研究。由於我一年僅回來二、三次又來去匆匆，常常跟不上台灣的政治情勢，曾醫生總是用他特有的社會性質理論來分析台灣社會變遷，當然每次都是以歎息聲結束。因此到診所看病，對我也是開展重新認識台灣的視野，離開曾醫生的診所的時候，我總是滿載而歸，每次見面他總會塞給我他的新作，以及花蓮家鄉的木瓜等農產品，我感受到的，是精神與物質上的大豐收。

曾醫生表面看起來是個一絲不苟而嚴肅的人，他的話題始終圍繞在台灣的政治經濟學及台灣史研究方面，是有深厚家國情懷的傳統知識份子。多年的交往接觸深了，慢慢感受到他不善於表達但卻溫暖、深情及浪漫的部分。二〇一四年左右，他母親生病後，每隔三周都從台北回花蓮輪流照顧高齡的媽媽一禮拜，這樣前後長達二年之久。他侍母至孝，凡事都事必躬親，讓身為妻子的麗英總是擔心他自己的身體。從育動開始撰寫博士學位論文起，他就不斷的和我提及女兒

的研究，並再三囑咐我瞭解是否有合適的工作機會，他希望女兒畢業後能回到台灣或中國大陸任教的願望，讓我體會到一位父親對女兒的殷望與摯愛。曾醫生是典型在生活上極大程度依賴著妻子的台灣傳統男人，家中及診所的大小事都非常需要麗英這樣的賢內助來輔佐。因此當我從麗英口中獲悉當年曾醫生居然是靠著彈吉他、唱民歌讓她動心而追上她。

曾醫生聽了還得意洋洋的告訴我自己年輕時是文青，曾經在屏東農專校刊《南風》上發表過小說與詩文，我也開心的說起自己在輔大念書時曾擔任過外語學院院刊《西風》的主編，曾醫生告知當時林載爵在東海也編過《東風》校刊，我們就笑成一團說東西南風都有了就缺個北風就都齊了。這些難忘的回憶，近日總在腦海中盤旋。

此外，在曾醫生的診所，我還能碰到不少多年未聯絡的前輩與老友。例如周漢卿伯伯、周榮光大哥、革宙大嫂、李文吉的太太、杜繼平及王墨林。無疑的曾醫生的診所成為我回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宛如八〇年代的《人間雜誌》。

每次拿到曾醫生給我沉甸甸的作品時，我都很慚愧。作為一個科班出身的歷史學研究者，雖然在八〇年代開啟了對「台灣左翼歷史——台灣農民組合」的研究。因緣際會的去北大求學並轉入對大陸農村的研究，卻成為台灣史研究的逃兵。讓

曉波老師、曾醫生等同志孤獨的繼續奮鬥，特別是他們兩人都離開我們的時刻，我內心充滿對他們的愧疚。作為一個用右眼診療牙病，而用左眼數十年堅持研究台灣歷史研究的民間學者，他開啟的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台灣光復史研究，更屬重要。

曾醫生的所有研究都是自掏經費，並擠出診所看病及自己休息的時間，泡在圖書館裡辛辛苦苦收集大量的資料，不是為了申請研究課題經費，也不是為了升等的無病呻吟之作。而是出於使命感，正如曾醫生自己所言：面對「在一個充滿以虛構、扭曲歷史來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年代」，「一個有良識良知餘溫的知識份子不得已的時代課題」。

曾醫生非常準確的把握了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這段歷史，是台灣重回中國大陸懷抱的五年的重要時刻。他對台灣光復史開創性的貢獻是將這段歷史定位為「台灣現代史的黎明」，其中「去殖民化、祖國化、民主化」是這段歷史的主調更是台灣未來的時代主題。這五年的光復歷史他撰寫了五本著作，並留下了大量的資料。遺憾的是還欠缺一九四七及一九四八年這兩年的書稿沒有完成，這是他的遺憾，我們的遺憾，更是關心自己歷史的台灣人莫大遺憾。

曾醫師手稿選刊：

〈再次面臨「光復台灣歷史」的時刻〉

一再次面臨「光復台灣歷史的時刻」的十幾
 在李登輝與陳水扁當政的十年間，動用了
 國家機器與台獨黨派联手，進行了刨根掘底的
 去中國化工程，~~同時~~特別集中「台灣歷史觀的扭曲
 和顛倒」，其中，把「台灣光復顛倒為「終戰」」（特別使
 用日本右翼的史觀）並以「取消「光復節」」二
 人紀念日代之，是其重要手段。
 正如龔定庵（龔自珍）所云：
 「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枵，必先去
 其史；」
 網紀，必先去其史；「愛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二
 復
 我們的語言，亦即要歷史的光復和語言的光
 復。
 報《民報》、首先呼籲要奪回我們的歷史、奪回
 我們的語言、亦即要歷史的光復和語言的光
 復。
 沒想到，光復後七十年的今天，口口声声
 處心積慮湮滅台灣歷史，皇民化台灣。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最早出刊的白話文
 情懷，使台灣人永久做日本的奴隸，五十年間
 九十年間，消滅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和祖國
 記。就像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其
 今天，台灣的作態，正是在滅國、夷祖宗、毀脈

20X20=400

象球牌

中華民國
 有堅
 固的
 中國
 心

4

事	自	民	中	一	到	指	到
接	此	國	國	號	末	三	一
官	到	國	國	命	代	方	九
，	1944	民	國	令	總	面	四
日	年	政	所	後	智	： 支	五
僑	的	府	有	， 即	安	： 殖	年
日	兩	主	一	席	藤	民	台
僑	年	權	切	廣	利	化、	灣
的	中	之	人	播	吉	祖	光
身	， 先	下	民	宣	的	國	復
邊	是		政	示	的	化	的
，	進		事	： 。	受	和	歷
以	行		皆	陳	降	民	史
及	行		已	儀	典	主	意
應	政		置	仗	禮	化	義
的	和		於	收	，		，
日	革		中		叮		叮
資			華		概		概
日							
產							

知可

大

20x20=400 象球牌

構。二月選出村長和鄉鎮民代表，并組成	從1946年1月開始進行選，建立各級民意機	度的改革與中國大陸的	貝合，許壽裳設立省立編譯館， 推行教育	底的祖國化、民族化。譬如，設立國語推行委	化，且 在 語言、教育、文化界思想上也進行徹	但日本殖民政府，絕情政府和日資日產民族	去殖民的另一面便是「祖國化」民族化。不	殖民工作。	接收，完成了世界史上少見的複雜且徹底的去
--------------------	-----------------------	------------	------------------------	----------------------	-----------------------------------	---------------------	---------------------	-------	----------------------

6

立御鎮民代表會。三月選出縣參議員，成立「縣
 參議會」。五月選出省參議員，成立「省參議會」。
 除了建立各級民意機構之外，還選出參政
 員、制憲國大代表以及立委，參加南京的國民參
 政會和制憲國民代表大會。
 光復等於徹底的民族解放，也是社會力的
 解放。各種人民團體蓬勃發展，如台灣民衆協
 會、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婦女會、記者公會、
 台灣商會、台灣文化協會等等。報刊雜誌
 更是琳琅滿目，《公博新生報》、《民報》、《人民導報》

20X20=400 象球牌

具二、	究理社	合	五十年來	我輩	忘社	合所有
其	一、	究理	就是人	是自然	人口	從來處在華國
主	義	程	階下	我	不是人	不是自然
人	口	從來	處在	華國		
秋	的	三	大	究理		
上	、	發表	了	視詞	、	欣喜地
林	茂	生	在	1945	年	10月25日
余	刊	的	《	前鋒	》	雜誌
雜	誌	、	正	代表	了	民主
化	的	進	展			
不	是	民	主	化	的	進
民	主	化	的	進	展	
人	民	團	體	世	有	報
刊						
十	家	報	刊	報	誌	創
刊						
《	和	平	日	報	》	
單	單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上	半	年	就	在	六

9

然而，在本省人的「歡天喜地」，狂熱迎接祖
 國，是期望祖國未解除台灣民衆的痛苦，沒想
 到現實變化卻朝相反方向。由於政治、經濟資
 源的省籍分配不公，中高層官更趨乎由外省人
 狹占，再加上失業、米荒、物價高漲、貪污、治安惡化，
 使民衆更加痛苦。台灣中部開始流行「三望」，即
 從希望、失望到絕望。《政經觀察》社論指出：「
 如今本省到處不是搖頭就是謾罵，沒有比這個
 更可怕的事」。民權通訊社發的「民主的考驗」
 指出了民衆從狂熱、懷疑、警戒到憎惡的心裡

面內戰的局面。
 國的經濟、政治，甚至一切，由藉此而陷入全
 國，美國比當年日本更有力量，更周密地控制了中
 府半封建的官僚特種外，便是前述的中國慘勝
 國，這個人再次進入了^{陰暗和}動亂^的其原因，除了國民政
 是，從歡文喜地到呼天搶地。
 全國又同的^性，當時全國流行的一句話，那取
 大變化。台灣出現的問題並非^全獨特^的現象，而^是有

20×20=400 象球牌

曾醫師手稿選刊：
〈讓這樣的歷史精神站起來〉
楊逵因《和平宣言》投獄五十周年以及「四六事件」五十周年紀念會側記

如：蔣經國

NO. 1

讓這樣的历史站起來！

精神

楊逵因和平宣言投獄五十週年紀念會例記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 曾健昆

1999.4.15.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的凌晨，大批國府軍警團圍包了台大、師院（理師大）的學生宿舍，學生與軍警回進行了激烈的對抗，有二百多名學生被槍行拘捕帶走，~~世~~世祿四六事件。就在同一天，作家、社會運動家楊逵也因~~為~~發表了和平宣言被抓，自此陷獄十二年。另外，也在那一天，當時培養了自由開放的文藝園地的新生報橋副刊主編史習枚（歌雷）、~~作~~作者孫運人。以及中華日報記者董佩箏，也~~被~~被捕。還有，當時仍~~是~~建國中學校學生的張光直（理中）院院士、國際知名考古學家，另數名~~也~~成功中學學生也在那一天被帶走。這些都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是一場狂風暴雨的開端。

四六事件在白色恐怖時代中被湮失了四十多年。

數年前

於開始有人提起，~~也~~至台大、師大也組織了事件的調查小組，並且提出了厚厚的調查報告，五年的四月六日也舉行了座談會記者會，當天~~也~~報面也熱鬧了一番。從這樣的動向來看，似乎四大事件已得到了平反已到了天日，事實上並非如此。至今為止的調查報告或報章的報導，似乎都偏重於事件的經過，都只籠著事件的表象在轉，並沒有觸及事件的历史本質，卻把定局限於單一事件，孤立起來看，而缺乏時代背景的聯繫。因此，就容易把事件簡化成國民黨黨警鎮壓學生的校園事件，甚至更糟糕的是，有可能被~~向~~政府侵犯校園的印象~~被~~在像二二八事件被扭曲成外來政權鎮壓台灣人的圖像一樣子。
 可能愈講得

實際上，沒有看到楊逵、史習枚、張光直等人也在當天被孤明罪案，而新生報、橋副刊也在那之後被廢刊的事實，就看不到「四大事件」的本質。沒有注視到當時因英內戰的形勢下，沒有聯繫到當時全國各地興起的学生運動，反內戰要和平的運動，風起雲湧，沒有思考到從「沈崇事件」到「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知識分子激越的心情，就無法理解「四大事件」的成因。沒有進一步認識到「四大事件」許多成員，在隨後的白色恐怖中逃亡、入獄的命運，就無法体会到「四大事件」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這是一個歷史的因果。沒有聽過麥浪歌詠队的歌声，沒有思考過楊逵的和平宣言的時代意義，沒有讀過「橋副刊」的詩篇以及對台灣新文學的真誠的激辯，就無法體深刻体会到「四大事件」

四大事件的

十週年紀念會	反映了上述的現法	六日晚	及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由夏聯會、勞動人權協會、統一聯盟、人間出版社以	兩場紀念晚會	省府意識型態服務	及起促進時代進步的任務	變時	當一個歷史事件	件的历史精神
會	在耕莘文教院舉行的	在耕莘文教院舉行的	某團體籌辦	統一聯盟、人間出版社以			而且易受當權者利用	它就无法对当代人起啓示与教育的作用	無法被遺棄	我們知道
四月六日是四大事件五十週年紀念會	四月五日是楊逵因和平宣言投獄五	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	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	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			者	也無法	被顯不出本	它的

24行 x 25字

紀念會以文藝晚會的方式舉行，節目多彩多姿，有幻燈報告、口頭報告、詩朗誦、記錄片、戲劇演出、演唱、鋼琴演奏、合唱等各種文藝形式，將楊逵的精神以及四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完整地再現出來。通過某種感傷使紀念會，而是將複雜的历史以及可敬的精神，昇華到藝術的高度，用各種藝術形式，通過藝術感情，感動了與會者的心情，便與會者恍惚经历了一場心靈的洗礼。這是这次紀念會最別緻最成功之處。当然，也是主辦單位最辛苦之處。

二、楊逵因「和平宣言」投獄五十週年紀念會

四月五日的楊逵因「和平宣言」投獄五十週年紀念會

胡德天用他特有的低沉、有力的聲音

24行×25字 左

的紀念楊逵詩作，揭開了序幕。接著由王津平主持幻燈
 報告，和平民主的鮮花終將盛開，他搜集了許多楊逵
 生平的照片，準備了精要的討稿，通過幻燈影像與口頭報
 告，介紹了楊逵的生平和精神。然後陳映夏報告了「楊逵
 和平宣言」的時代與思想，並簡要的說明了蕭其和平宣
 言促使楊逵發表那篇和平宣言的大時代背景，以及和平宣言
 的思想精神。歷史意義和在今日的兩岸局勢下的现实意义
 所在，呂正惠教授報告了「作為文學家的楊
 逵」，準確、扼要地吳出了楊逵一生堅決站在弱者無產大
 家的立場，在艱苦的環境中仍保持著樂觀、進取的無
 異精神。王曉波教授也報告了「作為社會運動家的楊逵」
 在口頭報告之間，由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的學生所組成

的野百合劇團，演出了改編自楊逵的作品《鵝媽媽出嫁》
 的話劇，年青學生雖是初登舞台，難免有莫怯場，但基本
 上，已表達了楊逵作品的精神；楊逵的作品，總是在平常
 百姓的勞動生活的描寫中，刻畫出社會的不平、矛盾，討
 嘲無情的壓迫者提出控訴。
 最後，紀念會在胡適夫和陳主更演唱楊逵作品~~和考~~
 及次作~~曲~~——《愚公移山》的歌聲中結束。
 使這次的紀念晚會更具意義的是：楊逵的次公子楊建先
 生，以及孫女楊翠女士（帶著她的小女兒一同來）都蒞臨晚
 會。而且楊建先生還特別帶來了楊逵先生生前珍藏的一張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台大慶演劇團到台中演唱~~時~~，與台
 中文化人士交流~~後~~共同簽名的一張麥浪的大海報。因為這
 份留念

我們演奏了一首李歐·傑那克的鋼琴曲——一九〇五年十
 月：凶兆、死亡。在柔和、甜美的寧靜中，凶兆逐步逐步
 逼近的恐怖心情，依依難捨的柔、甜美的旋律與啾啾進臨
 的恐怖凶兆的交響中，曲子嘎然而止。
 更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這次紀念會再理了當年的麥浪
 歌詠隊。在藍博洲簡這地介紹麥浪歌詠隊後，當年麥浪的
 成員，在全場的鼓掌，張以准先生。

演奏表現了

黎教授接受了台下的獻花後，把花輕
 輕地放回琴上，她說她把花獻給所有的受難者。

攝錄了

五重奏前唱

上台致辭接受敬意的花朵，並手拿昨晚楊建先生送來的當
 年麥浪與台中文化界共同簽名留念的淺黃的海報，此刻楊
 達與麥浪、四大、林副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又共同獲

地讓這種歷史精神站起來，站在像榮星合唱團或漢江野百合劇團的年青人的心靈中，才是紀念會最後的最大課題。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也

後記：

四月六日的下午二時開始，在馬場町堤外的

新店溪邊，舉行了紀念會。年代，白色恐怖

性著的春祭。實際上，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的大

逮捕，就是往後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冊中

是同一個歷史本質。播副刊、麥浪、楊遠、四大以

及往後的成千上萬的「白色恐怖犧牲者」，逃亡者，在

人物上有很大的重疊性，都表現了共同的時代精神

。這三場紀念會的連續舉行，正突顯了這樣的親身

曾醫師手稿選刊：

〈中國人民文學的脊梁〉

中國人民文學的奔標

2010年年末

1929年正是中國新文學經過風風火火的十年之後，中國

文壇出現了鮮明的魯迅在內的許多有成就的作家。當年

4月，有一位瑞典的考古學家到上海了解利魯迅的文学成

就後，請劉半農南，準備推薦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

人。劉半農玩魯迅，特在魯迅寫信徵詢魯迅的意願，魯迅

拒絕了。魯迅給台靜農的回信如此表示：魯迅給台靜農的回信表示。

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

願意如此。

諾貝爾獎金，以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

，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

魯迅回信更強調了中國人的正直奔標，他說：

美加美

(24 x 25)

或者就所便宜的，是就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了《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學位是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倘因為黃色臉孔人，格外优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其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特很壞。

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邊筆，对不起人之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筆可覆了，還是略遜的沒有名譽而窮之好罷。

1920年代中期，瑞典也嘗有幾位名魯迅，但魯迅還是

絕了。

鲁迅的这种精神，更生动地表现在靳以在1946年写的一
篇《给晏珍珠女士》文中。

该文针对晏珍珠女士给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先生的一封信公

开信而写的；该封信主要讲给中国作家要如何写作才能迎

合美国读者的口味，靳以~~也~~打付中国人~~的~~热情的鼓励批驳

了晏珍珠的意见，他说：
~~这是论~~（现实苦難）

你们记得的是我们贫乏的物质生活，可是你没有看到

一直在煎熬中的我们的受苦的靈魂，如果在我们的作品中

有嘆息，呻吟，有眼淚，那不只是作者的，那也是人民的

。我们生長在他们中间，只是努力來反映現實。我们不是

要來娛樂讀者的，我们更想不到什麼大價錢。我们並不是

為讀者的興趣寫作，我們自己先忍受著煎熬，到了不能不

（作家）

（现实苦難）

傾述的時候，我們笑了出來。
 靳以以林語堂為例，表示「我們沒有一個人想走他的路」。
 「我們的苦果一直是和我們的人互相通的。在這一點上林
 語堂和我們不同。他住在英國，回來的時候，也像英
 國的作家到中國來觀光一樣，帶英七零八碎，又回到外國
 去賣一大價錢。我們文藝工作者，沒有一個人羨慕他，
 也沒有一個人想走他的路。……所以我們絕不關心他的
 臉皮有多厚，他怎樣順從你們的編輯，贏得他個人的成功。
 該文表達了在困苦中，用自己的力量，解除自己的苦痛的
 的自主進取的態度：他
 可是我們忍得住，並不要因為困苦，就愁臉苦眉地乞
 求你們的憐憫，我們自己是不甘心這樣下去的。屬於人只

美加美

(24×25)

的這一群，正在用自己的力量，解除自己的苦痛，只有我們自己是可以信賴的，我們相信有一天，我們今踏進快樂裏，那時候我們也含笑，使你們知道我們並不是不喜歡笑的人兒。

最後他堂堂正正地告訴寰珍珠，到我們的國度裏虛心學習。

現在，我們就是這樣子，如果你們真心恐了解我們，不是用好奇的有趣的眼光來望我們，就在我們的作品中，到我們的國度裏虛心學習。我們保留我們的真實，不要曲意地合乎你們的快樂的現實，因為如果那樣，不但對我們的人兒不忠實，對你們也是不忠實的。

No. 6

這篇文章較載在「台灣」和平日報、新文學副刊也轉載了這篇文章（1946年8月2日）受到這篇文章所感動，寫了一篇〈寶珍珠的中國觀〉，當時的台灣省籍作家林英順，發表在《台灣文化》一卷一期刊上（1946年9月15日），他在文末痛陳：

最近的寶珍珠女士是要求中國人同她們美國人一樣地笑。這一臭我們該感謝她。可是我們是不能笑的呀！假如我們能夠忍住身上一切的痛苦，跟了他們笑起來，我們是何等無恥而不血性的東西呢？

我們希望寶珍珠女士別要以美國的富貴、自由、快樂的眼光來看錯中國的貧困、束縛、悲慘！別要以悠閒的姿容，來對待我們悲痛的苦臉！須要以文學家的辛度，更深

▲美加美

(24 × 25)

曾醫師手稿選刊：

〈方向叢刊創刊號封面草稿與成稿〉

給曾醫師與夫人

胡清雅

幾年前，曾有一段跟著曾醫師的讀書會唸書，唸劉進慶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人間的《政治經濟系列叢書》，應該還有其他，只是我忘了書名。回想起來，那些讀書場景仍然歷歷：小地方二樓，秋水堂地下室，還有週末的板橋國小。記憶裡，少了學生的課室靜得像是電影場景，我們借用的課桌椅稍小，書桌的木頭邊上刻著孩子歪斜的筆痕。我們讀書討論到不知時間，直到鐘聲劃過冬日的校園。

曾醫師手上的書，永遠比我的書更密密麻麻寫滿筆記，重複著千百次校對，層層浮貼著核實資料。每回讀到一個段落，曾醫師便會翻著那些資料，向我們一項項地「勘誤」，原來他所更新的資料，早已超越書的再版。還有陳映真。我第一次讀到曾醫師的文字，就是《反對

言偽而辯》裡頭曾醫師、杜繼平與陳映真藉著批評陳芳明的台灣再殖民論，提出經年研究的「社會性質論」。曾醫師是少數不急著佔有陳映真的陳映真研究者，願意用陳映真所樂意的科學，去繼承陳映真未竟之志。

但讓我永遠記得曾醫師與夫人的原因，遠不是書或知識，而是他們待我的溫暖。我想起兩件事。第一件事，某日在板橋國小的走廊上，讀書會結束了，閒聊之際，曾醫師跟我說他在社群媒體上，讀到我發表了某篇短文，他說很喜歡。那是一篇我回憶起自己高中生活的極短文，描述蒼白的青春狀態，而當時作為我的精神依託、情感出口的，是一個更為蒼白頹廢的英國搖樂團，兩地兩情錯接得可笑。乍聽之際我感覺羞赧，畢竟那文描述的是由自於匱乏與封閉，而展示出的一種蒼鬱的、無信仰的

青春面容。那時的我以為，我的回顧不過是「中產階級小知識份子」的自溺，太個人、毫無大意，此類個人感懷大概是左翼範本中第一項該革除的。但曾醫師跟我說：「清雅，要寫下去唷，好的文藝要從自己出發。」

第二件事，是我懷了孩子之後，為了經濟，與過往的人際逐步脫節，雖然我已落出讀出會，但師母常常打電話給我，跟我耳提面命懷孕與產後的各種大小事。這些家常話，在當時都成為我強大而穩定的支持，讓我在面對一個真正未知的未來時，不至於惶惶。我於是慢慢領會到，知識份子終究回歸到最基本、卻也是最高層次的待人接物，一旦如此，影響力之大。

我常想，我很喜歡跟著曾醫師讀書，也真心地喜歡這個前輩，很大原因在於他讓我感受到一種學習知識的「自由」。意思是，他讀書撰文寫作的背後，都有著一股很單純、真切的動力：那是他樂於如此的，也是他所相信的，他願意為此而努力不懈。在他的文章裡，我讀不到犬儒、諷刺、酸或鬱，沒有黨同伐異的取暖、沒有為罵而罵的矯情，也沒有用清高來討拍的做作。他的文章，批判是批判，考證扎實；立說是立說，邏輯縝密，種種一如曾醫師的為人：對於後輩，我鮮少看到曾醫師用派別定義個人，或以文廢人、以人廢言，這在台灣如此格

局裡頭，好難得。

近期看了聖嚴法師的紀錄片，聖嚴法師留日攻讀博士期間，他的師父東初老人給他一句話：「要作一個宗教家，而非宗教學者」，意思是精通天文地理，終歸真修實證。但對於吃學問飯的「學者」而言，「真修實證」該是什麼呢？學術、理論、知識、學問，終究是要服務於一個更大的、大於自己的理念吧，那個理念，對每一個人來說，能是什麼呢？是黨、是政治、是組織、是建立理想國、是改造人類成為新人？只是，在成為一個新人之前，我們作好一個人了嗎？我們所唸所學所經歷的，足夠我們直面人間了嗎？或者，足以讓我們「作一個好人」了嗎？於我而言，曾醫師是一個「好人」的範本。

那天，我在前往工作途中收到育勤來訊，得知曾醫師走了，之後好幾個朋友在短時間內陸續捎來同樣的信息。我記得當時的窗外是向北的公路，烈日強艷，山遠，雲友愛地落在更遠的天邊。看著看著，原本難受的心境，逐漸被感恩與珍惜所取代：傳來訊息的每一位朋友，都是緣分的體現，我因此有機會對曾醫師表達最純粹的感謝與思念，也讓我更清晰地回想起那一段單純讀書的好時光。因感念之故，願所有以理想為繫的好緣分，都能成為緣分的延續，不以道別為道別。（九月十四日）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追思曾醫師

黃雅慧

自友人那邊得知曾醫師離世的訊息後，除了震驚，

感覺仍很不真實。翻開過往參與曾醫師關於戰後政治經濟的讀書會筆記，從記錄下的每句話彷彿還可以感覺到曾醫師以一種不急不徐、溫文且堅定的敘述語調在耳邊迴盪。

二〇一三年十分幸運地能參與到曾醫師的讀書會，曾醫師不光帶領我進入台灣戰後政治經濟史，更傳遞了一種看問題、看世界的方法。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曾醫師曾在讀書會剖析台語歌。他說，現在許多台語歌的台灣悲情其實是從這些以農民為主體分解的底層而來，因為戰後台灣在體制上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加上有封建的遺制導致分解不完全，這些零細農無法被完全分解至工業體制中，因此不

上下的艱苦狀態成了當時很多台灣人的寫照。

台灣的文化評論多處於意識形態上的論爭，少有進入到歷史的、政治經濟的分析視野，因此多是飄忽不定，這其實也是緣於台灣文化評論與研究找不到一種世界觀與歷史認識論。曾醫師的視野給正在進行文化研究的我醍醐灌頂，也學習以踏實、科學地去看各種文化事件。

另一個記憶是，猶記讀書會時期正好遇到反服貿太陽花運動，面對外部世界的紛擾吵雜，聚集在秋水堂地下室讀書的我們只能持續讀書增進自己知識，曾醫師雖然對於當時抗爭狀態有所批判，但仍是溫柔且堅定地與我們分享他當時的一篇舊文《把顛倒的史實轉回來》，提醒我們要注意歷史問題。

比如他當時便是擔心這場運動的民粹化傾向，因其

排除歷史的政治與複雜性，把社會歷史具體的階級關係、人與人的權利關係、社會平等與公義問題都空心化，再填充台獨意識形態並普遍化。曾醫師這樣的批判對於當前民進黨統治的台灣處境仍然適用。

儘管每次討論到台灣時總是不免慨歎，但曾醫師從未放棄過樂觀且積極的那一面。今（二〇二〇）年初，在大墨邀約的一場餐敘上，已經退休的他準備在花蓮專心整理自己的著作，他說，對於台灣狀況，他跟陳映真三十年前一直在談的事情一一應驗，雖然很多人可能覺得悲觀，但他認為民眾有一天會看明白民進黨的所做作為，而民進黨目前也處於招數用盡，必須思考自身下一步的時刻。

他也說，現在台灣問題就是資產階級定位的問題。台灣的資產階級下一步要怎麼走，而現在資產階級的性質又是什麼，這是應該重新思考跟分析的。

曾醫師一步一步紮實穩健地提出問題，然後再投入鑽研。我常常很期待每次跟曾醫師會面，能聽他對於問題的精闢解答，只是這一回，曾醫師遺留了問題，而這個答案得靠我們自己摸索。

曾醫師的逝去令人感到不捨，人生導師又殞落了一位。但也因為曾醫師先前的累積與功課，他帶來的方法、

視野，讓後輩如我能有一個基石持續發展，而接下來對問題的追索，只能靠我們自己。

當為台灣社會的吵雜而感到紛擾不堪時，甚至對於前景失了思考方向時，曾醫師那光明且穩定的敘述聲調或許提醒了我，時局再亂，仍不能忘記把握住問題的性質，並持續深究之！

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 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

作者：曾健民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二〇〇五年八月

八一五後一百多天的歷史主調，就是台灣民眾高昂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這期間，從政治、經濟到歷史、文化，全面的進行了「去殖民化」和「祖國化」。這是八一五後一百多天歷史的重要內涵，也是其未完全達成的時代任務。

反對偽言的戰士・診療台灣的醫師

張立本

八月十六日，晨，山線顛簸欲睡。礁溪後，忽然平緩且開闊起來，卻再也睡不著了。再過蘇澳，途經幾片太魯閣沖積下來的小河口，才感覺後山——所謂最後的淨土——近了。

我曾不解，捲在風暴中心近三十年，曾醫師如何選擇晚年返回故里花蓮？近月沉澱下來，才想，許是醫學、政治經濟分析等的理性印象下，那真正屬於曾醫師的、文學的鄉土的、生活的、感性的內核，在召喚著吧？

約二十年前讀到《人間》三四期上的〈軍國日本與經濟日本〉，是最早的記憶，當時恐怕沒想過作者是一位牙醫。二〇一七年底，也是為著曾醫師在台灣政治經濟方面的思考與實踐，請求曾醫師擔任博士論文口試委員，輕忽了他在別處的營為。直到自己開始教台灣文學、思

潮、台灣史，才深感曾醫師給我們整理、出版了許多常為人遺忘的寶藏。然而一位出生於一九五〇年，刻苦尋路、自學的農村青年，他的長成蛻變怎能被我們忽視？

也是從訪談錄才知道，曾醫師去了日本才第一次讀到左派書籍的原典。思想成熟於台獨崛起的一九八〇年代，可不但沒走向反民族，他還成為了島內左派統一派的一份子。更深瞭解曾醫師的生命，似乎令人寬慰，但也絕不能說沒有使我對於自己、此刻、未來而感到徬徨。自發成為堅定的左派，是體現內戰歷史造成的路途崎嶇；而做為牙醫卻精通社會科學、文學、歷史，豈僅是證實曾醫師們如何在物質需要外飽滿自己的精神領域，成為完人？難道不是突出了島內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等專業，之墮落與不認真？曾醫師，您返鄉之路是否依然帶

有此種現實所孕的寂寞？

那天，我盡想著這些。當我坐在略顯凌亂的，但絕不是看不出條理的書房，數著分門別類的紙箱，彷彿也看見您就坐在材料的堆堆裡，從一筆、一筆反覆校對、標注文獻出處的工作抬起頭來，咧著嘴笑。博士結束後，理應好好談談的許多事都因急於找到工作而擱置，甚至於遺忘了。懈怠吧！看著告別式魚貫而入的老鄉、親戚、同學們，我彷彿懂了閃回的一幕。曾醫師回到東台灣的狹長地帶，應是想回到最原初的、純粹的、生活感飽實的孕育之地，專注地筆耕反偽言、解剖我島病灶罷！我這麼臆測著，於是這樣地始料未及就更令人無法釋然。

曾醫師，安息吧！

陳逸松回憶錄

（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

作者：曾健民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十年漂泊浪淘沙 小畜異鄉成我家

待月停琴翻子史 中原再望塞翁馬

《陳逸松回憶錄：放膽兩岸波濤路》

不只是關於陳逸松先生的個人生命史，
更是一本關於台灣戰後歷程的時代史；
突破了兩岸分隔的歷史界限，打開了新
的歷史空間和想像。

悼曾健民醫師

尹憶革

某年春假，我趁著復活節假期回到香港。臨離開香港之前的某個夜晚，我在九龍塘一家現已結業的書店的一個窄巷裡面，找到了一本作者著名曾健民的書。

當時的我還未正式開始學習台灣史和民國史，讀過的與台灣和與民國相關的書籍寥寥可數，而且大多數都是龍應台的著作，唯一一本例外，是李敖寫的《大江大海騙了你》。

龍應台是我在政治方面其中一位啟蒙老師。在我最開始踏足政治領域那幾年裡面，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受龍應台的影響，會用她的那種自由派觀點去分析政治議題，特別是在評論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時候。一年之前，我才剛擺脫龍粉的身份，以及擺脫了在成為龍粉之前早已擁有的台灣粉和民國粉身份。我不是不再去認識台灣和民國。

相反，在此之後我閱讀了更多與台灣和與民國有關的史料書籍，從前沒有看到的，後來都看了許多。我只是無法再像以前一樣對龍應台們所塑造出來的那個民國神話產生認同。

《大江大海騙了你》出版之時，我已經沒怎麼看龍應台的作品，但李敖這本書還是對我起到了一點作用的。他將龍應台們美化蔣國府統治的一片苦心掃進了垃圾堆，但卻未能對龍所鼓吹的冷戰史觀進行全面和系統的批判。當年回應龍應台的不只李敖，還有曾健民醫師。我第一次知道曾健民這個名字，是因為〈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新魔咒——評龍應台的一九四九〉這篇文章。

那本作者署名曾健民的書，名為《一九四九：國共內戰與台灣：台灣戰後體制的起源》。多年以後，我時常會試

著回想自己的思想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出現轉變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思想的轉變一般是不會找到一個絕對的和明確的時間點的，意識的轉變通常都是累積經歷轉化而成，但我知道自己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正值人生其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如果說在讀過的書裡面，有哪幾本書對我的人生造成過重大影響，我想，曾醫師這本著作必定就是其中一本。

是曾醫師讓我學會從中國看台灣。

那一年回到了英國之後，我還是會時常在網絡上看到曾醫師的名字。當時的台灣立報有幾個水平相當高的專欄，包括由曾醫師主筆的左右看和瞭望台。曾醫師在這兩個專欄裡面寫過很多不同的政治議題，包括台灣選舉、台灣社會、台獨批判、東亞政局，以及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國際時事。那時候每天上立報讀新聞是我生活中的其中一個習慣，很可惜，後來立報慢慢的就減慢更新了，直到後來我幾乎徹底遺忘了這個網站。左右看和瞭望台後來也就慢慢成為了歷史。

人的記憶有時候非常的不牢靠，但有時候又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些細碎的記憶片段特別會讓人感到印象深刻，即使那件事發生在很多多年前，即使那是一件細微不過的日常碎事，但你還是會記得在某一個地方做過某一件事。

在我回到英國的一年之後，有一個晚上，我在來往倫敦和劍橋的長途公車上面摸黑讀著《台灣意識形態批判》。

如果說在《一九四九：國共內戰與台灣：台灣戰後體制的起源》裡面，曾醫師讓我學會了從中國看台灣，看中國的歷史事件怎樣影響著台灣的歷史進程，那麼在《台灣意識形態批判》裡面，則讓人看到了「台灣意識」的前世今生，教人看到台灣意識和分離主義是怎樣在台灣發酵，以及它們的基礎又是什麼。在今天看來，說台灣意識孕育自獨台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理論，當然，還是會有些人對此加以否認。然而，曾醫師就在他的著作裡面，深入剖析藍綠兩大陣營都有著一個相同的意識形態，便是反中共親美日，相對之下只不過民進黨多了一樣反蔣反國民黨罷了。

香港回歸十五年的時候，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曾醫師主編的書籍，名叫《東亞後殖民與批判》，裡面收錄了在香港回歸之前，陳映真先生和曾醫師的一篇文章《從台灣看香港歷史》的對談。這篇對談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來說都非常有價值，香港基本上沒什麼人會做這種社科科普，更不要說是在批判帝國主義進行殖民侵略的框架底下對兩地社會進行比較。雖然時局變得太快，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是會推薦這篇對談給身邊的一些朋友，因為裡面的很多分析至今仍然適用，包括，香港和台灣都

是內戰冷戰期間帝國主義陣營圍堵中國的前線基地，港台有著一種共通性，當然，今天也許會有些人稱之為命運共同體，但這篇對談就是透過梳理歷史脈絡一點點的去剖析香港和台灣何以會成為今天這樣，跳出了從香港看香港以及從台灣看台灣的框架，陳映真和曾健民是從中國、東亞，以及冷戰格局的大框架裡面看港台的發展。

最近一次讀曾醫師的書，是在幾個月前讀《東亞的憂患：日本的歷史翻案和右傾化批判集》。這本書和上面提到的《東亞後殖民與批判》一樣，都是「方向叢刊」收錄的書目。曾醫師這本書側重東亞地區的政經歷史問題，作為曾經在日本居住多年的人，曾醫師無論對日本社會或日本政經都有非常深的認識。曾醫師用了相當多的章節講述八十年代日本開始急速右傾化一事，包括當時的日本右翼為侵略歷史翻案，而這件事非但會影響日本民眾對這場侵略戰爭的認識，同時也會對東亞地區遭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帶來影響。曾醫師曾在他的其他著作裡曾寫下過一句話：歷史的問題時常也是現實的問題。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將

會對整個地緣政治產生變化，將置東亞地區人民於戰爭危險之中。這本書裡面有部份的文章是曾醫師當年刊登在左右看和瞭望台的文稿。

有時候我會很無聊的想起，我在還不知道陳映真、林書揚、陳明忠等老前輩之前，就已經知道了曾健民醫師這個人。我和曾醫師素未謀面，雖然偶爾會在社交媒體上收到曾醫師發來的讚好，但我卻從未鼓起勇氣跟他說過一句話，未來得及說一句謝謝。

陳映真和曾健民都對我造成過非常深遠的影響。如果說陳映真先生對我的影響是激盪易見的，那麼曾醫師對我的影響則是潛默的，我一直慢慢的從他的文字裡吸收許多有用的知識和分析方法。

八月初，人間出版社歇業。他們都走了。

怎樣改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就讓後來的人繼續硬硬地去戰鬥罷！（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一九四五光復新聲：臺灣光復詩文集

曾健民主編 印刻出版

本書收錄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之日，各個媒體發表文字與宣傳口號。分有光復文學與光復言論二輯，輯一有新文學作品、光復詩詞、歌謠與標語；輯二為報刊中對光復的申論與祝賀，如光復的意義、光復後的新使命、光復慶典的記錄、光復後教育語言與婦女運動、原住民關懷等。忠實呈現其時與論與各方賢達的國家、社會意識。

懷念曾健民醫師

李 勇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〇日，我從新竹坐大巴車到台北，在敦化南路二段一家位於二樓的咖啡館，見到了曾醫師。

曾醫師穿著白襯衫，從悶熱的台北午後的陽光裡走進咖啡館，便緊緊握住了我的手。他那天並沒有遲到，而是跑出去接我了。他說咖啡館不好找，怕我走錯路。其實，在此之前，他在郵件裡已詳細地告知了路線——如何從新竹交大站坐車到台北，在台北哪一站換乘，到哪一站下，然後走哪條路，到哪個路口轉彎，再走多少米，就到了。

收到郵件之前，我是去世新大學旁聽一個保釣會議，才第一次見到曾醫師。那次同行的還有賀照田和臧清老師夫婦。賀老師一家那時和我都在交大，他講學，我訪學，住一棟樓。我當時到台灣，是為搜集陳映真研究資料，包括訪談和陳映真有關的人。見到賀老師，便說起曾醫師。

他說，過兩天他去參加一個保釣的活動，名單上有曾醫師的名字，他可幫忙介紹。

那次會上，我們都是聽眾，曾醫師是主講人之一。他戴著眼鏡，一邊講，一邊依稀記得手裡拿著一些資料卡片。也是那個會上，還見到了《薈報》的陳福裕先生，以及北京清華大學臨時去「客串」演講的一位對保釣極有研究的學者（名字記不住了）。後面二位，口才實在太好，相形之下，曾醫師便甚是樸素、內斂、低調了。不過，他並不拘謹，只是詳細、嚴謹。那是個很困倦的下午，他講完時天已不早，便匆匆互留了電話和郵件，約好下次見面。

見面，是為了聊陳映真。台灣的朋友們告訴我，聊陳映真，不能不找曾醫師。「曾醫師」是兩岸師友對曾先生共同的稱謂。做牙醫的他，曾留學日本，醫生是其本業。但

他卻從本業走進了社會研究的副業，並在這個副業裡，投入半生。而這個副業裡，集結了不少人（其實也不多），他們批判台灣（不止台灣）社會，研究台灣（不止台灣）社會——為了改變這個社會。

我是首先瞭解了這群人中的一個——陳映真。然後才開始瞭解到他身邊的這群人：呂正惠、藍博洲、施善繼、關曉榮、鐘喬、范振國、陳光興、趙剛，還有更年輕的彭明偉、張立本、黃琪樁，等等。人心幽微莫測，並不好懂，但當一種理想召喚起一群人的熱情，那麼在這群人中間，必定是有一個心心相映的通道的。在我和這群人接觸的過程中，我覺得，陳映真似乎就是這樣一個「通道」——而曾醫師則是讓我更清晰地看到這個「通道」的人。

在見面之前，我讀過曾醫師的一些文章，談政治、時事，談保釣、鄉土文學運動、香港……那種政治經濟學的素養，理性的文風，確實和陳映真是有很多相像的。他們還曾一起辦讀書會，一起在敦化路誠品書店辦香港回歸的公益講座，一起跑到琉球、韓國辦主題展覽……那段時間，他們還未初老，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並肩作戰。直到二〇〇六年，陳映真在北京病倒。

那天，我們便談到了陳映真病後的情形。曾醫師說，其實在陳映真第一次中風後，他們幾個人去過北京看望，

那時陳先生恢復的已經很不錯，能行動，但是不能說話。接著，他便談到了那個細節：「我們吃飯結束的時候，他專門握住了我的手，使勁地、用力地握了好下——你知道，他的手很大。他說不出話，但那種握手，很明確地是在告訴我：「我們還沒有成功，要繼續努力！」」

曾醫師忘不了那個細節，而我至今也忘不了他描述那個細節時的神情。他停頓住了說話，戴著近視鏡的眼睛望著我背後的不知名的遠處……那個小小的、擁擠的咖啡廳，咖啡廳外不知何時下起的一場暴雨，窗玻璃外無聲的蜿蜒而下的水流……一切仿佛都陷入了突然的寂靜。

那天，我們聊了整整一下午。看窗外的台北城由明媚到黯淡，一場大雨倏忽而至又倏忽而去。一個下午的時光，許多往事重現——他和他的相識，他們一起打過的仗，共過的事，一起去吃過的「大師兄麵館」……不過，時至今日留在記憶裡不滅的，還是那個突然間萬籟俱寂的時刻。

再過了些日子，大約是訪學結束要回大陸前的某一天，藍波邀我參加台灣左翼的一個聚會，聚會結束時，在下樓的樓梯口，差點和人撞個滿懷。抬頭一看，正是曾醫師。戴著眼鏡，白襯衫紮在褲腰裡，認真而有些靦腆的笑。

那次，應該是說過要再見的。然而，再次傳來的消息，卻是永別……

細細想來，我和曾醫師雖有長談，但總共也就見過三次。然而，他的那種謙遜、低調、樸素、內斂的個性，卻是我從心底裡喜歡的。他生在小康之家，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讓人羨慕的職業，也有美滿的家庭——他完全可以選擇過一種優裕閒適的生活。然而，他卻從很早便因緣際會地讀了那些書，認識了那些人，懷抱了那種樸素的讓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的願望，從而並不輕鬆地度過了大半生。

這樣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本就不多吧？

這樣的人，在這個世界上，還會有嗎？

……

謹以我最誠摯的敬意和懷念，向曾醫師的遽然離世表示最深切哀悼！

也請敬愛的曾醫師的家人節哀順變！

李勇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深夜於鄭州，十六日改定

東亞的憂患

日本的歷史翻案和右傾化批判集

作者：曾健民

出版：曾健民

出版日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從一八七四年的牡丹社事件侵略台灣開始，一百五十年間，日本逐步走上了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道路，造成了中國和亞洲人民巨大的禍害，歷史的殷鑑不遠；今天，日本又不斷走回老路，中國和亞洲人民寧可不警惕。本書收錄的這些三十年來的篇章，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從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歷史到走上今天軍事化國家的真相，希望對關心日本動向的讀者有一點助益。

致學長曾健民醫師

「學長」是我靠近您的理由，不是社會科學，不是台灣史，也不是文學。在這個大陸邊緣的島嶼上，一群邊緣的老少友朋當中，我有幸與您同樣畢業於那處邊緣的高中。遺憾的是，我這習慣於邊緣生活的學弟，直到您晚近的幾年才與您有較多的互動。誠如您夫人說過：「才認識而已，即將要別離……」

然而，聽聞您的名聲卻是較早的事情；我相信，別人也是如此。凡研讀台灣史、台灣社會史和台灣文學，必然會接觸到您的著作。大家都知道恩格斯與馬克斯相知相持的關係，我不確定您與陳映真先生是不是這樣的關係？或者，您喜不喜歡後人這樣比喻您和陳先生的志趣與感情？但凡我讀陳先生關於台灣種種的論集時，總能見到您同向而行的科普篇章，為我解惑釋疑。因此，您既是我的學長，

也是我的老師。

其實，我出身中文系，搞的是教育，關心的是中國文化如何在我的視聽範疇裡落實和傳揚。但在台灣這中國缺位的特殊時空裡，所見所聞竟成為我的痛苦緣由。而您同魯迅那樣，醫病醫人心的文章，適時幫助我了解中國的缺位，其實是台灣自身缺位的必然。然而，有那麼一回，深刻的一回，您指點我的文章太含蓄曲折，沒給人以解剖般的快感。我竟已忘卻是哪篇文章，卻難忘您當時以學長的身分，殷勤認真評論我文章的空谷之音。

何其幸運，我是您提携後進的受者；願我也效法您，或有提携後進的可能。不顧流俗，抗顏為師，古人做過這樣的示範，您也這樣示範過。然而您基於過人的科學素養，撥亂反正時竟毫無脾氣與激情，這點叫我如何學得來？正

王睿

因為我難以控制情緒，才在行文中那樣貌似含蓄曲折吧？克制是給容易失控的人使用，而您竟已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謙謙師範！

典型在夙昔。海峽風高浪急，不改您宿志，毅然抖一抖豪華的都會聲光，就讓自己落進闐靜的世外桃源，懷抱的卻是對眾生指點迷津的入世悲願，問當今誰有這般覺悟？學長的精神，花中的光榮，立足在海峽兩岸與人類解放的前進道路上，與真理同行。

向您致敬，我的學長！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新二二八史像

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

主 編：曾健民

出版社：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二〇〇三年四月

回望二二八事件，從全中國關心台灣的知識人與新聞媒體視角展開的史料集！

一九四九·國共內戰與台灣 台灣戰後體制的起源

作 者：曾健民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本書主要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綜述了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的歷史過程。

本書的另一半篇幅則著重在釐清一九四九年中，作為國共內戰重要部分的台灣省，如何從達官貴人以及撤退物資的「救生艇」，逐步成為國府的「反共復興基地」。

本書並配以一百多幅歷史照片，作為影像的歷史見證。

麥子不死

陳良哲

頭一回見到曾醫師應該是在新竹交大的陳映真研討會。才剛開始重新認識陳映真的我，和曾醫師並不相識。會議結束後我在前往搭車的路上，看到他和兩個方才在會議裡頭發言的青年人（邱士杰、張鈞凱）在大學路路口賣著米粉的店家裡，相當熱情地繼續著討論。這個景象一直停留在我的記憶裡。

二〇一二年受邀加入《立報》筆陣，輪著撰寫「左右看」專欄，我注意到署名曾健民的「瞭望臺」專欄，總是在極其有限的字數裡，深入淺出的「科普」國際局勢與議論時政。藉著同是《立報》作者的身份，在一次活動中與曾醫師相識交談。後來聽曾醫師說才知道，他也數度化名「官士生」（左看）和「曾成」（右看），輪流寫著「左右看」。

二〇一三年春天和師友拜訪曾醫師，以回應曾醫師在李文吉大哥告別式上對我們兩人的熱情邀約。談話中意外促成一個小小的讀書會，曾醫師意志高昂地要陪著我們唸書。本

意是從七十年代重新認識台灣社會，《清理與批判》與鄉土文學論戰是最開始的起點，但隨即便轉為政治經濟學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與《台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最終在二〇一五年秋天結束於《新自由主義簡史》。

因著讀書會，我和曾醫師有了比較多的互動。有時是曾醫師遇上了技術問題，需要找人幫忙掃描文件翻拍照片，或是排除電腦障礙。有時是曾醫師和師母從東部帶回的農作物，或是師母自製的咖哩，要我帶回家分給妻小。有時是曾醫師打來問候近況，關心我日常生活。

他也關注著「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的動態，時常對我讚賞陳真寫的新的文章，又說起巴勒斯坦與中東的最新動態，對於巴勒網每月的站樁行動總是表達他的關心與敬意。他曾與巴勒網的朋友一同在路上掛著標語靜站，也曾並肩與勞動黨的同志在「二」前反對美國霸權。

理應是晚輩關心問候長輩，我卻讓長輩打電話來關切自己，其實有些失禮有點難為情，但我也很喜歡接到曾醫師打來的電話，那是父兄親切的關懷與問候。並且，因著彼此關心的事情有所交集，觀點有些相似，於是可以暢所欲言。在世局急遽惡化之際，曾醫師雖然憂心，卻又有著堅定沉著的目光冷靜觀察這一切的發展；或有些許感嘆，卻總不帶過激的情緒。聽著他的分析，總能讓憂憤卻不知所措的我的心情，得以回復平穩。「是啊，確實是這樣子的，不過……」，「……是這樣子的」。在交談之間，曾醫師時常用著這樣的開頭與結尾回應。他和人道別時的一聲「再見！」，總是保持著積極的肯定的上揚聲調。此後再也接不到他的電話，再也聽不到那樣的語調。

我不只常困頓於時局，也因頓於生活。對於人生，對於孩子，總有許多想不透解不開的問題。曾醫師知道我的驚鈍不堪，總會和我分享他的經歷。這才知道他為了擔起家庭的擔子而赴日求學，小有成就之際，又在現實的考量下打消繼續深造的念頭。不管最後選擇走上哪條路，只要自己不後悔，都好。他這麼說著。他也數次提及在日本執業數年後舉家返台的往事，對於這個決定他並不後悔，但因此造成妻兒在生活上上的不便與矛盾，他一直抱有為人夫為人父的不捨和歉疚。

這幾年得知曾醫師要退休，便一直鼓吹他親手完成自己的回憶錄。在這個處處可見偽史顛倒是非的年代裡，若藉由

他的人生經歷作為一面史鏡，後生晚輩便能多一個機會撥開那刻意人為的團團迷霧，更為貼近於真實的共同過往。他認真地考慮過這事，也很積極地設想著退休後的寫作計畫，打算要在花蓮靜心書寫，專注地完成那些懸置多年的未竟之業。

可惜……

在曾醫師離去後，我總是會想著，是不是我們消耗太多曾醫師的時間？如果他能更為專注於「光復史研究」，花更多時間奮力於他和陳映真共同的未完志業，用更多精神整理出自己的成長軌跡與心路歷程，是不是就能為後人留下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與解毒良方？是不是他就不會離開得這麼匆忙？

但另一方面，人生若能重來一回，我還是會希望我所認識的曾醫師，是那麽樣的在乎和關心他身旁的人。他讓我認識到持守的信念、亂世裡的盼望、真誠的關愛、與批判的觀點和奮力不懈的耕耘，是可以同時並存的。他讓「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誠願曾醫師在人生旅途所留下的佳美腳跡，都能成為一粒粒的落地麥子：記著他的堅忍與毅力，好洗滌我們的軟弱與不堪；記著他的良善與謙遜，好激勵我們結出更多的子粒。讓落地的麥子不死，不過換種形式，一代一代地延續著它所該做的事。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於板橋

感念曾醫師指引我前進的方向

徐秀慧

其實還沒學會如何告別！

在廈門隔離期間傳來您已撒手歸天的訊息，還沒整理好剛剛辦完家母法事的心情，面對您的離去，同樣是難以平復的心情。一切都是那麼令人措手不及。本以為您回去花蓮是康復的轉機，奈何依舊是回天乏術！

如若不是您與我的博導呂正惠老師商議要我以光復初期的台灣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我可能至今都無法找到前進的方向，因此對我來說這無疑是恩同再造的人生轉折。感念那段為了一筆資料或線索，與您以及橫地剛先生鏗而不捨的追查的歲月。每次與您見面的討論，都是一次次飽滿的學習。感念您對後輩熱情而無私的提攜，在我人生最茫然的階段指引了我前進的方向。今後

唯有繼續努力實現您未完成的遺志，才能告慰您的期許。

其實還沒學會如何告別！

無論是之前面對陳映真老師、陳明忠先生，還是如今面對您的離去，都還沒有準備好如何告別！每次想著要寫點追思的文字，都是無語問蒼天，因為實在還沒學會如何告別！

我想著您豪情壯志告訴我的那些未完成的寫作計畫，言猶在耳！

既然還沒有準備好告別，那就繼續走向您前進方向的路上吧！

無論如何，也要戰鬥下去……

吳舒潔

曾醫師逝世那天，我們剛從花蓮離開。那是我第一次到花蓮，和士杰一起搭臧汝興夫婦的車。行程的主要目的是探望曾醫師，也幫忙整理一下他的資料和手稿。其實，我還有更多一層念想，想去看看曾醫師念茲在茲的故鄉究竟是什麼樣的。

一直就說要去花蓮，因為曾醫師常講，那裡的天很高，海很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年初入春的時候，他拍了幾張新居的照片發給我們說，屋子再打理打理你們就可以來了，還特地囑咐我一定要邀請父母到花蓮走走。照片裡看到了新居的一角，黑褐色的圍籬雅致大方，門前的小庭院雖還有些凌亂，幾株高高斜逸的石斛蘭卻帶來不少喜氣。那時曾醫師的遷居工程告一段落，診所也已收好，很快就能正式搬回花蓮，而我們也可以常去花蓮玩了，一切都是那麼令人

憧憬。那一陣子，明顯能感受到曾醫師在心情上的整理。他終於可以稍稍喘口氣，歇歇腳，回到心愛的故鄉，把年輕時未及完成的工作一件一件做完，再無遺憾。曾醫師病逝後，我一直不敢過多回想這半年多來的種種，不敢去翻看與曾醫師的微信聊天記錄。哪怕是多想一分，眼淚都無法再忍住。

曾醫師病倒後，我們才終於去了花蓮。花蓮的美有一種氣象。遼遠的天空延伸入海，滿目只有磅礴漸染的藍色，卻並不過分浪漫；舒朗落落的海岸山脈，孤拔的千仞縱穀，為花蓮的美造出了獨異的品格。這就是曾醫師的家鄉啊，我心裡歎著，似乎由此理解了曾醫師的個性。他的寬厚與堅定，原來養成於這般氣象中。曾醫師有個常用的筆名叫「官土生」，「官」是他的本姓，「土生」取自出身鄉土之義。他用這個筆名寫下了不少論文，有關於光復初期文化運動的考辨，

有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剖析，筆鋒既常帶感情，也絕不在原則問題上妥協。我想這個濃縮了他的身世筆名，應是寄託著他對於自己所從何來的清醒體認。這種清醒正如陳映真的「市鎮小知識分子」自剖，是他們這一代前行者特有的馬克思主義自覺。

曾醫師於台灣社會性質研究用力甚勤，許多人覺得時過境遷，繼續抱持正統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不免有些迂闊教條。然而，理論不僅是為了認識社會，也是為了認識自己。只需稍稍回顧中國革命的道路便會瞭解，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將理論的武器首先瞄準自己。他們通過對自己階級的認識邁向了對整個社會的認識，正是因為深知自己所在的位置，所以更加明白前行的方向，戰鬥也才不致失去立足的土地脫離了「人間」。這或許也是為何曾醫師從不以立場之別苛責摯友，他並沒有自以為佔據了思想的高地就批評他人的落後，而是願意去理解那些轉變的痛苦，那些成長的跋涉，因為自己也共在於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台灣。

曾醫師離開我們已半月有餘。天氣轉涼了，花蓮盛夏的烈日想來也應漸漸收斂。往年中秋前總會回台灣一趟，若是運氣好趕上柚子成熟，曾醫師就會送我們一袋老家玉裡的文旦。放上一周，表皮脫水變皺，剖開來便是滿屋子的清香。曾媽媽還教我們將柚子皮刮掉苦澀的白鏽，晾曬萃取製成洗

滌液，天然又好用。秋天的回憶真是充滿了柚子的味道。

曾醫師喜歡跟我們講他小時候爬柚子樹摘柚子的故事，據說那棵幾十年的老樹依然健在。少年時代的曾醫師大概也會有些頑皮吧，而眼前的曾醫師則早已褪去了青澀和苦悶，以超乎常人的毅力踏出了一條年輕人可以追隨、願意追隨的道路。或許是因為同為農家子弟，曾醫師對楊逵的欽佩溢於言表。他說，楊逵身上有一種樸實的韌性，只要有一絲一毫的機會就不會放棄鬥爭，無論如何也要堅持下去。在我看來，曾醫師又何嘗不是如此？被迫前往日本謀生路，憑著刻苦的自修兼攻醫科與馬列，待到足以在異國安身立命之時，卻無論如何也要回到台灣。是的，「無論如何」，也要戰鬥下去，楊逵筆下殖民地知識分子的骨氣，在曾醫師的人生中依然錚錚作響。

曾醫師的謙遜低調成為口耳相傳的美德，我卻以為，在他寂寞的路途上，鬥爭的火焰從未曾熄滅。他是真正的土生土長的台灣知識分子，拋卻了小市民的虛榮心，結結實實地站穩了自己的陣地。面對那些譏諷、冷落、傲慢，我想到了盧那察爾斯基替高爾基給出的回答：

「你想用什麼來罵倒我呢？難道因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種熱誠的巨大火焰，它在我的藝術裡也在燃燒著麼？」

二〇二〇年初秋於廈大凌峰

為了黎明的國度

邱士杰

開完二〇二〇年的東亞反靖國神社的視訊會議的那天，我和臧汝興提起去花蓮看曾醫師的事情。

「這幾天就去？或者再等一周？」

站在入夜的台北車站捷運站出口，我們評估了許久，也瞎聊了許多軼事。由於全台連日陰雨、天候不穩，因此我們並不想在天候不佳的時候前往花蓮。此外，我馬上就得回大陸準備開學，因此離台前的每一天都得精打細算。討論沒有結論，但臧汝興把決定權交給我：時間由我決定。

隔天即周日中午，我決定還是趕緊探望曾醫師。於是，我和舒潔跳上臧汝興和虹瑤的車，午後直奔花蓮。

曾醫師的倒下如此突然。五月七日忽然接到他的來電，說是肺積水，緊急入院，因此委託我幫他把《人間思想》為他做的口述（為了前進的回顧）做最終校訂。其實我們之前

已經針對口述要講的內容進行多次討論，也幫他尋找了一些背景材料。但我無論如何沒想到，口述的最終定稿會是在這種情形下由我校訂。由於時間緊急，《人間思想》登出時還是留有不少沒校出來的錯誤，這是我深感遺憾的事情。

曾醫師的病情發展令人意外。救護車馬上將他送到台北進行詳細檢查。此間收到他從病房的微信來電，講了快二十分鐘，但也沒具體說明他的病情。五月二十一日，曾醫師來訊告知出院，準備返回台北家中進行通院治療。於是我和舒潔在二十五日直接拜訪了曾醫師。這三、四年來，每兩三個月就與曾醫師碰面聊天。密集程度遠比還沒去大陸教書前高。但那天實在沒想到，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能夠對話的場合。

再次見面的曾醫師確實滿臉病容，但見到我們還是打起精神、笑著和我們聊天。談話中完全沒有談到具體的病情

（儘管我們已經知道是腫瘤），而是談論治療方案並交代文稿如何整理，比方他少年時代發表的文學創作以及正在著手或尚未出版稿件，等等。其實，當時我還是覺得曾醫師可以自己來整理這些文稿，但當時也不可能預料他決定採用的治療方案終究奪了整理的機會。而且「少年發表的創作」該去哪裡找呢？這樣的問題不斷在我腦海打轉。

印象最深的還是曾醫師意味深長的這句話——「會一直亂想呀。」——他微笑或苦笑地說出自己的病後心得。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臧汝興與我前往花蓮的原因。曾醫師服藥四天便倒下了，而且很嚴重。雖由台大醫院救了回來，但元氣大傷。經歷多日搶救和照料，終於在八月回到花蓮住院治療。

在韓國民主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臧汝興在九十年代末期擔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正式的研究員，也是勞動黨現任副秘書長與工運和社運政策的專業分析家。儘管只是代表個人而不是代表黨組織正式探望，但在我來說，能與臧汝興一起前往花蓮探探曾醫師的意義很巨大。因為勞動黨無論如何是八十年代崛起於台灣地平線上的工人階級與林書揚等前輩共同創立的先鋒組織。沿途與開車的臧汝興的交流與回憶，也讓我想起許多往事。

* * *

我在一九九八年十六歲的時候通過唐曙的介紹而一口氣認識了林書揚、陳明忠、陳傳枝、廖天欣、張增榮、王津平、汪立峽，以及高偉凱和朱力等前輩。這是我正式接觸社會主義統一派前輩們的開始。這個時候也因閱讀《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創刊號「台灣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而以讀者身分認識了曾醫師，但實際認識他反而是很後來的事。現在能想起的最早回憶是二〇〇二年橫地剛先生在月涵堂的《南天之虹》發表會。當時大病初癒的陳映真先生到場致詞，還有難得返台一趟的二二八當事人、台籍老地下黨員吳克泰、陳炳基先生出席。現在想來是不可思議的歷史會面。曾醫師也是當天的與談人，但我印象最深的其實是長期參與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活動的黃靜嘉先生（一九二四—二〇一七）。黃先生與現場唯一的本科生的我聊天，聊了聊時下青年對光復後五年歷史的認識。當時我完全不知眼前童顏黑髮的黃先生是從二二八走來、見過宋斐如等人的社會名流。少年時代參與過游擊隊的黃先生因仰慕陳老師的理想（也是自己未曾熄滅的理想）而努力參與社科會活動，並與曾醫師結為好友。後來，黃先生與曾醫師共同協助我在二〇一〇年秋天前往北京移地研究，並參加了黃宗智老師與汪暉老師的課程。我的研究才因此迎來巨大轉機。

那次活動以後，我與曾醫師的交往密切了起來。可能是因為我寫了那次活動的報導，可能是後來在陳老師的人間出版社開始約一年半的打工。也可能是我請曾醫師的女兒育勳學姊從東吳借出《平平》旬刊（一九二四）復刻本給他吧。這是台灣史上最初期的左翼刊物，有安「那其布爾塞維克」合作傾向。曾醫師一直不知道《平平》猶存於世。

十幾年來，每次去曾醫師診所都坐在那皮件氣味濃郁的沙發上與他談天。隨著便利店的日新月異，還發展成我去七一十一買兩杯小熱美到診所與曾醫師邊喝邊聊的模式。這是我學習光復後五年史的真正開始。雖然高中時代就買入復刻版光復時期刊物（《政經報》等五冊系列）並閱讀剛創刊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在汀州路金右堂買的！），但當時對光復史的認識純屬趣味，求的是貼近二十世紀海峽兩岸唯一統一的五年的感覺。如果沒有曾醫師的指點，理性上的研究不得其門而入。後來，我開始研究台灣史上的社會性質論，甚至包含陳老師的理論，這些嘗試都得到曾醫師的鼓勵。

很長一段時間的討論模式是在每次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出版後，我以讀者身分向曾醫師反饋心得，學習新知（同時也帶著沙發的皮件氣味回到家裡）。其間也藉由替曾醫師尋找舊報刊史料而獲得成長。他一直很在意打響《橋》副刊論爭第一槍的歐陽明的真實身分，我們竟然針對這個問

題討論了十幾年。

短暫的光復五年史（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是二十世紀唯一的祖國完全統一時期。這段時期發生了傷痕至今未癒的二二八事件，並圍繞著民主問題、民族性恢復問題，以及即將到來的冷戰，內戰構造與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而創造出同時代台灣青年或左或右、或統或獨的認同分歧。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在此時期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新血，並首次完全整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中。因此這段時期的歷史不是已經風乾的過去，而是兩岸尚未完全統一的當下不能迴避的、依然鮮活的經驗。它形成了台灣當下無論左右統獨都仍在不斷回憶的軸心時代。非歷史專業科班出身的曾醫師選擇了正面進攻。

對於曾醫師而言的光復五年史是台灣人民的主體性、能动性因為民族統一而迅速復活並提升的時代。在台灣史主流學界還在糾結二二八事件的傷痛與責任的當時，曾醫師已經看到祖國一旦統一就能在台灣人民內部煥發出來的能量。對於分離主義論者來說（如吳叡人等），這五年被解釋為「對中國政治不了解」的無辜台灣人民被動地捲入慘苦的中國政治（國共內戰）的悲劇五年。這種論點可以概括為某種「台灣人民政治無能論」或「台灣人民政治白癡論」。然而曾醫師的研究卻指出了兩岸統一之後的台灣人民如何自主展開敵、我、友的辨析，如何積極成為中國革命的主體，如何將中國

革命的政治有機地鑲嵌在島內現地的各種鬥爭，使中國革命在台灣「內在化」。同時，大陸來台的知識分子也毫無障礙地站在台灣人民的處境為台灣的去殖民化獻謀劃策。我個人最喜歡的故事就是羅鐵英（駱駝英）在《橋》副刊論爭中展開的台灣社會性質分析以及他對五四精神是否仍然適用台灣人的討論。但更典型的例子則是曾醫師屢屢指出的國語推行運動委員會的民眾運動國語論。委員會的魏建功與何容明確指出：去殖民的第一步不是政府強制民眾學國語，而是以民眾運動的方式恢復閩南語等母語，因為母語也是中國話。恢復母語就能說好國語。

在光復後五年的激動時代裡——類似韓國所稱的戰後「解放空間」（해방공간）——沒有誰是被騙的無辜受害者。正因敵我友的政治空間徹底打開了，日據時期萌芽的左翼運動及其先鋒隊才終於在這五年間獲得空前的群眾基礎（甚至首次上升到建立根據地與武裝鬥爭階段），並積極介入思想文化思想領域的鬥爭。正如汪暉老師所言，「政治化既體現為激進的革命與策略性妥協的過程，也表現為將青年問題、婦女解放、勞動與勞工、語言與文學、城市與鄉村等問題納入『文化』的範疇，讓政治成為一個創造性的領域；既體現為將軍事鬥爭、土地改革、政權建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融為一體的『人民戰爭』，也呈現為人民戰爭對十九世紀以

降的各種政治範疇的轉化。」曾醫師所要守護的，就是台灣人民在那寶貴的五年間自主全面獲得高度「政治化」的歷史經驗，是二十世紀台灣人民如何通過中國人民戰爭而成為主體，而不是如分離主義那樣選擇性地將二二八「政治化」並將與中國革命密切相關的所有經驗（如地下黨鬥爭與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和各種思想鬥爭）都加以「去政治化」或者「賤民化」和「白癡化」。

* * *

在二〇〇九年的陳映真研討會上，曾醫師評論我以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為主題的論文。社會性質論的因緣讓曾醫師和我一起從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工作，自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以來剛好十年。那天還找了黃靜嘉、陳威佑、施善繼、范振國等前輩見證、合影。但正如曾醫師口述回憶所言，我並沒有舉起社科會旗幟開展工作。除了二〇一〇年後兩年間我用 blogspot 製作了社科會網站、整理會務資料，並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以社科會之名批判那場運動以外，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曾醫師指導下開展研究、線上交流意見，保持著幾個月就碰面的慣例。儘管曾醫師在二〇一〇年之後就改用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的名稱，但我未用社科會的名號公開開展活動。無論如何，這件事我沒有充分回應曾醫師的期待，讓他失望了。

實際上，曾醫師對於開展台灣社會科學研究的思路與作為晚輩的我不盡相同。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也伴隨著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即林書揚先生定義為左、統二者合一的運動）的萎縮以及島內泛左翼陣營的分化而不成組織，連讀書會都難以成形（但曾醫師這幾年還是試圖搞讀書會，與青年們一起讀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可參閱清雅、雅慧的回憶）。而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能否與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整體、特別是現有的先鋒組織產生更緊密的結合，是更為急迫的課題。至少我是這麼想的。然而社科會從九十年代以來的運作方式實具先鋒主義色彩。這裡所稱的先鋒主義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專有術語，指的是先鋒隊以外的急進青年或群體產生「比先鋒還先鋒」的傾向。一度被城市左翼青年視為「第二黨」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就是典型例子。曾醫師所想像的圖景——如其口述史所言——是在理論工作者與先鋒隊之間形成循環的互動，找出運動發展最有共識和最科學的道路。

寬泛的意義上我贊成曾醫師的看法。但無論先鋒隊如何弱小，我更信任先鋒隊本身的領導性，而不是理論工作者的先鋒性。就像野呂榮太郎在日共「一九三一年綱領草案」後形成的講座派能及時地為黨的「三二年綱領」而鬥爭，而不是堅持自己的理論推論。曾醫師知道我的想法。當然，我也

知道理論工作者的先鋒性並不是曾醫師自己的獨創。實際上，曾醫師始終堅守著陳映真關於開展廣泛的人民運動的設想，因此他認為階級取向的工農運動（現實上只有工人運動）還是不夠充分。儘管我並未在具體的工運現場工作，但從原則出發，我還是認為工農運動以及先鋒隊是根本支點。也儘管曾醫師發展社科會的思路不能完全說服我，但我們完全一致的共識是搞社會性質論但不只是所謂台灣社會性質。這是陳映真撰寫的社科會宗旨明確權舉的鬥爭方向。也就是說，社科會就是要搞社會性質論。這是從台共到省工委再到劉進慶與陳映真所努力奠基的思想資源，更是有待台灣左翼繼承並發揚的中國革命理論戰線的重大遺產。

曾醫師對社會性質的關心還是相當「文學」的。一方面，他完全接受陳老師的國民黨波拿巴國家論，但這樣的分析取徑實際上突出上層建築而忽略了基礎的實際構造，並不是把握完整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讓戰後台灣經濟的分析擺脫後見之明。另一方面，曾醫師對社會性質討論的最優文本都不是字句中不斷出現社會性質四字的文章，而是他一系列的台灣文學史論。因為社會性質論從來只能依附於具體課題才能彰顯自身意義。我還記得孫隆基老師在博論答辯時問我：「你認為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是社會性質論戰嗎？」我傻了幾秒才回過神，危坐答曰：「我認為是

的。——那瞬間在我腦中閃過的念頭是：陳老師與曾醫師的社會性質論也在他們的台灣文學史論裡面！

曾醫師與社科會的特殊價值正在這裡：二〇一〇年到今天，他是台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陣營裡全面思考文藝戰線、思想戰線等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代表。其主題包含了光復五年史、台灣文學史、日本批判、台灣意識形態批判，以及陳映真最關心的台灣社會性質問題以及中國大陸的現狀分析。

曾醫師完全摒除了列寧所說的「奴隸的語言」(SERVILE LANGUAGE)，如實地陳述自己的研究結論。近十年甚至為了加強對歐美局勢的了解而加大閱讀英語新聞的比例，真是令我們晚輩自嘆不如（這還不說他原來就固定關注的日語新聞）。儘管曾醫師為此付出的努力不見得能讓學院裡的知識份子瞧得上眼，但他毫不遲疑、不斷動筆。他就是下決心在工作之餘不斷寫作、出版、對話。他預設的讀者不是學院的誰，而是有志改造社會的青年與無告的勞苦大眾。他從不拉幫結派鎮壓異己，也從未聽過他攻擊任何人。他自食其力並專志寫作，用自己的力量做該做和能夠多做的事。他的視野裡不是只有「牧師對牧師傳教」的既有的認同團體(identity-group, 霍布斯邦語)或「同溫層」，因而能夠看到認同團體以外的進步青年，努力扶助他們、關心他們。愛護且熱愛青年的他要的不是青年的追捧，而是與青年共成長

並廣續進步的思想。我知道他想做真正有生產性的事情，而不是像《資本論》第三卷所研究的商人資本那樣在既有的資源裡改變分配、進行毫無意義的瓜分、再瓜分以及欺詐性的投機行為（這種商人資本性格是劉進慶對台灣人內在意識的最大批判），然後將資源消費殆盡。進行有生產性的勞動、創造不退轉的積累、留下可共享的剩餘，這才是曾醫師選擇的戰鬥位置。用他的話來說：「我們無論如何不是搞學術，一切都是為了運動。」

曾醫師多次讚揚楊逵的典範。雖然楊逵從二十年代以來始終是黨外左翼（相對於日據時期台共與戰後省工委的「黨外」），但他能夠及時把握時局動向，準確介入議題、隨時靈活調整、堅持鬥爭原則。我想，陳映真對楊逵典範的評價，就是曾醫師試圖效法的行動方式吧——陳老師在〈學習楊逵精神〉說道，「楊逵先生是日據下台灣文學中唯一突出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和母題的作家。在政治上，楊逵先生直至晚年都不憚於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沒有動搖過社會主義的思想立場。他敢於鬥爭，善於團結，熱心指導和培養年輕的一代。他與反民族的分離運動鮮明對立，堅持克服民族反目，力爭民族團結，不遺餘力。」曾醫師不一定做到楊逵所做到的事，但他向往且努力效法。一直以來，是這個樣子也可以說，台灣島內無論如何一定還是有無數個人堅持自己

的中國認同，但真正願意為自己的認同而戰鬥的人確實無多。對於曾醫師而言，就算不得不一人戰鬥，也是自己做為中國人、作為一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戰鬥。不需要誰的認證或加持，也不是表演給神明看的野台戲。

曾醫師的《方向叢刊》在二〇一二年十月創刊，後來還出了第二輯，以及作為曾醫師個人文集的第三輯。正如曾醫師所說，創刊號部分內容挪用自未能問世而夭折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最後一輯，精神上則直接接續二〇〇一年《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第五輯（因為是祖國的緣故）所採取的戰鬥態度。實際上連封面設計的風格也延續《人間叢刊》。我還記得藝術家高重黎老師在《方向叢刊》發表會拿著兩種叢刊比對兩者風格如何一致的趣味往事。

曾醫師決定用的「方向」有兩層意思，第一個是一九四九年前後台大校內地下黨領導的「方向社」，這是他刻意援引的典故。第二個則是希望這份刊物能夠為運動指明方向。雖然我還是參與了《方向叢刊》出版前後的庶務，並幫忙設計了方向的圖標——從毛主席手跡中擷取的——但我對一人能否指出「方向」仍感保留，也對創刊號所收的香港來文不盡同意。然而，對比起近期香港的局面，又不得不感佩曾醫師永遠直面尖銳議題的決心。也只有他才能做到了。

還能記得曾醫師在二〇一三年之際的心情。當年七月底

我們一同參與了台灣同學會的寧夏研討會。會後在中衛特別是靠近內蒙阿拉善沙漠處旅遊。同行還有許多海外保釣前輩，如林孝信、龔忠武、劉彩品、木村博、吳國禎等老師。我們一行人在青銅峽水庫的一百〇八塔那兒打轉、饒有趣味地「祈福」，然後又轉往曾經拍攝《紅高粱》等著名電影的鎮北堡以及西夏鬼名元昊陵參觀。在某段靠近沙漠的邊上，我與曾醫師一同在微風飄砂的黃土地行走了二十多分鐘，一路上完全無話可說，只是走著。我能感受到他當時的沉重。那是綜合了許多思考的沉重。同年底舉辦在牯嶺街小劇場的毛主席誕辰紀念會上，曾醫師一開頭就說「我很快就要七十歲了」。無比沉重的口吻。當時我還沒反應過來，但當時的他其實才六十三歲。

我想起了日據以來的著名知識人陳逸松。陳逸松在一九六八年風起雲湧的日本學運現地觀看了時枝俊江發表於一九六七年的紀錄片《黎明的國度》（夜明けの国）。片中的新中國面貌成為陳逸松最終接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前往北京工作的關鍵因素。後來他成為七十年代人大常委會台籍委員。二〇一三至一五年間全心為陳逸松撰寫晚年傳記的曾醫師也非常喜歡（甚至購入）這部紀錄片。走在祖國的大地上，無論荒漠還是綠茵，這正是他要保衛的黎明的國度。

二〇一四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讓曾醫師展開新的思考。

他開始研究民粹主義的問題。雖然他還是堅持人民運動，但我感覺他在太陽花後有了反思。核心在於：如果人民運動能在台灣存在，有多大可能不是這類右翼民粹主義運動？如何才能不是？如何才能不被台灣資產階級的動向所操弄？這不得不提到二〇一一年他在北京與徐勝老師、橫地先生拜訪林書揚先生之後的微妙變化。此後他更常提到林桑對運動的意義，尤其在太陽花後。我想，他還是痛感運動失去林桑之後同時失去的許多契機與可能性吧。

我從未找曾醫師看過牙，也沒想過曾醫師應該在對我而言的老師身分之外增添醫師的角色。但我總會想起林桑臥病台大醫院舊院區時，作為醫者的他帶著基礎醫療器具到醫院病床前為林桑看牙，緩解其疼痛的往事。那時林桑往往在更大的病痛中浮現起三十四年年獄生活的片斷幻覺，正是所有照顧他的人都同感艱難和難過的時候。

* * *

一路上聊著並想著這些與曾醫師有關的回憶，我們終於在黃昏抵達大山大海之間的花蓮——這是夾處在中國東南第一高峰的中央山脈與無垠的太平洋之間的城市。曾醫師成長的風土在茲。周日從台北到花蓮的路途並不輕鬆，因為要翻過繞過或穿過中央山脈。如此，也可想像退休後返回花蓮定居的曾醫師來趟台北多不容易。即便搭乘火車也極費精力。

當我們一行人抵達疫情期間更加人山人海的花蓮，已近傍晚，因此隔日周一才順利拜訪曾醫師寓所。此行目的是依照與曾醫師的約定，將文稿帶回編輯，也希望能探望他。

自始便無確切把握，但還是到了現地才知確實不宜探望。曾媽媽擔心我們見了面傷心，也怕曾醫師見了我們之後難過。我想起曾醫師倒下之後再次見面的情景。在台大醫院，我完全無法想像眼前的曾醫師是一周前才和我們談論治療方案的他。我只能緊握他的手，向他保證一定完成文稿編輯任務。

曾醫師的書房還是沒整理完的樣貌。絕大部份文件與書籍仍在紙箱。但一進門就看到曾醫師所說的少年文稿以及待出版手稿。此行目的忽而解決，宛如神助。曾醫師的寫作和研究狀況也首次在我们眼前鋪展開來。我一直以為曾醫師已在這幾年進入電腦寫作，因為他的手機操作實在流暢。原來，還是稿紙筆耕。這導致他每篇文章從起草到成文都積累起厚度可視的文稿。但他也規整地將自己的手稿和資料整理成一包一包的檔案，其中包含了成箱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歷屆文件資料。

週二從花蓮返回台北之際，臧汝興帶大家去了趟太魯閣並著重訪問了世人皆已遺忘的台灣工殤紀念地：長春祠。遠看是青山飛瀑，但鑲嵌在岩壁裡的祭祠卻極其陰冷潮濕。無數外省老兵為了生活被國民黨政府調來崇山峻嶺的花蓮開鑿

公路，結果在落石與爆破間粉身碎骨。悲傷的外省老兵記憶與民族分斷傷痕埋藏在這裡。曾醫師少年時代曾在長春祠上方的禪光寺「閉關」，並在這裏遇見改變他人生的人們。我竟也在這特殊的時刻，到了曾醫師人生轉折的原點之地。

傍晚返抵台北，我開始閱讀搬回來的曾醫師文稿。從少年時代到旅日行醫，他是不斷地寫作。少年時代寫的是文彩洋溢的小說，旅日期間則在無數雪夜寫下一則則左翼理論筆記。我油然生起這樣的感嘆——

「曾醫師確實是一直在寫作啊！」

曾醫師總是說：「就像陳映真對我的鼓勵：要寫，寫出來就是了。你們也要一直寫。」其實，就算沒有陳老師的督促，他也已經在寫了。但曾醫師更願意將自己寫作的動力歸於陳老師的鼓勵。曾醫師一九六六年的少年日記曾寫下他對陳老師參與的《劇場》雜誌的讚頌與期待：

「太棒了《劇場》，年青人辦的東西就是如此有魄力，不隨俗，突出。我啊，應好好地奮鬥！有的是熱與力！」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曾醫師終在九十年代獲得與陳老師並肩戰鬥的機會時，那心中湧起的巨大能量。正是這樣的能量讓他在陳老師離開台灣之後努力守護陳老師的思想，特別是其思想的內在統一。這是如此真摯的友誼與信仰。每次與曾醫師聊天，所有話題也一定會回到陳映真。正如徐勝老師

所言，「我很敬佩曾先生對陳先生的尊敬和傾倒。他一生對陳先生如影隨形，不吝支援，如今那模樣還彷彿在眼前。」

屏東農專時代的《南風》同人這樣評論曾醫師：

「去年開學不久，南風社長為我引見了一位身材瘦長（也許不算瘦長）的男孩子，一雙銳利的眼睛逼得我逃將而去。」

「高中時，棄辛案：曾醫師筆名」即曾在報刊雜誌上露過幾手。加上受他老師王禎和的影響，遂漸露鋒芒。

〈臉與手〉中，文字的結構有些異味，暗示著棄辛所走的路線非屬大眾的筆調。」

「棄辛的輪廓是比吳晟好繪，因其比較執一，專寫小說。看過幾篇作品後，就可以略窺棄辛所走的門路與面貌，但是不容否認的，棄辛的心中所想抓住的，也是多變的，只是一時甚難脫除寫作不久者所懼有的『不拋棄性』，而強留著一種表現形式。但這僅是時間問題。時間一過，總會打破這個困難的。」

我不禁想到，曾醫師放棄小說創作、不再追求表現形式，直入理論研究與歷史研究的選擇，也不是大眾的筆調所能描繪的道路。但這是他打破思想上的困難之後執一走上道路。這條道路能夠喚醒大眾，動員大眾，是他追隨陳映真所走的大道，幹的是有出息的大事。正如他在二〇〇八年一月的筆

記所言：

「一個門外漢要搞歷史，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但科學的正確的歷史認識又是一個前提，但台灣沒有、缺少這前提，因此只有科學地去搞歷史。」

龍瑛宗說，「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曾醫師在其批判陳芳明台灣文學史論的論文徵引了這句話為結論。

雖然這句話是龍瑛宗在指陳殖民地文學創作的侷限，也雖然這句話很容易淪為「奧許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般庸俗解讀，但當我讀到這段引文，忽然想到，這正是陳老師與曾醫師投入社會性質研究的原因吧。在現象與本質脫離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戳破謊言瀰蓋的幻象，主動成為社會實現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載體，這不正是為真正的文學創造條件嗎？這不也就是文學的工作本身嗎？

可惜的是，雖然曾醫師已有許多論文涉及他尚未出版專書的一九四七至四八年台灣史，但曾醫師並沒有特別為這兩年歷史留下手稿。我想這就是他選擇先出《台灣光復史春秋》的原因吧。

一則手稿吸引了我的目光。二〇〇五年十月，曾醫師受邀在香港中聯辦主辦的紀念台灣光復座談會致詞如下：

「要掌握光復歷史的真義，以史為鑑，吸取歷史教訓，從六十年前的光復歷史中得到政治智慧。特別在推動

「再光復」的時代任務中，必須要向歷史學習。要充分認識到六十年前台灣光復歷史中的正確和錯誤，光明和黑暗，進步之處和落伍的地方；還有當時台灣民眾的心聲，台灣文化人、知識分子的感情、想法和期待。要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尊重其政治要求。」

「時刻都要向著『再光復』的總目標進行，不可稍懈。除了要認識到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也要認識到他們的『民主、科學』的意識。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以台灣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努力理解、認識台灣人民的感情、看法，和向背。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曾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光復』，因此，要時時刻刻向六十年前的光復歷史求取智慧，學習歷史，才能照明今天前進的道路。有正確的歷史認識，才不至於看不清楚而走跛躓的路。因此這兩個基礎是不可分割、相互聯繫、相互為用的。」

午夜時分翻完曾醫師的文稿，一個既熟悉又不曾認識的形象浮現眼前。新的一天將要開始。我重新把文稿裝回箱裡，沒有梳洗便沉沉睡去了。

* * *

幾個小時後，曾醫師離開了我們。

點燃共同前進的火炬

——對「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一九九七—二零零二）」的初步考察

曾健民

朋友們 在天亮前的黑暗裏

朋友們 把戰鬥的火焰燃燒起來

天快亮了 天快亮了

朋友們 在黑暗的那一邊

朋友們 有光明的明天

在日本代表團的帶唱下，來自台灣、日本、韓國、

琉球四地的數百位朋友以不熟練的日文一齊引吭高歌，

大家手拉著手肩並著肩，反覆地反覆地唱著，互相激勵

把戰鬥的火焰燃燒起來。這是一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

義國際研討會」在京都的第五次大會惜別宴上的熱烈場

景；接著，台灣團帶唱了運動歌曲「團結就是力量」，韓國團帶唱了「像岩石一樣」，琉球團帶唱「花」。最後，就像從台北、濟州、琉球到光州的每次大會一樣，每場的惜別文化活動上最後都一定會有三種語言合唱的「國際歌」響起：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在亞洲冷戰結束不久而後冷戰正形成的歷史時期，

來自台、日、韓、琉的東亞人民曾試圖再次點燃共同前進的火炬，從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二年突破困難舉辦了六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對支配東亞歷史半世紀的東亞冷戰體制和國家暴力做了根本的清理和批判；雖然經過了近二十年的時光，它在戰後東亞民眾的第一次集結共同衝破東亞歷史的黑暗部上，仍然是空前的，不管對歷史或現實仍然熠熠著前進的亮光，作為會議的親歷者，本文嘗試對這系列會議作一次初步的整理考察。

一、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的歷史與轉化

(一) 暗黑的東亞歷史天空

在亞洲大地上，遭受過歐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廣大人民，曾經有過高舉「反帝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大旗共同戰鬥的歷史。

一九四五年日帝戰敗後，大家正興高烈期待可以成為時代的新主人的時候，美蘇對立的冷戰席捲了世界，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前後，東亞地區台、韓、日、琉同時落入美國冷戰的前線，進入了新的苦難時代。在

冷戰的形成期，美國與各地扈從美國的獨裁政權發動了「國家恐怖主義」，對東亞各地追求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的民眾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和洗滌。在朝鮮半島上，先在一九四八年爆發了濟洲島四·三事件、麗水順天事件，接著爆發了朝鮮戰爭；同時，在台灣島上引發了長達十年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肅清，甚至在美國軍政下的日本在議會民主的掩飾下也爆發了如下山事件、三鷹事件或著名的大阪吹田、枚方的大型抗爭和鎮壓事件。

從中國內戰中倉惶逃台的國府，在美國支援下依美國的全球利益，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對全社會發動了大規模的「掃紅肅諜」的暴力鎮壓和洗滌，不但對當時台灣的中共地下黨或日據期成長起來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和思想，甚至「凡是反對內戰、主張國共和談、要求和平建設改善民生的言論都被認定為共產黨陰謀匪諜份子破壞份子，一概被列入掃紅肅諜的對象」。無數人在毫無抵抗中被逮捕、拷問、非法審判、監禁或刑殺，「據統計，在十年間被捕者八——〇萬人，有五——八千人遭刑殺」。

由國府發動的白色恐怖，不但肅清了一整個世代的追求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的菁英，還澈底滅絕了有關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歷史、思想、哲學和美學，使整個

台灣社會長期窒息在恐懼噤聲中而陷入全面白色化的感情、知識文化環境中，終導致對歷史的否定和對民族的互憎、墮入自我否定的倒錯意識中，滋生了民族虛無主義和分離主義意識。

隨著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接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圈相繼解體，世界進入了美國一極獨霸的後冷戰時代。冷戰雖已被宣告終結，但東亞民眾的冷戰受害並未終止，冷戰結構不但沒有得到清理或終結，還進一步轉化和擴張；資本主義在全球化中高歌，代表美國利益的歷史終結論和普世價值披靡世界，自稱冷戰勝利者的美國瘋狂地進行毫無制約的軍事擴張，並驅使民主、人權、貿易、金融、貨幣、媒體的武器對世界進行全方向的制霸。在曾經是冷戰前線的東亞地區，作為美國維持東亞霸權基礎的日美安保體制不但沒有縮小還進行擴張，繼續在日、琉、韓繼續駐紮十萬美軍；東亞冷戰結構中最突出的矛盾結節——朝鮮半島和中國兩岸的分斷體制，在政治上雖有些「民主轉化」，但根本上並沒有大的變革。曾為東亞反共前線的台灣，在這個大潮流中，被美國以單方面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繼續維持對台灣的控制，在這個架構下進行了所謂的「民主化」，以一九八七年的「解嚴」為轉捩點進入了新時期；在後冷戰時期

期的台灣，曾經揮舞著白色恐怖令人戰悚的兩蔣政權像朝露般地蒸發，而由本地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所取代，而原來無上的「反共意識」無縫地轉化為反中國的「台灣意識本土意識」，再次隱蔽了歷史意識和階級意識，並霸權化到今天。以反共、反中國反統一為實質內容的「台灣意識、本土意識」，起著繼續維持兩岸對峙和民族分斷，符合美國在台灣後的冷戰利益，它並非對「冷戰——戒嚴」體制的揚棄，而是「冷戰——戒嚴」歷史的畸形兒，對於「冷戰——戒嚴」體制所造成的最深沉的悲劇——對歷史的否定和民族互憎以及自我否定的倒錯意識，不但無批判無反省，還進一步轉化繼承。今日蔡政權虛偽的所謂「促進轉型正義」政策就是最好的說明。

為了克服今天台灣的這種困境，正本清源追究「冷戰——戒嚴」體制的結構化歷史，特別追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是刻不容緩的現實課題。把台灣戰後的特殊歷史與東亞冷戰世界的普遍歷史結合起來，把國家暴力和東亞冷戰聯繫起來，理清台灣戰後歷史和社會的本質，才能打破分離主義的孤島史觀，祛除本土意識的魔咒，走出自我否定的倒錯世界。

從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二年，由台灣政治受難人為

主體推動的台日琉韓四地進步團體、專家學者共同主辦的六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就是對上述東亞的歷史和現實向我們提出的課題的嚴肅回答。

(二) 歷史正義的召喚

一九九〇年七月，受了一九年韓國政治苦牢剛出獄的徐勝先生，經大阪大學教授杉原達先生的介紹，與在台灣受了長達三四年白色恐怖牢災的林書揚先生在日本京都的初遇，創造了會議的契機；兩位台韓政治受難人的見面，可以說象徵著長達四〇年彼此被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鎮壓在黑暗中的東亞現代歷史的初次相遇，照亮了黑暗的歷史，開啟了亞洲共同歷史命運的大門。

一九九三年五月，台北市密集住宅區邊的六張犁公墓，在一片荒草雜木林中，被發現了數百具零散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刑殺者的亂葬墓，散亂的簡陋的墓石彷彿無聲吶喊地著白色恐怖的驚悚，經歷了四十多年陰暗的歷史終於被攤在白日下。這一發現震驚了台灣社會，觸發了一波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調查、追究、平反的行動。

一九九五年林書揚先生受邀到韓國首爾參加韓國「國家保安法國國際研討會」，在台上與韓國獄中四四年的

老政治受者金善明先生深深的握手，更加強了追究共同的東亞冷戰和國家暴力歷史的決定。當時韓國的國家保安法還發揮著政治的猛威，大約還有七百五十名政治良心犯在獄中，且「非轉向」的出獄政治犯也不能出國，政治氣氛還十分嚴峻。同年，徐勝和杉原達再度來台歷訪了綠島、新店軍人監獄、六張犁公墓等白色恐怖遺跡，並與林書揚、陳明忠、吳澍培的「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共同研擬了舉辦「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的研討會初步構想。經過進一步的落實，分別成立了台灣、日本、韓國、琉球四地的事務局共同推動會議。台灣成立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台灣祕書處」，由陳映真、林書揚、陳明忠、吳澍培、曾健民共同負責，祕書處工作人員有林一明、臧汝興。

二、照亮東亞現代史的暗部——會議經過

(一) 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台北，一九九七年二月二一日到二四日）

經過四地事務局的無數次共同協商後，一九九七年二月二一日到二四日，在台北劍潭活動中心舉行了第一

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有來自韓國、琉球、日本、台灣四地超過三百人的政治受難人或家屬，進步學者專家、社會運動活動家和團體參加；二天的學術研討會除了探討台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主題外，還報告了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光州事件以及琉球反美運基地運動，予告了往後會議的主題；另外二天，進行了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追悼會、歷史現場巡禮和憑悼（馬場町、六張犁公墓和鹿窟事件）、歷史證言會以及文化座談會。

通過這次會議，我們更深刻認識到，台灣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本質上不單只是國共內戰下國府在台灣島內的孤立的政治肅清事件，而是有更廣泛的東亞冷戰的聯繫，同時期在朝鮮半島也發生了犧牲慘重的濟州島四·三事件、麗水順天事件以及其後爆發更慘烈的朝鮮戰爭、朝鮮半島和兩岸分斷，都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命運；所謂美日霸權的「東亞秩序」是在東亞冷戰形成期通過國家恐怖主義在東亞各地對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暴力肅清而建構起來的，只有體認到這個東亞人民的共同命運，才能共同攜手克服虛構的東亞秩序，由人民的手重建二一世紀的東亞和平。

這次會議實現了在東亞冷戰陰影下長期分斷的東亞

人民和歷史的第一次相會，共同照亮了東亞現代史的黑暗部。

陳映真在第一屆台北「會議邀請函」中指出：

「要站在這亞洲現代史的百年與戰後五十年所樹立的民眾的價值、思想的原點，究明亞洲社會史的本質。」

而在「會議旨趣」中，他面對當時駸駸已成為台灣社會統治意識的「本土意識」指出：

「對台灣來說，將台灣戰後特殊歷史與東亞冷戰的普遍歷史結合起來，將國家暴力與東亞冷戰結合起來，才能踏出『本土意識』感情論和道德論的框框，對戰後台灣社會和歷史，獲致科學的本質的認識。」

（二）第二屆，「濟州四·三第五〇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濟州島，一九九八年八月二二日到二四日）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二日到二四日，在韓國濟州島舉行了「濟州四·三第五〇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為名的第二屆會議。會議以「從民眾立場解體冷戰，實現東亞和平的理念，要求追究四·三事件真相，歷史定位，制定對犧牲者補償及恢復名譽的法律」為主題，共有來自四地區四百多人參加，堪稱從一九八九年開始每年舉行「四·三追悼紀念會」以來最大規模，也是韓國戰後以來未曾有過的大型國際會議，台灣祕書處共派出了五

○名參加，這次特別廣邀了台灣各界學者，社運、工運、婦運、原住民運動人士以及青年學生參加。

所謂「濟州四·三」是指：一九四八年，在朝鮮島南方，戰後結合了殖民時期親日派的美國軍政準備在南方單獨建立分裂國家以對抗北方，四月三日，在半島最南端隔海的濟州島爆發了抗拒南北分裂要求建立統一自主民族國家的島民蜂民，八月十五日大韓民國成立後對濟州島宣佈戒嚴，政府投入大量軍警和西北右翼青年團組成討伐隊對全島進行了大肅清，直到一九五四年事件平息為止，依據濟州島議會調查報告，包括「人民自衛隊」的游擊隊在內的事件牽連者及家屬犧牲者至少有三萬人以上。

大會首日的歡迎式上，首先是詩人文武秉登台朗誦鎮魂詩〈仇恨之歌·血淚之歌·骨頭之歌〉，淒絕的聲調感動了全場，節摘如下（轉譯自日譯）：

五〇年前

一九四八漢拏山

在軍警的槍下

我白白地死了

在無常歲月中 我被染著血的衣服包裹著

母親 我的肉體已腐朽回到了土地

解放不久美軍就來了

美軍來了 軍人來了

警察和西北青年團從本土來了

全都拿著武器

母親 我害怕死亡

我躲到山上被捕後成了「紅色」

母親 太陽已上昇卻漆黑的這個世界染著色的血

激烈嚎叫的烏鴉群不知飛向何方

母親 現在請你從我留下的沾滿血的衣服找到我

歲月已經流逝 雖然肉體已腐朽回到土地

唱出 滲染在漢拏山谷每一個洞窟的骨肉之歌吧

在虛空中彷徨的魂啊

肉體已腐朽變成泥土留下骨頭的魂魄啊

北村的田埔中死亡的靈魂啣

都來這邊享用米飯和雞蛋燒酒後回去吧

苦悶的先人啊 搗著手哇哇放聲大哭後回去吧

去到那個世界化身為美麗的蝴蝶

（三）第三屆，「東亞人權與和平國際研討會」（琉球，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六日到二九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六日到二九日，在琉球（沖繩）

舉行了「東亞人權與和平國際研討會」，從台北、濟州島

到這次琉球已是第三次大會，可以說在戰後美國冷戰政策在東亞製造出來的民族分斷三地區繞了一圈。

琉球列島與台灣最近也是與台灣在歷史上和現實戰略地位上息息相關的地方，可是也是台灣人最不了解的地方。琉球人民背負的最大問題，簡單地說，就是現實存在的龐大美軍基地。在大會開會上致「歡迎辭」的金城陸律師（沖繩大會實行委員長）對此問題一針見血指出：「沖繩，不單處於日美安保體制的關鍵地位，更是美國在東亞戰略的核心，因此，東亞冷戰構造所造成的諸問題，大大小小都在沖繩可以看到，相反，沖繩發生的諸問題其背景都有美國的東亞戰略存在」。本次大會的沖繩事務局局長高良鐵美（琉球大學憲法學教授）在致辭上也說：「在沖繩的美軍基地存在的意義，主要在針對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的兩地情勢，特別大多基地駐紮了具有快速打擊的海軍陸戰隊，其目的更明顯」。

金城陸進一步指出了琉球的憂鬱，他說：一九七二年美國把沖繩行政權還給日本，沖繩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也復歸在日本憲法範圍下，但是在沖繩的美軍基地的機能和實體不但沒改變反而日愈強化，今天，美國駐在日本美軍的百分之七五全部集中在沖繩。原來的琉球成了惡魔的基地島。一九九五年發生了美軍對少女的強暴事

件，引發了全沖繩人民的反美軍基地大抗爭，儘管縣民的投票大多人反對美軍基地，反對原普天間基地移設到名護市的邊野古海邊，然而，縣知事和名護市市長卻在本「東亞和平和人權沖繩國際大會」召開的前夕，十一月十二日公式表明決定基地移設邊野古，造成了全沖繩人民的憂慮引發了邊野古的大抗爭；同時，金城陸在「致辭」中更憂心忡忡指出沖繩面臨的未來三大問題；首先，是明年七月世界領袖高峰會談（G7）將在沖繩舉行，「現代霸權主義國家的頭頭們準備向世界誇示沖繩美軍基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吧！」其次，是美軍基地移設邊野古的問題，第三，是關於新沖繩和平祈念館中的展示竄改有關二戰末期沖繩戰歷史真相的問題。因此，琉球的朋友們是在面臨這些現實的困境中展開了這次的會議。

大會初日，在古琉球舞蹈和前沖繩縣知事大田昌秀動人的基調演講《志向一個沒有基地的和平的沖繩》之中結束。第二天進行了歷史和現場巡禮（fieldwork），參訪了淒慘的沖繩戰跡、見識了美軍基地，最後抵達了美麗的邊野古海邊；已紮營在海邊埋鍋造飯準備長期抗爭的反美軍基地團體幟飄飄迎接我們數百人加入抗爭行列，來自韓國的姜惠淑舞蹈家在海邊舞起了向冷戰犧牲

者的鎮魂之舞，韓國原慰安婦阿嬤們之手作的紅色人造花分給集會的每一個人，使阿嬤們的受難與從戰爭期待續到今天受著美軍威脅的沖繩人民的悲傷和憤怒無聲的連結在一起，這些也與從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不久後即受到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和支配，祖國被分裂的台灣、韓國人們的悲傷體驗共鳴。在沖繩的歷史和現場巡禮讓人親身感受到東亞冷戰和日美安保體制的活生生的實際存在和威脅，更令人深深感受到，東亞各地區，從日本帝國主義到冷戰美國新帝國主義支配下的百年不管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上的一貫性和共同性。

二天的學術研討會分三個主題進行：一／超越東亞冷戰體制二／東亞冷戰體制的構造和日本三／冷戰下東亞民眾的受難與鬥爭，特別第三個主題多元而充實：有來自少數民族的報告（台灣原住民和日本愛奴族）、有女性議題報告（駐韓美軍對女性的犯罪以及沖繩基地的女性運動，和慰安婦的報告）、有在日朝鮮人的鬥爭報告、有朝鮮戰爭的俘虜鬥爭報告，有日帝強擄中國奴工的報告；最令人動容的，是在大學時被韓國國家安全企劃部以捏造的間諜事件被關牢獄一四年後以非轉向政治犯剛出獄的姜勇州的報告（守護良心的鬥爭），這位剛復學的年輕醫學院學生，在細訴了他在獄中非轉向鬥爭的艱苦

經歷後說道：

「真希望我個人的體驗能夠對抗帝國主義和國家恐怖主義，開拓人權和平的新世紀，能夠為在場的大眾點亮小小的希望燈火，成為共同團結的基礎。」

在大會前二個月台灣發生了超大級的九二一大地震，造成無數人傷亡，大會特別捐助了八萬日幣，特別指明少數民族災區專用，由台灣祕書處代收（由陳映真、曾健民代簽收），發揮了大會共同團結的精神。

（四）第四屆，「紀念五·一八二十週年，朝鮮戰爭五十週年國際大會」（韓國光州市，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到二一日）

在邁入二一世紀的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到二一日，在韓國光州市舉行了「紀念五·一八二十週年，朝鮮戰爭五十週年國際大會」的第四屆會議，以「復活光州，朝鮮半島統一和東亞和平」為主題。大會開幕式當晚，為紀念光州抗爭二十週年的前夜祭，在光州市內舉行了二萬多人的火炬大遊行，場面十分壯觀。

第二天進行了歷史現場巡禮，先走訪了紀念五·一八光州事件的自由公園和墓地，再登上在朝鮮戰爭前後有名的左翼游擊隊基地——智異山，它與朝鮮現代史民眾抗爭歷史息息相關，它不只是一座山，而是朝鮮民眾

為了愛國、保衛國家以及希望建立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而獻身的民眾高貴生命的塚地。一九四八年麗水順天事件時，住在求禮郡山東面參加「女性同盟」活動的一位年輕女性，在被拉到刑殺現場時作的一首歌〈山東哀歌〉，這首歌被口傳了下來，淒厲地飄蕩在智異山頭：

多保重 山東呀

我棄你而去

一九歲的花蕾還未綻開呀

烏鴉在山谷間哀鳴

淤血的腳一瘸一拐的

來到橋頭

變成怨恨的靈魂

在蘆高壇的山谷中

無名者倒下了喲

二天的學術研討會分六個主題進行：／東亞與光州、／東亞的戰爭對民眾的大量屠殺、／歷史記憶紀念館、／國家暴力與創傷（家族和女性的苦痛）、／二一世紀南北統一與東亞和平、／綜合討論。

（五）第五屆，「朝鮮戰爭、日美安保條約和舊金山和約的五〇週年國際研討會」（京都立命館大學，二〇〇二年二月二二日到從二五五）

大會休息了一年後，二〇〇二年剛好是朝鮮戰爭、日美安保條約和舊金山和約的五〇週年，在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年從二〇〇二年二月二二日到二五日舉行了第五屆大會，以「冷戰、國家暴力和日本」為會議的主題。陳映真以台灣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致辭（實際上，陳映真並未出席，只是以書面致辭），他指出：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美國的武裝不但迫使韓民族南北分斷，也造成海峽兩岸的民族分離和對峙，韓國和台灣都成了美國在遠東戰略的前線，並且在冷戰體制下，深受民族對峙、獨裁政治和人權蹂躪之苦。在戰後的冷戰體制下，日本逃避了對自己在東亞所犯戰爭罪行的責任，成為美國霸權主義東亞戰略的工具，支持和強化東亞各反共軍事獨裁政權，二度損害了東亞人民……在人民層次上，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朝鮮、中國大陸和台灣人民曾經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有過團結互助的偉大傳統，讓我們在這偉大傳統的光照下，為了徹底粉碎冷戰體制，爭取分裂民族的再統一和世界真的和平和進步，團結一致，戰鬥到底！」

在金石範的紀念演講「轟炸阿富汗，一手遮天」結束後，進入二天的學術研討會，包括幾個主題：／日美

安保條約、舊金山和約和東亞的冷戰時代、／東亞的冷戰與性別、／分組專題討論（workshop）、／朝鮮戰爭、

／冷戰下的民眾鬥爭（報告及證言）、／綜合討論。

（六）第六屆，「紀念麗順事件五四周年——第六回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韓國麗水大學，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七日到二十日）

本來京都第五次會議結束後，與會者都已感疲憊希望暫停休息總結後再出發，但是韓國事務局強烈要求再舉辦一次麗水研討會。麗水順天抗爭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八年十月，與濟州四·三事件同格同背景，犧牲了六千人到八千人，因事件是由左翼主導，所以受難的歷史真相一直無法得到究明而被壓抑在沉默的世界，歷史清算一直沒有進展。這次主辦方希望趁年底的地方選舉和大統領選舉，辦一次國際研討會，以期麗順事件得到社會和政治的重視。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麗水大學舉行了「紀念麗順事件五四周年——第六回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二天的學術研討會分五個主題進行：／東亞冷戰體制的形成與脫離殖民化的挫折、／在東亞冷戰形成中的美加角色、／韓國對過去歷史的清算與制定特別法的經過、／戰爭與女性、／麗水順天事件與民間人

虐殺。

這次會議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榮維木參加，發表了論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冷戰體制的形成與對戰爭責任清算的影響——以中國為例〉，令人耳目一新，跟光州會議時邀請了中國南京大屠殺遭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參會發表演文一樣，都是會議的突破。這次大會還規劃了一場自由討論之夜，一是「與有參加過挺身隊經驗阿嬤的對話」，另一是「與非轉向長期囚的對話」，都是相當有創意敢突破禁忌的活動。

三、前進和後退

（一）現實政治的反撲

在韓國濟州島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主要是為紀念「濟州四·三事件」五〇週年，並為追悼犧牲者，究明歷史真相，促成立法對犧牲者道歉和補償而召開；從更大的視野來看，它也從根本上觸及到對朝鮮的美國冷戰和民族分斷體制起源的清埋和批判，在現實政治上當然會遭到保守勢力的反撲。當時韓國的政治氣氛雖已相對寬鬆，但以「國家保安法」為中心的反共獨裁制度——

冷戰分斷體制的殘留，仍然控制著人們的言論和行動。譬如，在會議前不久，拍攝了究明四·三歷史真相記錄片「不眠的吶喊——四·三抗爭」和「獵紅 redhunt」的製作者金東滿，被以國家保安法的利敵罪逮捕，而且，放映了這些作品的徐俊植（徐勝先生令弟）也遭到該法起訴。

面對國家保安法的脅迫，會議結束時韓國事務局和日本事務局分別發表了聲明文疾聲呼籲韓國當局立即撤除對金東滿和徐俊植的逮捕和起訴。另外，翌年（一九九九年）在琉球舉辦的第三次會議上，韓國事務局繼續發表了呼籲文，特別要求韓國政府全面廢除國家保安法。該呼籲文特別指出在真寬法師等一三〇多名政治良心犯依然被關在牢裡的今天，「我們相信不廢除侵害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國家保安法，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與民族統一，因此我們提出如下的主張：

第一、全面廢除日帝時代與分斷體制下的殘留——國家保安法。

第二、全面釋放因反民主惡法被捕的所有政治良心犯。

另外，大會原本邀請了留日朝鮮籍作家金石範到會上進行特別演講，卻遭韓國政府當局拒絕入境而無法成

行，這事在大會上引起了參會者的憤怒，全場一致通過了向韓國外交部長發出「金石範先生被拒入境抗議文」，結果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在參會者從「濟州四·三歷史現場巡禮」活動回來，金石範總算到達了會場，在大家的熱烈鼓掌中上台完成了「紀念演講」。根據金石範在會後發表的〈這麼困難的韓國行〉文中的記載：他認為自己一直受到韓政府「安全企劃部」的人所敵視所憎恨，他們這些由朴正熙時代的中央情報部轉身的安全企劃部的人，雖然時代已大變動的今天（金大中總統已上台），仍然脫離不了過去的情報政治的獨裁作風。金石範的臨時入境許可似乎經過韓政府的外交部、安企部和總統府之間的往返交涉後才在大會閉幕前夕批准。

由此可見，「濟州四·三事件」的真相究明（包括所有東亞冷戰歷史的清理也一樣），不單是歷史的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特別與現實政治有當複雜的關係。

（二）現實政治妥協的立法

在一九九七年第一屆台北大會上，台灣祕書處發布了「緊急呼籲」特別提出了：

「要求政府對白色恐怖犧牲者進行認真嚴的調查研究，負起法律責任，特別對冤假錯案進行謝罪和賠償」。

翌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八日），台灣立法院終於通

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及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對於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給予可以申請補償及恢復名譽的平反。同是政治受難者的陳映真很快對這條帶著濃厚的台灣現實政治妥協痕跡、殘留著反共威權色彩的補償條例表達了批評的意見。據六月一日「聯合」記者江中明的專題報導，陳映真指出了：

「該條例仍列了如「叛亂匪諜有實據者」等不得申請賠償的「排除條款」，先訂了「我是警察」和「你是強盜」的地位，卻沒有考量到即使是警察，也不能侵迫人權。該條例要受難者自己提出申請，經政府審核，若認為資格不符，可以駁回，這已是將政府放在「絕對」的立場。台灣政治受難者平反問題，一定要放在整個「戰後世界史的範疇」來討論、處理，否則永遠會有爭執。不是繞在「你是不是共產黨」的問題，而是政府為昔日不必要的大規模蹂躪人權措施承認錯誤，否則，所有國家暴力都會有「不得」「不得不」的說詞。」

相同的觀點也列入了一九九八年濟州大會（八月二一日到八月二四日）台灣祕書處發表的大會呼籲文中，有二點如下：

第一、我們反對「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及匪諜案件補償法」中，要求白色恐怖受難者否認自己的政治信仰換

取高額補償的規定。我們認為這是變相強迫政治「轉向」，是對受難人及家屬的二次傷害。

第二、我們認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是戰後世界史中冷戰構造下美國虐從國家的大規模人權蹂躪事件，政府應無條件、通案辦理道歉和包括物質、精神雙方面的補償。

「補償條例」雖然有上述的缺失充滿政治妥協的痕跡而受到政治受難人和家屬的詬病，但仍然跨出了清理國家暴力歷史的第一步。

經過四屆會議的共同努力，以及韓國內相關團體的抗爭壓力，終於使黑暗的歷史真相大白，實現了韓國政治受難者的平反和補償。一九九九年，韓國國會終於通過了「清算過去歷史的三法」，即「濟州四·三事件真相追究、名譽恢復法」、「民主化運動關聯者恢復名譽及補償法」、「可疑死亡真相究明特別法」等。

二戰結束，在殖民解放後的歡喜中，大批追求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的朝鮮、台灣民眾，在襲來的東亞冷戰和民族分斷的狂暴中仆倒，五十年間長期被埋葬在冷戰獨裁的黑暗歷史中。在二十世紀將結束，迎向二十一世紀的前夕，經過殘存受難人和進步團體的不斷抗爭下終於照亮了黑暗的歷史，受難者得到平反和補償；然而，

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的思想和願望，在後冷戰和民族分裂斷制依然統治的現實中，前途仍然充滿荊棘，只有靠東亞民眾的共同團結不斷鬥爭才能實現。

四、結論

曾經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共同為反帝反法西斯鬥爭而團結在一起的東亞人民，戰後在美國冷戰和國家暴力的支配下，分別走過了五〇年的苦難道路；「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由人民自己的力量衝破了向來為統治者所壟斷的國際團結，實現了半世紀的再會和自主團結，為清理歷史反抗冷戰體制追求分裂國家的「再統一，實現社會解放和世界和平再一次團結在一起。

會議都是各地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民間團體或個人自費參加，每次大會至少四天，飛機往返和住宿所費不貲；且每次都有數百人參加，連年開了六會議，每場會議事前都準備好三種語言的論文集，會中都有同步翻譯，這些都是四地事務局義務工作人員在幕後不眠不休的成果，再加上會場會務的龐大開銷，對經濟拮据的反體制運動團體來說負擔可謂不小，然而在堅持共同信念讓

東亞民眾共同前進的火炬不再熄滅，還是在東亞的大地上實現了再團結。這在亞洲戰後現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突破。

六次會議累積的論文包括專論、報告、歷史證言多達一百多篇，除了東亞冷戰和國家暴力歷史的主題之外，還有許多有關女性、少數民族、勞工、慰安婦、日帝強虜奴工、在日朝鮮人的鬥爭、朝鮮戰爭中的細菌戰、日帝侵略中國歷史等多樣議題，可以說是一部東亞百年人民歷史的真實記錄。

每次會議除了學術研討會之外，還有歷史現場巡禮、文化活動、分組討論，大大增進了與會者對各地鬥爭歷史的親身體驗，以民主的方式增進交流和互相學習。

會議不單處理歷史問題，還對當時發生的新現實問題立即發出共同的呼籲和抗議。譬如，在濟州島會議上台灣事務局就發出了呼籲文，批判李登輝政權對兩岸的「戒急用忍」政策，竄改歷史教科書問題，且反對「日美安保新指針」「周邊事態法」，以及反對美國在東亞的十萬駐軍、支持沖繩人民的反美軍基地運動等等。在第五屆京都會議上，以全體參會者的名義共同對當時美國布希政權的軍事帝國主義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批判。

雙戰結構與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 形成及其特質——以五十年代為中心

曾健民

提綱

- 一、本人的主要觀點
- 二、從兩個概念開始
 - (一) 雙戰結構的概念
 - (二) 波那巴國家的概念
- 三、台灣復歸中國後形成的國民黨政權（一九四五—一九五零）
 - (一) 中國內戰形勢中的地方政府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八）
 - (二) 國民黨中央政府遷台，在台灣建立內戰反共政權時期（一九四九—一九五零）
- 四、雙戰結構化過程，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質變為「波那巴式國家」（一九五零年六月二五日以後）

- (一) 冷戰與內戰結合（雙戰形成）
 - (二) 美國在東亞冷戰中的對台「支援」體制（美援體制）
 - (三) 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確立——國民黨改造、農地改革、地方自治、白色恐怖行動
 - 五、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支配構造及其特質
 - (一) 政治構造與支配機制
 - (二) 社會經濟構造與支配機制
 - (三) 社會控制—反共戒嚴體制
 - (四) 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對東亞冷戰的扈從性與一定的自主性
- 六、結語

前言

一九七九年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同時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這搖撼了自韓戰爆發以來，美國在東亞冷戰戰略中所扶植的台灣的國民黨國家，使其面臨外部正統性的危機，同時也觸發了內部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的。一九八七年，辭世前半年的蔣經國親手解除了長達三七年的戒嚴，並且將啟動黨國機器的鑰匙交給李登輝，國民黨國家正式進入「大轉型」期。

經過十年的混亂，「大轉型」的結果，雖然取得了從里長到總統經普選產生的初步民主形式，使台灣社會的新興政治勢力全面取代了戒嚴體制的舊勢力。但是這轉型實際上是有些微調整的國民黨國家的憲政法統框架下進行的，而且合流的術大黨仍然表現了以反共、反華、親美、親日為其主要意識型態的特徵，以「國家安全」為首要政綱，同時以「經營大台灣」的國家認同口號取代「光復大陸」的舊口號。以此觀之，轉型後的「國家」仍然處於五十年代形成的，內戰與冷戰的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延長線上。

所以，追本溯源客觀地認識五十年代在台灣國民黨

黨國家的形成及其特質，不但有歷史的意義同時也有現實的意義，更是討論戰後台灣社會性質的重要一章。

一、本文的主要觀點

現時對國民黨國家特質的論述或觀點，不是強調其獨裁性、威權性、封建性、外來性甚或殖民性的一面，就是主張其自由中國、正統中國或經濟成就的另一面。

這些觀點都局限於片面、浮面的描述，或僅止於感情論、道德論的層面。在現實上，都無法說明八〇年以後國民黨國家轉型的動力和轉型後的政權與轉型前政權之間的繼承性。在歷史上，也無法說明舊國民黨國家在各方面表現的兩面性，譬如；其民族主義的成分和反民族主義特質；政治戒嚴與經濟發展的共存；經濟上榨取的部分和促進的部分；對外關係的扈從性和自主性；等等。更無法說明，台灣社會從殖民地。地主佃農制為主的社會「過渡到小自耕農制為主的社會」進而發展到資本主義制為主的社會，在這社會發展過程中國民黨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認為首先必須克服冷戰意識型

態的限制，其次要跳脫把台灣從中國當代史和世界冷戰的現實孤立出來的，所謂本土中心主義者的歷史唯心論式的謬誤。然後把戰後台灣具體的歷史脈絡，運用社會科學的知識來研究，才能根本解明。

具體地說，只有把光復後台灣社會的變化，放在中國內戰與東亞冷戰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來認識，才能客觀地、本質地說明五十年代在台灣形成的國民黨國家的性質，這是本文的主要觀點。因為篇幅的限制，本文也只討論五十年代前後台灣的國民黨國家的形成與性質。

二、從兩個概念開始

為便於討論，首先說明本論文主要運用的兩個概念來討論；一個是雙戰結構的概念，另一個是馬克斯理論中關於波那巴國家性質的概念。

（一）雙戰結構的概念^{（註1）}

一、世界冷戰、東亞冷戰與台灣雙戰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除了造成法西斯主義的敗亡外，還造成原歐洲資本主義世界的崩潰連同其殖民主義的瓦解。這也使原來建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需

求上的美國高度生產力面臨危機。如何取代舊世界，重新創造美國主導的新世界市場，維持美國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就成為戰後美國政府的最大課題。世界冷戰就是，戰後美國在全世界的擴張、建立霸權的過程中，與全世界各社會主義勢力、民族解放勢力之間，產生的各種軍事、政治、經濟形式的對抗。它以美、蘇兩極對抗為主軸，這兩極對抗又擴散到世界各地各民族，以各種形式介入各地的社會矛盾，而形成世界規模的兩陣營對立。

東亞冷戰是世界冷戰一組成部分，^(註二)又有東亞地區的特殊性。原支配東亞的日本帝國主義和西歐帝國主義崩潰後，太平洋戰爭的唯一勝者美國，迅速充填地域霸權真空，介入解放後各民族內部矛盾，而與反法西斯右派、法西斯殘餘、封建、舊殖民勢力結合，隨著歐洲冷戰與中國內戰情勢的進展，漸次扶植這些勢力來鎮壓、排除各民族階級與民族解放勢力。這是戰後東亞各國各民族共同的歷史，也是東亞冷戰的起源和本質。

同樣地，戰後，美國也積極介入中國的國共內戰，但中國大陸的巨大內戰形勢非美國所能左右，因而於一九四七年以後漸漸採袖手政策。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中央政府從大陸潰退，遷逃台灣，一九五零年二月新中國

與蘇聯簽訂友好條約，採親蘇反美路線。同月美國國內，以麥卡錫議員激烈的反共論調為中心掀起反共狂潮，六月韓戰爆發，美國再度介入隔海對峙的中國內戰，將台灣納入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前哨，積極扶植遷台的國民黨反共政權，以圍堵中國和遏止全世界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革命浪潮，這就是台灣雙戰的起源。

二、雙戰結構的涵意^(註三)

戰後，從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支配下解放的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殖民支配的後果，其社會內部都普遍存在階級解放或民族解放勢力與封建、舊殖民勢力之間的矛盾；矛盾的極端形式便是內戰。同時，隨著戰爭結束而逐漸顯露的，以美蘇兩極對抗為主軸的冷戰，因為它在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抗的本質，則必然或先或後、或強或弱地，擴張、介入各國的內戰。結果，冷戰改變了各國內戰的自然進程，使應在內戰中消失的階級或勢力，人工地重獲生機，而阻止、延遲、扭曲了社會的自然變革。此本文略稱雙戰。雙戰以各種形式，普遍發生在戰後第三世界國家，構成世界冷戰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冷戰的特征之一。當雙戰狀態長期化或固定化，相對於該民族或社會便形成雙戰結構。

冷戰不只在軍事層面將內戰固定化，而且隨著世界

冷戰的進展和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各層面，總體地進一步強化它、改造它，使內戰質變成一個新的結構體而扈從於冷戰意志，這就是雙戰結構。雙戰結構除了扭曲民族、社會的自然變革外，還進一步造成：

- ① 改變政權形態、法政體制、經濟制度、階級關係。
- ② 以各種結構性機制，改變文化、價值系統、意識形態、和人的心智。
- ③ 使民族內部的對立、仇恨、分裂結構化。

這雙戰結構，不只是世界冷戰結構的一部分，也是維持、擴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不可不認識到的。

(二) 波那巴國家的概念 (註四)

依馬克斯的國家理論，簡單地說國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社會經濟上占統治力量的支配階級，在政治領域的代理機關。依這理論，雙戰結構下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國家嗎？若不是，如何說明它龐大的國家機器、強大的國家權力，及其對台灣社會發展的支配力呢？若是一個國家，那麼它是台灣社會那一個階級的代表呢？至少在五十年代，它不但不是台灣社會任何一階級的代表，甚至還是台灣新興階級的創造者。雖然六〇年代以後，它走上發展台灣資本主義的路線，可是它只是路線

的執行者，並不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理者。七〇年代，雖然它不斷擴大與台灣資產階級的同盟關係，但直至八十年代為止，它依然維持對資產階級的支配地位，而非其代理者。因此「至少到八〇年代的轉型期為止，它一直不是一個階級性「國家」。

馬克斯的國家理論中，曾討論過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個沒有特定階級屬性的「例外國家」，那就是波那巴國家。(註五)把五十年代國民黨政權與馬克斯討論的波那巴國家相比對，兩者在政治形態上與對社會的關係上的主要特徵，有下列相同點——

① 不代表社會的任何階級，只代表其本身的集團利益

② 社會弱化的基礎上，個人高度獨裁，「國家」高度、自主，各階級皆屈服其下

③ 龐大的軍隊、特務、官僚、牢牢吸附社會每一細胞

④ 政權存立的社會基礎主要是小自耕農

⑤ 資產階級雖然在政治上遭到排除，在經濟上，其資本卻獲得意外的發展

⑥ 是一個過渡性的、人工性的擬似國家
構成馬克斯理論中的波那巴國家的另一要件是，「特

殊的歷史條件」。因社會的歷史階段不同，所以兩者的「特殊歷史條件」也不同，國民黨政權的特殊歷史條件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雙戰結構，而波那巴國家的則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法蘭西內戰。雖然如此，本文認為馬克思理論中關於波那巴國家的概念，重點在於這特殊「國家」的政治形態及它與社會的關係，特別是它與資產階級的關係這一點，並不在於有那些具體的「特殊歷史條件」。基於上述理由，本文認為用波那巴國家的概念，來概括五十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性質，是值得嘗試的。

下文嘗試通過分析戰後台灣社會在國共內戰和東亞冷戰制約下的具體歷史過程，來討論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形成和形成過程中「波那巴國家」特質的確立，進而分析其具體特徵。主要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零年間，討論台灣社會在光復、復歸中國和國共內戰進展的形勢中，形成的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以及其對台灣社會的主要支配內容。第二部分是討論，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爆發，台灣被編納入東亞冷戰前線，雙戰結構形成，在這特殊歷史條件下，國民黨的「波那巴式國家」如何確立。第三部分是，分析其政治社會控制機制、經濟結構和它對東亞冷戰的關係。最後一部分是結語。

三、台灣復歸中國後形成的國民黨政權（一九

四五—一九五零）

台灣的雙戰結構，包括三方面不同歷史條件的滙合，它包括復歸中國後的台灣社會、中國內戰以及東亞冷戰。而且這三者不是同時同步滙合的，有一定的歷史先後。

首先是一九四五年光復後的台灣社會馬上包攝入中國內戰的形勢中，然後在韓戰爆發後再被組入東亞冷戰範圍。

從光復到一九五零年間的台灣歷史變化，總的說是在中國內戰範圍內的變化。（註六）它又經歷兩時期，首先是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間，台灣復歸中國後，在中國內戰情勢進展中的地方政府時期。其次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零年間，在內戰中潰退台灣的國民黨中央政府「以台灣為根據地，建立內戰反共政權，與新中國隔海對抗時期。這期間，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社會建立了各種支配機制，它包括國家資本主義、對農業的榨取機制、反共恐怖統治體制等。

（一）中國內戰形勢中的地方政府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八）
台灣光復復歸中國後，隨即包攝入中國國共內戰的

大環境。處於「內戰第二」狀態的國民黨南京中央政府，在台灣設行政長官公署，行特殊統治。^{（註七）}將接收的日資

日產公營化，施行國家資本主義，它不但是國民黨政權的重要物質基礎，同時也成為往後台灣政經發展中的重要特色。^{（註八）}雖然因政權的階級性格，溫存了台灣的地主

佃農半封建土地制度，但為了戰後重建及調節米糧的現實需求，先後施行了田賦徵實、隨賦征購、肥料換穀等米穀徵收體制，^{（註九）}這些是往後五十年代農業榨取機制的起源。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廢行政長官公署制改行普通的省政府制，節節升高的國共內戰和經濟混亂沖擊台灣，通貨膨脹使經濟瀕於崩潰。

（二）國民黨中央政府遷台，在台灣建立內戰反共政權時期（一九四九—一九五零）

一九四七年初，馬歇爾調處中國內戰失敗後，美國對政府的支持開始採不冷不熱的態度，使國府在內戰中節節敗退。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初，命其心腹陳誠任台灣省主席，掌台灣黨、政、軍、產大權，著手準備國民黨中央國家機關遷台。年底遷台後，國共內戰便成為隔台海對峙局面，這時期主要有下列特徵：

一、台灣與大陸再度長期隔離^{（註十）}

陳誠首先實施入出境管理，斷絕與大陸商貿。又將國庫黃金遷台，並以此為發行準備，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發行新台幣，截斷與中國大陸金融與匯兌關係。至此，光復後復歸為中國社會一員的台灣，不足四年後，再度因為國共內戰而與中國大陸隔離。次年，冷戰進一步凍結內戰，使隔離固定化，長達四十年的社會隔離自此開始。

二、反共恐怖統治體制。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在台灣實施戒嚴，長達三七年的戒嚴體制自此成立。再加上同年八月由蔣親手重建的，以「政治行動委員會」為名的特務系統，開始對台灣社會的變革勢力進行反共鎮壓。戒嚴體制與特務系統成為往後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執行白色恐、怖政策，維持高度獨裁的重要工具，也是台灣國家恐怖主義的實體。

三、內戰反共政權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國府中央機關倉促遷台，代表舊中國社會的地主、官僚資本、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國家，失去了它統治的社會。只有上層法政體制遷逃台灣，架疊在光復後形成的地方政府上組成「國家機關」，加上一同遷逃的軍隊、特務、官僚，形成了內戰反

共政權。同時，開始著手實施第一階段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試圖將台灣社會改造成「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這時期的內戰反共政權，雖然在台灣仍維持它從大陸遷逃來的上層國家機關，但這機關已失去了它在中國大陸所代表的階級和統治的社會，失去了做為「國家」的資格，所以只算是一個武裝政治集團。可以說，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國家，已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走進了歷史。另外，雖然它已具有各種「國家」的形式要素（依上面所述，包括國家資本、農業榨取機制、反共恐怖統治體制、國家機器），因為它的不穩定、性、龍暫性、純軍事性，所以也只算是因戰政權。就像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分析的：「雖然國民黨政權已牢牢地控制台灣，但若有沒有美國的援助或占領，將在一年內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併吞。」它處於風中殘燭，瀕於滅亡的邊緣，在中國內戰的範圍內，隨著中國民族的、社會的自然變革，將隨時消亡。但不久之後，一個新的歷史條件改變了中國內戰的形勢，扭曲了中國內戰的自然進程，改變了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的命運，賦予它新的生機和改造它的性格。那就是韓戰爆發，美國將台灣強編組入東亞冷戰的前線，台灣被置於雙戰狀態之下，雙戰結構逐漸在台灣

形成。

四、雙戰結構化過程，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質變為「波那巴式國家」。

冷戰與內戰在台灣의 結合，就是美國在東亞冷戰的軍事反共體制與在台灣의 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的結合。

美國以戰後世界霸權的地位，在軍事、政治、經濟、意識型態各方面，全方位地扶植垂危的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替美國進行東亞冷戰的反共圍堵任務。美國軍事反共體制在台灣의 實體就是美國「對台支援體制」，在這支援之下，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起死回生，對台灣社會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與鎮壓，更深入而穩固地建立了對台灣社會的支配基礎。在這雙戰結構化的過程，使過渡的、不穩定的、缺乏社會內容的、內戰反共政權，質變成一個更反共的、半人工的「波那巴式國家」。

（一）冷戰與內戰結合（雙戰形成）

一九四八年，內戰中的國府兵敗如山倒，年底，開始著手遷逃台灣。美國也隨著試圖從中國大陸內戰中抽

身，轉而著重於如何把台灣置於其勢力範圍內，因此開始將台灣問題與中國問題分開對待，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

美國表現在對台政策上是：阻止蔣介石逃來台灣，以及在台灣扶植其他親美勢力取代蔣介石，甚至於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表對華白皮書，宣布放棄對蔣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雖然如此，蔣還是牢牢地控制了台灣，建立了上述的內戰反共政權。當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又轉而尋求與新中國維持關係，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美國對台灣沒有政治、軍事或占領的野心。（註二）

與此同時，另外一面新的世界形勢也正在急速發展中。首先是一九四九年的世界經濟仍然處於戰後的蕭條與停滯，世界美元缺口繼續擴大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處於危機狀態，同年八月蘇聯核試爆成功，打破美國的核獨占，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年底扣留美駐瀋陽總領事，次年一月沒收北京美總領事館，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條約等等，新中國採一連串反美親蘇的路線。這些世界形勢對美國的挑戰，在美國國內掀起了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的反共歇斯底里現象，窒息了美國國內自由主義的勢力，使美國的

對外關係也更朝向僵硬的反共路線。對日占領政策也更向右轉，從一九五零年五月開始如火如荼的展開，對左翼勢力的排除與鎮壓。反映這種美國國內的反共狂潮，美國的世界冷戰戰略也進入新的階段。它集中表現在一九五零年四月的NSC六八號文件上，這文件強調以全面性的軍事圍堵，以對抗全世界各處的社會主義革命及民族解放運動，並且強調必要時毅然以武力還擊，美國的世
界冷戰戰略進入了軍事圍堵的新時期。二個月後，這文件的內容，以韓戰爆發而形式展現。（註三）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五日韓戰爆發的第二天，杜魯門便發表「海峽中立化」宣言，強調「台灣地位未定」。企圖排除新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同時也否定在台灣的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對台灣的自主權，強調美國對台灣的處置權。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海，凍結中國內戰，台灣被置於東亞冷戰的前線，接著美國對台「支援」體制進入台灣，完成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大半月形島嶼圍堵鏈鎖。這變化，一方面拯救了在台灣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瀕於滅亡的危機，另一方面也開啟了美國重新介入中國內戰，改變在台北內戰政權的性質以及改造台灣社會的大門。

（二）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對台「支援」體制（美援體制）

美國以對台「支援」體制來執行它在台灣的東亞冷戰意志。它強而有效地提供一個安定的政經環境，以及對外對內的「國家」要件，使在中國內戰範圍內，瀕於滅亡的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質變為一個半人工的、穩定的「波那巴式國家」，為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反共圍堵目標服務。這「支援」體制包括：

一、在機構上：
包括美方的軍事顧問團、大使館、美援駐台分署，它單獨代表美國政府在台灣直接執行東亞冷戰意志。台灣則有美援會、農復會，這兩機構獨立於台灣行政系統之外，配合執行美方政策。

二、在軍事方面：
以第七艦隊進駐台海，凍結中國內戰。並且以近三十億美元的軍援，強化國民黨政權的防衛能力，但限制它進攻大陸的能力。

三、在政治方面：
支持國民黨政權的對外合法性（如國際外交承認、聯合國席位、以及各種國際組織的會員資格），以強化其對台灣社會的內部正當性。製造自由中國、正統中國的形象。

四、經濟方面：

扮演第二財經內閣的角色；以美援彌補財政與國際收支赤字、抑制通貨膨脹、策定並主導經建計劃、又透過對公營事業貸款進行社會基礎建設、通過農復會加強農業基礎建設，以及對私人企業進行貸款。

它的主要目的，當然在於使國民黨政權執行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圍堵目標。另外，它又創造了，台灣往依賴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社會條件。如，促成第二、第三階段農地改革（小自耕農形成的條件）、制約公營事業擴張、鼓勵私人資本，促成重建日台經濟關聯。而最重要的是培養一批親美的美援經技官僚（如嚴家瀚、李國鼎、李登輝），^(註14)為下一階段台灣而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人的和意識型態的條件。這些也內化成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重要特質。

（三）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確立——國民黨改造、農地改革、地方自治、白色恐怖行動

國民黨政權得到了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對台「支援」後，重獲生機，立即對內部進行一系列的改造。因為冷戰的「支援」，充其量只是政權存立的外部要素，若沒有強力的社會基礎，就成了完全人工的傀儡政權。因此，它一方面進行國民黨內部的改造，另一方面也通過對台

灣社會的政治、經濟大改造和白色恐怖行動，進一步建立社會統治基礎，確立對社會的高度支配力。

它的改造包括四方面：

一、國民黨改造：（註一五）

韓戰爆發，獲得美國對台「支援」的次月（就是一九五零年七月），蔣介石成立了「國民黨改造委員會」，進行長達二年的改造。改造的結果是，排除異己，進一步確立蔣介石個人在黨內的獨裁地位，強化「以黨治國」方針，也就是建立「以黨領政、以黨領軍、以黨領特、以黨領社」的國民黨專制體制。它的特點是，高度獨裁的蔣介石；透過黨組織，控制軍隊、特務和政府，以此再進一步控制全社會。

經過這改造，將龐雜、腐化的黨與國家機器，轉變成更高度集中，更反動化的反共組織。使它對台灣社會維持更高度的獨裁性，也對美國在台冷戰意志保持相對的自主性。改造過的國民黨是「波那巴式國家」的靈魂。

二、農地改革：（註一六）

在農復會及其美國顧問（如雷正琪（W. Ladinsky）等）的指導下，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進行了第二、第三階段的農地改革，瓦解數百年來支配台灣社會的半封建土地制度，造成了小自耕農經濟成為當時台灣社會

的主要經濟內容，同時也造成了新興工業資產階級。它改變了台灣社會原有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一致性，促進了台灣的社會生產力。另一方面，由於小自耕農就不具備集體勞動過程，只有家族勞動的特質，無法形成集中的政治力經濟力，由於這種小自耕農為主的社會的先天特性，成為波那巴性質的「國家」存在的先決條件。再透過對小自耕農的發展與榨取機制，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得到了存立的社會經濟基礎。另外，小自耕農的形成與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也給新興工業資產階級，提供了國內市場，以及資本積累的源泉，進入六十年代，更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業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因此，農地改革是使國民黨政權跨入「波那巴式國家」門檻的重要一步。——

三、地方自治：

農地改革改變了台灣地方社會的生產關係，由地主佃農制進入了以小自耕農制為主的社會。國民黨政權在地方社會的政治領域也進行一次改革，也就是在一九五零年年底開始舉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實施地方自治。相當程度地反映了農地改革後，小自耕農和地方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在下面將提及的「以黨領政」的機制下，這地方自治卻又成了「國家」控制社

會的中介機構。

四、白色恐怖行動：（註一七）

在國民黨敗退台灣，未被組入東亞冷戰之前的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就已展開對異議人士以及追求社會變革的人和組織，進行搜捕、監禁，但這是在中國內戰範圍內，根由於民族內部矛盾的鎮壓。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爆發，台灣被納入東亞冷戰前線，雙戰結構形成以後，取得美國冷戰支援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反共歇斯底里症的強化下，就肆無忌憚地，進行大規模的、殘酷的追捕、鎮壓、秘密審訊、監禁和刑殺，使全社會陷入恐怖氣氛，人人自危。白色恐怖行動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中，雖然難以統計，被捕入獄人數大約上萬，有四千到五千人被刑殺。

這白色恐怖行動是台灣雙戰結構的重要歷史特徵，它除了是內戰的產物外，最重要的是東亞冷戰的產物，具東亞冷戰史的普遍意義。也是當時美國國內反共歇斯底里症透過冷戰擴及東亞各國，在其扶植的反共政權手中執行的，更澈底的國際紅色大清滌。在台灣，它不但滅絕了所有追求社會變革的人與組織，同時也斷絕了這方面的知識、思想、哲學、藝術，使雙戰結構的意志、思想和意識型態長期支配一切。這在社會意識領域方面，

構成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長期執政的重要條件之一，也是今日的台灣思想文化以及國民意識仍然停留在反共、親美日狀態的結構要素。更重要的是它替資本的原始積累準備了無阻力的社會條件，為台灣資本主義依賴美國的發展開闢了無障礙的大道，使台灣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無後顧之憂的條件中得到意想不到的發展。

五、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支配構造及其特質

經過上述的質變過程，雙戰結構下的國民黨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支配構造與機制的特性，總括地說，就是以高度獨裁的形式，來維持其反共集團的存立，同時扮演台灣資產階級保母的歷史角色。下面將分別討論。

（一）政治構造與支配機制

由於「以黨治國」、「黨國不分」的黨政關係，廣義的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應該包含國民黨組織，這是很重要的特點。軍隊、特務在形式上雖然屬政府的一部

分，但實際的領導權乃由黨組織掌控（最終極是由蔣介石控制）。因此，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是由國民黨及執行黨意的政府、軍隊、特務組成，而政府則包括中央政府 and 地方政府。

一、中央政府及代議機關（總統、五院及國大等所謂憲政法統體制）

所謂憲政法統體制，形成於大陸內戰中的一九四七年，行憲不滿半年就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法、以及各種總動員法，凍結了「憲政精神」，它就是上面曾提及的遷台上層法政體制。在遷逃台灣後，為了強調它的對全中國的正統性，以便維持內戰反共政權的合法性，以及為了對外宣揚自由中國的形象，這憲政法統體制繼續成為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上層法政建築以維持它的「憲政外殼」。但是實際的政治運作機制是：「以黨領政」，在黨組織控制下實行行政獨裁，司法權與監察權也相同。以立法院和國民代表大會組成的國會更是御用化，成為永不改選的政治花瓶，就是一般所謂的一萬年國會」。

二、地方政府和地方代議機關 （註一）

地方政權是經定期普選產生的，代表農地改革後，各地新興資產階級在地方上的政治力量，應該具有資產

階級的性質。但因為國民黨以黨領政的特質，國民黨透過輔選或用地方政經特權的交換，來製造地方派系，進而控制地方政治。並以此來交換地方政治菁英的效忠和選票，互相形成恩庇侍從關係。地方政治反而成為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與社會民衆的中介，控制地方社會的一種機制。

從上面分析可知，那些具資產階級形式的中央憲政法統體制和地自治，只是虛有其表的政治外殼。實際的政治支配機制，是以極端的反共主義為最高國是，由個人高度獨裁的蔣介石通過黨組織控制政府、軍隊、特務，再由這些來控制全社會，而反共戒嚴體制是使支配成為可能的原動力。這種政治結構和支配機制使全體國民不分身分、階級、族羣都臣服其下，它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的利益，只代表其自身集團的利益。充分顯示「波那巴式國家」的政治特質。

（二）社會經濟構造與支配機制

台灣的社會經濟戰後經過二次大變革，首先是一九四六年接收日資日產的公營化措施，以及五〇年初期雙戰結構下的農地改革，形成了下列四部分的構造。

一、小自耕農經濟：

產生於農地改革，是五十年代台灣社會經濟的主要

部分，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存立的社會基礎，也是新興工業資產階級資本積累的源泉。

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以龐大的公營事業（國家資本）為基礎，在美援的支持下，形成強力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是「波那巴式國家」對社會經濟支配的權力來源。一方面它是國家財政的手段和對私人企業的支配工具，另一方面也為農業和私人企業的發展提供外部環境。

三、民間資本主義經濟：

產生於農地改革中，國民黨國家以四大公營事業股票（水泥、製紙、農林、工礦）做為對地主地價的補償，這四大公司加上大陸遷台的紡織資本，就構成了台灣民間資本主義的起點。在美援貸款以及「波那巴式國家」進口替代保護政策下，於政治戒嚴的台灣社會環境中，得到快速的發展。

四、小商品經濟：

由日據殖民國期就已相當發達的零細工商業組成，做為上述三種經濟的補充，一直保持相當穩定的比重，它成為日後台灣中小企業的主要來源。

小自耕農經濟是五十年代台灣經濟的牽引車，其他三者的發展都是立基於小自耕農經濟的成長，它們之間

的經濟聯結機制，是依靠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機制，才得以進行。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國家」直接對農業的發展（農復會、農會）

與榨取機制（米穀徵收體制與分糖制），這機制使農業剩餘轉移到「國家」部門，一部分成為「國家」維持存立的資源，另一部分則輸出創匯，分配給工業部門作為輸入原料、機器的外匯來源。

另一方面是，「國家」對工業部門的進口替代保護政策，當時，農村是國內的主要消費市場，因而產生了農工間的不等價交換機制，工商業則透過這不等價交換機制，使農業剩餘轉化成資本積累的源泉。

第三方面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機制，它一方面維持「國家」在財稅上的自主性，同時創造私人資本積累的外部環境。

總之，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社會經濟特徵是，一方面扶植小自耕農，一方面則透過對小自耕農的榨取機制，收奪農業剩餘，以維持自己集團的存立，同時促成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

（三）社會控制——反共戒嚴體制

雙戰結構下的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另一個最重要的特徵是，極端的反共主義。五〇年初的白色恐怖

行動為其最極端形式，白色恐怖行動隨著韓戰停火而逐漸緩和，取而代之的是延續三十年以上的反共戒嚴體制。

這極端的反共主義可以說，是對全社會的絕對命令，從蔣獨裁者以下的黨政軍特到販夫走卒，不分貴賤、不管上下，莫不屈服於這絕對命令之下。所有的政治運作、經濟循環、社會原理、文化創造，莫不在這絕對命令的限制範圍內進行，它是所有的感情、思想、創造活動的絕對範圍，超出這範圍，就像所有的數字碰到零一樣，化為烏有。極端的反共主義體現於反共戒嚴體制，廣義的反共戒嚴體制包括社會意識控制、社會行動限制以及特務網絡三部分。

一、社會意識控制：

首先是對教育系統的控制；從小學到大學，全面實施訓育或軍訓教育，對學生灌輸反共愛國思想。另外，又對十八歲以上青年實施徵兵制，接受二到三年軍事訓練，從根底強化青年的反共愛國意識。再加上對新聞、雜誌、書刊、廣播、電影、等大眾傳播媒體的嚴密控制，對全民製造反共、愛國、親美、封建、保守的社會意識。

二、社會行動限制：

以「戒嚴法」、「國家總動員法」、「非時期人民團體法」等法令，限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

社的自由，扼殺國民的社會行動自由和阻礙社會關係的自然生成，使社會原子化、去動員化。然後進一步將國民的社會生活，組織到由國民黨控制的御用社會團體中（如農會、工會、公會、商會等）以便利操控。

三、特務網絡：

反共戒嚴體制的特務機構，因權力中心的轉移而不斷改變，若以五十年代末為基準來看，則包括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警政署、憲兵隊等單位。它無所不在地吸附在社會每一細胞上，以「戒嚴法」、「懲治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等多如牛毛的反共法，窒息社會每一細胞，監視著每個國民的行動。形成一頭隱身黑暗的巨獸，隨時吞噬越出極端反共主義範圍的每一個國民，製造了大量的政治良心犯。

這反共戒嚴體制的功能，當然主要在維持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的存立與運作，另一方面也創造了資本快速積累的社會條件，尤其六十年代以後，以勞動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為牽引車的資本主義發展，反共戒嚴體制更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四）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對東亞冷戰的扈從性與一定的自主性

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基本上扈從於東亞冷戰，

但由於它在中國內戰的長期鬥爭的歷史經驗，以及它在被納入東亞冷戰之前，已在台灣建立了對社會的支配力，所以相對東亞冷戰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它可以在東亞冷戰轉化的過程，長期穩固地存在。這一點，是它和東亞其它政變頻繁的冷戰傀儡政權不同之處。

尤其以五十年代的情況來看，它與美國對台的冷戰意志之間，就有統一面也有矛盾面，其內容如下：

在政治軍事目標上；其統一面是軍事反共，其矛盾面，國民黨國家是堅持一個法統中國進行軍事反攻，美國是分離中國與台灣，進行冷戰圍堵。

在經濟目標上；其統一面是安定經濟，其矛盾面，國民黨國家是強化國家資本和小農經濟以支應軍事財政，美國則是著重於創造一個依賴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環境。

雖然如此，從長期來看，歷史總是朝美國的東亞冷戰意志大方向發展，只是在這大方向中，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維持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這兩面性是往後台灣社會與國民黨國家發展和轉型的原動力，使「波那巴式國家」長期執政的原因也是今日轉型後政權與轉型前體制之間的繼承性的要因。

六、結語

本論文是以雙戰結構的觀點和波那巴國家的概念，討論五十年代前後，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先後在台灣社會結構化的歷史過程中，國民黨內戰反共政權的形成以及轉化成「波那巴式國家」的歷程，進而討論這「波那巴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支配結構和特質。

國民黨「波那巴式國家」包括龐大的黨、政、軍、特組織，它的運作是以蔣個人高度獨裁為頂點，透過黨組織控制政府、軍隊、特務，進而控制全社會。而使這控制運作成為可能的是；東亞冷戰中美國對它的全方位支援體制，以及在這支援下的白色恐怖行動、反共戒嚴體制和「國家」在經濟上的自主性。這使所有的階級、族羣、個人不分貴賤皆屈服其下。在社會經濟方面，它進行了農地改革，創造了自耕農和新興工業資產階級，並以對小自耕農的發展與榨取機制為基礎，將小自耕農剩餘轉移到自己手中，維持自己集團利益，並且分配給新興資產階級，而且新興資產階級也在「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下得到快速發展。雖然如此它不屬於資產階級，也不代表任何階級，它通過上述對政治、經濟、社會的控制機制，維持自己的存立，追

求自己集團的利益，和扮演催生台灣資產階級的歷史角色。它以虛擬的反攻復國目標，維持極端的反共主義，以這絕對命令取代所有的知識、思想、哲學、意識型態，扼殺了社會對自由、正義、合理的追求。

對台灣社會來說，它是如此巨大、無所不包、至高無上的存在，但無論如何，它只是雙戰結構，這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也就是東亞冷戰與中國內戰結合中，冷戰扭曲了中國內戰的自然進程（民族、社會的自然變革）的特殊產物。在內戰被冷戰長期凍結的狀況下，它主要扈從於美國在東亞冷戰的意志，尤其進入六〇年代，它除了繼續雇從於美國的冷戰圍堵意志外，又依隨美國資本的意志改造台灣社會，進行依賴美日的資本主義發展，更顯現出它的扈從性與代理性。

這樣，台灣社會的發展，當然不可能有獨立自主的、自然的發展（台灣的社會歷史從來就沒有獨立自主的、自然的發展），只要雙戰結構或其變形（如八〇年代以後，中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後的，美國對台灣的一與台灣關係法體制）繼續存在，台灣的政權與社會的特殊性、扈從性（非自然性、非自主性）和繼承性就繼續存在。

本論文寫作過程，承蒙陳映真先生的多方指導與鞭策，併此致謝

註釋

〔註一〕「雙戰結構」對戰後台灣社會發展的規定性作用的概
念，散見陳映真先生諸多論文。而「雙戰結構」的
用詞以及意涵，則是筆者與陳先生反覆討論中形成
的。

〔註二〕關於東亞冷戰請參考：①Michael Schaller 原著，郭俊
鈺譯（一九九二）〈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金禾出
版社。

〔註三〕雙戰結構的作用模式依序是：外部作用於內部，內
部上層建築作用於下層建築。內部上層建築就是政
治領域，扮演工具性角色，是外部力量與內部下層
建築力量之間的平衡物。在這裏的具體關係是冷戰、
內戰雙重結構國民黨政權、台灣社會。

〔註四〕最早以波那巴國家的概念，討論國民黨政權性質的
是陳映真先生，於一九八九年在遠望雜誌上發表的
文章〈美軍基地——反共波那巴國家的成立〉。其
次是姜南揚著（一九九四）《台灣大轉型》，克寧出
版社，頁二零七—三二九。

〔註五〕參閱《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六零三—七

零三；或《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八卷，頁一一七—一二七，人民出版社。

(註六) 參閱《南京政府崩潰始末》(一九九二) 丁永隆、孫宅巍合著，巴比倫出版社。

(註七) 吳梓文〈戰後台灣省制之變革〉，《思與言》第二六卷第一期一九八八年五月。

(註八) 吳若予著(一九九二)《戰後台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業強出版社。

(註九) 劉進慶著，王宏仁等譯(一九九二)《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人間出版社。

(註十) 關於這時期的歷史資料，請參閱黃嘉樹著(一九九三)《國民黨在台灣》，南海出版公司。郭傳璽主編(一九九三)《中國國民黨四十年史綱》，新華書店。李松林著(一九九三)《介石的台灣時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註一一) 請參閱海峽評論社編輯(一九九一)《台灣命運機密檔案》以及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編，海峽評論社出版的《美國對台政策機密檔案》。

(註一二) 參閱註二書。

(註一三) 關於美國對台支援體制請閱：Jacoby, Neil H. (一九九六) *U.S. Aid to Taiwan*。趙既昌著(一九八五)

《美援的運用》，聯經出版社。文馨瑩著(一九九零)《經濟奇蹟的背後》，自立晚報社。

(註一四) 這些在五十年代任職美援機構的經濟技術官僚，在六〇年代後，都先後登上台灣的政治舞台，扮演執行台灣往依賴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路線的主角。

(註一五) 參考許福明著(一九八六)《中國國民黨的改造》，正中書局。

(註一六) 參考李憲文著(一九八二)《農地改革對台灣農村權力結構之影響》，正中書局。第二階段農地改革(一九五一)是「公地(原日產)放領」，第三階段(一九五三)是「耕者有其田」。所謂農業的發展與榨取機制是：農地改革後，以農復會和農會組織為中心在資金、技術人材、品種和農業基礎設施上的建設，這是發展的部分。而榨取機制就是指在地方政權期(一九四六)就已形成的田賦徵實、肥料換穀……等農業剩餘收奪體制。

(註一七) 林書揚文(一九九六)《簡述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

(註一八) 施威全撰(一九九三)《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方派系研究》。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陳明通著(一九九五)《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月旦出版社。

「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

關於陳芳明的戰後文學史觀的歷史批判

曾健民

出來論辯。

一九九九年的《聯合文學》八月號，刊登了陳芳明先生（以下禮稱略）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一文；該文開宗明義便強調他欲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所依據的「台灣史觀」和「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重要性，並依他的台灣史觀的架構簡要論述了他的台灣新文學史，可見得台灣史觀對他的台灣新文學史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決定著他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好壞對錯，值得重視。對於他的台灣社會性質論，陳映真先生已有很犀利的批判，不再贅言；至於他的「台灣史觀」，本文認為不論在知識上、事實上或認識上都有很大的問題，有必要進一步提

他欲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中的「台灣史觀」，也就是他的台灣新文學史的歷史分期，簡單地說，就是把近百年來的台灣歷史劃分為：日據殖民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戰後再殖民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八七）以及解嚴後殖民時期（一九八七—）的三個時期。這種似曾相識的史觀，顯然是把台獨理論宗師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稍加改造後，在文學史上的運用。它的最大特點，便是把戰後國府統治下的台灣跟戰前日帝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等「質」齊觀，都視為「被殖民時期」，並且認為直到解嚴或李登輝登台以後，台灣才從漫長的「殖民統治」下

解放出來，進入所謂的「後殖民時期」。顯然，它的重點就在「戰後再殖民」論，主要在突出戰後的台灣乃是在國民政府「殖民統治」下的「殖民社會」，這樣的中心觀點。本文主要針對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從社會科學、台灣歷史和文學的角度，進行批判。

一、背離社會科學和台灣社會歷史的「殖民」

論

簡單地說，陳芳明所欲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的歷史架構，它的核心便是「台灣殖民論」。大家都知道，「殖民歷史」早已是世界史中的常識，「殖民理論」也早已是社會科學的範疇，一門重要的學科。依常理，只要有殖民的論述，不管在概念上或事實上，決不可偏離社會科學的規範。然而，在陳芳明的「台灣殖民論」中，卻找不到一點兒與社會科學上的「殖民」概念有任何的關連之處；他所指的殖民統治的內容也曖昧不清，充其量只反復舉些如國語政策、價值壟斷、霸權論述……等擬似殖民其實根本不是殖民的論點。因此，使他所欲建構

的台灣新文學史的歷史架構，雖然充斥著殖民的字眼和論述，但卻與社會科學上的「殖民」無關，更與客觀的台灣社會歷史（特別是戰後史）背離。

一、社會科學的「殖民」概念

現當代史的「殖民」始於十九世紀中末，此時，西方各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已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少數巨大壟斷資本獨佔了國內市場，資本運動的規律使它必得跨越國界，把全世界都納入它的擴大再生產的範圍；為了攫取原料、爭奪市場和資本輸出地，各國紛紛以帝國主義的手段對落後地區的弱小國家進行侵略和殖民統治。因此，首先要認識到，現當代史的「殖民」，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產物，壟斷資本在世界範圍的經濟掠奪是它的本質，政治上的支配或文化上的歧視只是它的手段，它的表像，物質世界的掠奪是它的第一義，精神世界的掠奪是它的第二義。陳芳明的「殖民論」的最大問題，就是把「文化殖民」當作殖民本身，而看不到現當代殖民的本質（何況，他的文化殖民說也是虛構與知識不足的產物，這問題在後面有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說殖民之所以成為殖民，它的核心，是在經濟的掠奪問題。

進入二〇世紀，世界也進入了帝國主義的年代，這

個世紀的前半，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土地都曾淪為殖民地；因此，「殖民」已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重要歷史經歷，當然，反殖民或去殖民更是重要的共同課題。這些經驗和課題，早已成了社會科學的範疇。因此，一個社會是不是「殖民地」，某政權是不是「殖民政權」，是不是「殖民統治」，是有它的客觀判定基準的，不是可以像陳芳明那樣憑主觀或意識形態，用「有那麼嚴重嗎？」的態度任意建構的。

因此，論說現當代史的「殖民」問題時，最起碼要從下面的基本概念出發：

（一）「殖民者」（宗主國）必然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它為了維繫自國壟斷資本的擴大再生產，以帝國主義的手段對外侵略或進行殖民統治。

（二）殖民者為了遂行從殖民地榨取經濟利益的目的（這是殖民統治的本質，也是判定是否「殖民」的基準），在殖民地強制施行各種軍事、政治、社會、文化的殖民主義政策。殖民地人民被剝奪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各種權利，致使民族經濟衰敗，完全從屬於殖民資本而無法自立；民族文化也逐步淪喪而無法自主。因此，殖民地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民族矛盾。

接著，我們不妨以上述的「殖民」概念，簡單地檢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的荒誕。

二、是「資本主義化」不是「殖民地化」

如果，戰後的台灣真如陳芳明所說的是「再殖民時期」，國民政府是「殖民政權」。那麼，依前述社會科學有關現當代「殖民」的概念來看，國民政府不但成了外來政權，甚至成了一個殖民台灣的帝國主義國家，台灣的「光復」也成了帝國主義中國對台灣的侵略。顯然，歷史的事實並非如此；一九四九年底遷逃台灣的國民政府，已是一個失去了大陸的江山（包括它的政權、土地、人民、財富和軍隊）的逃亡政權，連自身的生存都不得不依賴美國，怎會是帝國主義國家呢？而且，如果國民政府是「殖民政權」，它必定對台灣進行吸血式的殖民榨取，被殖民的台灣本地資本根本得不到發展，本地的經濟也必定走上衰頹依附的命運。然而，歷史的事實卻非如此，正好相反地，台灣的社會經濟快速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台灣本地資本也在短期間得到了巨大的積累，同時快速地改變了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台灣的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很快地登上了社會的主要舞台，掌握了台灣的物質和精神的統治權；最後，國民黨政權卻像完成任務的朝露般地，毫無掙扎地讓位給了台灣的

本地資產階級，這明明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絕不是什麼「殖民地化」的過程。

再設若，戰後的台灣，真如陳芳明所說的是「殖民地社會」；依社會科學上的「殖民地社會」的特徵，它的主要社會矛盾就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民族矛盾；那麼，戰後台灣社會內部（注意：我指的是社會內部，外部非本文討論範圍）到底是那一個殖民民族對那一個被殖民民族之間的矛盾呢？在台灣，省籍矛盾（它並不是社會矛盾的本質）是有的，但民族矛盾，除了漢族與原住民族之間的矛盾（何況那更是社會內部的更次要的矛盾）外，真是點著燈也找不著。如果台灣是國民政府統治的「殖民地社會」，那麼戰後迄今的反國民政府的運動，不都成了反殖民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任誰都知道這是荒誕無稽之談。對於戰後的台灣的反對運動，陳芳明不也稱之為「民主化運動」嗎？既然是「民主化運動」，它的本質就是民族國家內部資本主義形成期的反獨裁專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而不是什麼反殖民統治運動。可見得，國民政府的統治本質是民族內部的「反共獨裁」，而不是異民族的「殖民壓迫」。「戰後再殖民」論純屬向壁虛構。

由上述的簡單推論可知，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

論，一點兒也禁不起社會科學的檢驗，只不過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完全與戰後的台灣社會歷史無關，不！根本就是相顛倒。

二、錯亂的「殖民統治」說

歸納陳芳明再三指陳的國民政府對台灣「戰後再殖民統治」的內容（也就是他的殖民統治說），它包括下面幾個部分：

（一）在文化上：國語政策、語言文化的歧視政策、中原取向的民族教育、對「台灣歷史」「台灣文學」的打壓等。

（二）經濟上：壟斷式的金融資本、專賣制度。

（三）權力關係上：價值壟斷、威權支配、霸權論述、權力控制……等。

這些到底是不是「殖民統治」，下面將逐條辯析。

一、民主主義的「國語政策」和去殖民的「國語政策」

眾所周知，統一的語言——國語，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但它並不是自然天生的，而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強制」的結果。譬如，今天的日

本國國語，就是在明治國家的形成過程中，以國家的權力強力排除日本各地的方言，以「東京便方言」為國定語言的結果。總之，任何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國語，都難免烙印著「強制」的痕跡。

特別是曾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國家，由於民族語言曾遭到極大的破壞而淪喪，在脫離殖民統治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國家語言的建立更備嘗艱辛；就不得不採取語言上的「去殖民」政策，以民族主體的国家權力為後盾，對已內化的殖民者的語言進行強制性的排除，這就是強制性的國語政策的本義。在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這種強制性，除了表現在國語政策上外，諸如：國民教育、度量衡或貨幣的統一、市場的統一、民族經濟的扶植與形成等，莫不是一「強制」的過程。如果依照陳芳明的殖民邏輯，這些「強制」豈不都成了「殖民統治」，那麼，世界上的民族國家豈不都變成了殖民國家。

其次，要區別殖民者所強制的「國語政策」和民族國家的「國語政策」在本質上的不同。特別是在台灣的近百年歷史中，曾經有過兩次的「國語政策」；在日據期，日本殖民者所強力推行的所謂的「國語政策」（特別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後）是企圖消滅民族語言推行殖民者

的語言的政策，因此，是殖民主義的「國語政策」；它與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且復歸中國的「光復」後，推行的「國語政策」，在字面上雖然相同，但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不止不同，根本上是相反的。前者是殖民主義的、軍國主義的語言政策，不得任意顛倒。陳芳明把這個光復後的「國語政策」等同於日據下的「國語政策」，以作為他的「戰後再殖民」論的論據，就是利用一般人对史實的不熟悉，刻意掩蔽語言的實質歷史意義，再運用語言的表像以達到顛倒歷史是非的目的。

二、光復初期的「國語政策」

——推行國語與恢復台灣話並進

「國語政策」和「語言文化的歧視」，一直是被陳芳明並舉為戰後再殖民的論據。他所謂的「語言文化的歧視」，主要是指在推行國語的同時所造成的對台灣話的歧視。推行國語是不是一定會歧視台灣話，要視實際情況而定；而且，到底是「強制」還是「歧視」，完全是主觀的認定。但是，徹底普及國語的結果，會使台灣話屈居地方方言的地位，這是可以確定的。然而，光復初期的「國語政策」卻不是這樣的，當時面對殖民者語言——日語的強大壓力，也就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國語政策」的結果，使台灣人民幾乎喪失了說台灣話的能力，特別是戰中世代更為嚴重，因

此，當時推行國語與恢復台灣話是相輔並進的。

光復初，在行政長官公署的機關報《新生報》上，曾登載過這麼兩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的社論，題目是《國語問題》；另一篇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何容先生的專論，題目是《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雖然前一篇的主要內容是有關推行國語的問題，後一篇則是談論如何恢復台灣方言的問題，但兩者都同時觸及了推行國語與台灣方言的關係。何容先生在文章的開頭便直接說道：

「推行國語不必，也不能，把方言消滅」，為什麼？

他說：「因為國語本身也是一種方言……是同系的語言。推行同系的語言的一支派，來消滅另一支派，是不可能的。而且，正像保存方言能幫助國語的推行一樣，推行國語也能幫助方言的保存。」

而在《國語問題》一文中，對於台灣話，它是如此看待的：「我們可對不同方言的同胞，加以歧視嗎？不可以的，所謂台灣話——福佬話，實際就是中國話……：台灣話是中國話的一種，完全是中國話，我們這種話，比中國國語所帶漢族的古音更多，訕笑「蠻南缺舌之人」是錯誤的。」

對於國語的態度，它是這樣看的：「我們應該學習國語，

為什麼呢？中國通用國語的人最多，面積最廣，可以說已通用全國，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自然應該得國語。不僅台灣人要學國語，福建人廣東人也在學著國語。國語是我們自己的語言，要懂。懂是應該的，並不光榮，不懂也並不是可恥。……政府對台灣話不會禁止使用，或企圖消滅它，因為台灣話也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

對於台灣話，何容先生進一步認為：「一種方言在它自己的本區域內，應該是日常生活中的用語」。但是，台灣光復初期的情形卻是「自政府機關學校，以至於一般社會，還多是用日本話」，「這誠然是便利」，但這種便利是「不合理的」。因為「台灣話受日本話強力的壓迫，同我國其他區域的方言相比，已經喪失了它應有的方言的地位」。因此，他呼籲「現在本省推行國語固然很重要，同時我們應該設法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

而為了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何容先生倡議：「第一：凡是可以用台灣話的時候，都用台灣話，不用日本話。第二：從內地來的不會台灣話的人，應該學習台灣話。」

從上述兩篇光復初有關「國語政策」的專論可知，當時的「國語政策」是與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相輔相成的，推行國語與保存方言是互利並進的，只有兩者並進

才能減少殖民者語言——日語在台灣的影響，絲毫沒有對台灣話「歧視」的問題。它的特色，在共同向殖民者的語言奪回民族語言（國語和台灣話）的主權，也就是「語言的光復」，套一句流行話就是「語言的去殖民」主義。

可見得光復初期的「國語政策」，在對待台灣地方方言——台灣話的主張上，是科學的、進步的和民主的。它主張「台灣話也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是古漢語，呼籲要把它從被日語壓迫的狀況下解放出來，鼓勵以台灣話破除日語的霸權地位，以恢復它地方語言應有的功能和地位。並且它一點兒也沒有「中央」心態，反而以一個國語推行委員會成員的身份，要求來台省外人士也要學習台灣話。這就是「國語政策」的本義，這種具有科學的、進步的、民主的精神的，民族主義的「國語政策」，陳芳明等的刻板、僵化、顛倒的「台灣史觀」當然是看不到的。

三、誇大光復初期台灣作家的語言障礙的謬誤

光復剛滿一年，行政長官公署就施行了報刊禁用日文的政策；這個政策在當時確實引起了不少的反彈，誠然，它是不科學也是不民主的作法。特別是，對於在戰爭期間（或皇民化時期）受教育、成長而登上社會舞台的年輕人來說（所謂的「日語世代」），確是不小的衝擊。但是，全

面誇大它的衝擊，只強調它的負面而看不到它的正面，甚至否定它到了站在維護殖民者語言的地步，則不可取。

陳芳明把光復初的這個禁日文政策對台灣文學的衝擊，誇大成使「日據期的新文學傳統又遭逢另一次斷裂」，以及使「本地作家變成無聲的一代」。但是，他對一九三七年日本殖民者廢止中文的影響，卻淡化成「語言傳統的斷裂」。

實際上，後者才真使以中國白話文為主要文學表達工具而成長起來的台灣新文學，受到致命的打擊；它不只使語言的傳統斷裂，更使台灣文學的精神傳統斷裂；當時，維繫台灣文學的兩刊物《台灣文藝》和《台灣新文學》被迫相繼停刊；白話文作家，如賴和、陳虛谷、楊守愚等人，因拒用日文而封筆，作家失去了文學園地，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台灣文學》的出現，前後四年台灣的文學幾乎處於空白的狀態，而《台灣文學》（季刊）也只不過存在一年半的時間，甚且，在皇民文學的打壓下，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瀕臨危機。由此觀之，一九三七年殖民者禁中文，對台灣新文學的打擊，並不僅止於「語言傳統的斷裂」，根本就是「文學傳統的斷裂」。

台灣光復後，第一年，報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言論出版呈現難見的榮景，文學創作和評論也逐漸恢復，特別是重回中國文學的大潮流後，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品大

量流通於台灣，對台灣文學起了很大的影響。一九四六年十月二五日報刊禁用日文的政策，對文學環境並沒有產生立即的大影響。真正的對台灣的文學環境起絕大影響的，應該是「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台灣作家的思想感情變化和內心的恐懼。但是，整體而言，事件後不及半年，以報紙副刊為中心又逐漸恢復了文學活動，只是，許多台灣作家逐日消沉或淡出文壇。

其次，不能把兩者等「質」齊觀；因為一九三七年的廢止中文，是在消滅民族語言的「殖民主義」政策，而一九四六年的禁止日文，則是為了排除殖民者的語言以恢復民族語言的「民族主義」政策，兩者有本質上的差別。是要站在殖民主義者那一邊呢？還是要站在民族主義者這邊？

再說，報刊禁日文的政策，與「本地作家變成無聲的一代」也並沒有必然的關係。也就是說，把光復後的語言障礙誇大到使「本地作家變成無聲的一代」的說法，是錯誤的。應該就個別的作家來看：譬如，光復後，同屬日文作家的楊逵，就用各種方法克服了語言的障礙，積極從事文學活動，直到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前夕為止；很多沒有語言障礙的作家，如王白淵、賴明弘、張深切等人，雖然在光復初十分活躍，但「二·二八」事件後

就逐漸消沉了；像日文作家呂赫若、張冬芳，在光復不久，很快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一年內），重新出發開始創作，但隨著時代矛盾的深化，他們也與作家徐瓊二（淵琛）、朱點人一樣，都直接投身了台灣的地下黨，參加了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洪流而犧牲了，當然不會再有文學聲音了。還有，也要看到當時以「銀鈴會」為中心的一批青年作家（真正的「日文世代」），如林亨泰、張彥勳、朱實……等，在短短一年內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沖上台灣文學舞台的事實，因為台灣話和白話相近本是同系語言，是民族語言，不是外語，要克服並不困難。可見得，片面誇大報刊禁用日語或光復後的語言障礙對台灣文學的影響是不正確的。而且可以說，「本地作家變成無言的一代」，並不是語言政策造成的，而是時代的多難所造成的。

四、把國府對全民的反共戒嚴統治轉化為

對台灣人的殖民統治

況且，五〇年代以後變成「無聲的一代」的，何止省籍作家呢？在反共肅清的風暴中，更多的外省籍作家受到嚴酷鎮壓；有人逃亡、有人被打入黑牢、有人轉向、有人噤啞，如雷石榆、歌雷、歐坦生、姚隼、姚一葦……等不勝枚舉；而且，在台灣，三〇年代以來的中

國現代文學的進步傳統更遭到徹底的肅清、禁絕而「斷裂」，豈止台灣的文學呢？

這又關聯到陳芳明再三指陳，「國府打壓『台灣文學』」、「台灣歷史」，是「殖民統治」的問題。實際上，在極權的國府反共戒嚴體制下，所有的異議無不受到鎮壓；反共肅清是不分台灣或大陸、本省或外省，也不分高官或平民、身份高低的，它是對全民的反共專政。在這樣的時代下，豈止台灣文學、台灣歷史、台灣意識受到打壓？受到最徹底打壓的，倒是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三〇年代四〇年代文學）、中國近現代歷史和中國意識；何止打壓？根本就是肅清！何止肅清，更要檢查「對峙」的忠誠度呢。在反共戒嚴下，台灣文學、台灣歷史充其量只是未能成為「顯學」，只是屈居非主流地位，如此而已，什麼時候「不能閱讀台灣歷史、不能閱讀台灣文學、是危險的學問」（陳芳明語）了？什麼時候什麼人因為研究、寫作、傳播台灣歷史或文學而成為叛亂犯了？而入獄了？受歧視了？而被「白色恐怖」掉了？請舉出具體事證。

把過去五〇年間，國府的反共戒嚴體制對全民的專政、對所有異議的打壓、對所有觸犯反共教條的人民進行肅清的歷史，轉化為專對台灣人、台灣歷史、台灣文學、台灣意識打壓的歷史，並據以高呼國府政權對台灣進行了一種

民統治」，台灣社會是「被殖民的社會」，把民族內部的問題轉化為異民族間的問題，這就是陳芳明的「台灣史觀」，也是他的「戰後再殖民」論的真相。它為著打造「新國家」的國民歷史意識的心情，是大家都能領會到的。

五、資本的壟斷並不同於殖民統治

在經濟上，陳芳明認為「壟斷式的金融資本」也是「殖民統治」，那更是天大的笑話。全世界有哪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壟斷式金融資本」的？若依陳芳明式的思維，美國、日本、英國等國都對它本國實施殖民統治了？實際上，陳芳明所頌贊的台灣「後殖民時期」，它的社會經濟的本質就是台灣的本土金融資本的進一步壟斷化，那麼是不是台灣本土資本對台灣的進一步「殖民統治」了呢？不是的，它是資本的統治也是階級的統治，絕不是殖民的統治。至於「專賣制度」，它更不是「殖民統治」所專有，譬如，戰後成為「民主國家」的日本，就繼續延用戰前的「專賣制度」，難道日本政府對日本人民實施了「殖民統治」了嗎？專賣制度只是一種獨特的財稅手段，絕不是「殖民統治」所專有。

六、國家暴力不同於殖民統治

陳芳明慣常把「價值壟斷」、「威權支配」、「霸權權述」、「權力控制」……等字眼，當做戰後國民黨殖民統

治的論據。實際上，這些都不等同於殖民統治。自人類進入了階級社會，產生了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特別是「國家」這種統治機器出現後，就有了擁有「霸權」、「威權」、「權力」的統治者，以及被支配、被壟斷、被控制的被統治者，試想有那個統治者不支配、控制、壟斷？這種權力關係，在任何一个階級社會都有，古代羅馬的奴隸社會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有、陳芳明所讚頌的台灣「後殖民社會」更有，它只是國家機器所特有的暴力特徵，並不是殖民統治所專有。把一般的國家暴力等同於殖民統治，不是在社會科學上的無知，就是意識形態的作祟。

三、是台灣「光復」不是「再殖民」

一、日據期抗日反殖運動的歷史歸趨

日據期的台灣殖民地化的歷史，有與其他的殖民地不同的特殊性格；它原不是以一個獨立的民族或國家（如朝鮮）為單位淪為日本殖民地，而是以爛熟的中國封建社會（國家）的一部分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與香港類似）。就像當年台灣籍資深記者李純青先生在《中國

的政治與台灣》一文（一九四六年六月一七日，《和平日報》）所說的：「台灣獨立是荒唐的，台灣沒有獨立的條件，根本也不應有此要求，因為台灣和國內民族相同，地理接近，本來就是在中國身上被日本咬去的一塊肉。」這塊被日本咬去的中國地方性封建社會，雖然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轉化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從它被日本咬去的那一刻起，不論是前仆後繼的反割台鬥爭、反抗日本佔領的武裝鬥爭或日據下的武裝抗日運動，莫不以回歸祖國恢復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為訴求；直到一九一四年的苗栗事件，屬同盟會會員的羅福星在法庭上還公開宣稱，其抗日目的就在「使台灣復歸中國」；一九一五的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仍自命「大元帥」奉「大明慈悲國」之旨，發諭告文，提出「恢復台灣」的口號。隨著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支配的日益深化，台灣的反抗運動性質雖已轉變為現代性的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但在日本殖民者所編寫的《總督府員警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的《台灣社會運動史》序文中，也承認台灣的社會運動和台灣人民的漢民族意識有很深的關係，它如此寫道：

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

意識牢不可拔。……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感情難以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此實為本島社會運動勃興之原因。

序文的另一段，也特別提及當時的幾個抗日事件，譬如：邱琮指導下的「台灣光復運動」、「意圖以武力革命使台灣復歸支那」的「台灣民眾黨事件」，另外有，「謀求與中國國民黨要人取得聯繫，於島內進行裝蜂起」的「眾友會」事件等等。可見得，連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認，台灣的抗日運動有許多是「以「支那」為祖國」，是意圖以武力革命「使台灣復歸「支那」」。這些都與當時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有深刻的關聯。

雖然，一九二八年的台共綱領中，曾有主張「台灣獨立」的字句；但這種「獨立」論必須放在當時的具體歷史脈絡來理解，它是針對日本帝國的「獨立」，與今天針對中國的「獨立」是完全不同的。況且從台共往後的發展，各成員一生的言行以及追求的目標來看，這個「獨立」與脫離中國是毫不相干的。

到了日據後期，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許多台灣人民返回中國大陸，組成了各種抗日團體。一九四一年二月一〇日，在重慶，各抗日團體聯合組成了一個「台灣革命同盟會」，確定該會的宗旨為「集中一切台灣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太平洋戰爭爆發的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正式廢除了「馬關條約」以及中日間的一切條約，確立了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中國的老淪陷區的原則。於是「台灣革命同盟會」在第二屆臨時代表大會決議：革命的目標在「推翻日寇統治，復歸祖國」，並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的馬關條約四八周年之日，積極展開了「台灣光復運動」。至此，台灣的反日民族解放鬥爭與全中國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匯合，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光復台灣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就像當時李友邦將軍在《台灣革命現階段之任務》（一九四二年一月）文中說：「今日的台灣，已不再是單由台灣人向日寇爭取「獨立自由」的台灣，而是台灣人與祖國同胞共同向日寇「收復」台灣了」。指出了台灣革命的現階段任務，已從先前的「台灣獨立革命黨」時期所主張的「先單獨追求台灣獨立，再回歸祖國」，進入了一個「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階段。台灣的反日革命鬥爭的事業只有在加入全中國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先保衛祖國爭取勝利，才能達到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的目標。這預告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必然會實現台灣的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

作家歐陽明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發表的《台灣新文學的建設》一文中，也說

道：「從社會歷史發展上看，從客觀形勢的要求上看，台灣反日的民族解放革命，必然隨著祖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取得勝利而勝利。」

從上述五一年間台灣人民的抗日反殖運動的歷史來看，即使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階段反抗的形式和性質不同，但所追求的總是或現或隱地伴隨著復歸中國的目標，這是台灣的抗日反殖運動的特徵，也是它的歷史規律。這一點，與朝鮮在「殖民解放」後追求「獨立建國」有根本的不同。

二、「發見我是人」——台灣「光復」的意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中國抗戰勝利，依「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台灣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後復歸中國；這是上述台灣抗日反殖運動的歷史歸趨，也是歷史規律的體現。更近的來說，它是抗戰後期「台灣光復運動」的結果，故習稱「光復」。對台灣人民來說，「光復」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變革，它有兩重意義：一是從殖民統治的桎梏解放出來的大變革，另一是復歸中國民族國家的大變革。同一時刻面臨這兩大歷史變革，其狂喜昂奮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親愛的同胞，我在這地方要慎重的告訴你們，我們是明末漢民族中最有血氣、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民族意識、最有奮鬥力的……我們不可忘記，我們是遺傳著

大陸民族的血統，我們的國家是世界五大強國中的大中華民國……最後我將與大眾合唱，中華民國萬歲！漢民族萬歲！」

讀了這一篇文章充滿了中華民族意識的激情和愛國感情的文章，不要又以為它是國民黨官方民族主義的教材，實際上，這是台獨運動的始祖，「台灣民族論」的先驅者廖文毅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五日出版的《前鋒》雜誌創刊號，也是「光復紀念專刊」上所寫的發刊詞《告我台灣同胞》。在同期上，他的另一篇文章《光復的意義》也這樣寫道：「在台灣光復的這個時候，所發現著的第一個事實，就是「民族精神的振興」……第二個事實就是「國土重圓」……第三個事實就是「家人再集」……第四個事實就是「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

日據期曾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當時任「台灣光復慶祝大會」（台灣省受降典禮之後舉行）主席團主席的林茂生先生，在同期上的《祝詞》一文，對「光復」的感受表達得更為生動，他說：「在光復共慶之秋，有「三大發見」，一是「發見我是人，是自然人」，二是「發見社會」，三是「發見國家」。

這類文章，在台灣光復之初俯拾皆是，這只不過是比較突出的一、二例而已。這些文章流露著自然的真情，

洋溢著民族感情和愛國意識，可說反映了當時台灣人民對「光復」的歷史變革的共同心理。這種心理也表現在楊逵的身上；楊逵在日本投降不久，國民政府尚未踏上台灣之土的九月，便興匆匆地把他的一首陽「農場改名為「一陽」，並出版《一陽週報》，開始宣揚起孫文的三民主義理念。

因為，在長期的嚴酷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被剝奪了政治權、經濟權和文化權，處於沒有「人權」的、「非國民」的、殖民地人的地位，民族意識受壓抑，民族社會被支離，更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這就是身為殖民地人的屈辱和悲哀。殖民地人民的最大願望，也是反殖民運動的最大目標，就在打破這些殖民桎梏，脫離殖民地人的地位，成為一個完整自主的「自然人」，並且作為一個「國民」生活在自己的「民族社會」和「民族國家」中。而「光復」給台灣人民帶來的「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的三大歷史變革，正實現了台灣人民夢寐以求的願望。當時，除了極少數在殖民時代依仗日本殖民統治者維持自己權勢的台灣人大資產家以外，對於台灣人民（不管左中右派）來說，「光復」就是自己夢想的實現，其狂喜和對祖國的熱烈期待是不難想像的。

因此，歷史地來看，從初期的反日占武裝鬥爭到末

期的「台灣光復運動」，日據下五一年間台灣人民前仆後繼所追求的，總是指向復歸祖國的方向，而「光復」給台灣帶來的巨大歷史變革，使台灣重歸中國的「民族社會」和「民族國家」，就是實現了台灣人民的歷史願望，這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台灣的社會歷史的特性所規定的必然歸趨。對於這樣的「光復」，陳芳明居然把它顛倒為「再殖民」，把體現了台灣人民歷史願望的復歸中國，倒錯為再度被中國殖民。如果光復是「再度受中國殖民」，台灣人民怎麼不像割台時一樣，以武裝鬥爭相向呢？而是以「張燈結綵」，以「歡天喜地」的心情相迎呢？實際上，在當時，把「光復」視同「再殖民」的，恐怕只有那些極少數依仗日本殖民者的台灣人資產家、爪牙以及日本極右翼勢力吧！不料，這種站在台灣人民的「願望、夢想」的對立面的「感情和觀點」，居然在五〇年後，以「史觀」的外形現身在陳芳明等人的身上。

三、是中國民族國家內部的矛盾，不是「再殖民」

但是，對於光復後的歷史發展，決不可愚昧到只看到光復的變革所激發的昂奮的民族感情，也應該看到它的背後潛行著的巨大矛盾。日據期曾是台灣農民組合的成員，光復初任新竹縣縣長的劉啟光（本名侯朝宗），在《台灣評論》創刊號（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的《反省！

覺悟》一文，就如此說過：「因為我已切實體會到蘊藏在狂歡之後的危險因素。我回故鄉的途中，更坦白地告訴熱烈歡迎我的幾十位嘉義地方的新舊朋友，要他們認識國情，放低期待，以免希望高失望亦大……。可是狂熱的潮流，仍然驅使全省的同胞，對祖國政府抱著過高過大的期待，終至釀成以後的失望和反感。」

這種矛盾逐漸表現在，陳儀政府接收體制的貪污腐敗和顛預無能上；生產停頓、物價高漲、失業恐慌、言論出版的限制，以及因為文化差距和人事不公平而造成的省內外隔閡等等。這樣的矛盾終至顯現到，使楊逵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的《新知識》上，寫了《為此一年而哭》，高喊道：「哭民國不民主」；作家賴明弘也在同期上寫了《光復雜感》，感歎到：「人人正因為刺激太大，動搖太大，隨之而狂歡而失望了，而痛哭甚至而排斥了」。雖然如此，當時台灣的進步知識人，並未只停留在感情論，而是以社會科學的態度來分析認識問題。他們認識到，這些矛盾的根源之一，是由於台灣帶著特殊的殖民地社會歷史驟然復歸於仍處於半封建而帶著官僚主義性格的國民政府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他們也認識到，這個矛盾也非台灣獨有，其實它是國民政府在全中國範圍實施的接收體制、進行的國共內戰以及獨裁貪污

腐敗所造成的與全中國人民間的普遍矛盾的一特殊部分。台灣詩人、評論家王白淵，在《在台灣歷史之相克》（一九四六年二月一〇日，《政經報》二卷三期）中，就很清楚地指出：「台灣之光復，實系五〇年來未曾有的改變，因此亦難免經過種種波折……但其根本原因可歸於從前的中國（亦即舊中國，筆者按）和台灣的社會範疇的不同。總理曾說過殖民地與次殖民地之別，恰似科學上亞硫酸和次亞硫酸之別……。但這個問題系全國性的問題，不能只在台灣解決，和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階段有關。因此我們須要把眼光放大，看看全中國歷史之進軍，而凝視全世界歷史之演變，然後才對台灣的現實，一步一步加以改革。」賴明弘也在前述的《光復雜感》一文中，如此說：「台灣的問題既然是中國問題中的一個問題，當然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基本態度，那就是台灣的問題應該要放在中國問題上去評論它。」

可見得，面臨光復以後逐步激化的矛盾，絕大多數的台灣知識人仍是站在中國民族國家的全範圍來理解問題，認為「台灣的問題應該要放在中國問題上去評論」，從未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看。至於，往後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及漫長的冷戰內戰的雙戰結構下的反共戒嚴，則是另一歷史階段，另一歷史範疇的問題。基本上，它已屬於中國

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國際階級矛盾的範疇；就和戰後世界，脫離殖民統治獨立後的眾多民族國家所經歷的烽火不斷的荊棘之路一樣。對於這個階段的問題，陳芳明也得不誠實面對的，希望他敢於出面論辯。

四、「去殖民」——作家們的台灣「光復」

陳芳明認為台灣作家在「光復」中所面臨的最大考驗是：「從大和民族主義的思考調整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思考」，並認定這兩種民族主義都是「官方的民族主義」、「作家必須在兩者之間做一抉擇」。亦即，他把台灣作家面臨台灣「光復」時的民族認同，描繪成這樣的歪曲圖像：台灣作家在日據期都是大和民族主義的思考，在面臨「光復」帶來的與大和民族主義相同的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時，不得已只有在兩者間做一抉擇。好像台灣作家是被迫面對台灣的光復，是不得已才同外來的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妥協一樣。實際上，像陳芳明所描繪的台灣作家，除了極少數的台灣人皇民作家如周金波等之流外，在台灣的文學史上是找不到的。如果說，在台灣光復時真有這樣的作家存在，那就是日據末期的皇民文學頭頭，日本人作家西川滿；這個在日據末疾言厲色為日本殖民當局推動皇民文學的大和民族主義者，在日本投降和台灣光復後，心生恐懼，竟然一把自己的家系譜拿給楊雲

萍看，辯明自己的祖先也是中國人，自己原本是自由主義者」（池田敏雄遺稿《敗戰日記》II，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四日記事），來為自己脫罪。

關於民族主義，列寧曾科學地把它區分為二種：一種是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另一則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並且指出，一定要把它「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來分析（列寧《論民族自決權》，一九一四年）。由此可知，把所有的民族主義都視為相同的東西，是錯誤的；民族主義實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的壓迫的民族主義（如希特勒的日爾曼主義或日本的大和民族主義），另一種是反帝、反殖反壓迫的民族主義（如泰戈爾的思想，如甘地、蘇卡諾、孫文、恩克魯瑪等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從近百年來反帝、反殖、反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中成長起來的；在台灣，日據期的台灣抗日運動，從它的性質和目標來看，也可說是在台灣的特殊歷史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的一部分，一特殊的形態。更具體地來看，面臨台灣的光復，台灣人民所表現出來的唾棄長期壓迫他們的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並且歡天喜地地迎接帶來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的歷史變革，這樣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認同是很鮮烈的，一點也不曖昧的，其

本身不就是在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自然表現嗎？

作為台灣人民感情的詠唱者以及時化的批判者，台灣作家在日據期也鮮明地表現了這樣的民族精神；譬如，賴和一生著唐衫堅持用白話文寫作，楊逵在小說《模範村》中所凸顯的主角阮新民，甚至巫永福在日據末寫的詩《祖國》，也熱烈呼喚：「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叫喊／還我們祖國呀」。從這些作家的精神和感情可以看到，原來中國民族主義的感情並不是光復後國民政府從外帶來的，早在日據期的台灣文學中就已存在，只不過在殖民壓迫下隱而不顯，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復歸祖國後，這種感情便像地底的岩漿般噴湧出來。譬如，日據期的重要作家賴明弘，在光復不久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就在上海出版的《新文學》雜誌第二期上，發表了題為《重見祖國之日——台灣文學今後的前進目標》的文章，他說：「這樣在此半個世紀中，台灣與祖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一切關係，雖然遭受日寇嚴格的截斷，但是貫穿文化思想的民族精神之火把，終熊熊地被承繼，這重要的一線終至被堅守著，所以今日整個的台灣民族仍然是活在中國民族的大海裡。」讀了這篇文章，真不知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要如何論下去了？在日據中期展開的「台灣鄉土文學」論爭中，與賴明弘站在不同觀點立場的作家郭秋生，也以筆名「芥舟」，

在前述的《前鋒》雜誌的光復專刊上，寫了詩歌《台灣光復歌》，他詠唱道：「可恭喜／出頭天／莫非是天有理／也是祖國大犧牲所致。」

作家張文環，在光復當初，雖然正埋頭學習中文，但仍以日文寫了一些評論，清楚地表現了他當時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認同，譬如發表在《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上的《給台灣青年》一文，說道：「我們的青年期，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在生活上，除了為糊口而煩惱外，還不斷受到暴虐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從後面踢屁股驅趕，一些寧作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本省人高等刑事不斷進出我家；然而，當時我們都盼望祖國的復興，四億的漢民族，果真如帝國主義者所宣傳的將成為他們的奴隸嗎？我隔著鐵窗這樣地想著……」。在同《和平日報》上的另一篇文章《關於台灣文學》（一九四六年五月三一日），他流露了這樣的真情：「今天的新生報台中分社主任吳天賞（他是東京時代以來的文學同志），光復當時，在眾人面前指揮練唱國歌時，不禁落下了眼淚。真是連作夢也沒想到，這麼快就獲得了自由，而且大家都還活著，真想一起跪在青天白日旗的前面痛哭一場……」。

光復的歷史變革所激發出來的澎湃的民族感情，也表現為對殖民歷史和大和民族主義的全面對決與清算。

譬如：龍瑛宗在光復後發表的一篇文章——《文學》（《新新》創刊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〇日）。就表達了對殖民時期文學的自我否定與再出發的痛切心情，他寫道：「回頭看看台灣的情況吧！無疑地，台灣曾為殖民地；世界史上，從未有過作為殖民地又文學發達的地方，殖民地與文學的因緣是很遠的；即便如此，台灣不是有過文學嗎？是的，曾經有過看似文學的文學，但那並不是文學，知道了嗎？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只有戴著假面具的偽文學。總之，我們非自我否定不可，我們一定要再出發，一定要走上正大的道路」。從這裡，我們看到，在看似悵鬱、猶豫的龍瑛宗的文學形象下，卻燃著鮮明的燈；這短短的文句，應該成為台灣文學工作者的自惕。再看看作家呂赫若；他在光復不久，馬上投入台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加入「台灣文化協進會」的行列；在不到一年，就用剛學會的白話文創作了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月光光》、《一個獎》和《改姓名》，這不是對大和民族主義的全面批判和對決是什麼？

光復初期，對大和民族主義的清算和對決，不但表現在台灣作家的身上，也表現在尚未被遣返的良心的日本文化人身上。《民俗台灣》的池田敏雄、金關丈夫教授等，在光復初就熱心幫忙楊逵的《一陽週報》，提供有關

三民主義的理論書籍資料，張羅接洽代售書店等等。另一個例子就是，日據末期曾是一個狂熱的大和民族主義者，與西川滿並列的皇民文學旗手濱田隼雄；他在一九四七年寫的《木刻畫》一文，便透露了他在台灣光復初與大陸來台的木刻家黃榮燦的交往中，受感動而自省的經過，文中有一節如此寫道：「我的驚訝變成了一種羞恥，我反省了自己單以好奇的心情與他交往的過錯，也反省了自己曾嘲笑來台中國士兵背著棉被和雨傘的愚昧，接著，日本終於給中國打敗了的實感第一次衝擊著我的心。」據說，濱田先生回日本後，終生從事和平運動，成為一個和平主義者。

由上可知，在光復的變革中，台灣作家自然流露了高昂的民族感情，對大和民族做了徹底的決算，表現了真正的「去殖民」精神，連日本文化人也反省了大和民族主義而走上新生。從這些歷史的事實中，便可知，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是如何地用他的意識形態來取代真正的歷史了。

是的！

「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

請陳君銘記龍瑛宗先生五〇年前的肺腑之言。

論「台灣意識型態」

九〇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後，西方世界齊聲歡呼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終結」世界；同時，「歷史終結」論也流行一時，認為今後是一個永遠沒有意識形態的自由民主的世界。但是不久，美歐戰機導彈用「人道主義」的大義名分對科索沃狂轟濫炸；2001年，象徵自由世界的美國紐約雙子星大廈崩塌的驚悚畫面，接著伊拉克戰爭……。每天在我們眼前上演的，不但不是一個歷史終結的世界，也不是一個意識型態終結的世界，而且是一個被霸權主義、新自由主義、西方的普世價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左右的世界。因此，我們仍生活在一個像病毒一樣有強力致命的意識形態世界中。

曾健民

一、「意識形態」是什麼？

在台灣，從官員到專家學者、平民百姓，都會認為意識型態是一種僵化、教條的思想觀念，只有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或極權主義才是意識形態；自己是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沒有意識形態的世界。

其實，這種想法本身正是一種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固然是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反共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

人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動物。在任何社會，儘管表現形式千變萬化，但一定都有經濟活動，政治組織，

以及不可缺少的意識形態（如法律、倫理、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是社會總體的有機部份，它作為社會生活的結構是普遍的無所不在的；沒有意識形態的種種表象體系，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杜塞認為：意識形態是具有獨特邏輯和規律的「表象」體系（形象、觀念、概念），它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份，並且在鬥爭中確立其形式。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文化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認為：意識形態是利益和權力鬥爭的產物，充滿衝突和矛盾張力，但是，產生的意識型態表現為文化、典章、文學藝術等；它是使統治權力合法化的一套話語策略，是階級社會本身不可或缺的结构。

既然意識形態是社會結構的一部份，它的社會職能（功能）是什麼呢？伊格頓認為：意識形態是由物質和權力關係所生的觀念體系，它一方面反映這種關係，另一方面又強化這種關係並維護這種關係。簡單地說，意識形態是以虛假的形式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以維持鞏固現狀或維護統治結構。阿杜塞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文化客體，它通過建構「個體」成為「主體」，使這個意識形態化的主體，起著若維持、維護統治者利益的社會功能。

二、台灣意識型態

馬克思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批判的意識形態，是西方資本主義歷史中，反映了階級矛盾和鬥爭的諸觀念體系。包括：啟蒙主義、理性主意、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由於是在西方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歷史發展，有別於西方的意識形態內容。我們一定要慎重區別兩者的異同。

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其社會功能在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和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在台灣，意識形態的內容和社會功能則大為不同，譬如五〇年代起台灣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反共主義，並非完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其社會功能主要是為了維護「內戰冷戰國家」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共主義同樣是虛假的、顛倒的觀念系統，但卻是在恐怖高壓下誕生的。

台灣戰後的社會歷史變遷並不是一個自主的獨立的發展過程，而是在一個有絕對支配力量的中國內戰和美國冷戰的雙重作用下的發展。六十多年來，不管是反共

戒嚴體制或是獨裁下的資本主義，甚至今日的資本主義，都是這雙重結構中的歷史產物。作為維持或鞏固這個雙重結構，或者是做為在這個框架下的權力、利益鬥爭而產生的觀念體系，我們稱之為「台灣意識型態」。

現在台灣流行的意識形態五花八門，譬如有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但它不是從台灣社會衝突中的產物，也並不起維護體制的主要作用，因此都不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或意識形態。我們認為，只有六十年來在台灣起著維持和鞏固內戰冷戰結構或者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也就是佔有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俗稱「主流意識」），才是「台灣意識型態」。

它們包括有：反共主義、自由主義、本土主義和普世價值等四大範疇。

去年，在抗議陳雲林來台的示威活動，就出現了「打倒共匪、釋放劉曉波」的標語。雖然只有九個字，背後卻突顯了六十多年來在台灣占支配地位的這四類「台灣意識型態」的強大作用。

曾經在反共戒嚴期間全民高喊的「打倒共匪」的口號，竟然再現於今天街頭上反中國示威的行列中。可見得反共主義一直支配著台灣人的心靈，構成了台灣人的主體性。也可以說，反共主義是台灣意識型態的核心，

其他的意識形態都以它為基礎。另外，劉曉波是以西方子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反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物；因此在台灣高喊「釋放劉曉波」的後面，就突顯了以自由主義、本土主義、普世價值諸「台灣意識型態」反中國的作用。當然，台灣朝野熱烈歡迎達賴、熱比婭訪台，或以政治公帑支持王丹、吾爾開希，也都是同樣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這些「台灣意識型態」都扮演了積極的社會功能，也都起著維護鞏固雙戰基本結構（兩岸分裂和對立），以及本地資產階級利益的作用。

1、反共主義

反共主義之所以成為台灣最強大最深入的意識形態，有其歷史根源。日據期，從一九三一年的台共和左翼團體遭大檢舉後，日本的反共法西斯就全面支配了台灣，反共反中國的日本主義意識型態深深植入了台灣人的心靈。一九五零年（嚴格說，從一九四七年九月實施的戡亂動員體制就開始），逃台蔣國府的內戰反共體制得到美國的冷戰反共主義的支持後，以軍事戒嚴和國家恐怖主義徹底肅清「異類」，造成每個人精神休克的狀態（強制的「自清」，造成個人主體的空白），高度的反共主義把「個人」建構為反共的「主體」，形成了「打倒共匪」的全民現象。由於可知，建構意識形態主體的正是權力，

而意識型態又使這個主體的內在存在臣服於權力，而與權力同一，捍衛權力。伊格頓曾描述了西方資本意識形態對個人內心全面統治的狀態：

「製造了主體的正是權力。法則必須寫在我們的身體上和心靈裡。它不僅要求我們被動去寬容，而且要求我們熱誠地去擁抱。它的終極目標，不僅是誘導我們接受壓迫，而且要我們高高興興地同謀此事。」（《歷史中的政治》，馬海良譯）

這種西方的資本意識形態的極權統治狀態，實際上與蔣國府以及美國、日本的反共主義共同對個人的意識形態極權統治極其相似，只不過，台灣的情況是以國家恐怖主義為強制手段。

2、自由主義

美國的冷戰意識形態有兩個面向，一是反共主義，另一是美式的自由主義（或現代化理論）。美國的東亞冷戰對台灣的介入，除了強大的軍事（以「中共協防條約」為中心）外還有大量的美援。另外，跟著軍艦大砲和美金進來的，還有美式的反共主義、自由主義和現代化理論。這些意識形態通過影響財經官僚和培養各階層的政治知識菁英，促使台灣資本主義的萌芽茁壯，使美式的自由主義（或現代化理論）成為台灣社會影響力最

大的意識形態。我們從馬英九、蔡英文或龍應台的身上看到其巨大的影響。這個自由主義和反共主義又共同構成了本土主義的基本內容。

3、本土主義

在內戰冷戰框架下，蔣國府一面維持政治上的獨裁，以反共主義統治一切思想，同時，在經濟上走依賴型資本主義發展，奶大了台灣本地的新興資產階級。20年代以後，經歷了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廢約等多重衝擊，蔣國府內外都失去了統治的正常性（合法性）。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架構下，本地新興資產階級政權取代了凋謝的蔣政權。在後冷戰框架下，新興資產政權和在野政黨攜手逐步建構了「本土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包括「四大族群論」、「殖民統治現代化論」、「戰後再殖民論」以及「二二八論」。本土主義意識形態不但起著維持兩岸分裂對立的政治功能，更扮演著掩蔽階級統治真相，轉化資產階級利益為全民利益的假象。

另一方面，在雙戰結構下被奶大的本土新興資產階級，先天上就有妥協、軟弱的性格。雖然掌握了國家機器，意識形態上仍繼承蔣國府反共、親美日、反中國的性格。

4、普世價值

就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使台灣資本主義進一步依賴世界資本主義，國際資本成為台灣不容小覷的力量。資本邏輯取代了過去的威權秩序成為台灣社會的主要支配力量，改變了社會關係，也改變人的思想觀念，所謂「公民社會」日漸壯大。作為西方資本邏輯，也做為國際資本擴張的思想十字軍的「普世價值」，逐漸成了台灣意識型態的新內容。

前美國在台協合理事主席白樂崎，不久前在所謂「茉莉花革命」喧囂一時之際，曾為文向馬英九下指導棋，要馬與「中國」打交道時要勇於提出「普世價值」。蔡英文也表示，應該把「民主人權」列入兩岸交流議題清單。這兩者，與街頭示威中「釋放劉曉波」的標語口號一樣，都是西方後冷戰框架下的意識型態。

三、代結語

最後、引一段後現代主義理論家詹明信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中的一段話，作為結語：

「我們既可以用分析和理論的方法，通過各種意識

形態作品或意識形態的歷史形式的研究，理解其運動規律和功能，來達到理解和非神秘化意識形態的作用過程。我們也可以通過實踐來取消意識形態；因為正是這些客觀的形式和環境，首先使得那些意識形態得以產生，並且成為必要……意識形態批判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必須含有一種爭取解放的努力，不僅僅要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而且也要從異化中解放出來。」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完稿

詩抄

田間：〈我不會背叛世界〉〔註〕

我將正直地活下去

我將正直地死

春天來啦

白鴿呵

從茫茫的沙灘上

鼓起

愛自由的翅

大地

很光亮

三月

很溫暖

我馬上出發去
參加新的戰爭

我愛戰爭

我情願在炮火裡
流盡我的血……

我不害怕

我從不害怕

即使死

我也要愉快地
敞開我的胸膛

擁抱

這土地

我的眼睛

永遠望著

祖國

【註二】

高大的藍的天空
而

我的墳墓

如果能夠蓋上

一幅紅布

我將笑著睡著

此後我就等待著

鐵的子弟兵

將勝利品

掛在槍上

唱起歌

用歌和我說：

『人民，

勝利！

土地，

解放了！

……』

並為我的墳墓

再插上一束紅花

那束紅花呵

好為我向世界宣告

——我不曾

背叛世界

因為我

我是大眾的

即使我死

我也並沒有死……

[註一] 曾健民醫師在追悼林書揚先生的文字裡提及此詩，他說這詩是刊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宋斐如所辦的《人民導報》，由黃榮燦主編的【南虹】副刊；而他每讀這詩都會流淚，「它清洗了我的心境，鼓起了我的勇氣」。施善繼先生另有手抄稿的版本，因而得知這詩「原載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新華日報》」。此處照《新華日報》版本刊出。此詩原稱〈我愛戰爭〉，為配合紀念會朗誦，改為〈我不曾背叛世界〉。感謝施善繼先生提供手抄稿，曾珠喜女士協助校對，許霖女士提供《新華日報》圖檔。

[註二] 此處原為「中國」，為配合紀念會朗誦，改為「祖國」。

高爾基：〈海燕之歌〉（戈寶權譯）

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捲集著烏雲。

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

一會兒翅膀碰著波浪，一會兒箭一般地直衝向烏雲，它叫喊著，——就在這烏兒勇敢的叫喊聲裡，烏雲聽出了歡樂。

在這叫喊聲裡——充滿著對暴風雨的渴望！

在這叫喊聲裡，烏雲聽出了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焰和勝利的信心。

海鷗在暴風雨來臨之前呻吟著，——呻吟著，

它們在海上飛竄，想把自己對暴風雨的恐懼，掩藏到大海深處。

海鴨也在呻吟著，——它們這些海鴨啊，

享受不了生活的戰鬥的歡樂：轟隆隆的雷聲就把它們嚇壞了。

蠢笨的企鵝，膽怯地把肥胖的身體躲藏在懸崖底下……

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飛翔！

烏雲越來越暗，越來越低，向海面直壓下來，而波浪一邊歌唱，一邊衝向高空，去迎接那雷聲。

雷聲轟隆。波浪在憤怒的飛沫中呼叫，跟狂風爭吼。

看吧，狂風緊緊抱起一層層巨浪，惡狠狠地將它們甩到懸崖上，把這些大塊的翡翠摔成塵霧和碎沫。

海燕在叫喊著，飛翔著，像黑色的閃電，箭一般地穿過烏雲，翅膀掠起波浪的飛沫。

看吧！它飛舞著，像個精靈，——高傲的、黑色的暴風雨的精靈，

——它在大笑，它又在號叫……它笑那些烏雲，它因為歡樂而號叫！

從雷聲的震怒裡，——這個敏感的精靈，

——它早就聽出了困乏，它深信，烏雲遮不住太陽，——是的，遮不住的！

狂風吼叫……雷聲轟隆……

一堆堆烏雲，像青色的火焰，在無底的大海上燃燒。

大海抓住閃電的箭光，把它們熄滅在自己的深淵裡。

這些閃電的影子，活像一條條火蛇，在大海裡蜿蜒流動，一晃就消失了。

「暴風雨！暴風雨就要來啦！」

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閃電中間，高傲地飛翔；
這是勝利的預言家在叫喊：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紀念會籌備後記

■嚴格說起來，我跟曾醫師的交情不深，僅從文章和工作上認識。參與追思紀念會的籌備，主要是希望能為曾媽媽和育勤分擔解憂。

籌備小組用了曾醫師喜歡的一句話「為了前進的回顧」作為紀念主軸。近年深深感受「前進」不難喊、「回顧」容易讀，然而，時光依然飛逝得與己無關，不願期許也自無法如曾醫師般勤勉，惟想起曾醫師對我說過，一人，是要勞動的！在與家屬和籌備成員們的協力過程中意識到，即便步伐微不足道，都得確實邁出，才不至於讓「前進」停留在態度。剛跨出的這一步，還得繼續。(中)

■「曾醫師，我說好你就開始」，這應該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與曾醫師的交談，那是請他拍推薦陳映真全集時的對話。這幾天挑選曾醫師的照片，一直被純粹而堅定的眼神吸引著，從他年輕時的照片中透露的熱情與東部山野的氣質，我了解了週遭的人每當提到曾醫師時，為什麼總是流露出「一股溫暖的笑容。(佳)

■魯迅：「生命不怕死，在死的前面，跳著笑著，從死裡向前進。」

二〇一二年林書揚先生病逝北京，曾醫師在給我的一封信裡引用了這段話，並註明這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廿日《人民導報》上，由黃榮燦主編《南虹》副刊（第十八期）的刊頭語。從曾醫師離開到這場追思會，我始終想起這段寄語，既是對自己的期許，更鼓舞著所有認識、以及還來不及認識曾醫師的人：「向前進」。(凱)

■念想 想說的都在前文裡。如還要說，只有痛苦。時代都會過去但未來也永在，差別或是，過去的人情即便凋落仍可見著隱約集體輪廓，接下來的卻無從揣想。(本)

■籌備的過程中我常想，曾醫師如果看到我們為他準備的這場小小的追思會，是否會滿意？這二百多頁的紀念文字，是否足以告慰他一生的跋涉？我願意相信他會看到的。我們將前行，然而這不意味著紀念的結束。或許前行的方向仍未昭明，但曾醫師的努力，給了我們某些支點，足以撬動這寂寞室塞的現實。曾醫師，前方的風景，我們創造給您看。(潔)

■感謝王墨林（大墨）、施善繼、曾淑霞、黃雅慈、陳俊西、黃亨勻、王睿、顧玉玲、宋文揚

一同參與「海燕朗誦隊」，感謝王明輝（○○）和劉雅芳的音樂協力，和關晨引的舞蹈呈現。

和曾醫師相識的時間不長，沒有幾年，卻留下令人難忘的印記。他所擺上的一切，所努力的成果，也許我們永遠也追趕不上。只是曾醫師未完成的課題，依舊有力地質問者仍有氣息的你我。在餘地完工作答？(哲)

■一九六六年，青年節！多麼美的詞兒。可不是青年的節日。天知道今日的青年，不！應說中國的青年剛從傳統底裏布裡昇出頭來透氣，但不幸的國難卻當頭壓下，今日的青年苟且，他們不會「五四」的反抗，只是苟延殘喘。(三丑)

一直在想分泌塑造一個善良的心，一個小小的好小女孩，那我要以永恆鎖著它，以萬年的愛，以可容下全宇宙的愛情喂它，斯時，時間不再！風化不再！(土卅)

朔朔的北風中，母親來了，從充滿忙碌的日子中來看我，帶著我沒看著她長大的幼妹來了！冷冰冰的雙頰頓時熱烘，到了花蓮問我要那好孝敬您！偉大的母親！(王二)

我要去那片沙漠——勞倫斯——的沙漠。還記得勞倫斯碧瞳中那份虛無嗎？(王二)

他們說：「卓溪在地圖上找不到，只有一條街和蕃仔住的地方。」哼！他口的！神什麼？看著吧，我溫馨的故鄉，我要改造您成一輝煌的地方，一個每人知道的地方。(王三)(健民)

■我刪掉的一段：「藉用釋家的用語，曾醫師讓我認識到，「老同學」這個果位，是可以自力修行修來的」(一一)

■本次參與紀念會籌備的主要成員有：育勤、一明、李中、鈞凱、良哲、佳明、立本、舒潔、士杰。紀念冊編輯風格特意沿襲《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與《方向叢刊》風格並模仿光復初期刊物版式。感謝所有供稿者更感謝曾醫師對台灣社運與民族再統一運動留下的思想遺產。讓我們活學活用、實現志業！(杰)

■這一個月以來的資料蒐集與密集討論，帶我拾回塵封已久的記憶，認識不曾探究的過去，並堅固工作伙伴間的連結。希望這本滿載思念、理想、回憶與熱情的手冊能帶著大家一同回顧，並肩前進。(勳)